

斯大林全集

第五卷



目 錄

第五卷說明 一—二

一九二二年

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突厥語系民族共產黨員會議上的

開幕詞（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記錄） 三—四

我們的意見分歧 五—三

一 對待工人羣衆的兩種方法 六

二 自覺的民主和被動的『民主』 八

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討論並經

黨中央批准的提綱） 一四—二四

一 資本主義制度和民族壓迫 一四

二 蘇維埃制度和民族自由	七
三 俄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	二〇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	三五—三九
一 關於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的報告(三月十日)	三七—三五
二 結論(三月十日)	三六—三九
給弗·伊·列寧的信	四〇—四二
論民族問題的提法	四三—四七
致山民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賀電	四八—四九
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戰略和策略(小冊子的大綱)	五〇—七〇
一 術語的定義和研究對象	五〇
二 俄國發展中的歷史轉變	五四
三 問題	五六
關於共產主義在格魯吉亞和南高加索的當前任務(在格魯吉亞共產黨 梯弗里斯黨組織全體黨員大會上的報告)(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	七一—八〇
黨在取得政權以前和以後	八一—九〇
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民族政策	九一—九四

前途..... 五—一〇三

一九二二年

給『真理報』..... 一〇四

紀念『真理報』創刊十周年(回憶)..... 一〇五—一〇九

一 連納事件..... 一〇五

二 『真理報』的創辦..... 一〇六

三 『真理報』的組織作用..... 一〇七

列寧同志在休養中(短文)..... 一〇一—一〇三

致彼得格勒，致代表蘇維埃的賀電..... 一一三

關於各獨立民族共和國的聯合問題(和『真理報』記者的談話)..... 一一四—一二九

論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在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二〇—一二六

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立(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二九—一三三

一九二三年

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戰略和策略問題

一 要預先確定的幾個概念

一、工人運動的兩個方面

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綱領

三、戰略

四、策略

五、鬥爭形式

六、組織形式

七、口號。指示

二 戰略計劃

一、歷史轉變。戰略計劃

二、第一個歷史轉變和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方針

三、第二個歷史轉變和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方針

四、第三個歷史轉變和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方針

三三〇頁
三三一頁
三三二頁
三三三頁
三三四頁
三三五頁
三三六頁
三三七頁
三三八頁
三三九頁
三四〇頁
三四一頁
三四二頁
三四三頁
三四四頁
三四五頁
三四六頁
三四七頁
三四八頁
三四九頁
三五十頁

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提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討論並經

黨中央批准的提綱）……………一四九—一五〇

一……………一四九

二……………一五〇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一五九—一六〇

一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四月十七日）……………一六一—一六〇

二 關於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的結論（四月十九日）……………一六一—一九一

三 關於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四月二十三日）……………一九一—二三三

四 關於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的結論（四月二十五日）……………二三三—二三三

五 對決議案的修改意見的答覆（四月二十五日）……………二三三—二三六

六 對民族問題委員會的報告的補充（四月二十五日）……………三三七—三三八

報刊是集體的組織者……………三三九—三三三

欲蓋彌彰……………三三三—三三六

有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負責工作人員參加的俄共（布）中央

第四次會議（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三三七—三三八

一 提交第四次會議討論並經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民族問題綱領草案……………三三九—三四〇

黨在民族問題方面工作的總路綫	三九
同設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院和組織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部有關的問題	四〇
吸收當地居民中的勞動分子參加黨的建設和蘇維埃建設的辦法	四三
關於改善當地居民文化生活狀況的措施	四三
根據民族生活習慣的特點進行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	四三
關於組織民族部隊的實際措施	四四
組織黨的教育工作	四五
爲貫徹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挑選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	四五
二 關於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內的右派和「左派」(關於會議第一項議程 「蘇丹—加里也夫事件」的演說)(六月十日)	四六—四五
三 貫徹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的實際措施(關於第二項 議程的報告)(六月十日)	五五—六六
四 結論(六月十二日)	六七—七六
五 對發言的答覆(六月十二日)	七六—七八
十月革命和中間階層問題	七九—八三
紀念女工和農婦第一次代表大會五周年	八四—八六

在軍事學院慶祝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簡要報道）	二六七—二六八
關於黨的任務（在小組長、爭論俱樂部成員和支部委員會委員參加的俄共（布）紅色勃列斯尼亞區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二八九—三〇三
爭論是黨堅強有力的標誌	二八九
爭論的原因	二九〇
黨內生活的缺點	二九一
造成缺點的原因	二九四
怎樣消滅黨內生活的缺點？	二九六
關於爭論，關於拉法伊爾，關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論文和薩普龍諾夫的信	三〇三—三〇六
關於爭論	三〇三
關於拉法伊爾	三〇六
關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論文	三〇八
關於薩普龍諾夫的信	三一
關於托洛茨基的信	三三
必要的指摘（關於拉法伊爾）	三七—三九

致「共產黨人報」的賀電	三三〇
附錄	三三一—三三〇
附錄一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宣言	三三一
附錄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條約	三三四
註釋	三三一—三四
年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	三四—三三

第五卷說明

『斯大林全集』第五卷包括約·維·斯大林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的著作。

本卷主要包括關於黨在恢復國民經濟方面的任務、關於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工農聯盟的新形式、關於加強黨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統一以及關於黨和羣衆聯系的形式和方法的論文、報告和演說（『我們的意見分歧』、『關於共產主義在格魯吉亞和南高加索的當前任務』、『前途』、在黨的第十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編入本卷的還有小冊子的大綱『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戰略和策略』以及『黨在取得政權以前和以後』、『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戰略和策略問題』兩篇論文，在這些著作中約·維·斯大林發展了列寧關於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戰略和策略的學說。

編入第五卷的很大一部分著作論述了民族問題理論的發展、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政策、蘇維埃多民族國家的建設和蘇聯第一個憲法基本原則的擬定（提交黨的第十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提綱、在黨的第十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及有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負責工作人員參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會議上的報告、在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

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以及『論民族問題的提法』、『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民族政策』等論文)。

本卷第一次發表了『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戰略和策略』(小冊子的大綱)、『民族問題綱領草案』、有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負責工作人員參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會議上的『貫徹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的實際措施』的報告、報告的結論和對發言的答覆。

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

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突厥語系民族共產黨員會議上的開幕詞

(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記錄)

斯·大·林同志宣佈會議開幕，指出中央局的工作不能令人滿意，中央局應當改選，接着他簡短地說明了共產主義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突厥語系民族中的發展情況。

俄羅斯共產主義的發展在俄羅斯社會主義內部有幾十年理論工作和理論鬥爭的悠久歷史。經過這種鬥爭，形成了團結一致的領導集團，他們在理論方面很強，並且能堅持原則，足以領導黨員羣衆。我國東部的共產主義則與此不同，它是不久前在爲社會主義而進行實際革命鬥爭的過程中產生的，沒有預先經過理論發展階段。突厥語系民族的共產主義在理論方面差，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只有用我國突厥語系民族各種語言出版有原則性的共產主義書刊，才能消除這種缺點。

在俄羅斯共產主義發展的歷史中，同民族主義傾向作鬥爭從未有過重大的意義。所有的俄羅斯人，其中包括俄羅斯共產黨員，過去都是統治民族，他們沒有經受過民族壓迫，除了某些『大國沙文主義』的情緒外，一般說來，他們中間沒有發生過民族主義傾向，因此他們用不着，或者幾乎用不着

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突厥語系民族共產黨員會議上的開幕詞

去克服這種傾向。

突厥語系民族的共產黨員是經歷過民族壓迫階段的被壓迫民族的兒女，他們與此不同，他們中間過去和現在都存在着民族主義傾向和民族主義殘餘，因此克服這種傾向和剷除這些殘餘是突厥語系民族共產黨員的當前任務。毫無疑問，這種情況阻礙了我國東部共產主義的形成。

但是東部的共產主義也有它有利的一面。俄羅斯共產黨員在實行社會主義方面，沒有或者幾乎完全沒有歐洲先進國家的經驗可以利用（歐洲所提供的主要是國會鬥爭的經驗），因此，他們就不得不用所謂自己的方法去開闢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犯了許多錯誤。

突厥語系民族的共產主義則與此不同，它是在和俄羅斯同志並肩爲社會主義而進行實際鬥爭的過程中產生的，它有可能利用俄羅斯同志的實際經驗而避免犯錯誤。這種情況保證東部共產主義完全有可能迅速發展和鞏固。

所有這些情況決定了黨中央對還很年輕的突厥語系民族的共產主義採取比較緩和的政策，幫助東部堅定的共產主義分子同突厥語系民族共產主義的上述弱點和缺點進行鬥爭。

中央局是一個應當採取各種辦法同民族主義殘餘進行鬥爭並在理論上加強我國東部共產主義的機關。

載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真理報」第六號

我們的意見分歧

我們在工會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並不在對工會的原則性的估價方面。托洛茨基經常援引的我們黨綱中關於工會作用的那些人所共知的條文和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關於工會的決議^(三)，現在有效，將來仍然有效。工會和經濟機關應當而且一定要融合起來（『結合』），這是沒有人爭論的。我國現今的經濟恢復時期要求目前還只是口頭上的產業工會逐漸變成能振興我國各基本工業部門的真正的產業工會，這是沒有人爭論的。簡單地說，我們的意見分歧並不是原則性的意見分歧。

我們的意見分歧也很少涉及在工會和整個工人階級中建立勞動紀律的必要性問題。有人說我們黨內有一部分人『放鬆了韁繩』，因而使羣衆受自發勢力的玩弄，這是一種未加思考的說法。黨員在工會中和工會在工人階級中的領導作用始終是無可爭辯的真理。

我們的意見分歧更少涉及工會中央委員會和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成員的質量問題。大家一致認為這些機構的成員遠不够理想，工會已被一連串軍事動員和其他動員弄得空虛不堪，應當把工會舊的工作人員交還工會並增添新的工作人員，必須供給它們設備等等。

不，我們的意見分歧不在這方面。

一 對待工人羣衆的兩種方法

我們的意見分歧在下列幾個問題上：加強工人階級的勞動紀律的方式問題；對待被吸引來參加恢復工業事業的工人羣衆的方法問題；把目前薄弱的工會變成能夠恢復我國工業的強有力的真正的產業工會的途徑問題。

有兩種方法：強迫方法（軍事方法）和說服方法（工會方法）。第一種方法決不排斥說服的因素，而說服的因素在這裏服從於強迫方法的要求並且是它的輔助手段。第二種方法也不排斥強迫的因素，而強迫的因素在這裏服從於說服方法的要求並且是它的輔助手段。把這兩種方法混淆起來是不能容許的，正像不容許把軍隊和工人階級混淆起來一樣。

以托洛茨基爲首的一批黨的工作人員醉心於軍隊中軍事方法的成就，認爲可以而且應當把這種方法搬到工人中間來，搬到工會中來，以便在鞏固工會和恢復工業方面獲得同樣的成就。可是這批人忘記了軍隊和工人階級是兩個不同的集團，對軍隊適用的方法對工人階級及其工會可能是不適用的和有利的。

軍隊並不是單一的整體，它是山兩個基本社會集團即農民和工人組成的，而前者比後者多好幾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三〕}在論證軍隊中主要採用強迫方法的必要性時所出的出發點是：我們的軍

隊主要是由農民組成，而農民是不會為社會主義進行鬥爭的，鬥爭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必需的。由此就產生了像政委制度和任制等等純粹軍事性的工作方法。

與軍隊相反，工人階級是一個單一的社會集團，他們的經濟受共產主義的鼓動，自願地組織工會，所有這一切使他們成為採用說服方法是我們產業工會的實際工作基礎，這是毫不奇怪。傳、發揮工人羣衆的主動性和自動精神、選舉制等等純粹工會。托洛茨基的錯誤就在於他低估了軍隊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差距（大概是由於惰性）把軍事方法從軍隊中搬到工會中來，搬到托洛茨基在一個文件中說道：『把軍事方法（命令、懲神）單純地對立起來就是考茨基主義、孟什維主義和社會勞動組織和軍事組織對立起來就是可恥地向考茨基主義和托洛茨基就是這樣說的。

把『考茨基主義』、『孟什維主義』等廢話撇開不談，很明顯組織之間的差別，不了解在消除了戰爭和恢復工業的時期把軍事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而把軍事方法搬到工會中來是錯誤。

我們的意見分歧

這種不了解就是不久前出版的托洛茨基關於工會的一些論戰性小冊子的基礎。這種不了解就是托洛茨基的錯誤的根源。

二 自覺的民主和被動的『民主』

有些人認為，談論工會內的民主是放空砲，是黨內生活的某些現象所引起的時髦風氣，認為關於民主的『空談』將被厭棄，而一切將『照舊』進行。

另外一些人認為，工會內的民主在實質上是一種讓步，是對工人的要求的一種迫不得已的讓步，認為我們在這裏與其說是在嚴肅認真地辦事，不如說是在耍外交手腕。

不用說，這些同志大錯特錯了。工會內的民主，即通常稱為『工會內部無產階級民主的正常方法』，是羣衆性的工人組織所固有的自覺的民主，這種民主是以認識到對組織在工會內的千百萬工人羣衆經常採用說服方法是必要的和有益的這一點為前提的。不認識到這一點，民主就會變成空談。

當戰爭正在進行和危險迫近的時候，我們組織發出的『支援前綫』的號召得到了工人熱烈的響應，因為滅亡的危險在當時很容易覺察，因為這種危險十分具體，大家一目了然，這就是高爾察克、尤登尼奇、鄧尼金、皮爾蘇茨基、弗蘭格爾的軍隊在向前推進並在恢復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當時發動羣衆是不困難的。但是現在，當軍事危險已經消除，而羣衆對於新的危險即經濟危險（經濟破壞）

還遠不那麼容易覺察的時候，單靠號召來發動廣大羣衆就不行了。當然，糧食和布疋的缺乏是大家都能感覺到的，但是，第一、人們總是想盡辦法尋找糧食和布疋，因此糧食不足和商品缺乏的危險遠沒有像軍事危險那樣鞭打羣衆；第二、誰也不會斷言羣衆一定認識到經濟危險（缺乏機車、農業機器、紡織工廠和冶金工廠，缺乏電站的設備等等）和不久以前的軍事危險同樣現實。爲了推動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同經濟破壞作鬥爭，就必須發揮廣大羣衆的主動性、自覺性和自動精神，必須用具體事實來說服他們，使他們確信經濟破壞也和昨天的軍事危險一樣是現實的致命的危險，必須通過按民主方式建立起來的工會吸引千百萬工人參加恢復生產的工作。只有這樣才能把經濟機關同經濟破壞的鬥爭變成整個工人階級的切身事業。否則就不可能在經濟戰綫上取得勝利。

簡單地說，自覺的民主，工會內部無產階級民主的方法，是產業工會唯一正確的方法。被迫的「民主」同這種民主毫無共同之處。

讀了托洛茨基的「工會的作用和任務」這本小冊子後，可能認爲托洛茨基在實質上「也」贊成「民主」方法。某些同志根據這一點就認爲工會的工作方法問題不是我們的分歧點。這是完全不對的。因爲托洛茨基的「民主」是被迫的、不徹底的、無原則的民主，這樣的民主只能補充對工會不適用的軍事實僚主義方法。

請你們自己判斷吧。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初中央做了決定，全俄工會第五次代表會議共產黨黨團根據中央的決定通過

了下面的決議：『必須最堅決最有計劃地反對由集中制和軍事化的工作方式蛻化為官僚主義、剛愎自用、官場習氣和對工會的瑣碎監督……對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托洛茨基所領導的運輸工人中央委員會）來說，因特殊條件而實行特殊管理方法（為此成立了鐵道總政治部）的時期也開始結束』，因此，代表會議的共產黨黨團『建議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大力推行和廣泛使用工會內部無產階級民主的正常方法』，責成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積極參加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的一般工作，並與其他工會組織同等的資格加入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見『真理報』第二五五號）。但是，托洛茨基和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竟不顧這項決議，在整個十一月份內繼續實行半官僚主義半軍事的老路綫，照舊依靠鐵道總政治部和水運總政治部，企圖『整刷』和破壞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捍衛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對其他工會組織的特權地位。此外，托洛茨基在十一月三十日『給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信中又『突然』聲明說：『水運總政治部……在最近兩三個月內無論如何還不能解散。』結果怎樣呢？在這封信發出六天以後（十二月七日），同一個托洛茨基又在中央委員會『突然』贊成『立即撤銷鐵道總政治部和水運總政治部，並且根據正常的民主原則將這兩個機關的全部人員和資產移交給工會組織』。他是贊成這一點而反對七個中央委員的八個中央委員之一，當時有七個中央委員認為撤銷這些機關還不够，他們要求更換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現有的成員。爲了挽救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現有的成員，托洛茨基贊同撤銷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的總政治部。

這六天內有什麼變化呢？也許鐵路員工和水運員工在這六天內已經成長到不再需要鐵道總政治

部和水運總政治部了吧？或者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國內或國外的政治局勢發生重大的變化了吧？當然不是。問題在於水運員工堅決要求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撤銷總政治部，更換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的成員，而托洛茨基集團怕自己垮台，希望至少能保住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舊有的成員，於是不得不退却，做了一些誰也不能滿足的局部的讓步。

事實就是這樣。

未必用得着證明，這種被迫的、不徹底的、無原則的『民主』同『工會內部無產階級民主的正常方法』毫無共同之處，黨中央還在十一月初就提出了『工會內部無產階級民主的正常方法』，它對振興我們的產業工會是非常必要的。

*

*

*

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共產黨黨團的討論會⁽¹⁾上，托洛茨基在他的結束語中反對把政治因素加進關於工會的爭論中去，斷言這和政治毫不相干。應當指出，托洛茨基在這裏是根本不對的。未必用得着證明，在工農國家裏，沒有一項具有全國意義的重要決議，特別是直接關係到工人階級的決議，可以在一定方面反映國家的政治狀況而被通過。並且一般說來，把政治和經濟分割開來是可笑的不嚴肅的。正因為如此，對每一項這樣的決議必須預先也從政治方面來評價。

請你們自己判斷吧。

現在可以認為已經證實，托洛茨基所領導的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的工作方法已經被運輸工會中

中央委員會的實踐推翻了。托洛茨基領導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並通過它去影響其他工會，本想活躍和振興工會，吸引工人參加恢復工業的工作。可是事實上他得到了什麼呢？他得到的是：同工會內部大多數共產黨員的衝突，大多數工會同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的衝突，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實際上的分裂，組織到工會中的工人「下層」痛恨「專員」。換句話說，不但沒有使工會振興起來，而且連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本身也開始瓦解了。毫無疑問，如果把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的工作方法搬到其他工會裏去，那末那裏也會出現同樣一幅衝突、分裂和瓦解的圖畫。結果工人階級中就會產生渙散和分裂。

工人階級政黨能不顧這些事實嗎？能不能斷定說，我國工人階級團結在統一的工會中或者分裂成不同的互相敵對的集團，這對我國的政治情況來說都是一樣呢？能不能說，在估計對待羣衆的方法問題上政治因素不應當起任何作用，說這同政治毫不相干呢？

顯然不能。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同它聯盟的各共和國現在約有一億四千萬人口。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農民。要管理這樣的國家，蘇維埃政權就必須得到工人階級牢固的信任，因為只有通過工人階級並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才能領導這樣的國家。但是要保持和鞏固大多數工人的信任，就必須不斷發揮工人階級的自覺性、自動精神和主動性，必須用共產主義的精神不斷教育工人階級，把他們組織到工會中來，吸引他們參加共產主義經濟建設事業。

用強迫和從上面『整刷』工會的方法來實現這個任務顯然是不行的，因為這些方法會分裂工人階級（請看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會引起對蘇維埃政權的不信任。此外，不難理解，採用強迫的方法一般說來既不能發揮羣衆的自覺性，也不能加強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信任。

顯然，只有用『工會內部無產階級民主的正常方法』，只有用說服的方法，才能完成團結工人階級、發揮他們的自動精神和加強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信任的任務，爲了發動全國去同經濟破壞作鬥爭，這種信任在目前是非常必要的。

可見，政治也是贊成用說服方法的。

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

載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真理報」第十二號

署名：約·斯大林

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

(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討論並經黨中央批准的提綱(五))

一 資本主義制度和民族壓迫

一、現代民族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產物。封建主義消滅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就是人們形成爲民族的過程。英吉利人、法蘭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都是在資本主義打破封建割據局面而勝利發展時形成民族的。

二、凡民族的形成和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在時間上大體一致的地方，那裏的民族自然就具有國家的外貌，發展成獨立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英國(愛爾蘭除外)、法國、意大利的情形都是如此。東歐却與此相反，由於自衛(抵禦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人的侵犯)的需要而加速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早於封建主義的消滅，因而也早於民族的形成。所以這些地方的民族沒有發展成也不能發展成民族國家，而建立了一些混合的多民族的資產階級國家，這些國家通常都由一個強大的統治民族和幾個弱小的從屬民族組成。奧地利、匈牙利、俄國就是這樣。

三、像法國和意大利這種最初主要是依靠本民族力量的民族國家，一般說來是沒有民族壓迫的。

而建築在一個民族（確切些說是這個民族的統治階級）對其餘民族的統治上面的多民族國家則與此相反，它們是民族壓迫和民族運動的發源地和主要舞台。統治民族的利益和從屬民族的利益之間的矛盾如果不解決，多民族的國家就不能穩固地存在。多民族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悲劇就在於它無力解決這些矛盾，它想在保存私有制和階級不平等的情況下使各民族「平等」並「保護」少數民族，結果每一次總是失敗，民族衝突更加尖銳化。

四、歐洲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對新的銷售市場的需要，對原料和燃料的尋求，帝國主義的發展，資本的輸出以及海上和鐵路交通幹綫的必須保證，一方面促使舊的民族國家去奪取新的領土，促使舊的民族國家變成必然有民族壓迫和民族衝突的多民族（殖民）國家（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另一方面加強了舊的多民族國家的統治民族的野心，它們不僅想保持原有的國界，還想向外擴張，靠侵佔鄰國使新的（弱小的）民族隸屬於自己。於是民族問題擴大了，並且終於自然而然地同整個殖民地問題融合起來了，而民族壓迫就由國內的問題變成國際的問題，變成帝國主義「大」國為征服弱小的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而進行鬥爭（和戰爭）的問題。

五、帝國主義戰爭徹底揭露了資產階級多民族國家的不可調和的民族矛盾和內部的軟弱，它使戰勝的殖民國家（英國、法國、意大利）內部的民族衝突極端尖銳化，使戰敗的舊的多民族國家（奧地利、匈牙利、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徹底崩潰，最後，使新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芬蘭、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等）組織起來，——這是資產階級解決民族問題的最「激進

的『辦法。但是新的獨立的民族國家的組成並沒有確立也不可能確立各民族的和睦共處，沒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壓迫，因為建立在私有制和階級不平等基礎上的新的民族國家自己要在存在下去，那就必須——

(甲) 壓迫自己的少數民族（波蘭壓迫白俄羅斯人、猶太人、立陶宛人、烏克蘭人；格魯吉亞壓迫沃舍梯人、阿布哈茲人、阿爾明尼亞人；南斯拉夫壓迫克羅地亞人、波斯尼亞人等等）；

(乙) 靠侵佔鄰國來擴張自己的領土，這就會引起衝突和戰爭（波蘭侵犯立陶宛、烏克蘭、俄羅斯；南斯拉夫侵犯保加利亞；格魯吉亞侵犯阿爾明尼亞、土耳其等等）；

(丙) 在財政、經濟和軍事方面依附帝國主義『大』國。

六、這樣，戰後時期便展現了一幅令人不愉快的圖畫——民族仇視，不平等，壓迫，衝突，戰爭，文明國家各民族相互之間以及它們對沒有充分權利的各民族所進行的帝國主義野蠻行爲。一方面，幾個『大』國壓迫和剝削所有附屬的和『獨立的』（實際上完全是附屬的）民族國家，這些強國彼此間爲爭奪剝削各民族國家的獨佔權而鬥爭；另一方面，附屬的和『獨立的』民族國家爲反對『大』國的難以忍受的壓迫而鬥爭；民族國家彼此間爲擴張自己的民族領土而鬥爭；民族國家各自爲壓迫自己的被壓迫少數民族而鬥爭。最後，殖民地反對『大』國的解放運動日益加強，這些『大』國內部以及一般都有幾個少數民族的民族國家內部的民族衝突日益尖銳。

帝國主義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和平圖畫』就是這樣。

資產階級社會在解決民族問題方面完全破產了。

二 蘇維埃制度和民族自由

一、私有制和資本必然使人們離散，燃起民族紛爭，加強民族壓迫，而集體所有制和勞動却必然使人們接近，去除民族紛爭，消滅民族壓迫。沒有民族壓迫，資本主義的存在是不可思議的，同樣，沒有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沒有民族自由，社會主義的存在也是不可思議的。只要充滿民族主義偏見的農民（以及整個小資產階級）跟着資產階級走，沙文主義和民族鬥爭就必不可免，相反地，如果農民跟着無產階級走，也就是說如果無產階級專政有了保證，那就可以認為民族和平和民族自由有了保證。因此，蘇維埃的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確立是消滅民族壓迫、確立民族平等、保證少數民族權利的基本條件。

二、蘇維埃革命的經驗完全證實了這個原理。蘇維埃制度在俄國的確立和各民族有國家分離權的宣佈，根本改變了俄國各民族勞動羣衆之間的關係，消除了過去的民族仇視，摧毀了民族壓迫的基礎，因而不僅取得了俄國其他民族工人兄弟對俄羅斯工人的信任，也取得了歐洲和亞洲各民族工人兄弟對俄羅斯工人的信任，並且已經把這種信任化爲共同事業奮鬥的熱情和決心。蘇維埃共和國在阿捷爾拜疆和阿爾明尼亞的成立也獲得了同樣的結果，民族衝突消滅了，土耳其和阿爾明尼亞勞

動羣衆間、阿爾明尼亞和阿捷爾拜疆勞動羣衆間的「百年」仇視也消除了。蘇維埃在匈牙利、巴伐利亞和拉脫維亞的暫時勝利也是一樣。另一方面，可以確信地說，不消滅自己家裏的民族仇視和民族壓迫，沒有西方和東方各民族勞動羣衆對俄羅斯工人的信任和熱情支援，俄羅斯工人就不能戰勝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而阿捷爾拜疆共和國和阿爾明尼亞共和國也就不能立足。各蘇維埃共和國的鞏固和民族壓迫的消滅，是勞動人民擺脫帝國主義奴役的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

三、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存在，即使是面積很小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存在，對帝國主義都是致命的威脅。這個威脅不僅在於各蘇維埃共和國同帝國主義斷絕關係後已經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變成真正獨立的國家，因而使帝國主義者失去了一塊額外的領土和額外的收入，而首先在於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存在本身，這些共和國在鎮壓資產階級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上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最有力的鼓動，都是號召附屬國擺脫帝國主義奴役的鼓動，都是使各色各樣的資本主義瓦解和解體的不可克服的因素。因此，帝國主義「大」國就必然要反對蘇維埃共和國，力圖消滅這些共和國。「大」國同蘇維埃俄國鬥爭的歷史，「大」國嫉使一個個邊疆地區的資產階級政府和一羣羣反革命將軍反對蘇維埃俄國，嚴密封鎖它和竭力設法在經濟上孤立它的歷史，雄辯地說明在目前的國際關係中，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下，任何一個單獨的蘇維埃共和國都不能認爲自己能保證不會在經濟上枯竭，不會在軍事上被世界帝國主義打敗。

四、因此，各個蘇維埃共和國孤立的存在是不穩固不牢靠的，因爲資本主義國家威脅着它們的生

存。第一、各蘇維埃共和國國防的共同利益，第二、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生產力的任務，第三、產糧的蘇維埃共和國給予不產糧的蘇維埃共和國必要的糧食幫助，——這三者絕對要求各個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國家聯盟，這是免遭帝國主義奴役和民族壓迫的唯一道路。從『本族的』和『異族的』資產階級手中解放出來的各民族蘇維埃共和國，只有聯合成緊密的國家聯盟才能使自己生存下去，才能戰勝帝國主義的聯合力量，否則就要完全失敗。

五、以軍事和經濟事務的共同要求為基礎的蘇維埃共和國聯邦，是國家聯盟的一般形式，這種形式可以——

(甲) 保證各個共和國和整個聯邦的完整性和經濟發展；

(乙) 把不同發展階段上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一切不同的生活習慣、文化和經濟狀況包羅在一起，並根據這種不同情況採用這種或那種聯邦形式；

(丙) 建立那些把自己的命運同聯邦的命運這樣或那樣聯系起來的民族和部族的和睦共處和兄弟合作。

俄國採用各種形式的聯邦的經驗，從以蘇維埃自治(柯爾克茲、巴什基里亞、韃靼、山民、達格斯坦)為基礎的聯邦，過渡到以與各獨立蘇維埃共和國(烏克蘭、阿捷爾拜疆)建立條約關係為基礎的聯邦以及介於這二者之間的形式(土爾克斯坦、白俄羅斯)的經驗，完全證實把聯邦作為各蘇維埃共和國國家聯盟的一般形式是很適當很靈活的。

六、但是，只有依靠加入國相互信任和自願協議，聯邦才能鞏固，才能得到實際的效果。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是世界上對許多民族和部族和睦共處及兄弟合作的試驗獲得成功的唯一國家，因為這裏既沒有統治者，也沒有從屬者；既沒有宗主國，也沒有殖民地；既沒有帝國主義，也沒有民族壓迫，——這裏聯邦是以各民族勞動羣衆的相互信任和自願聯合的願望為基礎的。聯邦的這種自願性質今後還必須繼續保持，因為只有這樣的聯邦才能成爲一種過渡形式，使世界各國勞動人民達到在統一的世界經濟範圍內的高度團結，這種團結的必要性已愈來愈明顯了。

三 俄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

一、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同它聯盟的各蘇維埃共和國約有一億四千萬人口。其中非大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柯爾克茲人、烏茲別克人、土爾克明人、塔吉克人、阿捷爾拜疆人、伏爾加河流域的韃靼人、克里木的韃靼人、布哈拉人、希瓦人、巴什基里亞人、阿爾明尼亞人、徹岑人、卡巴爾達人、沃舍梯人、切爾克斯人、英谷什人、卡拉恰也夫人、巴爾卡爾人[⊖]、卡爾梅克人、卡列里亞人、阿瓦里亞人、達爾根人、卡集·庫穆赫人、庫林人、庫梅克人[⊖]、馬里人、楚瓦什

⊖ 後面七個部族統稱爲「山民」。

⊖ 後面五個部族統稱爲「達格斯坦人」。

人、沃加克人、伏爾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布里亞特人、雅庫特人等）約有六千五百萬。

沙皇政府，地主和資產階級對這些民族的政策是：剷除它們中間任何國家制度的萌芽，摧殘它們的文化，限制它們的語言，使它們愚昧無知，盡量使它們俄羅斯化。實行這種政策的結果，使這些民族不能充分發展並造成了它們政治上的落後。

現在，當這些地區的地主和資產階級也已經被推翻，人民羣衆宣佈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候，黨的任務就是幫助非大俄羅斯各族勞動羣衆趕上走在前面的俄國中部，幫助他們：

（甲）在他們那裏發展和鞏固適合他們民族面貌的形式的蘇維埃國家制度；

（乙）在他們那裏設立使用本族語言的、由熟悉當地居民生活習慣和心理的本地人組成的法院、行政、經濟和政權機關；

（丙）在他們那裏發展使用本族語言的報刊、學校、劇院、文娛事業以及一般文化教育機關。

二、在六千五百萬非大俄羅斯人口中，除了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經過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烏克蘭、白俄羅斯、阿捷爾拜疆的一小部分和阿爾明尼亞以外，剩下的約二千五百萬主要是突厥語系人口（土爾克斯坦、阿捷爾拜疆大部分、達格斯坦、山民、韃靼人、巴什基里亞人、柯爾克茲人等），他們還沒有來得及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或者幾乎沒有自己的工業無產階級，多半還保存着游牧經濟和父權制氏族生活方式（柯爾克茲、巴什基里亞、北高加索），或者還沒有脫離半父權半封建的原始生活方式（阿捷爾拜疆、克里木等），但是已被納入蘇維埃發展的總軌道。

黨對這些民族的勞動羣衆的任務（除第一點所指出的以外），就是幫助他們消滅父權制封建關係的殘餘，並且以勞動農民蘇維埃爲基礎，通過在這些民族中間建立堅強的共產黨組織的辦法幫助他們參加蘇維埃經濟建設，這些共產黨組織要能夠利用俄羅斯工人和農民在蘇維埃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同時要能夠在自己的建設工作中估計到每個民族的具體經濟狀況、階級結構、文化和生活習慣的一切特點，而不是機械地搬用只適用於另一種經濟發展較高階段的俄國中部的經濟措施。

三、在二千五百萬主要是突厥語系人口中，除了阿捷爾拜疆、土爾克斯坦大部分、韃靼人（伏爾加河流域的和克里木的）、布哈拉、希瓦、達格斯坦、一部分山民（卡巴爾達人、切爾克斯人、巴爾卡爾人）和其他某些已經定居並固定在一定地域的民族以外，剩下的約六百萬是柯爾克茲人、巴什基里亞人、撒岑人、沃舍梯人、英谷什人，他們的土地直到最近還是俄羅斯移民的殖民對象，這些俄羅斯移民奪去了他們較好的耕地，一步步地把他們排擠到貧瘠的荒地上去。

沙皇政府，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政策就是在這些地區的俄羅斯農民和哥薩克中間培植更多的富農分子，把他們變成滿足大國野心的可靠支柱。實行這種政策的結果就是當地的土著居民（柯爾克茲人、巴什基里亞人）被排擠到窮鄉僻壤而逐漸死亡。

黨對這些民族的勞動羣衆的任務（除了第一點和第二點所說的以外），就是把他們和當地俄羅斯居民中的勞動羣衆爲擺脫富農、特別是爲擺脫掠奪成性的大俄羅斯富農的壓迫而進行鬥爭的力量聯合起來，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幫助他們打倒富農殖民者，從而保證他們有可耕的、爲過人的生活所必需的土地。

四、除了上述那些具有一定階級結構和佔有一定地域的民族和部族以外，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還有一些流動的民族集團和少數民族（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波蘭人、猶太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它們攙雜在其他聚居的民族中，多半沒有一定的階級結構，也沒有一定的地域。沙皇政府的政策就是採用一切手段，直到採用蹂躪的手段（蹂躪猶太人）來消滅這些少數民族。

現在，當民族特權已經消滅，民族平權已經實現，少數民族自由發展的權利已為蘇維埃制度性質本身所保證的時候，黨對這些民族集團的勞動羣衆的任務就是幫助他們充分利用這個給他們保證了的自由發展的權利。

五、邊疆地區共產黨組織的發展是在某些特殊條件下進行的，這些條件阻礙了黨在這些地區的正常成長。一方面，在邊疆地區工作的大俄羅斯共產黨員是在「統治」民族存在的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民族壓迫，往往縮小民族特點在黨的工作中的意義，或者完全不重視民族特點，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考慮某一民族的階級結構、文化、生活習慣和過去歷史的特點，因而把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政策庸俗化和歪曲了。這種情況就使他們脫離共產主義而傾向於大國主義、殖民主義、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另一方面，當地土著居民中的共產黨員經歷過民族壓迫的苦難時期，他們還沒有完全擺脫民族壓迫的魔影，往往誇大民族特點在黨的工作中的意義，抹殺勞動者的階級利益，或者把某一民族勞動者的利益和這一民族「全民族的」利益簡單地混淆起來，不善於把前者同後者區別開來，根據勞動者的利益進行黨的工作。這種情況也就使他們脫離共產主義而傾向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有時具有大伊斯蘭主義、大突厥主義（在東方）的形式（在東方）。

代表大會堅決斥責了這兩種對共產主義事業有害的和危險的傾向，認為必須指出第一種傾向即大國主義、殖民主義傾向是特別危險和特別有害的。代表大會提醒大家，不剷除黨的隊伍中的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殘餘，就不可能在邊疆地區建立在國際主義基礎上把當地居民和俄羅斯居民中的無產階級分子團結在自己隊伍中的堅強的、聯系羣衆的、真正的共產黨組織。因此，代表大會認為，消除共產主義中的民族主義的、首先是殖民主義的動搖，是黨在邊疆地區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六、由於軍事戰綫上的勝利，特別是在消滅弗蘭格爾以後，在一些沒有或者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落後邊疆地區，市儈民族主義分子爲了升官發財而紛紛爭取入黨。這些人考慮到黨實際上佔着統治地位，常常塗上共產主義的色彩，整批整批地鑽到黨裏來，把掩飾不周的沙文主義和腐化思想帶到黨裏來，邊疆地區的黨組織一般說來是軟弱的，它們並不總是能够抵擋得住通過吸收新黨員來「擴大」黨的那種誘惑。

代表大會號召同一切混進無產階級政黨裏來的冒牌共產黨員作堅決鬥爭，警告黨不要靠吸收知識分子中市儈民族主義分子來「擴大」自己的隊伍。代表大會認為，應當主要依靠吸收邊疆地區的無產者、貧農和勞動農民來充實邊疆地區的黨，同時，應常用改善邊疆地區黨組織成員質量的辦法來進行鞏固黨組織的工作。

載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

【真理報】第二十九號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

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
一九二一年莫斯科版

一 關於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的報告

(三月十日)

在直接談到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當前的具體任務以前，必須確定幾個前提，沒有這些前提，民族問題就不能解決。這些前提涉及民族的出現、民族壓迫的產生、民族壓迫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形式以及民族問題在各個不同發展時期的解決方式等問題。

這樣的時期有三個。

第一個時期是西方封建主義消滅和資本主義勝利的時期。人們就是在這個時期形成民族的。我指的是英國（愛爾蘭除外）、法國和意大利這樣的國家。在西方，即在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的部分地區，封建主義消滅和人們形成爲民族的時期與中央集權國家出現的時期在時間上大體是一致的，因此那裏的民族在其發展時就具有國家的形式。這些國家內部沒有其他比較大的民族集團，因此那裏也就沒有民族壓迫。

在東歐恰恰相反，民族形成和封建制據消滅的過程與中央集權國家建立的過程在時間上不是一致的。我指的是匈牙利、奧地利和俄國。在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沒有開始，也許剛剛開始，

然而爲了抵禦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東方人的侵犯，必須立即建立能够抵禦外侮的中央集權國家。由於東歐中央集權國家出現的過程比民族形成的過程要快些，所以在那裏就建立了混合的國家，這些國家是由尙未形成爲民族但已結合在一個國家中的幾族人民組成的。

這樣，第一個時期的特徵就是在資本主義初期出現了民族，並且在西歐產生了沒有民族壓迫的純粹的民族國家，在東歐則產生了多民族國家。在這些多民族國家裏，有一個比較發達的民族居於統治地位，其餘不大發達的民族則在政治上以至後來在經濟上都受統治民族支配。東歐的這些多民族國家成了民族壓迫的發源地，而民族壓迫產生了民族衝突、民族運動、民族問題和解決這一問題各種方式。

民族壓迫和反抗民族壓迫的鬥爭方式發展的第二個時期，是西方帝國主義出現的時期。這時，資本主義爲了尋求銷售市場、原料、燃料和廉價勞動力，爲了爭取輸出資本和獲得鐵路與海上的交通幹綫而跳出了民族國家的範圍，靠侵佔遠近各鄰國來擴張自己的領土。在這第二個時期，西方的舊民族國家英國、意大利和法國已不再是民族國家了，就是說，它們因奪得了新的領土而變成了多民族的殖民國家，因而也就成了在東歐早已存在的那種民族壓迫和殖民壓迫的舞台。在東歐，這個時期的特徵是從屬民族（捷克人、波蘭人、烏克蘭人）覺醒和興起了，這種情況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就造成了舊的資產階級多民族國家的崩潰和在所謂的列強奴役下的新的民族國家的成立。

第三個時期是蘇維埃時期，是資本主義消滅和民族壓迫消除的時期，這時，統治民族和從屬民

族、殖民地和宗主國的問題都放到歷史檔案庫裏去了。這時，我們看到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領土上有許多民族站起來了，它們有着同等發展的權利，但是由於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落後，還保存着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某些不平等。這種民族不平等的實質是：由於歷史的發展，我們從過去繼承了一種遺產，這就是一個民族即大俄羅斯民族在政治上和工業上比其他民族發達些。因此就產生了事實上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不是一年之內就能剷除的，但是，只要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幫助各落後民族和部族，就一定能够把它剷除。

這就是歷史上所經過的民族問題發展的三個時期。

前兩個時期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在這兩個時期內，有些民族受到壓迫和奴役，因此民族鬥爭仍然存在，民族問題沒有解決。然而它們之間是有差別的。在第一個時期，民族問題並沒有越出個別多民族國家的範圍，只是涉及不多的幾個民族，主要是歐洲的一些民族；而在第二個時期，民族問題就由國內的問題變成國際的問題，變成帝國主義國家彼此間爲了控制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爲了使歐洲境外的新的部族和部落隸屬於自己而進行戰爭的問題了。

這樣，過去僅僅對那些文明國家有意義的民族問題，在這個時期就失去了它的孤立性，而同整個殖民地問題融合起來了。

民族問題發展成整個殖民地問題，並不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這一發展首先是因爲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各交戰國的帝國主義集團本身不得不求助於殖民地，從殖民地獲得人力來建立軍隊。毫無

疑問，這一過程，即帝國主義者必然求助於殖民地各落後部族的過程，不能不喚醒這些部落和部族去謀求解放，進行鬥爭。其次第二個因素是各帝國主義集團瓜分土耳其並且使它亡國的嘗試，這一因素使民族問題擴大和發展成了整個殖民地問題，使它由解放運動的星星之火變成燎原烈火，蔓延到全球各地。土耳其在國家制度方面是伊斯蘭教民族中比較發達的一個國家，它不堪忍受這種前途，於是就舉起了鬥爭的旗幟，把東方各民族團結在自己周圍來反對帝國主義。第三個因素是蘇維埃俄國的出現。蘇維埃俄國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已經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這就自然而然地鼓舞了東方各被壓迫民族，喚醒了它們，發動它們去進行鬥爭，從而為建立一條從愛爾蘭到印度的被壓迫民族的共同戰綫提供了可能性。

民族壓迫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的這一切因素造成了這樣的結果：資產階級社會不僅沒有解決民族問題，不僅沒有奠定民族之間的和平，反而使民族鬥爭的星星之火燃燒成被壓迫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反對世界帝國主義鬥爭的燎原烈火。

很明顯，唯一能夠解決民族問題的制度，唯一能夠創造條件保證不同民族和部落和睦共處、兄弟合作的制度，是蘇維埃政權的制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

未必用得着證明，在資本統治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和階級存在的情況下，民族權利平等是不可能得到保證的，只要資本政權還存在，只要爭奪生產資料的鬥爭還在進行，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民族權利平等，也不可能各民族勞動羣衆之間的合作。歷史證明，消滅民族權利不平等的唯一方法，建立

被壓迫民族和非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兄弟合作的制度的唯一方法，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蘇維埃制度。

其次，歷史表明，雖然某些民族已經從本民族的資產階級以及從「異族的」資產階級壓迫下解放出來，就是說，雖然它們自己已經建立了蘇維埃制度，但是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情況下，沒有鄰近的蘇維埃共和國在經濟和軍事方面的援助，它們就不能單獨存在和順利地捍衛自己的單獨存在。匈牙利的例子雄辯地證明：如果沒有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聯盟，如果它們沒有團結成統一的軍事經濟力量，那末無論在軍事戰綫上或經濟戰綫上都不可能抵擋住世界帝國主義的聯合力量。

蘇維埃共和國聯邦是國家聯盟最適當的形式，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就是這一形式的體現。

同志們，這就是我首先要在這裏談到的一些前提，目的是爲了在下面論證我們黨在解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的民族問題方面採取某些步驟的必要性。

雖然俄羅斯和同它聯盟的各共和國在蘇維埃制度下已經沒有統治民族和無權民族、宗主國和殖民地、被剝削者和剝削者了，但是民族問題在俄羅斯仍然存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民族問題的實質就是要消滅過去遺留下來的某些民族的事實上的落後性（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使各落後民族有可能在政治、文化和經濟方面趕上俄國中部。

在舊制度下，沙皇政權不努力也不可能努力發展烏克蘭、阿捷爾拜疆、土爾克斯坦和其他邊疆地

區的國家制度，它反對發展邊疆地區國家制度，也反對發展它們的文化，力圖用暴力同化當地的土著居民。

其次，舊的國家、地主和資本家留下了像柯爾克茲人、徽岑人、沃舍梯人這些被摧殘的部族，它們的土地過去是俄羅斯哥薩克和富農分子的殖民對象。它們過去註定要遭到浩劫和滅亡。

其次，大俄羅斯民族過去是統治民族，它的這種地位甚至在俄羅斯共產黨員中間也留下了一些影響，這些俄羅斯共產黨員不善於或者不願意去接近當地居民中的勞動羣衆，不善於或者不願意去了解他們的需要並幫助他們擺脫落後和不文明。我指的是爲數不多的一些俄羅斯共產黨員，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忽視邊疆地區的生活習慣和文化的特點，有時表現出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的傾向。

再次，非俄羅斯民族受過民族壓迫，它們的這種地位對當地居民中的共產黨員也不無影響，這些共產黨員有時不善於把本民族勞動羣衆的階級利益同所謂「全民的」利益區別開來。我指的是有時在非俄羅斯共產黨員中間可以看到的、地方民族主義傾向，這種傾向在東方就表現爲大伊斯蘭主義、大突厥主義。

最後，必須把柯爾克茲人、巴什基里亞人和一些山民部落從死亡中拯救出來，剝奪富農殖民者以保證他們得到必要的土地。

構成我民族問題實質的一些問題和任務就是這樣。

在說明了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些當前的任務之後，我想來談談一般的任務，即談談使我們共

產黨在邊疆地區的政策適合於那些主要存在於東部的經濟生活的特殊條件的任務。

問題在於：有許多部族，主要是突厥語系各部族（它們大約有二千五百萬人），還沒有經過或者還沒有來得及經過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因此，它們沒有或者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它們必須越過工業資本主義，從原始經濟形態轉到蘇維埃經濟階段。爲了進行這項艱鉅的但決不是不可能的工作，必須考慮到這些部族的經濟狀況，甚至要考慮到它們過去的歷史、生活習慣和文化的一切特點。把那些在俄國中部行之有效的有意義的措施搬到這些部族裏去，是不可思議的和危險的。顯然，在實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政策時，一定要注意到我們在這些邊疆地區所碰到的經濟狀況、階級結構和過去歷史方面的一切特點。更不用說有些荒唐的事情是必須消除的，例如柯爾克茲伊斯蘭教居民從來不養豬，而糧食人民委員部却按攤派方式要他們交豬。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有些人是多麼不願意注意初到那裏去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生活習慣的特點。

剛才有人遞了一張條子給我，要我答覆契切林同志的論文。同志們，契切林的論文我仔細地讀過了，我認爲他的論文除了舞文弄墨以外，別的什麼也沒有。這篇論文中有四點錯誤或者說四點誤解。

首先，契切林同志有否認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矛盾的傾向，他過高估計了帝國主義者的國際聯合，而忽略了和過低估計了各帝國主義集團之間和各帝國主義國家（法國、美國、英國、日本等）之間的內部矛盾，可是這種矛盾存在着，並且正醞釀着戰爭。他過高估計了帝國主義上層聯合的因素，而過低估計了這個『托拉斯』內部的矛盾。可是這些矛盾存在着，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活動正是以這些矛盾

爲依據的。

其次，契切林同志犯了第二個錯誤。他過低估計了佔統治地位的列強同不久前成立的在財政上和軍事上受這些列強支配的民族國家（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芬蘭等）之間的矛盾。契切林同志完全忽略了這樣的事實：儘管這些民族國家隸屬於列強，或者確切些說，正是由於這種隸屬關係，列強同這些國家之間才存在着各種矛盾，例如在列強同波蘭、愛沙尼亞等國的談判中就顯露出了這些矛盾。外交人民委員部存在的作用就在於估計這一切矛盾，以這些矛盾爲依據，並在這些矛盾的範圍內隨機應變。契切林同志竟過低估計了這一點，令人大爲吃驚。

契切林同志的第三個錯誤，就是他過多地談論民族自決這個實際上已變成便於帝國主義者利用的空洞口號。奇怪的是契切林同志竟忘記了我們拋棄這個口號已經兩年了。在我們黨綱中已經不再有這個口號了。我們黨綱中所說的已經不是民族自決這個十分含糊的口號，而是各民族有國家分離權這個更清楚更明確的口號。這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奇怪的是契切林同志在他的論文中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因此，他對那個已經是含糊不清的口號提出的一切反對意見都是無的放矢，因爲不論在我的提綱中或者在黨綱中，一個字也沒有提到『自決』。那裏談到的只是關於各民族的國家分離權問題。而現在，在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這個口號對我們來說是革命的口號。因爲各蘇維埃國家是根據自願原則聯合成聯邦的，所以加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各民族按照自己的意志沒有使用分離權。因爲我們所說的是那些受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壓制的殖民地，是阿拉伯、

美索不達米亞、土耳其、印度斯坦這類從屬國家，即那些殖民地國家或半殖民地國家，所以各民族有分離權的口號就是革命的口號，拋棄這個口號就是為帝國主義者效勞。

第四個誤解就是在契切林同志的論文中缺少實際的意見。寫文章當然是容易的，但是，既然文章的標題是『反對斯大林同志的提綱』，那就應當提出一些重要的東西，至少應當提出幾個實際的反建議。可是我在他的論文中並沒有找到一個值得傾聽的實際建議。

同志們，我就要講完了。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資產階級社會不僅不能解決民族問題，反而在『解決』民族問題的嘗試中使民族問題擴大為殖民地問題了，並且造成了一條從愛爾蘭到印度斯坦的反對自己的新戰綫。唯一能夠提出和解決民族問題的國家是以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國家，即蘇維埃國家。在蘇維埃聯邦國家內，不再有被壓迫民族和統治民族，民族壓迫已經消滅，但是，由於文化較發達的民族和文化不大發達的民族之間還存在着舊的資產階級制度遺留下來的事實上的不平等（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民族問題就具有一種形式，這種形式要求規定一些措施來幫助各落後民族和部族的勞動羣衆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繁榮起來，使他們有可能趕上走在前面的無產階級的俄國中部。由此就產生了一些實際建議，這些建議構成了我所提出的關於民族問題提綱中第三部分的內容。（鼓掌）

二 結 論

(三月十日)

同志們！這次代表大會在民族問題的討論方面最大的特徵，就是我們已經從發表關於民族問題的宣言，經過重新劃分俄國行政區域，進到在實踐上提出問題了。在十月革命初期，我們只是宣佈了民族分離權。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〇年，爲了使各落後民族的勞動羣衆接近俄羅斯無產階級，我們按照民族特徵重新劃分了俄國的行政區域。而現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則把黨對各自治區和同俄羅斯聯盟的各獨立共和國的勞動羣衆和小資產階級分子應當採取的政策問題完全提到實踐上來了。因此，查東斯基的關於提交大家的提綱帶有抽象性質的說法使我感到驚奇。我手頭有他自己的提綱，不知道他爲什麼沒有把這個提綱提交代表大會審查。在他的提綱中，我沒有找到一個實際建議，除了提出用「東歐」一詞代替「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用「俄羅斯」或「大俄羅斯」一詞代替「俄國」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建議。我在這個提綱中沒有找到其他實際建議。

現在來談談下面一個問題。

應當說，我本來對發言的代表抱的希望很大。俄國共有二十二個邊疆地區，在這些邊疆地區中，

有的工業非常發達，在工業方面和俄國中部很少有差別，有的還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階段，同俄國中部有根本的差別，另一種則是完全閉塞的。要把邊疆地區這一切不同的情況都非常具體地包括在提綱內是不可能的。決不能要求有全黨意義的提綱僅僅帶有土爾克斯坦的性質，僅僅帶有阿捷爾拜疆或烏克蘭的性質。必須撇開細節，抓住各個邊疆地區的共同特點，把它們列入提綱。其他起草提綱的方法在天地間是沒有的。

必須把非俄羅斯民族劃分為幾類，這在提綱中已經做了。非俄羅斯民族大約有六千五百萬人。所有這些非俄羅斯民族的共同特點是它們在國家制度的發展方面都落後於俄國中部。我們的任務是盡一切力量幫助這些民族，幫助它們的無產階級分子和勞動者發展使用本族語言的蘇維埃國家機關。這種共同之點在提綱中，在提綱的實踐部分中，都已經提到了。

其次，如果要使各邊疆地區的特點更加具體化，就必須從大約六千五百萬非俄羅斯民族的總人口中劃出二千五百萬左右還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突厥語系民族人口。米高揚同志說阿捷爾拜疆的發展程度在某些方面比俄羅斯各省高，這是不對的。他顯然是把巴庫和阿捷爾拜疆混為一談了。巴庫不是從阿捷爾拜疆內部發展起來的，而是經過諾貝爾、路特希爾德、維沙烏等人的努力從上面建造起來的。至於阿捷爾拜疆本身，那它是一個最落後的父權制封建關係的國家。因此，我把整個阿捷爾拜疆列入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一類邊疆地區，對於這類邊疆地區，必須採用特殊的方法把它們納入蘇維埃經濟的軌道。關於這一點提綱裏也說到了。

其次，還有第三類，這一類的人口不超過六百萬，主要是還保留着氏族生活方式的游牧部落，它們還沒有進入農業經濟。這主要是柯爾克茲人、土爾克斯坦北部、巴什基里亞人、微岑人、沃舍梯人、英谷什人。對於這一類民族，首先必須保證它們有土地。這裏沒有讓柯爾克茲人和巴什基里亞人發言就停止了討論。他們對於居於山地的巴什基里亞、柯爾克茲和山民因無土地而日漸死亡的痛苦，是能够談得更多一些的。而薩發羅夫關於這一點所說的只能涉及六百萬人口的這一類。因此，把薩發羅夫的實際建議運用到一切邊疆地區是不可想像的，因為對其餘的約有六千萬人口的非俄羅斯民族來說，這些修正是毫無意義的。正因為如此，我不反對把薩發羅夫對某些民族所提出的某幾點意見加以具體化、補充和修正，但是必須說明，決不能到處運用這些修正。其次，我必須對薩發羅夫的一項修正提出批評。在他這項修正中有一句關於「民族文化自決」的話。

那裏寫道：「在十月革命以前，由於實行帝國主義的政策，俄國東部邊疆地區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族人民無法通過實行本民族文化自決和用本族語言進行教育的方法來利用資本主義文明的文化成果」等等。

我必須說，我不能接受這項修正，因為它帶有崩得主義的色彩。民族文化自決是崩得的公式。我們早就拋棄了那些含糊不清的自決口號，恢復它們是沒有必要的。而且這整句話不過是一些字的矯揉造作的堆砌。


其次，我接到一張條子，上面說我們共產黨員似乎在人為地培植白俄羅斯民族。這是不對的，因

爲白俄羅斯民族存在着，它有和俄羅斯語言不同的語言，因此，只有使用白俄羅斯本族的語言，才能提高白俄羅斯人民的文化。大約五年前，關於烏克蘭，關於烏克蘭民族，也有人說過同樣的話。就在不久以前還有人說，烏克蘭共和國和烏克蘭民族是德國人臆造出來的。可是很明顯，烏克蘭民族存在着，發展它的文化是共產黨員的義務。違背歷史是不行的。很明顯，如果烏克蘭的各個城市至今還是俄羅斯人佔優勢，那末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城市必然會烏克蘭化。大約四十年前，里加是一個德國人的城市，但是，由於城市是依靠農村發展的，而農村又是民族的保存者，因此里加現在就成了純粹拉脫維亞人的城市了。大約五十年前，匈牙利所有的城市都帶有德國性質，可是它們現在都馬札爾化了。白俄羅斯將來也會這樣，雖然現在在它的各個城市中非白俄羅斯人還佔優勢。

在結束我的講話時，我建議代表大會選舉一個由各區域代表組成的委員會，以便討論提綱中我們所有邊疆地區都感到興趣的實際建議，使它們更加具體化。（鼓掌）

給弗·伊·列寧的信

列寧同志！

最近三天我有機會讀完了『俄羅斯電氣化計劃』彙編（）。疾病幫了我的忙（因禍得福！）。一本出色的、編得很好的書。一個不帶引號的真正統一的和真正國家的經濟計劃的傑出草案。這是現代唯一的馬克思主義嘗試，要給經濟落後的俄國的蘇維埃上層建築奠定在目前條件下真正現實而唯一可能的技術生產基礎。

你還記得去年托洛茨基提出的在戰前工業的廢墟上依靠大量使用不熟練的工農羣衆（勞動軍）的勞動使俄國『經濟復興』的『計劃』（他的提綱）吧。這和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的計劃比較起來，是多麼貧乏、多麼落後！真是一個中世紀的手工業者，一個自命爲負有用古代傳說『拯救』俄國的使命的易卜生劇作中的英雄……而常常出現在我們報刊上使我們感到羞恥的幾十個『統一的計劃』有什麼價值呢，——簡直是預備班學生說的孩子話……還有那仍然在『批評』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和滿腦子保守思想的李可夫的庸俗『現實主義』（其實是馬尼洛夫精神）……

我的意見是：

(一) 不要再浪費一分鐘去空談計劃；

(二) 立即開始實際行動；

(三) 我們在輸送物力和人力、恢復企業、分配勞動力、供應食物、組織供應站和供應工作本身等方面的工作，至少要有三分之一服從於這一行動的利益（三分之二應「當前」的需要）。

(四) 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雖然具有一切優良的品質，但仍然缺乏健康的求實精神（在一些文章中使人感到有教授式的軟弱氣息），因此必須給他們的計劃委員會增添一些具有實際經驗、能夠按照「彙報執行情況」和「按期完成」等原則辦事的人。

(五) 責成「真理報」、「消息報」，特別是「經濟生活報」廣泛宣傳「電氣化計劃」，既宣傳計劃的基本內容，也宣傳同各個方面有關的具體內容，讓人們記住：只存在一個「統一的經濟計劃」，即「電氣化計劃」，其餘的一切「計劃」不過是無謂而有害的空談。

你的 斯大林

寫於一九二一年三月

第一次載於「斯大林五十壽辰紀念文集」

一書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論民族問題的提法

共產黨人對民族問題的提法，和第二國際及第二半國際（*II*）的活動家、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的」政黨、「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孟什維克黨、社會革命黨等有本質的不同。

指出作為民族問題新提法的最顯著的特徵的四個要點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它們在對民族問題的新舊理解之間劃了一條分界綫。

第一個要點是作為局部的民族問題和作為整體的殖民地解放的總問題融合起來了。在第二國際時代，通常都把民族問題限制在只和「文明」民族有關的問題的狹隘範圍內。愛爾蘭人、捷克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阿爾明尼亞人、猶太人以及歐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國際所關心的就是這些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命運。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殘酷的民族壓迫的千百萬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社會主義者」的眼裏。他們不敢把白種人和黑種人、「不文明的」黑人和「文明的」愛爾蘭人、「落後的」印度人和「有教養的」波蘭人相提並論。當時人們都默默地認為：如果也需要為歐洲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解放而鬥爭，那末「正派的社會主義者」就完全不應當真正談到為「保存」「文明」所「必需」的殖民地的解放。這些所謂社會主義者甚至並不認為，如果亞洲和非洲殖民地人民不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歐洲民族壓迫的消滅是不能想像的，他們並不認為前者和後者是

有機地聯系着的。共產黨人首先揭示了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的聯系，從理論上論證了這一聯系，並且把它作為自己革命實踐的基礎。因而，白種人和黑種人之間、帝國主義的『文明的』奴隸和『不文明的』奴隸之間的那堵牆就被推倒了。這種情況大大地促進了把落後的殖民地的鬥爭和先進的無產階級的鬥爭配合起來反對共同敵人、反對帝國主義的事業。

第二個要點是各民族和殖民地有國家分離權，有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這一明確的革命口號代替了含糊不清的民族自決權口號。第二國際的活動家在談到自決權的時候，通常總是不提國家分離權，至多只把自決權解釋為一般自治權。民族問題『專家』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甚至把自決權變成歐洲被壓迫民族的文化自治權，就是說，被壓迫民族在全部政治（和經濟）權力仍舊掌握在統治民族手中的條件下，有設立自己的文化機關的權利。換句話說，就是把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自決權變成統治民族享有政治權力的特權，而關於國家分離的問題則撇開不談。第二國際的思想首領考茨基基本上同意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對自決所做的這個實質上是帝國主義的解釋。帝國主義者抓住這個對他們有利的自決口號的特點並把它宣佈為自己的口號，這是不足為奇的。大家知道，以奴役各族人民為目的的帝國主義戰爭，就是在自決的旗幟下進行的。因此，含糊不清的自決口號就從民族解放、民族權利平等的工具變成馴服各民族的工具，變成使各民族順從帝國主義的工具了。最近幾年的世界事物的進程，歐洲革命的邏輯以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增長，都要求拋棄這個已變成反動的口號，而代之以另一個革命的口號，即能夠消除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勞動羣衆對統治民族無產者不信任的氣氛的口

號，能够爲民族權利平等和這些民族勞動者的團結掃清道路的口號。共產黨人提出的各民族和殖民地有國家分離權的口號就是這樣的口號。

這個口號的優點就在於它能够——

(一)消滅某一民族勞動者懷疑另一民族勞動者有掠奪意圖的任何根據，從而爲相互信任和自願聯合打下基礎；

(二)摘下帝國主義者一面虛偽地談論自決，一面却力圖使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順從自己並把它們強留在自己的帝國主義國家範圍內的假面具，從而加強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反對帝國主義的解放鬥爭。

未必用得着證明，如果俄羅斯工人在取得政權以後不宣佈各民族有國家分離權，如果他們不用事實證明自己有實現各民族這個不可剝奪的權利的決心，如果他們不放棄對芬蘭的「權利」(一九一七年)，如果他們不從波斯北部撤出軍隊(一九一七年)，如果他們不放棄對蒙古、中國某些領土的野心等等，那末他們就不會得到西方和東方其他民族的同志對自己的同情。

同樣不容置疑，用自決的旗幟巧妙地掩蓋起來的帝國主義者的政策，近來在東方仍然接二連三地遭到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這種政策在那裏遇到了在以各民族有國家分離權的口號的精神進行鼓動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日益發展的解放運動。這一點是那些因巴庫「行動和宣傳委員會」^{二三}犯了一些不關緊要的過錯而拚命辱罵它的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的英雄們所不了解的，但是任何一個願意

知道上述『委員會』成立一年以來的活動和近兩三年來亞洲和非洲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的人，都一定會了解的。

第三個要點是對民族殖民地問題同資本政權、推翻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之間的有機聯系的揭示。在第二國際時代，民族問題的範圍被縮小到極點，通常被看做是孤立的、同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沒有聯系的。人們當時都默默地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前，只要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實行一些改良的辦法，民族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地』解決，認為不根本解決民族問題，無產階級革命也能實現，相反地，不推翻資本政權，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前，民族問題也能解決。這種實質上是帝國主義對事物的看法像一根紅綫貫穿在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關於民族問題的人所共知的著作中。但是最近十年以來，對民族問題的這種理解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和十分腐朽的。帝國主義戰爭表明，近幾年來的革命實踐也再次證實——

(一) 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是同擺脫資本政權問題分不開的；

(二) 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不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奴役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就不能生存；

(三) 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推翻資本政權就不能獲得解放；

(四) 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無產階級的勝利就不能鞏固。

如果歐洲和美洲可以叫做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進行主要戰鬥的前綫和舞台，那末具有原

料、燃料、糧食和大批人力的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就應當算做帝國主義的後方和後備軍。爲了贏得戰爭的勝利，不僅要在前綫打勝仗，而且要使敵人的後方、敵人的後備軍革命化。因此，只有在無產階級善於把自己的革命鬥爭同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勞動羣衆的解放運動結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者政權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才能認爲有保證。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的活動家忽略了這件「小事」，把民族殖民地問題同在西方日益高漲的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政權問題分割開來了。

第四個要點是給民族問題加進了新的因素，即加進了使各民族在事實上（不只是在法律上）平等的因素（幫助和協助落後民族提高到走在它們前面的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經濟水平），這是建立各民族勞動羣衆之間兄弟合作的條件之一。在第二國際時代，通常只限於宣佈「民族權利平等」。至多也不過是要求實現這種權利平等。但是民族權利平等本身是很重要的政治成果，如果沒有足夠的手段和可能來行使這個極重要的權利，那它就有變成空談的危險。毫無疑問，落後民族的勞動羣衆沒有力量像先進民族的勞動羣衆那樣享用「民族權利平等」給他們的權利，因爲某些民族從過去繼承下來的落後性（文化的、經濟的）不是一兩年內就能消滅的，人們還是能感覺得到的。這種情況在俄國也可以感覺得到，這裏有許多民族還沒有來得及經過資本主義，而有些民族根本沒有進入資本主義，沒有或者幾乎沒有自己的無產階級，這裏民族權利平等雖然已經完全實現，但是，由於文化上和經濟上的落後，這些民族的勞動羣衆還沒有力量充分使用他們已經取得的權利。這種情況在西方無產階級勝利

後的『第二天』還將更強烈地使人感覺得到，因為那時處於各個極不相同的發展階段的無數落後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必將登上舞台。正因為如此，勝利了的先進民族的無產階級必須幫助，真正地長期地幫助落後民族的勞動羣衆發展文化和經濟，幫助他們提高到高級發展階段，趕上走在前面的民族。沒有這種幫助，就不可能建立爲社會主義最終勝利所十分必需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勞動者在統一的世界經濟範圍內的和睦共處和兄弟合作。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不能只限於『民族權利平等』，必須從『民族權利平等』轉到採取使各民族事實上平等的辦法，轉到制定並實行下列實際措施：

- (一) 研究落後民族和部族的經濟狀況、生活習慣和文化；
 - (二) 發展它們的文化；
 - (三) 對它們進行政治教育；
 - (四) 把它們逐步地無痛苦地引向高級的經濟形式；
 - (五) 建立落後民族勞動者和先進民族勞動者之間的經濟合作。
- 說明俄國共產黨人對民族問題的新提法的四個要點就是這樣。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日

載於一九二二年五月八日

「真理報」第九十八號

署名：約·斯大林

致山民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的

賀電 (三)

謹向山民共和國(三)勞動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致以兄弟的敬禮。因身體不適，不能參加代表大會，深感遺憾。

山民婦女同志們！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的解放運動都不能沒有婦女直接參加，因為被壓迫階級在解放道路上每走一步就使婦女的地位改善一步。在古代的奴隸解放運動和近代的農奴解放運動的隊伍中，不僅有男子，而且有婦女，她們是用自己的鮮血保證忠於勞動人民事業的女戰士和女烈士。而在現代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即在人類一切解放運動中最深刻最強大的解放運動中，不僅產生了女英雄和女烈士，而且產生了在無產階級的共同旗幟下勝利鬥爭的千百萬勞動婦女的羣衆性的社會主義運動。

同這個強大的勞動婦女的運動比較起來，資產階級婦女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運動不過是一種爲了消磨時光而臆想出來的兒戲。

我深信，山民婦女代表大會一定會在紅旗下進行自己的工作。

斯大林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載於山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東部勞動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公報

一九二一年弗拉基高加索版

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戰略和策略

(小冊子的大綱)

一 術語的定義和研究對象

(一) 政治戰略和策略的活動範圍及運用範圍。如果承認無產階級運動有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那末戰略和策略的活動範圍無疑就只限於運動的主觀方面。客觀方面就是在無產階級外部和周圍發生的、不以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意志為轉移的那些發展過程，就是最終決定整個社會發展的那些過程。主觀方面就是在無產階級內部發生的、客觀過程在無產階級意識中得到反映的那些過程，就是加速或延緩客觀過程，但決不能決定客觀過程的那些過程。

(二)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首先是研究客觀過程的發展和消亡，斷定發展的趨勢，指出某個或某些階級必然執掌政權或者必然沒落，一定沒落。

(三) 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根據理論原理確定上升階級（這裏是指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定期限內或在整個資本主義時期內的運動目標（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

(四) 戰略遵循綱領的指示並且根據對內部的(一國的)和國際的各種鬥爭力量的估計,規定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應當遵循的總的道路,總的方向,以便在力量對比產生和發展的情況下獲得最大的效果,戰略根據這一點制定社會戰綫上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者的力量佈置計劃(總的配置)。不能把『力量佈置計劃的制定』同策略和戰略共同進行的佈置力量即配備力量的具體而實際的工作混淆起來。這並不是說戰略只限於規定道路和制定無產階級陣營中戰鬥力量的佈置計劃,相反地,它還要指導鬥爭並修正整個轉變時期的日常策略,巧妙地利用它的後備力量,並且機動靈活地支持策略。

(五) 策略遵循戰略的指示以及本國和鄰國革命運動的經驗,估計到某一特定時期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者內部力量的狀況(文化水平、組織性和覺悟性的高低、具有哪些傳統、哪些主要的和輔助的運動形式和組織形式)和敵人陣營中力量的狀況,利用敵人陣營中的不協調和種種混亂,擬定能够最穩當地使戰略取得勝利的具體辦法,把廣大羣衆爭取到革命無產階級方面來,把他們引到社會戰綫的戰鬥陣地上來(爲了執行根據戰略計劃所制定的力量佈置計劃)。策略根據這一點提出或改變黨的口號和指示。

(六) 戰略是在歷史轉變關頭、歷史轉折關頭變更的,戰略所包括的時期是從一個轉變(轉折)到另一個轉變,所以它把運動引向包含整個這一時期無產階級利益的一定的總目標,它要設法使整個這一時期階級之間的戰爭贏得勝利,因此它在這個時期內是不變的。

策略則相反,它是由某個轉變即某個戰略時期的來潮和退潮、鬥爭力量的對比、鬥爭(運動)的

形式、運動的速度以及某一特定時期和某一特定地區的鬥爭場所來確定的，又由於這些因素的改變是取決於從一個轉變到另一個轉變時期的地點和時間的條件，策略所包括的不是整個戰爭，而只是使戰爭勝或負的個別戰役，它在戰略時期內有好幾次的變更（可以變更）。戰略時期要比策略時期長。策略服從於戰略的利益。一般說來，策略的勝利是為戰略的勝利作準備。策略的任務是領導羣衆進行鬥爭，提出口號，把羣衆引到新的陣地上，使鬥爭最終取得戰爭的勝利，就是說，取得戰略的勝利。但是，有時候策略的勝利會破壞或推遲戰略的勝利，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就應當放棄策略的勝利。

舉例來說。在一九一七年初，在克倫斯基統治時期，我們在工人和士兵中間進行的反戰鼓動在策略上無疑是不利的，因為羣衆把我們的演講者拖下講台，打他們，有時甚至把他們打死。羣衆不是流入黨而是流出黨。這個鼓動雖然在策略上失敗了，但是，它加速了巨大的戰略勝利，因為羣衆很快就了解到我們的反戰鼓動是正確的，這就在後來加速和促進了他們轉到黨方面來。

又如共產國際爲了執行二十一項條件^(二)而要求回改良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劃清界限這件事，在策略上無疑是有些不利的，因為這樣就有意識地減少了共產國際「擁護者」的數量，並且暫時削弱了共產國際，但是，由於清除了共產國際內的不可靠分子，在戰略上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毫無疑問，這會鞏固共產國際，加強它的內部團結，也就是說，會根本加強它的力量。

(七) 鼓動口號和行動口號。不能混淆這兩種口號，混淆起來是危險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

個口號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的時期是鼓動口號；十月初（十月十日）黨中央通過『奪取政權』的決議後，它在十月裏就成了行動口號。巴格達齊也夫集團四月在彼得堡舉行發動就是混淆了這兩種口號。

（八）指示（總的）是一定期和一定地點行動的直接號召，是全黨必須執行的號召。『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在四月初是宣傳口號（『提綱』^(二五)），六月成爲鼓動口號，十月（十月十日）成爲行動口號，十月底就成爲直接指示了。我說的是對全黨的總指示，自然還應當有發展總指示的地方指示。

（九）小資產階級的動搖，特別是在政治危機尖銳化的時候（德國國會選舉時；俄國克倫斯基統治的四月、六月和八月間，以及一九二一年喀琅施塔得叛亂^(二六)）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必須仔細加以研究、利用和估計，但是同這種動搖妥協對無產階級事業是危險的、有害的。決不能由於這種動搖而改變鼓動口號，但是可以而且有時必須改變或延期發出某個指示或口號（行動的）。『在二十四小時內』改變策略也正是改變指示，甚至是改變行動口號，但決不是改變鼓動口號（例如取消一九一七年六月九日的遊行示威等等事實）。

（十）戰略家和策略家的藝術在於既能巧妙而及時地把鼓動口號轉變爲行動口號，又能及時而巧妙地把行動口號轉變爲一定的具體指示。

二 俄國發展中的歷史轉變

(一)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轉變 (日俄戰爭一方面揭露了專制制度的全部腐朽性，另一方面顯示了無產階級運動和農民運動的實力) 和適應轉變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戰略計劃——列寧的『兩個策略』^(二七)。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方面的轉變 (轉變的實質就在這裏)。不是實現立憲民主黨人領導的自由資產階級同沙皇政府的勾結，而是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戰略計劃的實質就在這裏)。這個計劃的出發點是：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會推動西方的社會主義運動，使那裏的革命發動起來，並促使俄國從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 (參見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記錄，列寧在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二八)，以及在代表大會上和『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二九)小冊子中對專政概念的分析)。對國內和國際的鬥爭力量作必要的估計並對轉變時期的經濟和政治作一般的分析。二月革命至少實現了『兩個策略』中的戰略計劃的三分之二，因而結束了這個時期。

(二) 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三月向蘇維埃革命方面的轉變 (帝國主義戰爭掃除了專制制度，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全部脆弱性，表明了社會主義變革必不可免，並且是擺脫危機的唯一出路)。

由人民、資產階級和英法資本進行的『光榮的』二月革命 (這次革命把政權交給了立憲民主黨人，所以在國際關係方面沒有引起什麼重大的變化，它不過是英法資本的政策的繼續) 和翻天覆地的十

月革命之間的區別。

列寧的『提綱』是適應新轉變的戰略計劃。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出路。這個計劃的出發點是：『我們將在俄國開始社會主義革命，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從而使西方的革命發動起來，然後西方的同志就會幫助我們把我國的革命進行到底。』對這個轉變時期的國內外的經濟和政治（『兩個政權並存』時期，聯合的詭計，標誌着克倫斯基統治死亡的科爾尼洛夫叛亂，西方各國因對戰爭不滿而發生騷動）作必要的分析。

（三）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和一九一八年上半年，突破了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國際社會戰綫，確定了向消滅資本主義和在世界範圍內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轉變；同時開闢了用國內戰爭代替帝國主義戰爭的紀元（和平法令，土地法令，民族法令，公佈密約，建設工作綱領，列寧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¹⁾），列寧的小冊子『蘇維埃政權的任務』⁽²⁾，經濟建設）。

全面分析非執政的即在野的共產主義的戰略和策略同執政的共產主義的戰略和策略之間的區別。

國際形勢：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繼續進行着的戰爭，是俄國蘇維埃政權存在和發展的有利條件（布列斯特和約簽訂以後）。

(四)在短促的和平建設時期之後，即在布列斯特和約簽訂以後開始的對武裝干涉者採取軍事行動的方針（一九一八年夏季到一九二〇年底）。這個方針是在布列斯特和約簽訂以後開始實行的，布列斯特和約反映了蘇維埃俄國在軍事上的軟弱，強調了俄國建立紅軍這個蘇維埃革命的主要支柱的必要性。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行動，協約國軍隊侵佔牟爾曼斯克、阿爾漢格爾斯克、海參崴和巴庫，協約國向蘇維埃俄國宣戰，——這一切最後確定了從已經開始的和平建設向軍事行動，向保衛世界革命策源地使之免受國內外敵人侵犯的轉變（列寧關於布列斯特和約的演說等等）。由於社會革命遲遲沒有爆發，特別是在上述地區被侵佔以後並沒有引起西方無產者的嚴重抗議，我們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不得不簽訂可恥的布列斯特和約，以便取得喘息時機來建立我們自己的紅軍，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捍衛蘇維埃共和國。

「一切爲了前綫，一切爲了保衛共和國。」因此成立了國防委員會等等。這是在俄國國內外全部生活上打下烙印的軍事時期。

(五)在粉碎弗蘭格爾以後，從一九二一年初實行和平建設的方針，同一些資產階級國家簽訂和約，同英國締結條約等等。

戰爭結束了，但是西方的社會主義者暫時還無力幫助我們恢復經濟，而我們在經濟上又被工業比較發達的資產階級國家所包圍，因此不得不採用租讓制，不得不同一些資產階級國家簽訂貿易協定，並同一些資本家集團訂立租讓合同，我們在這方面（經濟方面）也是孤立無援的，不得不想盡辦

法克服困難。一切爲了恢復國民經濟（參見大家都知道的列寧的演說和小冊子）。把國防委員會變成勞動國防委員會。

（六）黨在一九一七年前的發展階段：

（甲）基本核心、特別是「火星」派的形成等等。同經濟主義的鬥爭。信條（三）。

（乙）黨的幹部即未來全俄範圍的工人政黨的基礎的形成（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三年）。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丙）把幹部擴展成工人政黨，並且用無產階級運動進程中動員來的黨的新工作人員充實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

（丁）孟什維克爲了使黨的幹部瓦解成非黨羣衆而同黨的幹部進行鬥爭（『工人代表大會』）；布爾什維克爲保存黨的幹部即黨的基礎進行鬥爭。倫敦代表大會。工人代表大會派的失敗。

（戊）取消派和黨員。取消派的失敗（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〇年）。

（己）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六年時期。非法和合法工作方式結合的時期，黨組織在各個工作部門中的成長。

（七）共產黨是蘇維埃國家內部的一種聖劍騎士團，它指導蘇維埃國家的機關並鼓舞它們的活動。

老近衛軍在這個強大的騎士團中的作用。用最近三四年中鍛鍊出來的新工作人員補充老近

衛軍。

列寧同調和派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是否正確？是正確的，因為不這樣黨就會渙散，黨就不是一個有機體，而是各種分子的混合體，黨的內部就不會團結一致，黨就不會有無比的紀律性和空前的靈活性，而沒有這些，黨和它所領導的蘇維埃政權就不能抗擊世界帝國主義。拉薩爾說得很對：『黨是靠清洗自己而鞏固起來的。』首先是質量，然後才是數量。

(八) 是否需要無產階級政黨，以及無產階級政黨的作用問題。黨是無產階級的指揮員和司令部，它領導無產階級在一切鬥爭部門中的一切形式的鬥爭，並把各種不同鬥爭形式聯成一個整體。如果說不需要共產黨，那就等於說無產階級的鬥爭可以不要有專門研究鬥爭條件和擬定鬥爭方法的司令部和領導核心，就等於說沒有司令部比有司令部要戰鬥得好，這樣說是愚蠢的。

三 問 題

(一) 專制制度在日俄戰爭以前和以後的作用。日俄戰爭揭露了俄國專制制度的全部腐朽性和軟弱性。獲得勝利的一九〇五年十月的政治總罷工十分明顯地暴露了這種軟弱性（泥腿巨人）。其次，一九〇五年不僅揭露了專制制度的軟弱、自由資產階級的虛弱和俄國無產階級的強大，而且推翻了過去極為流行的一種說法，說俄國專制制度是歐洲的憲兵，說它似乎能够担任歐洲的憲兵。事

實表明，俄國專制制度沒有歐洲資本的幫助連自己的工人階級也對付不了。當俄國工人階級還在睡覺，俄國農民還相信沙皇爺爺而毫無動靜的時候，俄國專制制度確實有可能擔任歐洲的憲兵，但是一九〇五年，首先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的槍聲喚醒了俄國無產階級，同年的土地運動打破了農民對沙皇的信仰。現在歐洲反革命的重心已從俄國地主轉到英法銀行家——帝國主義者身上去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說，俄國是歐洲的憲兵，對俄國專制制度作戰是進步的，他們企圖藉此來為自己在一九一四年背叛無產階級的行為辯護，這實際上是拿過去的影子做王牌，當然，這是弄虛作假，因為擁有充分的人力和物力足以担当憲兵任務的歐洲真正的憲兵不是在彼得格勒，而是在柏林、巴黎和倫敦。

現在大家都很清楚，歐洲不僅給俄國輸入社會主義，而且還以貸款給沙皇等等形式輸入反革命，而俄國給歐洲輸入的除了政治亡命者外，還有革命（一九〇五年俄國至少給歐洲輸入了作為無產階級鬥爭手段的總罷工）。

（二）關於『果實的成熟』。怎樣判斷革命爆發時機的到來？

什麼時候可以說『果實已經成熟』，準備時期已經結束，可以開始行動？

——（甲）在羣衆的革命情緒洋溢和溢出邊緣，而我們的行動口號和指示落後於羣衆運動的時候（見列寧的『擁護參加杜馬』，一九〇五年十月以前的時期），在我們很難而且不總是能夠阻止住羣衆的時候，例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和機槍團的士兵舉行發動的時候（也見列寧的

『……幼稚病』(三)；

六〇

——(乙)在敵人陣營動搖和混亂、瓦解和崩潰達到頂點的時候，在敵人陣營的背叛分子和變節分子的數量不是與日俱增而是與時俱增的時候，在所謂中立分子即千百萬廣大的城鄉小資產階級羣衆開始堅決地拋開敵人（拋開專制制度或資產階級）而尋求同無產階級結成聯盟的時候，在敵人的管理機關和鎮壓機關由於這一切而不起作用、陷於癱瘓、成爲無用之物等等，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權利開闢道路的時候；

——(丙)在這兩種情況（即甲、乙兩種情況）同時發生的時候（實際上這種情形是常有的）。

有些人認爲，只要確認執政階級衰亡的客觀過程已經開始就可以發動攻擊。這是不對的。除此以外，還必須爲攻擊取得勝利準備必要的主觀條件。戰略和策略的任務其實就在於巧妙而及時地使準備攻擊的主觀條件的工作與統治階級政權衰亡的客觀過程相適應。

(三)時機的選擇。既然打擊的時機實際上是由黨選擇的，而不是由事變強加的，那末要使時機選擇得當，就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甲)『果實的成熟』和(乙)發生某種特別突出的事件，如政府採取某種行動或發生某種地方性的自發行動，要這種事件能夠成爲廣大羣衆易於理解的可以開始打擊的適宜理由。不遵守這兩個條件，就會使打擊不僅不能成爲向敵人展開日益強大的總攻擊的起點，不僅不能發展成雷霆萬鈞的致命打擊（恰當選擇時機的意義和目的就在這裏），相反地，可能使它變成合乎政府和一切敵人心意、有利於提高他們威信的可笑的盲動，並且會變成使黨毀滅或者至少使黨渙

散的原因和起點。例如一部分中央委員提出的、中央以其不適合（完全不適合）第二個要求（見上）而加以否決的關於逮捕民主會議（三）代表的建議，從選擇時機這一點來說就是不恰當的。

一般說來，應當防止第一次打擊（時機的選擇）變成盲動，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嚴格遵守上述兩個條件。

（四）『力量的試驗』。有時候，黨把堅決發動的準備工作做好以後，自以為已經積聚了足夠的後備力量，就認為舉行嘗試性的發動來試探一下敵人的力量和檢查一下自己的戰鬥準備是適當的。這種力量的試驗或者是黨有意識地根據自己的選擇來進行的（原定一九一七年六月十日舉行的遊行示威，後來取消，改在同年六月十八日舉行），或者是迫於環境，迫於敵方的過早發動和某種沒有預見到的現象而進行的（一九一七年八月的科爾尼洛夫的發動和共產黨的反發動，這種反發動是對自己力量的一次極好的試驗）。不能認為『力量的試驗』就是像五月示威那樣的普通遊行示威，因此不能把力量的試驗看做普通的力量計算，力量的試驗按其重要程度和可能的後果來說，雖然比起義小，但無疑比普通的遊行示威大，它是介乎遊行示威和起義或總罷工之間的一種中間物。在有利的條件下，它能够發展成第一次打擊（時機的選擇），發展成起義（我們黨在十月底的發動），而在不利的條件下，它能够使黨直接受到毀滅的威脅（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至四日的遊行示威）。因此進行力量試驗最適當的時候，是『果實已經成熟』，敵人陣營十分渙散，黨積聚了一定後備力量的時候，簡單地說，就是黨準備進攻，黨不怕力量的試驗會因情況的變化而變成第一次打擊、以後變成向敵人總進攻的時候。

黨在進行力量試驗的時候應當準備應付一切變化。

(五)『力量的計算』。力量的計算是普通的遊行示威，它在任何情況下（例如舉行罷工或不能工的五月遊行示威）幾乎都可以進行。如果力量的計算不是在直接爆發的前夜而是在比較『和平的』時期進行，那末它可能得到的結果至多是同政府的警察或一些軍隊發生一個對黨和對敵人都不會有特別損失的小衝突。但是，如果它是在爆發日益逼近的熾熱氣氛中進行，那末它就會把黨捲入同敵人進行爲時過早的激烈衝突，如果黨還很軟弱並且對這種衝突沒有準備，敵人就會順利地利用這種『力量的計算』來擊潰無產階級的力量（因此黨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間不止一次地發出了『不要受人挑釁』的號召）。因此，在革命危機已經成熟的氣氛中採用計算力量的方法必須非常謹慎，要記住，在黨軟弱的時候，敵人可能會把這種方法變成擊潰無產階級或者至少大大削弱無產階級的工具。相反地，在黨有戰鬥準備，敵人的隊伍顯然渙散的情況下，就不應當放過機會，從『力量的計算』轉到『力量的試驗』（預計到實行這種轉變的有利條件——『果實的成熟』等等），然後展開總衝擊。

(六)進攻的策略（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後進行解放戰爭時的策略）。

(七)有秩序地退却的策略。如何在敵人力量顯然佔優勢的情況下巧妙地退入腹地，以便即使不能保全軍隊的大部分，至少也能保全它的骨幹（見列寧的『……幼稚病』）。例如，我們在抵制維特——杜巴索夫的杜馬時是如何最後退却的。退却策略和逃跑『策略』之間的區別（和孟什維克比較）。

(八)防禦策略是保存骨幹和積蓄力量以等待未來戰鬥的必要手段。它要求黨佔領所有一切鬥

爭場所的陣地，把各種武器即各種組織形式準備好，決不忽視其中任何一種即使表面看來是無關緊要的組織形式，因為在開始進行決戰的時候，誰都不能預先知道哪個場所是最初的戰鬥舞台，哪種運動形式或組織形式是無產階級的出發點和有力武器。換句話說，在防禦和積蓄力量的時期，黨應當做好一切準備以等待決戰。……等待戰鬥。這並不是說，黨應當袖手旁觀，做一個無用的觀望者，由革命的黨（如果它是在野黨）蛻化成消極等待的黨，——不，黨在這樣的時候，就是說，如果黨還沒有來得及積蓄應有的力量，或者情況對黨不利，黨就應當避開戰鬥，不去應戰，但是，在有利的條件下當然不應當放過任何機會，在對敵人不利的时候迫使敵人進行戰鬥，使敵人經常處於緊張狀態，使敵人的力量一步步地削弱和瓦解，使無產階級的力量在關係到它日常利益的戰鬥中一步步地得到鍛鍊，從而增強本身的力量。

只有這樣，防禦才能成爲真正積極的防禦，黨才能保持真正行動的黨，而不是觀望等待的黨的一切特徵；只有這樣，黨才不會錯過和忽略斷然發動的時機，不會遭到事變的突然襲擊。考茨基及其同伙由於實行了『英明的』觀望等待的策略和採取了更加『英明的』消極態度而忽略了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進攻時機，這就是一個直接的警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由於在和平和土地問題上採取了漫無止境的等待策略而錯過了奪取政權的機會，這也應當是一個警告。另一方面，不能濫用積極防禦的策略、行動（舉動）的策略，這也是很明顯的，因為這樣做的危險是可能把共產黨的革命行動的策略變成『革命』操練的策略，即變成這樣一種策略：它不是積蓄無產階級的力量和加強無產階級的戰

鬥準備，就是說不是加速革命，而是分散無產階級的力量，削弱無產階級的戰鬥準備，因而延緩革命事業。

(九) 共產黨的戰略和策略的一般原則。這樣的原則有三個：

(甲) 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取得的並經革命實踐證實的下面這個結論為基礎：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的革命階級，它關心人類擺脫資本主義而獲得徹底解放，因此它的使命就是在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擔當一切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的領袖，因而必須把全部工作都導向保證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

(乙) 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取得的並經革命實踐證實的下面這個結論為基礎：任何國家的共產黨的戰略和策略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是正確的，就是它們的戰略和策略不限於「自己的」國家，「自己的」祖國，「自己的」無產階級的利益範圍之內，相反地，是在估計自己國家的條件和情況的同時，把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其他國家的革命利益放在首位，就是說它們的精神實質是國際主義的，它們「最大限度地實現一個（自己的）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一切，以便發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國的革命」（見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二五)）。

(丙) 以下列論點為出發點：否定在改變戰略和策略、在制定新的戰略計劃和策略路線時的一切右的和左的教條主義（考茨基、阿克雪里羅得、波格丹諾夫、布哈林），否定直觀方法，否認引證、歷史比擬、杜撰計劃和制定死公式的方法（阿克雪里羅得、普列漢諾夫），承認不應當「躺在」而應當

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不應當『只是解釋世界』，而應當『改造』世界，不應當『觀察無產階級的腎部』和做事變的尾巴，而應當領導無產階級並成爲不自覺過程的自覺表現者（見列寧的『自覺性和自覺性』）和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中關於共產黨人是無產階級最有遠見的和先進的部分這段名言（三））。

俄國和西方革命運動經驗中的許多事實都說明了上述的每一個原則，特別是第二個和第三個原則。

（十）任務：

（甲）把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爭取到共產主義方面來（就是說要聚集幹部，建立共產黨，制定綱領和策略原則）。宣傳是工作的基本方式。

（乙）把廣大工人羣衆和全體勞動者爭取到先鋒隊方面來（把羣衆引到戰鬥陣地上）。工作的基本方式是羣衆的實際行動，這是進行決戰的前奏。

（十一）規則：

（甲）掌握無產階級的一切組織形式，一切運動和鬥爭形式（場所）。（運動形式：國會內的和國會外的，合法的和非法的。）

（乙）學會適應一種運動形式和另一種運動形式的迅速更替，一種形式和另一種形式的補充，學會合法的形式和非法的形式，國會內的形式和國會外的形式的結合（例如：一九一七年七月布爾

什維克從合法的形式向非法的形式的迅速轉變，連納事件時期國會外的運動和杜馬內的活動的結合）。

(十二) 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以前和以後的戰略和策略。四個特點。

(甲) 十月革命後在整個歐洲特別是在俄國形成的一個最重要的情況，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在俄國範圍內戰勝了俄國資產階級，從而突破了國際社會戰綫（同帝國主義決裂，公佈密約，用國內戰爭代替帝國主義戰爭，號召士兵聯歡，號召工人起義反對本國政府）。這一突破開始了世界歷史的轉變，使國際帝國主義的整座大廈受到了直接威脅，根本改變了西方鬥爭力量的對比，使之有利於歐洲工人階級。這就是說，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已經從一國的力量變成國際的力量，而且推翻本國資產階級的舊任務已經為推翻國際資產階級的新任務所代替。國際資產階級感到有致命的危險，因此就把堵塞俄國這個缺口作為自己的迫切任務，集中了他們的餘力（後備力量）來反對蘇維埃俄國，蘇維埃俄國也就不能不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來進行防禦，被迫承受國際資產階級的主要打擊。這一切大大促使西方無產者對本國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並且大大加深了西方無產者對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國際無產階級先進戰士的同情。

這樣，在一個國家內實現了推翻資產階級的任務之後，就產生了在國際範圍內進行鬥爭的新任務，即在另一個方面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國家同敵視它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鬥爭，俄國無產階級過去是國際無產階級隊伍之一，從今以後則變成了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即先鋒隊。

這樣，發動西方革命以使自己（俄國）易於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已經從願望完全變成了當前的實踐任務了。十月革命在各種關係方面（特別是在國際關係方面）所引起的這一變化應完全歸功於十月革命。二月革命甚至沒有觸及國際關係方面。

（乙）十月革命後在俄國形成的情況的第二個重要特徵，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國內的地位改變了。從前，在十月革命以前，無產階級所關心的主要是組織一切戰鬥力量推翻資產階級，也就是說，當時的任務主要是批評性的和破壞性的。現在，在十月革命以後，資產階級已經不掌握政權，國家已經是無產階級的了，因此舊任務已過時而讓位於這樣的新任務：組織俄國全體勞動者（農民、手工業者、知識分子、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的各落後部族）一方面建設新的蘇維埃俄國，建設它的經濟機關和軍事機關，另一方面鎮壓已被推翻但還沒有被徹底消滅的資產階級的反抗[⊖]。

（丙）與俄國無產階級已經改變的地位以及新的任務相適應，無產階級對待資產階級集團和小資產階級集團以及俄國各個居民階層的政策也改變了。從前（在推翻資產階級的前夕），無產階級拒絕同資產階級集團達成個別協議，因為這種政策會鞏固執政的資產階級；而現在則恰恰相反，無產階級主張達成個別協議，因為這些協議能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權，瓦解資產階級，使無產階級易於馴服和同

⊖ 與此相適應，某些舊的運動形式，如罷工和起義等等也過時了，工人階級組織（黨、蘇維埃、工會、合作社、文化教育機關）的性質和形式（職能）也隨着改變了。

化某些資產階級集團。『改良主義』和達成個別協議的政策之間的區別（前者絕對拒絕革命行動的方法，後者則不是，而革命者在運用後者時是以革命的方法為依據的，前者的範圍較窄，後者的範圍較寬）。（見論『改良主義』和『協議政策』）

（丁）與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人力和物力的巨大增長相適應，共產黨的戰略工作的範圍也擴大了。從前，共產黨的戰略只限於制定戰略計劃，在各種運動形式和無產階級組織形式之間，在運動的各種要求（口號）之間靈活運用，提出一些口號，更換一些口號，運用有限的後備力量即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而且由於黨的軟弱，利用這些後備力量的範圍和可能性通常總是限於狹小的圈子；現在，在十月革命以後，第一、後備力量增大了（俄國各社會集團之間的矛盾，周圍國家的各階級和各民族之間的矛盾，周圍國家之間的矛盾，西方日益增長的社會主義革命，東方和整個殖民地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等等）；第二、可以靈活運用的方法和可能性增多了（舊方法由新方法補充了，例如由外交工作、由西方社會主義運動同東方革命運動建立更切實的聯系等補充了）；第三、無產階級在俄國已經成爲統治的政治力量，它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在國際上已經成爲世界革命運動的先鋒隊，由於它的人力和物力的增長，出現了日益廣泛地利用後備力量的可能性。

（十三）特別是：（甲）關於運動的速度及其在確定戰略和策略時的作用問題，（乙）關於改良主義、協議政策和二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

（十四）『改良主義』（『妥協主義』）、『協議政策』和『達成個別協議』是三種不同的東西（每種

將分別論述)。孟什維克的協議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它們是以改良主義即否認革命行動為依據的，而布爾什維克的協議是以要求革命行動為依據的。正因為如此，孟什維克的協議成了一套體系，成了協議政策，而布爾什維克只主張達成個別的具體的協議，並沒有把它們變成特殊的協議政策。

(十五) 俄國共產黨的三個發展時期：

(甲) 無產階級先鋒隊(即黨)的形成時期，黨的幹部的聚集時期(黨在這個時期是軟弱的，它雖然有綱領，有總的策略原則，但作為羣衆性行動的黨還是軟弱的)；

(乙) 共產黨領導下的羣衆革命鬥爭時期。這個時期黨從羣衆的鼓動組織變成羣衆的行動組織，革命行動時期代替了準備時期；

(丙) 取得政權以後即共產黨變成執政黨以後的時期。

(十六) 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力量在於：在俄國，農民的土地革命(推翻封建制度)是在無產階級而不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因此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便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序幕，勞動農民同無產階級的聯系和前者對後者的支持，不僅政治上得到了保證，而且組織上在蘇維埃中也得到了鞏固，這就使絕大多數居民同情無產階級(正因為如此，即使無產階級本身在國內不佔多數也不要緊)。

歐洲(大陸)無產階級革命的弱點在於：在歐洲，無產階級和農村沒有這種聯系，也得不到農村的這種支持，在那裏，農民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下而不是在當時還很軟弱的無產階級領導下從封建制

度下解放出來的，因此在社會民主黨對農村利益漠不關心的情況下，大多數農民仍長久地對資產階級抱着同情[⊖]。

一九二一年七月

第一次刊印

⊖ 這本小冊子的大綱，作者曾用於寫作「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該書於一九二四年出版，已編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大綱的第一部分曾用於寫作「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戰略和策略問題」一文，該文於一九二三年發表，已編入「斯大林全集」第五卷。大綱的某些論點，作者曾用於寫作「黨在取得政權以前和以後」一文，該文於一九二一年八月發表，已編入「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編者註

關於共產主義在格魯吉亞和南高加索的當前任務

（在格魯吉亞共產黨梯弗里斯黨組織全體黨員大會上）

上的報告）（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

同志們！你們黨組織的委員會要我向你們做關於共產主義在格魯吉亞的當前任務的報告。

共產主義的當前任務——這是策略問題。要確定黨的策略，而且是執政黨的策略，就必須首先考慮到黨周圍的應該加以重視的總的情況。那末究竟是什麼情況呢？

未必用得着證明，隨着國內戰爭的爆發，世界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一個是以協約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一個是以蘇維埃俄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第一個陣營裏的，是各種各樣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和孟什維主義的國家，在第二個陣營裏的，是各蘇維埃國家，其中包括格魯吉亞。目前各蘇維埃國家周圍情況的基本特點是：上述兩個陣營之間的武裝鬥爭時期因雙方相當長期的停戰而結束了，在各蘇維埃共和國，和平經濟建設時期已經代替了戰爭時期。在過去，在所謂軍事時期，各蘇維埃共和國是在『一切爲了戰爭』這個總的口號下行動的，因爲各蘇維埃共和國已成爲被帝

國主義國家包圍封鎖的兵營。在當時，在那個時期，共產黨的全部精力集中在用一切人力去建設紅軍，加強前綫，以便同帝國主義進行武裝鬥爭。不用說，黨在這個時期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建設上。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各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在這個時期只限於發展軍事工業和勉強維持國民經濟中某些與戰爭也有關係的部門。各蘇維埃國家的軍事時期遺留給我們的經濟破壞正說明了這一點。

現在，當我們已進入新的經濟建設時期，當我們已從戰爭轉到和平工作的時候，「一切爲了戰爭」這個舊口號就必然爲「一切爲了國民經濟」這個新口號所代替。這個新時期要求共產黨員把全部力量投到經濟戰綫上，投到工業、農業、糧食工作、合作社、運輸業等等上去。因爲不這樣做，就不可能戰勝經濟破壞。

如果說，軍事時期給我們提供了軍人型的共產黨員，如供應工作人員、編制工作人員、作戰參謀人員等等，那末在新時期，即在經濟建設時期，在吸引廣大羣衆參加經濟恢復事業的同時，共產黨還應當關心培養新型的做經濟工作的共產黨員，如工業、農業、運輸業、合作社等方面的工作人員。

但是，共產黨員在開展經濟建設工作時，不能不考慮過去遺留下來的兩個極重要的情況。那就是：第一、各蘇維埃國家周圍存在着工業高度發達的資產階級國家；第二、各蘇維埃國家內部存在着人數衆多的農村小資產階級。

因爲歷史的意志決定了蘇維埃政權不是在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而是在資本主義不大發達

的國家裏取得勝利。歷史表明，在像俄國這樣的國家裏推翻資產階級，比在德國、英國和法國這類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容易得多，因為俄國的資本主義比較年輕，無產階級強大而集中，民族資產階級軟弱；而德國、英國和法國的資本主義已存在幾百年，資產階級已經成爲整個社會生活中的極重要的領導力量。

毫無疑問，當無產階級專政在德國和英國這樣的國家確立的時候，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並把它進行到底就比較容易，也就是說，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就比較容易，因為那裏的工業比目前各蘇維埃國家的工業要發達，技術比較精湛，無產階級的人數也比較多。可是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一方面，無產階級專政在一些工業不大發達而小商品生產者階級（農民）人數衆多的國家裏建立起來了；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專政在一些工業比較發達而無產階級人數衆多的國家裏還存在着。忽視這個事實是不明智的、輕率的。

蘇維埃國家的原料產地和燃料產地很多，而工業發達的資產階級國家却缺少這種產地，因此資產階級國家的一些資本家集團無疑地願意同各蘇維埃國家達成協議，以便在一定條件下利用我們的原料產地和燃料產地。另一方面，各蘇維埃國家內部的小生產者階級（農民）需要工業品（布疋、農業機器），因此它無疑地也願意同本國無產階級政權達成協議，以便通過商品交換（用農產品交換）得到工業品。

而蘇維埃政權也願意同別國的一些資本家集團和本國的小商品生產者階級達成臨時協議，因爲

這種協議無疑會加速和促進被戰爭破壞的生產力的恢復，加速和促進作為未來社會主義經濟的技術工業基礎的電氣化的實現。

這些情況要求各蘇維埃國家的共產黨員實行這樣的政策：同西方一些資本家集團達成臨時協議（為了利用它們的資本和技術力量），同時也同本國的小資產階級達成臨時協議（為了獲得必需的原料和糧食）。

有人會說，這種同資產階級達成協議的策略帶有孟什維主義的色彩，因為孟什維克在自己的行動中就是實行同資產階級達成協議的策略。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共產黨員現在提出的同一些資產階級集團達成協議的策略和孟什維克同資產階級達成協議的策略之間有天淵之別。孟什維克通常是在資本家執掌政權的時候，是在執政的資本家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並使無產階級腐化而答應從上面賜給無產階級個別集團一些「改革」和小小的讓步的時候，提出同資產階級達成協議的。這種協議對無產階級有害，對資產階級有利，因為它不是削弱而是鞏固資產階級政權，使無產階級內部產生分歧，並使無產階級分裂。正因為如此，布爾什維克一向反對並且今後還要反對孟什維克的同執政的資產階級達成協議的策略。正因為如此，布爾什維克把孟什維克看做向無產階級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人。

同孟什維克的策略相反，布爾什維克提出的協議策略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它完全以另一種情況為前提，即執掌政權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而且一些資產階級集團同無產階級政權達成協議後，一方面必然使無產階級政權鞏固，另一方面又必然使資產階級瓦解並使一些資產階級集團

馴服。只是無產階級必須緊緊握住它所奪得的政權，並且善於利用這些資產階級集團的資金和知識來恢復國家的經濟。

可見，這個策略和孟什維克的策略是有天淵之別的。

總之，把全部人力投到經濟戰綫上，同時通過協議的方式利用一些資產階級集團，利用它們的資金、知識和組織技能，以利於國家經濟的恢復，——這就是總的情況要求各蘇維埃國家共產黨員，其中包括格魯吉亞共產黨員當前應當擔負的第一項任務。

但要確定蘇維埃國家的策略（這裏指的是確定蘇維埃格魯吉亞的策略），單考慮到總的情況是不夠的。爲了確定每一個蘇維埃國家共產黨員的策略，還必須考慮到這些國家存在的特殊的具體的條件。而蘇維埃格魯吉亞存在的特殊的具體的條件（格魯吉亞共產黨必須在這些條件下進行活動）究竟是怎樣的呢？

可以毫不懷疑地舉出一些說明這些情況的事實。

第一、毫無疑問，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對各蘇維埃國家極端仇視，因此無論從軍事方面或從經濟發展方面來看，蘇維埃格魯吉亞和其他一切蘇維埃國家都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各蘇維埃國家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互相支援是這些國家發展的不可缺少的條件。

第二、很明顯，格魯吉亞缺少糧食，它需要俄羅斯的糧食，沒有是不行的。

第三、格魯吉亞沒有液體燃料，爲了維持運輸業和工業，顯然需要阿捷爾拜疆的石油產品，沒有

是不行的。

第四、同樣毫無疑問，格魯吉亞的出口商品不足，它需要俄羅斯用黃金來幫助它彌補商品預算的赤字。

最後，不能不考慮到格魯吉亞居民中民族成分的特殊情況，阿爾明尼亞人在格魯吉亞居民中佔很大的百分比，而在梯弗里斯，即在格魯吉亞首都甚至約佔全部居民的半數。毫無疑問，這就要求格魯吉亞在任何管理形式下，特別是在蘇維埃制度下，要同格魯吉亞的阿爾明尼亞人以及同阿爾明尼亞保持無條件的和平和兄弟合作。

未必用得着證明，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具體條件要求蘇維埃格魯吉亞、蘇維埃阿爾明尼亞和阿捷爾拜疆彼此間在經濟方面共同行動，在經濟活動方面聯合一致，比如說，共同加強運輸，在國外市場上一致行動，佈置土壤改良工作（灌溉、排水）等等。至於一旦需要抵禦外侮時，南高加索各獨立蘇維埃共和國之間和這些共和國同蘇維埃俄羅斯之間必須互相支援和聯系，那就更不用說了。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無可爭辯的。我所以又提到這些老生常談的道理，是因為最近兩三年以來，有一些情況妨礙着這種聯合，並且有使這種聯合的嘗試遭到破壞的危險。我說的是格魯吉亞的、阿爾明尼亞的、阿捷爾拜疆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最近幾年來在南高加索各共和國內極爲猖獗，妨礙着聯合事業。

我記得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間，南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和全體勞動者中間呈現出一片兄弟般團結的景象，當時阿爾明尼亞工人、格魯吉亞工人、阿捷爾拜疆工人和俄羅斯工人兄弟般地區

結在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中。而現在，當我到達梯弗里斯之後，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南高加索各民族工人之間過去的那種團結已經沒有了。民族主義在工人和農民中間增長了，對其他民族同志的不信任情緒加深了；反阿爾明尼亞的、反韃靼的、反格魯吉亞的、反俄羅斯的和其他種種民族主義現在極其盛行。舊的兄弟般的信任的關係破裂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地削弱了。顯然，格魯吉亞民族主義政府（孟什維克）、阿捷爾拜疆民族主義政府（木沙瓦特黨人^(三三)）和阿爾明尼亞民族主義政府（達什納克黨人^(三四)）存在三年之久不是沒有影響的。這些民族主義政府實行自己的民族主義政策，向勞動者灌輸侵略性的民族主義精神，以致民族主義的仇視氣氛包圍住了這些小國中的每個國家，使格魯吉亞和阿爾明尼亞得不到俄羅斯的糧食和阿捷爾拜疆的石油，使阿捷爾拜疆和俄羅斯得不到經過巴士姆運來的商品。至於武裝衝突（格魯吉亞和阿爾明尼亞的戰爭）和互相殘殺（阿爾明尼亞和韃靼的互相殘殺），那就更不用說了，這都是民族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在這種充滿民族主義毒素的環境裏，原有的國際主義關係破裂了，工人的意識遭到了民族主義毒素的侵害，這是不足為怪的。由於這種民族主義殘餘在工人中間還沒有被剷除，這種情況（民族主義）就成了使南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在經濟（和軍事）活動方面聯合起來的極大障礙。我已經說過，沒有這種聯合，南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特別是蘇維埃格魯吉亞在經濟上就不可能繁榮起來。因此，格魯吉亞共產黨員當前的任務就是：同民族主義作無情的鬥爭，恢復孟什維克民族主義政府出現以前原有的那種兄弟般的國際主義關係，從而造成一種使南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經濟活動得以聯合起來並使格魯吉亞的經濟得以恢復所必需

的相互信任的健康氣氛。

當然這並不是說，不再需要獨立的格魯吉亞或獨立的阿捷爾拜疆等等了。在某些同志中間流傳着一種計劃，主張恢復舊省制（梯弗里斯省、巴庫省、埃里溫省），由南高加索政府統一領導。我認爲這是空想，而且是一種反動的空想，因爲這個計劃的出發點無疑是想扭轉歷史車輪。恢復舊省制和廢除格魯吉亞、阿捷爾拜疆和阿爾明尼亞的民族政府，就無異於恢復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葬送革命成果。這和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正因爲要消除互相不信任的氣氛和恢復南高加索各民族工人同俄羅斯工人之間兄弟般的關係，——正因爲這樣，就必須保持格魯吉亞、阿捷爾拜疆和阿爾明尼亞的獨立。這並不是排斥，相反地，這是預計到必須在經濟方面和其他方面互相支援，必須按照自願協議原則和協商原則把各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的經濟活動聯合起來。

我得到的消息說，最近莫斯科決定給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和阿捷爾拜疆一個小小的援助，即貸給它們六百五十萬金盧布。此外，我知道格魯吉亞和阿爾明尼亞是無償地從阿捷爾拜疆得到石油產品的，這種事情在資產階級國家生活中，即使是在用有名的『誠意協定』（Entente cordiale）聯系起來的資產階級國家生活中也是不可想像的。未必用得着證明，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行動不是在削弱而是在鞏固這些國家的獨立。

總之，要肅清民族主義殘餘，無情地剷除這些殘餘，並且在南高加索各民族勞動者中間造成一種相互信任的健康氣氛，以便在保持蘇維埃格魯吉亞獨立的情況下促進和加速南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

國經濟活動方面的聯合（沒有這種聯合，蘇維埃格魯吉亞的經濟就不可能恢復），——這就是格魯吉亞的具體條件要求格魯吉亞共產黨員當前應當擔負的第二項任務。

最後，是當前的第三項任務，這項任務也同樣重要和同樣必要，這就是要保持格魯吉亞共產黨的純潔性、堅定性和靈活性。

同志們！你們應當記住，我們黨是執政的黨，那些不可靠的、同無產階級思想背道而馳的、企圖升官發財的分子往往整批整批地鑽進我們黨來，或者竭力設法鑽進來，因而把腐化和守舊思想帶進黨裏來。共產黨員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設法保護黨，不讓這些分子鑽進黨裏來。必須永遠記住，政黨的力量和作用，特別是共產黨的力量和作用，與其說是取決於黨員的數量，不如說是取決於黨員的質量，取決於他們的堅定和對無產階級事業的忠誠。俄國共產黨總共只有七十萬黨員。同志們，我可以向你們斷定，俄國共產黨是能够使使自己的黨員數量增加到七百萬的，如果它想這樣做的話，如果它不懂得七十萬堅定的共產黨員比七百萬誰也不需要什麼也不能做的同路人的力量要強大得多的話。俄國抵擋住了世界帝國主義的攻擊，它在對外戰綫上取得了一系列極重大的勝利，它在兩三年內發展成一支震撼世界帝國主義基礎的力量，這一切成就的取得，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應當歸功於團結一致的、久經戰鬥鍛鍊的和百鍊成鋼的共產黨，這個黨從來沒有追求過黨員的數量，而認爲自己首先應當關心的是改善黨員的質量。拉薩爾說得對：黨是靠清除自身的骯髒東西而鞏固起來的。另一方面，有些政黨，例如世界最大的社會民主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所以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成了帝國主義

手中的玩具，而在戰後則像一個泥腿巨人那樣跌入深淵，那無疑是因為它多年來迷戀於靠吸收各種小資產階級敗類來擴大自己的組織，這批敗類就窒息了黨內的生氣。

總之，要保持自己黨的堅定性和純潔性，不要追求黨員的數量，要不斷地改善黨員的質量，保護黨，不讓市儈知識分子民族主義者湧進黨來，——這就是格魯吉亞共產黨當前的第三項任務，即最後一項任務。

同志們，我的報告就要結束了。現在來做幾點結論：

(一) 開展全面的經濟建設工作，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貢獻給這項工作，同時利用西方資本家集團和本國小資產階級集團的人力和物力。

(二) 消滅民族主義這條九頭蛇，造成國際主義的健康氣氛，以便在保持南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獨立的條件下促進這些國家經濟活動方面的聯合。

(三) 保護黨，不讓市儈分子湧進黨來，保持黨的堅定性和靈活性，不斷地改善黨員的質量。這就是格魯吉亞共產黨當前的三項基本任務。

格魯吉亞共產黨只有完成這些任務才能掌握船舵，戰勝經濟破壞。(鼓掌)

載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

「格魯吉亞真理報」(梯弗里斯)

第一〇八號

黨在取得政權以前和以後

必須指出我們黨的三個發展時期。

第一個時期——這是我們黨的形成、黨的建立時期。它大致包括從創辦『火星報』〔三〕到召開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這段時期（一九〇〇年底至一九〇五年初）。

在這個時期，黨作為動力來說是軟弱的。它所以軟弱，不僅因為它年輕，而且還因為整個工人運動年輕，沒有或者只有不大發展的革命環境和革命運動，特別是在這個時期的開始階段（農民默不作聲或者至多是背後發些怨言；工人只知道局部的經濟罷工或全市性的政治罷工；運動的形式帶有地下的或半公開的性質；工人階級的組織形式也主要是帶有地下的性質）。

由於戰略是以擁有後備力量和可能靈活運用後備力量為前提，因此黨的戰略必然是狹窄的，受限制的。黨只限於制定運動的戰略計劃，即規定運動應當遵循的道路，由於黨的軟弱，黨的後備力量——俄國國內外敵人陣營中的矛盾還沒有被利用或者幾乎沒有被利用。

由於策略是以對種種運動形式和無產階級組織形式的利用、這些形式的配合和互相補充等等為前提來爭取羣衆和保證戰略勝利的，因此黨的策略也必然是狹窄的，沒有廣大的活動範圍的。

黨在這個時期最注意和最關心的是黨的本身，是黨的生存和黨的保存問題。這個時期黨被看做是某種獨立自在的力量。沙皇政府對黨的瘋狂進攻，以及孟什維克企圖從內部來破壞黨和用不定形的非黨團體來代替黨的幹部（請回憶一下一九〇五年從阿克雪里羅得的那本臭名遠揚的小冊子「人民杜馬和工人代表大會」出版後開始的孟什維克關於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運動），都威脅着黨本身的生存，因此，保存黨的問題在這個時期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俄國共產主義在這個時期的基本任務是：把工人階級中最積極最忠實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優秀分子吸收入黨，組成無產階級政黨並使它站穩脚跟。列寧同志是這樣表述這個任務的：「把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爭取到共產主義方面來。」（見『……幼稚病』〔三〕）

第二個時期——這是把廣大工農羣衆爭取到黨方面來，爭取到無產階級先鋒隊方面來的時期。它大致包括一九〇五年十月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這段時期。

這個時期比前一個時期的情況複雜得多，發生的事件也多得多。一是沙皇政府在中國東北戰場上的失敗和一九〇五年十月的革命，一是日俄戰爭的結束、反革命的勝利和革命成果的葬送，還有帝國主義戰爭、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和有名的『兩個政權並存』，——這一切事件激動了俄國的各個階級，把它們一個個地推上了政治舞台，鞏固了共產黨，喚醒了廣大農民羣衆參加政治生活。

無產階級運動增添了像政治總罷工和武裝起義這樣強有力的形式。

農民運動增添了對地主的抵制（把地主『趕出』莊園），這種抵制後來就變成了起義。

黨和其他革命組織的活動因爭得了國會外的、合法的和公開的工作形式而活躍起來了。

工人階級的組織不僅增添了像工會這樣久經考驗的和重要的形式，還增添了像工人代表蘇維埃這樣史無前例的强有力的工人階級組織形式。

農民步工人階級的後塵，也選出了農民代表蘇維埃。

黨の後備力量也增多了。在鬥爭過程中表明農民能够而且一定會成爲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同時也表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推翻資本政權事業中的領導作用。

黨在這個時期已經遠不像前一個時期那樣軟弱了；作爲動力來說，黨已經成了極重要的因素。現在它已不會再是一種獨立自在的力量了，它的生存和發展確實有了保證，現在它由獨立自在的力量變成爭取工農羣衆的工具，變成了領導羣衆進行推翻資本政權鬥爭的工具。

黨的戰略在這個時期有了廣大的活動範圍；它首先是用來保證和利用農民這種後備力量，而且這個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黨的策略也有了廣大的活動範圍，因爲羣衆運動、羣衆組織、黨和其他革命組織的活動增添了過去所沒有的新形式。

黨在這個時期的基本任務是：把千百萬羣衆爭取到無產階級先鋒隊方面來，爭取到黨方面來，以便推翻資產階級專政和奪取政權。黨最關心的已經不是黨本身，而是千百萬人民羣衆。列寧同志是這樣表述這個任務的：要在社會戰綫上『佈置千百萬羣衆』，以便保證『在即將到來的決戰中』獲得

勝利。(見列寧同志的上述小冊子)

我們黨的前兩個發展時期的特徵就是這樣。

第一個時期和第二個時期之間的差別無疑是很大的。但是它們之間也有共同之處。無論在第一個時期或在第二個時期，黨十分之九是甚至完全是一國的力量，只對俄國或在俄國內部起作用（有組織的國際無產階級的隊伍之一）。這是第一。第二、無論在第一個時期或在第二個時期，俄國共產黨都是在俄國內部實行變革的黨和革命的黨，因此在這兩個時期內黨的主要工作是批評和破壞舊制度。我們現在所處的第三個時期的情況則完全不同。

第三個時期——這是奪取和保持政權的時期。其目的方面是吸引俄國全體勞動者參加社會主義經濟和紅軍的建設，另一方面是用一切人力和物力幫助國際無產階級進行推翻資本的鬥爭。它包括一九一七年十月到目前這段時期。

俄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無論在國際方面或在俄國內部，都形成了一種世界歷史上空前的完全特殊的局面。

首先，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標誌着世界社會戰綫的突破，並且在整個世界歷史中造成了一個轉變。請想一想從落後的殖民地到先進的美國這條廣闊的社會戰綫，後來國際無產階級的俄國部隊強有力地突破了這條戰綫，這一突破威脅了帝國主義的生存，打亂了帝國主義鯊魚的一切如意算盤，並且促進了，從根本上促進了國際無產階級反對資本的鬥爭，——這就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歷

史意義。從那時起，我們黨就從一國的力量變成了主要是國際的力量，而俄國無產階級也就從國際無產階級的落後部隊變成了它的先鋒隊。從此以後，國際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要擴大俄國這個缺口，幫助走在前面的先鋒隊，不讓敵人包圍這個勇敢的先鋒隊和使它離開基地。相反地，國際帝國主義的任務是要堵塞，一定要堵塞俄國這個缺口。正因為如此，我們黨要想保持政權，就應該『最大限度地實現一個（自己的）。——斯大林註』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一切，以便發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國的革命』（見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三））。正因為如此，我們黨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起就從一國的力量變成了國際的力量，變成了在國際範圍內實行變革的黨。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黨在國內的狀況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前兩個時期，黨是破壞舊制度和推翻俄國資本的槓桿。而現在，在第三個時期則相反，它已由在俄國內部實行變革的黨變成了建設的黨，變成了創造新的經濟形式的黨。從前黨吸收優秀工人是爲了衝擊舊制度，現在黨吸收他們是爲了做好糧食、運輸和各基本工業部門的工作。從前黨吸引農民中的革命分子是爲了打倒地主，現在黨吸收他們是爲了改善農業，鞏固勞動農民和執政的無產階級之間的聯盟。從前黨吸收各落後民族中的優秀分子是爲了同資本作鬥爭，現在黨吸收他們是爲了根據同俄羅斯無產階級合作的原則來安排這些民族中勞動者的生活。從前黨摧毀軍隊，摧毀舊的將軍的軍隊，現在黨必須建立爲保衛革命成果免受外敵侵犯所必需的新的工農軍隊。

俄國共產黨從在俄國內部實行變革的黨變成了從事和平建設的黨。正因為如此，黨在無產階級

武庫中取消了現在俄國已經不需要的罷工、起義等鬥爭形式。

從前，沒有軍事方面和經濟方面的行家也過得去，因為當時黨的工作主要是批評性的，而批評是容易的……現在黨不能沒有各方面的行家了；黨除了利用舊專家以外，還必須培養自己的行家，如編制工作人員、供應工作人員、作戰參謀人員（軍事方面的）、糧食工作人員、農業工作人員、鐵路工作人員、合作社工作人員、工業和對外貿易的行家（經濟方面的）。不這樣做就不能進行建設。

從黨的人力物力和黨的後備力量大大擴大和增多的意義上來說，黨的狀況也發生了變化。黨的後備力量是：

- （一）俄國內部各個不同的社會集團之間的矛盾。
- （二）周圍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有時釀成軍事衝突的矛盾和糾紛。
- （三）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社會主義運動。
- （四）落後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中的民族解放運動。
- （五）俄國的農民和紅軍。
- （六）外交機關和對外貿易機關。
- （七）國家政權的全部威力。

一般說來，就是這樣一些力量和可能性，黨的戰略可以在這些力量和可能性的範圍（這些範圍是相當廣闊的）內靈活運用，黨的策略也可以在這種基礎上進行日常的動員力量的工作。

這一切就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積極的方面。

但是，十月革命也有它的陰暗的方面。因為俄國無產階級是在國內外特殊的條件下取得政權的，這些條件給黨在取得政權以後的全部工作打上了烙印。

第一、俄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換取西方國家的機器和裝備，那就很難靠本身的力量組織運輸業，發展工業並使城鄉工業電氣化。第二、俄國至今還是一個被工業比較發達的敵視俄國的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社會主義孤島。如果蘇維埃俄國鄰近有一個工業發達的蘇維埃大國或者幾個蘇維埃國家，那就能很容易根據以原料換取機器和裝備的原則同這些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是現在沒有這個條件，所以在無產階級革命還沒有在一個或幾個工業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之前，蘇維埃俄國和我們這個領導它的黨就不得不尋求同敵視我們的西方資本家集團建立經濟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術裝備。租讓制形式和對外貿易——這些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不這樣就很難指望在經濟建設方面和在國家電氣化方面取得決定性的成就。毫無疑問，這個過程將是緩慢而痛苦的，但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某些性情急躁的同志忍耐不住了，要求迅速取得成績和採取有效措施，但是必然性依然是必然性。

從經濟方面來說，目前各資本家集團之間的糾紛和軍事衝突，正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一樣，它的根源是目前的生產力同限制生產力發展的本國帝國主義的框子以及同資本主義的佔有形式之間的衝突。帝國主義的框子和資本主義的形式窒息和阻礙着生產力的發展。唯一的出路就是根

據先進的（工業的）和落後的（燃料和原料的）國家之間建立經濟合作的原則（而不是根據前者掠奪後者的原則）來組織世界經濟。正因為如此，就需要有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否則休想組織和正常地發展世界經濟。但是要開始（至少是開始）建立合理的世界經濟，無產階級至少必須在幾個先進國家獲得勝利。現在還沒有這個條件，所以我們黨就必須尋求同各資本家集團建立經濟合作的迂迴道路。

正因為如此，在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並舉起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以後，只要『最大限度地實現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一切，以便發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國的革命』的黨的政策還沒有收到實際的效果，黨就認為實行『放縱』我國的小生產和小工業的政策，實行在國家政權控制下容許資本主義局部恢復和吸引租賃者和股東等等政策是適宜的。

這就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所造成的一些積極的和陰暗的特殊條件，我們黨在第三個時期就是在這些條件下活動和發展的。

我們黨目前在俄國國內或國外所具有的那種巨大的威力就是由這些條件決定的。黨所面臨的而且無論如何應當加以克服的那些意料不到的困難和危險，也是由這些條件決定的。

這個時期黨在對外政策方面的任務是由我們這個國際革命的黨的地位決定的。這些任務就是：

（一）利用包圍我國的各資本家集團之間和各資本主義政府之間的一切矛盾和糾紛來瓦解帝國主義。

（二）不惜人力和物力幫助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

(三) 採取一切辦法加強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

(四) 鞏固紅軍。

這個時期黨在國內政策方面的任務是由我們這個從事和平建設工作的黨在俄國內部的地位決定的。這些任務就是：

(一) 鞏固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的聯盟，其方法是：

(甲) 吸引農民中最主動和最具有辦事能力的人參加國家建設工作；

(乙) 在推廣農業知識和修理機器等方面幫助農民經濟；

(丙) 發展城鄉間正常的物資交流；

(丁) 使農業逐步電氣化。

應當記住一個重要的情況。與西方的革命和無產階級政黨不同，我國革命的一個可慶幸的特點和我們黨的巨大的優點是：小資產階級中最廣大最有力的階層——農民在俄國已經從資產階級可能的後備力量變成了無產階級的真正的後備力量。這種情況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因而有利於俄國無產階級。這主要是因為和西方的情況不同，俄國農民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擺脫地主的奴役而獲得解放的。在這個基礎上也就形成了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的聯盟。共產黨員的責任是要珍視和鞏固這個聯盟。

(二) 發展工業，其方法是：

黨在取得政權以前和以後

- (甲) 集中最大限度的力量掌握各基本工業部門和改善這些部門的工人的供應工作；
 - (乙) 發展對外貿易以輸入機器和裝備；
 - (丙) 吸引股東和租賃者；
 - (丁) 儲存即使是最少數量的機動糧；
 - (戊) 使運輸業和大工業電氣化。
- 一般說來，黨在其目前發展時期的任務就是如此。

載於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真理報」第一九〇號

署名：約·斯大林

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民族政策

十月革命的力量之一，就在於它和西方的歷次革命不同，它把千百萬小資產階級羣衆，首先是把他們中間最強大的人數最多的階層——農民團結在俄國無產階級的周圍。因此，俄國資產階級就陷於孤立，失去了軍隊，而俄國無產階級就變成了國家命運的主宰者。不這樣，俄國工人就保持不住政權。

和平、土地革命和民族自由——這就是使幅員廣闊的俄國的二十多個民族的農民集合在俄國無產階級紅旗周圍的三個基本要素。

頭兩個要素在這裏沒有必要談了，因為在書刊上已經談得够多了，而且不談也是很清楚的。至於第三個要素，即俄國共產黨人的民族政策，看來，它的重要性人們還沒有完全了解。因此，不妨簡單地談談。

首先，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除外）的一億四千萬人口中，大俄羅斯人不超過七千五百萬，其餘的六千五百萬人都是非大俄羅斯民族。

其次，這些民族主要是居住在邊疆地區，即軍事上最容易被攻破的地方，這些邊疆地區富產原

料、燃料和糧食。

此外，這些邊疆地區在工業方面和軍事方面沒有俄國中部發達（或者完全不發達），因此，沒有俄國中部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幫助，它們就無力捍衛自己的獨立生存，正像俄國中部沒有邊疆地區在燃料、原料和糧食方面的幫助就不能保持自己軍事和經濟的威力一樣。

這些情況加上共產主義民族綱領的某些原理，就決定了俄國共產黨人的民族政策的性質。

這個政策的實質可以用下面幾句話來表述：放棄對非俄羅斯民族居住地區各種各樣的「要求」和「權利」；承認（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這些民族有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使這些民族同俄國中部在軍事和經濟方面建立自願的聯盟；幫助落後民族發展文化和經濟，否則所謂「民族權利平等」就會變成空談；這一切都是以農民的徹底解放和把全部政權集中在邊疆地區各民族的勞動者手中為基礎的，——俄國共產黨人的民族政策就是如此。

不用說，如果執掌政權的俄羅斯工人不用事實證明自己有實行這種民族政策的決心，如果他們不放棄對芬蘭的「權利」，如果他們不從波斯北部撤出軍隊，如果他們打消俄國帝國主義者對蒙古和中國某些地區的野心，如果他們不幫助舊俄帝國的落後民族使用本族語言發展文化和國家制度，那末他們就不會取得本國的其他民族的同志，首先是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被壓迫羣衆對自己的同情和信任。

只有在這種信任的基礎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各族人民的牢不可破的聯盟才能

產生，這種聯盟是各式各樣的『外交』詭計和處心積慮地實行的『封鎖』所無力反對的。

不僅如此，俄羅斯工人如果沒有舊俄邊疆地區的被壓迫羣衆對自己的這種同情和信任，就不能戰勝高爾察克、鄧尼金和弗蘭格爾。不應當忘記，這些叛亂將軍的活動地區只限於那些以非俄羅斯民族爲主的邊疆地區，由於高爾察克、鄧尼金和弗蘭格爾實行帝國主義的和俄羅斯化的政策，這些邊疆地區的非俄羅斯民族不能不憎恨他們。協約國干預這件事並支持這些將軍時所能依靠的只是邊疆地區的俄羅斯化分子。這樣，協約國只能挑起邊疆地區居民對叛亂將軍的憎恨並加深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同情。

這種情況決定了高爾察克、鄧尼金和弗蘭格爾後方的軟弱性，也決定了他們前綫的軟弱性，歸根到底也就是決定了他們的失敗。

但是俄國共產黨人的民族政策，並不只是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同它聯盟的蘇維埃共和國範圍內獲得了良好的效果。事實上，這種效果也在各鄰國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關係上間接地表現出來了。過去把俄國看做妖魔鬼怪的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和東方其他國家同俄國的關係的根本改善，就是一件連克遜爵士那樣勇敢的政治家也不敢反駁的事實。未必用得着證明，如果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四年以來，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沒有一貫實行上述的民族政策，那末上面所說的各個鄰國同俄國關係的根本改變就是不可能的。

一般說來，俄國共產黨人的民族政策所獲得的結果就是如此。正是在現在，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四

周年的時候，當沉重的戰爭已經結束，大規模的建設工作已經開始，爲了一眼看清過去而不由自主地回顧一下已經走過的道路的時候，這些結果就看得特別清楚了。

載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七日

「真理報」第二五一號

署名：約·斯大林

前 途

國際局勢在俄國生活中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這不僅因為俄國也和歐洲其他一切國家一樣同鄰近的資本主義國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首先因為俄國是一個蘇維埃國家，它對資產階級世界是一個「威脅」，這就自然而然地使它受到敵對的資產階級國家陣營的包圍。因此很明顯，這個陣營的狀況，這個陣營內部鬥爭力量的對比，對於俄國就不能不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下面這一事實應該認為是表明國際局勢特徵的主要因素：公開戰爭時期已經被「和平」鬥爭時期代替了；作為資產階級反革命首領的協約國和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先進部隊的俄國在某種程度上已相互承認對方的鬥爭力量，並已實行停戰。鬥爭表明，我們（工人）還沒有足夠的力量立刻消滅帝國主義。但是鬥爭也表明，他們（資產者）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扼殺蘇維埃俄國。

由於這種情況，世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害怕」或「恐懼」（如他們在紅軍進攻華沙時所表現的）已經烟消雲散。與此同時，歐洲的工人幾乎每次得到蘇維埃俄國的消息都要表現出的那種無限的熱情，也在消失了。

冷靜估計力量的時期到來了，為準備和積蓄力量迎接未來戰鬥而進行細緻工作的時期到來了。

這並不是說，還在一九二一年初就已形成的某種力量均勢仍然毫無變動。情形遠不是這樣。

世界資產階級由於進行帝國主義戰爭而遭到革命的打擊，現在他們恢復過來，甦醒過來以後，就從防禦轉為向「他們自己的」工人進攻，巧妙地利用工業危機，把工人拋到更壞的生活條件下（工資的降低，工作日的延長，大批羣衆的失業）。這種進攻所造成的後果在德國格外慘重，那裏（除了其他一切原因）馬克的大大貶值使工人的狀況更加惡化。

因此，在工人階級中間就產生了爲建立工人的統一戰綫和爭取成立工人政府的聲勢浩大的運動（特別是在德國），這個運動要求工人階級中一切或多或少帶有革命性的派別（從「溫和的」到「極端的」）達成協議和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沒有理由懷疑，在爭取成立工人政府的鬥爭中共產黨員將站在最前列，因爲這個鬥爭一定會使資產階級進一步瓦解，使現在的共產黨變成真正羣衆性的工人政黨。

但是，問題決不限於資產階級向「他們自己的」工人進攻。資產階級知道，不制服俄國，就不能擊潰「自己的」工人。因此，資產階級不斷地加緊工作，準備向俄國發動比過去一切進攻更複雜更嚴重的新進攻。

當然，他們現在正同俄國而且將來還會同俄國簽訂貿易協定和其他協定，這對俄國來說是有極大意義的。但是不應當忘記，貿易的和其他各種各樣的代表團和團體源源來到俄國，一方面同俄國做生意並幫助俄國，另一方面也是世界資產階級最好的情報員，因此，現在世界資產階級對蘇維埃俄

國，對它的強弱方面比過去任何時候都知道得清楚，這種情況在一旦發生新的武裝干涉時就有非常嚴重的危險。

當然，東方問題上的某些摩擦可以歸結為一種「誤會」。但是不應當忘記，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黃金和其他「財富」源源流入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遠東，是爲了在蘇維埃俄國的周圍建立一個經濟的（不僅是經濟的）包圍圈。未必用得着證明，所謂華盛頓「和平」會議^[3]是不會答應給我們什麼真正的和平的。

當然，我們和波蘭、羅馬尼亞及芬蘭的關係是「最友善的」。但是不應當忘記，這些國家，特別是波蘭和羅馬尼亞，正在依靠協約國加緊擴軍備戰（不是對付俄國又是對付誰呢？），它們現在和過去一樣仍然是帝國主義最親近的後備軍，正是它們不久以前還派遣薩文柯分子和佩特留拉分子的白衛軍到俄國境內來（是爲了偵察嗎？）。

非常明顯，這一切以及諸如此類的行動都是準備向俄國發動新進攻的全部工作中的個別環節。

經濟鬥爭和軍事鬥爭配合，內部衝擊和外部衝擊聯合——這就是這次進攻最可能採取的形式。

我們能否使這次進攻不能發動，或者在進攻終於發動時把它變成對付世界資產階級的致命武器，這取決於後方和軍隊中的共產黨員的警惕性，取決於我們在經濟領域內的工作成就和紅軍的堅強性。

一般說來，外部狀況就是如此。

蘇維埃俄國的內部狀況同樣是複雜的，也可以說是「獨特的」。這種狀況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說明：在新的經濟基礎上爲鞏固工農聯盟以發展工業、農業和運輸業而奮鬥；也可以用另一句話來說明：在經濟破壞的情況下爲保持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

目前在西方有這樣一種理論：只有在工人佔多數或者至少是工業人口佔多數的國家中，工人才能取得和保持政權。考茨基之流的先生們正是根據這一點來否定無產階級佔少數的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合理性」的。這種理論默默地以下面的假設爲出發點：小資產階級，首先是農民，不會支持工人奪取政權的鬥爭，農民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的後備軍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後備軍。這種假設的歷史根據是：西方（法國、德國）小資產階級（農民）在危急關頭通常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的法國，一九一八年以後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嘗試）。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

（一）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當時無產階級只是革命的擔負者），那裏的農民可以說是從資產階級手中獲得土地，獲得擺脫封建奴役的自由，因此資產階級對農民的影響那時就已得到保障。

（二）從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爆發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初次嘗試經過了半個多世紀，在這期間農民中分化出了在農村中很有勢力的強大的農村資產階級，它已經成了連接農民和城市大資產階級的橋樑，因而鞏固了資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

上述理論就是在這種歷史環境下產生的。

俄國却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

第一、和西方相反，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三月）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和對資產階級展開激戰的情況下進行的，在激戰過程中農民團結在自己的領袖無產階級的周圍。

第二、同樣和西方相反，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嘗試（這個嘗試成功了）不是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半個世紀開始的，而是緊接着它經過短短六個月到八個月的時間開始的。當然，在這期間農民就不可能分化出強大而有組織的農村資產階級，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被推翻的大資產階級已經再也不能恢復元氣了。

後一種情況更加鞏固了工農聯盟。

正因為如此，俄國工人雖然佔俄國人口的少數，却做了國家的主人，爭得了絕大多數人民首先是農民對自己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並且保持住了政權，而和一切理論截然相反，資產階級却陷於孤立，失去了農民這個後備軍。

由此應當得出這樣的結論：

（一）根據俄國的實際情況，上面所說的無產階級人數「必須佔多數」的理論是有缺陷的，不正確的，或者至少是被考茨基之流的先生們解釋得太簡單太庸俗了。

（二）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在革命進程中形成的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的實際聯盟是俄國蘇維埃

政權的基礎。

(三)共產黨員的責任就是要保持和鞏固這個實際聯盟。

目前的全部問題在於這個聯盟的形式並不總是相同的。

過去，在戰爭時期，我們主要是實行軍事政治聯盟，就是說把地主趕出俄國，把土地交給農民使用，而當地主爲了奪回『自己的財產』而發動戰爭的時候，我們就對地主作戰以捍衛革命成果，因此農民供給工人糧食，並且爲軍隊提供人力。這是一種聯盟形式。

現在，當戰爭已經結束，土地不會再有危險的時候，舊的聯盟形式就不够了。需要另有一種聯盟形式。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爲農民保持土地，而是要保證農民有自由支配這塊土地上的產品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就必然會使耕地面積進一步縮減，使農業日趨衰落，使運輸業和工業癱瘓（由於缺乏糧食），使軍隊瓦解（由於缺乏糧食），而這一切就必然導致工農實際聯盟的破裂。未必用得着證明，國家掌握必要數量的糧食儲備是復興工業和保存蘇維埃國家的動力之動力。喀琅施塔得叛亂（一九二一年春天）就是一次警告，這次叛亂表明舊的聯盟形式已經過時，必須採取既能保證工人的經濟利益又能保證農民的經濟利益的新的經濟聯盟形式。

這就是理解新經濟政策的鑰匙。

廢除餘糧收集制和消除其他諸如此類的障礙是新道路上的第一個步驟，這一步驟解開了小生產者的手，有力地推動了糧食、原料和其他產品的生產。如果注意到俄國目前掀起的大規模發展生產力

的熱潮也和內戰後的美國北部一樣，那就不難理解這一步驟的巨大意義了。毫無疑問，這一步驟既然解除了對小生產者生產能力的束縛，並保證他們得到一定的利益，那就使他們處於不得不幫助蘇維埃國家的境地，如果注意到運輸業和工業已由國家控制的話。

但是提高糧食和原料的產量還不够。還必須收集和收購必要數量的為支持運輸業、工業、軍隊等等所必需的糧食和原料。所以，如果撇開單純代替餘糧收集制的糧食稅不談，那末第二個步驟就應當認為是把糧食和原料的收購工作交由中央消費合作總社辦理。誠然，中央消費合作總社的地方機關不守紀律，不能適應商品市場迅速擴大的情況，商品交換的實物形式不適宜和商品交換的貨幣形式迅速發展以及缺乏貨幣資金等等，使中央消費合作總社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但是中央消費合作總社這個大量收購糧食和原料的主要產品的主要機關的作用將日益擴大，這是沒有理由可以懷疑的。只是國家必須——

(甲) 使它成爲國內貿易業務(非國營的)撥款的中心；

(乙) 使它在財政上控制其他各種對國家還懷有敵對情緒的合作社；

(丙) 用某種形式爲它開闢一條進行對外貿易的途徑。

第三個步驟應當認爲是開辦國家銀行這一調節國內貨幣流通的機關。商品市場的擴大和貨幣流通的加速一定會產生下面兩個主要後果：

(一) 使貿易業務(私營的和國營的)和生產業務(各種費率及其他)完全以盧布的漲落爲轉移；

(二) 使俄國的國民經濟從封鎖時期的那種閉關自守的自給自足的經濟變成同外界通商的即以盧布匯率的偶然漲落為轉移的交換經濟。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不整頓貨幣流通和提高盧布的匯率，我們國內外的經濟業務就會陷於癱瘓。國家銀行是貨幣流通的調節器，它不但能成為債權人，而且能成為汲取大量私人儲蓄的抽水機，依靠這些儲金不發行新幣也可以周轉，——根據一切材料來看，雖然這個國家銀行有遠大的前途，但在目前還是「未來的音樂」。

提高盧布匯率的第二個辦法應該是擴大我們的輸出和縮小我們的極大的貿易逆差。必須考慮到，吸引中央消費合作總社來進行對外貿易只能對這方面的工作有幫助。

其次，我們需要借外債，因為這不僅是支付手段，而且是擴大俄國對外信貸的要素，也是提高我們盧布信用的要素。

再次，索柯里尼柯夫不久前在「真理報」上談到的合營的貿易轉運公司和其他公司無疑也能促進這方面的工作，但是這裏應當指出，有一個時期在報刊上談得很多的關於推廣工業租賃制和發展我國原料同外國機器和裝備的正常交換的問題，雖然都是貨幣經濟發展的要素，其本身却完全取決於預先提高我們盧布的匯率。

最後，第四個步驟應當認為是在我們企業中改行經濟核算制，關閉和出租不盈利的小企業，挑選最富有生命力的大企業，大力精簡我們過分臃腫的機關的人員，編制穩定的國家預算（物資的和貨幣

的)。這一切做到以後就能剷除企業和機關中的依賴供給的思想，使工人和職員普遍振作起來，並改善和強化他們的勞動。

一般說來，這就是我們已經採取的和必須採取的一些措施，把這些措施綜合起來就是所謂新經濟政策。

不用說，我們在實行這些措施時，正如預料的那樣，犯了很多錯誤，歪曲了它們的實質。然而有一點可以認為已經證實，就是這些措施開闢了一條道路，沿着這條道路前進我們就能不顧一切艱難困苦，不怕外部的威脅和俄國內部的飢荒，推進國家的經濟恢復工作，發展農業和工業，鞏固無產者和勞動農民的經濟聯盟。

新經濟政策的初步成就，如耕地面積開始擴大，各企業中勞動生產率提高和農民情緒好轉（制止了大規模的土匪騷動），都確鑿地證實了這一結論。

載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真理報」第二八六號

署名：約·斯大林

給『真理報』

『真理報』是在有名的「連納事件」時期在革命高漲的浪潮中誕生的。羣衆性的工人報紙『真理報』恰恰在這種日子裏出版，這就標誌着：

- (一) 斯托雷平『平靜』以後的國內普遍疲憊時期已告結束；
 - (二) 俄國工人階級猛然覺醒，走向新的革命即一九〇五年以後的第二次革命；
 - (三) 把廣大的工人階級羣衆爭取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的開端。
- 一九二一年的『真理報』爲布爾什維主義一九一七年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

『真理報』第九十八號

紀念『真理報』創刊十周年

(回憶)

一 連納事件

連納事件是斯托雷平『平靜』制度的產物。年輕的黨員當然沒有嘗過也不記得這個制度的滋味。至於老年人，那他們一定還記得那些可詛咒的往事：討伐隊，對工人組織的野蠻襲擊，農民的橫遭鞭打以及這一切暴行的掩蓋物——黑幫和立憲民主黨的杜馬。在警察、地主和資本家的狐羣狗黨到處橫行下，社會輿論受到束縛，工人普遍厭倦、冷淡、窮困、失望，農民受盡折磨，胆顛心驚——這就是斯托雷平『平靜』的特徵。

在表面觀察問題的人看來，似乎革命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普魯士式的俄國『立憲』發展時期到來了。取消派——孟什維克公開叫喊這一點，鼓吹有必要組織合法的斯托雷平工黨。某些老『布爾什維克』衷心同情這種鼓吹，提早離開了我們黨的隊伍。鞭子和黑暗勢力大獲全勝。『被蹂躪的聖地』——這就是當時俄國政治生活的特徵。

連納事件像一陣狂風掃過了這個『被蹂躪的聖地』，給人們揭開了一片新的景象。原來斯托雷平

制度並不那麼鞏固，杜馬引起了羣衆的厭惡，而工人階級已經積蓄了相當的力量，足以投入戰鬥，掀起新的革命。僅僅在遙遠的西伯利亞的一個荒僻的地方（連納河畔的波戴勃城）發生了一樁工人被槍殺的事件，就掀起了全俄各地的罷工浪潮，使彼得堡的無產階級走上街頭，把那大言不慚的馬卡羅夫大臣連同他的厚顏無恥的口號「從前如此，將來還會如此」一舉而掃除了。這是即將到來的大運動的先聲。「明星報」當時做得對，它喊道：「我們活着！未用盡的力量的火燄使我們的鮮血沸騰……」新的革命運動的高潮來到了。

羣衆性的工人報紙「真理報」就在這個運動的浪潮裏誕生了。

二 「真理報」的創辦

一九一二年四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在波列塔也夫同志的寓所裏，兩位杜馬代表（波克羅夫斯基和波列塔也夫）、兩位作家（奧里明斯基和巴圖林）和我這個中央委員（當時我是一個不合法的人，在「不可侵犯的」波列塔也夫的寓所裏「避難」）在一起商妥了「真理報」的編輯方針，並且編排了該報的創刊號。「真理報」的兩位經常撰稿人傑米楊·別德內依和達尼洛夫是否參加了這次會議，我記不清了。

由於「明星報」的鼓動和廣大工人羣衆的同情以及工廠裏大批工人爲「真理報」自願捐款，創辦該報的技術前提和物質前提已經具備。「真理報」的確是俄國工人階級首先是彼得堡的工人階級努力

的成果。沒有這種努力，它就無法存在。

『真理報』的面貌很清楚：『真理報』負有向羣衆廣泛宣傳『明星報』的編輯方針的使命。『真理報』的創刊號寫道：『誰經常閱讀『明星報』並且知道它的撰稿人（也是『真理報』的撰稿人），誰就不難了解『真理報』的工作方針。』〔七〕『明星報』和『真理報』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真理報』的對象和『明星報』不同，『真理報』的對象不是先進工人而是廣大工人階級羣衆。『真理報』應當幫助先進工人把俄國工人階級中那些已經覺醒過來參加新鬥爭但在政治上還落後的廣大階層團結在黨的旗幟的周圍。正因為如此，當時『真理報』給自己規定了一項任務：培養工人出身的作家，並吸引他們參加報紙的領導工作。

『真理報』的創刊號這樣寫道：『我們還希望工人不要僅限於同情，而要積極地參加我們的辦報工作。工人們不要說寫作是他們所「不習慣的」工作；工人作家不是現成從天上掉下來的，而只是在寫作的過程中慢慢鍛鍊出來的。所需要的只是更勇敢地動手去幹；跌一兩次跤，以後就學會寫作了……』〔八〕

三 『真理報』的組織作用

『真理報』是在我們黨的這樣一個發展時期問世的，當時地下組織完全掌握在布爾什維克手中

（孟什維克逃跑了），而合法的組織形式（杜馬黨團、報刊、疾病互助會、保險會以及工會組織）還沒有完全從孟什維克手中奪回。這是布爾什維克為把取消派（孟什維克）從工人階級的合法形式的組織中驅逐出去而進行堅決鬥爭的時期。把孟什維克「撤職」的口號是當時工人運動中最流行的口號。「真理報」刊載了很多關於驅逐一度盤踞在保險組織、疾病互助會和工會組織內的取消派的消息。工人選民團的六個代表席位都從孟什維克手中奪過來了。孟什維克的報刊也處於同樣絕望或幾乎同樣絕望的境地。這是擁護布爾什維克的工人為維護黨而進行的一場真正英勇的鬥爭，因為沙皇政府的爪牙並沒有打瞌睡，他們在迫害和消滅布爾什維克，而被迫轉入地下的黨如果沒有合法的掩蔽物就不能繼續發展。此外，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如果不爭得合法組織，黨就不能接觸廣大羣衆並把他們團結在自己的旗幟周圍，黨就會脫離羣衆，變成與世隔絕的孤立的集團。

『真理報』在維護黨性、爭取建立羣衆性的工人政黨的鬥爭中是個領導中心。它不僅僅是總結布爾什維克在爭取合法工人組織方面的成就的報紙，也是把這些組織團結在黨的地下根據地周圍並把工人運動引向一定目標的組織中心。列寧同志在『做什麼？』（一九〇二年）中就寫道：一個辦得很好的全俄的戰鬥報紙，不僅應當成爲集體的鼓動者，還應當成爲集體的組織者。『真理報』在爲保持地下組織和爭取合法工人組織同取消派進行鬥爭的時期正是變成了這樣的報紙。不戰勝取消派，我們就不會有因團結而強大，因忠於無產階級而不可戰勝的黨，就不會有組織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黨，如果說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那末另一種說法，即老『真理報』的頑強而忘我的工作在大程度

上準備和加速了對取消派的勝利，也同樣是正確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老『真理報』無疑是俄國無產階級未來光榮勝利的先驅者。

載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

『真理報』第九十八號

署名：約·斯大林

列寧同志在休養中

(短文)

我覺得不應當在現在來寫『列寧同志在休養中』的文章，因為休養日期即將結束，列寧同志很快就要回到工作崗位上來了。此外，我得到的印象是這樣豐富和寶貴，如果按照『真理報』編輯部提出的要求，把這些印象寫成一篇短文，那是不十分恰當的。可是我必須寫，因為編輯部堅持這樣做。

我在戰綫上遇到過一些老戰士，他們往往連續打仗，『一連』幾晝夜，不休息，不睡覺，然後像鬼似的從戰地跑回來，像割下的麥桿倒在地，一睡就是『接連十八小時』，起來後精神煥發，又想去打仗，不打仗，他們就『不能活』。七月間，當我和列寧同志別離一個半月以後第一次會面時，他留給我的正是這種連續打仗後疲勞萬分，休息後精神煥發的老戰士的印象。雖然精神已經恢復，但是還看得出疲勞過度的痕跡。

列寧同志諷刺地說道：『我不能看報，不能談政治，我竭力躲避掉上的每一片紙，因為我怕它是報紙，怕因此違反紀律。』

我哈哈大笑起來，極力稱讚列寧同志的紀律性。同時我們把醫生們也嘲笑了一通，他們竟不解，既允許職業政治家們會面，他們就不會不談政治。

列寧同志那種如飢如渴地打聽各種問題的精神，急於要做工作的不可遏止的熱情，簡直使我驚訝。顯然他已經渴望好久了。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三〕，熱那亞會議和海牙會議〔四〕，今年年景，工業和財政狀況，——所有這些問題都一一提出來了。他並不急於表示意見，埋怨自己已落後於事變，他主要是打聽情況，把情況記在心裏。他聽說年景很好，就非常高興。

一個月以後，我所看到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這一次，列寧同志周圍堆滿了書報（醫生已准許他看報，也不限制他談政治了）。不再有疲勞過度的痕跡了。急於要做工作的神經質的熱情也沒有跡象了，——飢渴已經過去了。他完全恢復了鎮靜和自信。我們的列老眯着眼鏡敏地瞅着他談話的人……

而且我們這一次的談話也更為生動了。

國內情況…… 收成…… 工業狀況…… 盧布匯率…… 預算……

「情況是困難的。但最困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豐收會使情況根本改善。有了豐收，工業和財政狀況一定會好轉。現在問題是使國家免除不必要的開支，精簡我們的機關和企業，改善它們的質量。在進行這項工作時必須特別堅決果斷，這樣我們就能衝出窘境，並且一定能衝出窘境。」

外部狀況…… 協約國…… 法國的行爲…… 英國和德國…… 美國的作用……

「它們都貪得無厭，彼此深惡痛絕。它們會打架的。我們不必急。我們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們主張和平和協議，但我們反對奴役和帶奴役性條件的協議。必須緊緊地掌着舵，走我們自己的路，決不

要上別人阿諛奉承或恫嚇詭詐的當。』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他們進行瘋狂的煽動反對蘇維埃俄國……

『是的，他們一心要誹謗蘇維埃俄國。他們幫助帝國主義者進行反對蘇維埃俄國的鬥爭。他們已跌入資本主義泥潭，滾到深淵裏去了。讓他們去打滾吧。在工人階級看來，他們早就死去了。』

白匪報刊…… 亡命徒…… 他們詳細描寫列寧逝世的無稽的神話……

列寧同志微笑着說：『讓他們造謠和自己安慰自己去吧，用不着奪走垂死者的最後一點安慰。』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載於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真理報」第二一五號

標題為「列寧同志在休養中」的副刊專號

署名：約·斯大林

致彼得格勒，致代表蘇維埃的賀電

值此無產階級專政誕生五周年之際，謹向這個專政的搖籃紅色彼得格勒致敬。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五日

「彼得格勒真理報」第二五一號

致彼得格勒，致代表蘇維埃的賀電

一一三

關於各獨立民族共和國的聯合問題

(和「真理報」記者的談話)

斯大林同志對本報記者提出的關於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一些問題作了如下的說明(圖)。

各獨立共和國聯合的運動是由誰發起的？

運動是由各共和國自己發起的。大約在三個月以前，南高加索各共和國的領導集團就提出了關於建立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統一的經濟戰綫和把各共和國聯合成一個聯盟國家的問題。當時在阿捷爾拜疆、格魯吉亞和阿爾明尼亞的一些地區把這個問題提交黨員羣衆廣泛地進行了討論，從有關的決議中可以看出，這個問題激起了空前未有的熱情。幾乎與此同時，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也提出了聯合的問題，這個問題在那裏的廣大黨員羣衆中間，也和南高加索一樣，引起了極熱烈的反應。

這些情況無疑說明這個運動富有生命力，也說明各共和國的聯合問題確實已經成熟了。

這個運動是怎樣引起的，它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主要是經濟方面的原因。幫助農民經濟，發展工業，改進交通聯絡工具，財政問題，關於租讓制

和其他經濟協定的問題，作爲商品買賣者在國外市場上一致行動，——這就是產生成立共和國聯盟的運動的一些問題。一方面內戰使我們各共和國內部的經濟資源枯竭，另一方面沒有較多的外資流入，這就造成這樣一種情況：我們各蘇維埃共和國沒有一個能够靠本身的力量來恢復自己的經濟。現在，當各蘇維埃共和國在內戰結束後第一次認真着手解決經濟問題的時候，當在工作過程中第一次感到單靠各個共和國孤軍作戰十分不够而完全有必要聯合行動並在經濟方面聯合起來的時候，當感到這種聯合是真正恢復工業和農業的唯一途徑的時候，這種情況就特別顯著了。

但是要把各個共和國的經濟活動真正聯合起來，直到把它們聯合成統一的經濟聯盟，就必須建立一些能够沿着一條確定的道路指導這些共和國的經濟生活的相當的常設聯盟機關。正因爲如此，這些共和國之間原有的經濟協定和貿易協定現在就顯得不够了。正因爲如此，建立共和國聯盟的運動的發展超過了這些協定並提出了各共和國的聯合問題。

你認爲這種聯合趨向是一種嶄新的現象，還是有它的歷史？

各獨立共和國的聯合運動並不是一種什麼突如其來的和「空前未有的」新現象。它有自己的歷史。這個聯合運動經過了兩個發展階段，現在它已進入第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也就是武裝干涉和內戰時期，當時致命的危險威脅着各共和國的生存，當時這些共和國爲了保衛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在軍事方面聯合起來。這個階段是以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軍事聯合、軍事聯盟而告結束的。

第二個階段是一九二一年底到一九二二年初，也就是熱那亞會議和海牙會議時期，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武裝干涉的力量喪失了信心，試圖不用軍事方式而用外交方式在各蘇維埃共和國內恢復資本主義所有制，當時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統一的外交戰綫是抵擋西方列強攻擊必不可少的手段。在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了八個友好的獨立共和國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在熱那亞會議開幕前簽訂的著名協定^(三)，這個協定不是別的，正是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外交聯合。第二個階段即我們各共和國的外交聯盟階段就是這樣結束的。

現在各民族共和國的聯合運動已進入第三個階段即經濟聯合階段。不難理解，第三個階段是聯合運動的前兩個階段發展的結果。

是否應當由此得出結論說，各共和國聯合的結果，和遠東共和國一樣，必定是同俄羅斯合併，同俄羅斯融合？

不，不是這個意思！遠東共和國^(三)和上述各民族共和國之間有原則的差別：

(甲)前者完全不是按照民族特徵，而是根據策略上的理由（考慮到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可以成爲反對日本和其他列強的帝國主義野心的可靠保障）用人工建立起來的（當作緩衝地帶）；後者則相反，它們是各有關民族發展的自然產物，主要是以民族特徵爲基礎的；

(乙)遠東共和國可以取消，這絲毫不會觸犯該共和國多數居民的民族利益（因爲他們同俄羅斯大多數居民一樣都是俄羅斯人），但是取消各民族共和國就是要求取消非俄羅斯民族和使它們俄羅

斯化的一種反動的荒謬舉動，就是反動的唐·吉訶德式的舉動，這種舉動連黑幫分子叔爾根這樣的俄羅斯沙文主義黑暗勢力派也會反對的。

正因為如此，在遠東共和國確信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不適用於作為反對帝國主義者的保障以後，它就能自行消亡，成為俄羅斯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像烏拉爾或西伯利亞那樣的不設立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地區；而民族共和國是完全建立在另一種基礎上的，只要產生它們的各民族還存在，只要民族語言、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還存在，它們就不能取消，就不能沒有自己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就不能沒有自己的民族基礎。這就說明為什麼各民族蘇維埃共和國聯合成一個聯盟國家的結果，不可能是它們同俄羅斯合併，同俄羅斯融合。

在你看來，各共和國聯合成統一的聯盟的性質和形式是怎樣的？

聯合的性質應當是自願的，完全自願的，每個民族共和國都應當有退出聯盟的權利。因此，自願原則應當作為簽訂或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條約的基礎。

簽訂聯合條約的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是一個完整的聯邦單位）、南高加索聯邦（^(圖)也是一個完整的聯邦單位）、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布哈拉和花刺子模（^(圖)不是社會主義共和國，而只是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當自然發展還沒有使它們變成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前，它們還可能留在這個聯合以外。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最高機關是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聯盟人民委員會，前者由各加

盟共和國按它們所代表的人口比例選出；後者是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執行機關，由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

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是：制定加入聯盟的各共和國和各聯邦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基本領導原則。

聯盟人民委員會的職權是：

(甲)直接和統一管理聯盟的軍事、外交、對外貿易、鐵路和郵電各項事務；

(乙)領導加入聯盟的各共和國和各聯邦的財政、糧食、國民經濟、勞動和檢查等委員部的工作，而這些共和國和聯邦的內務、農業、教育、司法、社會救濟、人民保健各委員部仍由這些共和國和聯邦統一和直接管轄。

在我看來，這就是聯合成共和國聯盟的一般形式，在各民族共和國的聯合運動進程中所能摸索到的也就是這樣的形式。

有一種意見認為除了兩個聯盟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以外，還必須設立介於二者之間的第三個聯盟機關，即所謂各民族都有同等名額的代表參加的上議院。毫無疑問，這種意見是得不到各民族共和國的贊同的，這至少是因為設有上議院的兩院制起碼是和目前發展階段上的蘇維埃建設不相容的。

在你看來，共和國聯盟是否很快就能實現，它的國際意義如何？

我認爲共和國聯盟成立的日子爲時不遠了。完全可能，聯盟的成立和即將到來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會在同一個時間。

至於這個聯盟的國際意義，那就幾乎用不着特別說明了。如果說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軍事聯盟在內戰時期使我們能够打退我們敵人的軍事干涉，它們的外交聯盟在熱那亞會議和海牙會議時期有助於我們抵抗協約國的外交進攻，那末毫無疑問，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成一個聯盟國家將創立一種軍事的和經濟的全面合作形式，這種形式能够根本促進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經濟繁榮，使它們變成反對國際資本主義侵犯的堡壘。

載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真理報」第二六一號

論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

(在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票上的報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同志們！前幾天，在這次代表大會開幕以前，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收到了南高加索各共和國、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一些決定，其中陳述了這些共和國有聯合成一個聯盟國家的願望和必要。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認為現在聯合起來是適時的。由於這個決定，各共和國的聯合問題便提到這次代表大會的日程上來了。

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聯合運動還在三四個月以前就開始了。首先發起的是阿捷爾拜疆共和國、阿爾明尼亞共和國和格魯吉亞共和國，後來烏克蘭共和國和白俄羅斯共和國也響應了。這個運動意味着，舊的條約關係，即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其他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協定關係，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已經顯得不夠了。這個運動意味着，舊的條約關係必然要過渡到更緊密的聯合關係，即過渡到以建立設有相當的聯盟執行機關和聯盟立法機關（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聯盟人民委員會）的統一的聯盟國家為前提的關係。簡單地說：從前在協定關係範圍內暫時解決了的

東西，現在要在運動進程中使它成爲一種固定的東西。

推動各共和國走上聯合道路的原因是什麼呢？確定必須聯合起來的情況有哪些呢？

確定各蘇維埃共和國必須聯合成一個聯盟國家的情況有三類。

第一類情況是有關我國內部經濟狀況的一些事實。

第一、由於進行了七年的戰爭，我們各共和國現有的經濟資源極爲貧乏，這就迫使我們把這些貧乏的資財集中起來，更合理地使用它們，用它們來發展各共和國蘇維埃政權的脊椎骨——各主要經濟部門。

第二、在我們聯邦的各個不同地區和共和國之間，歷史上形成了一種天然的分工，即經濟的分工。例如，北方供給南方和東方布疋；南方和東方供給北方棉花、燃料等等。各區域之間所確立的這種分工是不能一筆勾銷的，因爲它是聯邦經濟發展的整個歷史進程所造成的。同時，在各共和國獨立存在的情況下，這種分工使各個地區不可能得到充分發展，它要求各共和國在經濟上團結成一個統一的整體。

第三、全聯邦的基本交通工具必須統一起來，因爲交通工具是各種可能聯合的神經和基礎。不言而喻，交通工具決不能由各個共和國單獨支配和只服從於各共和國的利益，因爲這樣會把經濟生活的神經中樞——運輸變成不能按計劃使用的許多單獨部分。這種情況也要求各共和國聯合成一個國家。

最後是我們財力的拮据。同志們，應當坦率地說，在目前，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的第六年，我們在財政方面大規模發展的可能性比在舊制度時小得多了。例如，舊制度每年有五億盧布的燒酒稅，而我們沒有；舊制度能借到數億盧布的外債，我們却不能。這一切說明，在我國財政發展的可能性如此小的情況下，如果各個共和國的力量不團結起來，各個共和國的財政力量不聯合成一個整體，我們就不能解決我們各共和國在財政方面當前的基本任務。

推動我們各共和國走上聯合道路的第一類情況就是如此。

確定各共和國聯合起來的第二類情況就是同我國外部狀況有關的一些事實。我指的是我們的軍事狀況。我指的是我們通過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同外國資本發生的關係。最後，我指的是我們和資產階級國家的外交關係。同志們，應當記住，雖然我們各共和國都幸運地擺脫了內戰狀態，但是外敵入侵的危險還遠沒有消除。這種危險要求我們的軍事戰綫必須絕對統一，軍隊必須無條件地統一，特別是在現在，在我們已經走上真正在物質上裁減軍備（當然不是在精神上解除武裝）的道路的時候。我們現在既然已經把軍隊裁減到六十萬，那就特別需要有一個能夠保證各共和國外部安全的統一的不可分割的軍事戰綫。

其次，除了軍事性質的危險以外，還有使我們的聯邦在經濟上陷於孤立的危險。你們知道，在熱那亞會議、海牙會議以及同烏爾卡爾特談判（見）以後，對我們共和國實行經濟抵制雖然沒有成功，但是滿足我國經濟需要的外資大量流入的情形却看不到了。使我們各共和國在經濟上陷於孤立的危險

還是存在的。這種新的干涉形式的危險性並不亞於軍事干涉，要消除這種危險，只有建立我們各蘇維埃共和國統一的經濟戰綫來對付資本主義包圍。

最後是我們的外交狀況。你們都親眼看到，不久以前，在洛桑會議⁽¹⁾開幕前夕，協約國各國千方百計地力圖孤立我們聯邦。可是它們在外交上並沒有做到這一點。反對我們聯邦的有組織的外交抵制已經被打破了。協約國不得不重視我們聯邦，不得不後退，不得不稍作讓步。但是沒有理由指望在外交上孤立我們聯邦的諸如此類的事實不會再發生。因此，在外交方面也必須有一條聯合戰綫。

推動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走上聯合道路的第二類情況就是如此。

無論第一類情況或第二類情況，直到現在，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以來的整個時期內，都是起作用的、有效的。我剛才說過的我們在經濟上的需要以及我們在對外政策方面在軍事上和外交上的需要，在過去無疑也是起作用的。然而，只是到現在，在內戰結束以後，當各共和國第一次有了着手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性，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經濟資源極爲貧乏，看到無論在內部經濟方面或在對外方面都完全有聯合的必要時，這些情況才具有特殊的力量。正因爲如此，在目前，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的第六年，各獨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聯合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了。

最後，第三類事實也要求聯合，這類事實是同蘇維埃政權結構的性質和蘇維埃政權的階級本質相聯系的。蘇維埃政權按其本質來說是國際主義的，它用各種方法在羣衆中培植聯合的思想，因此它本身就推動羣衆走聯合的道路。如果說資本、私有制和剝削把人們分開，把人們分裂成互相敵對的陣

營（在這方面，大不列顛、法國，甚至像波蘭、南斯拉夫這樣的多民族小國都可以做例子，這些國家的不可調和的民族矛盾腐蝕着它們的基礎本身），如果說在那裏，在資本主義民主佔統治的以私有制為國家基礎的西方，國家的基礎本身就在製造民族糾紛、衝突和鬥爭，那末在這裏，在政權不是建築在資本上而是建築在勞動上，不是建築在私有制上而是建築在集體所有制上，不是建築在人剝削人上而是建築在同這種剝削作鬥爭上的蘇維埃世界裏，則恰恰相反，政權的性質本身在促使勞動羣衆自然而然地力求聯合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家庭。

在那裏，在西方，在資產階級民主的世界裏，我們看到的是多民族國家的日漸衰落和瓦解成幾個組成部分（如大不列顛，我不知道它將怎樣處理印度、埃及、愛爾蘭；又如波蘭，我也不知道，它將怎樣處理本國的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而在這裏，在我們這個聯合了不少於三十個民族的聯邦內，則恰恰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各獨立共和國之間的國家聯系日益加強，各獨立民族日益緊密地結成一個獨立國家。這種情況難道沒有重大意義嗎？這就是國家聯合的兩種類型，第一種是資本主義類型，是促使國家崩潰的類型，第二種是蘇維埃類型，和第一種相反，它是使早先獨立的民族逐漸而鞏固地結成獨立國家的類型。

推動各共和國走上聯合道路的第三類事實就是如此。

各共和國聯合的形式應當怎樣呢？聯合的原則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收到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南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的一些決議中已經扼要地規定出來了。

聯合起來的有四個共和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是一個完整的聯邦單位）、南高加索共和國（也是一個完整的聯邦單位）、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花刺子模和布哈拉這兩個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不是社會主義共和國，而是人民蘇維埃共和國，這兩個共和國所以暫時還留在這個聯合以外，只是而且完全是因為它們還不是社會主義共和國。同志們，我不懷疑，希望你們也不要懷疑，這兩個共和國隨着它們內部向社會主義方面的發展，也一定會加入現在成立的聯盟國家。

有人以為，如果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不是作為一個完整的聯邦單位加入共和國聯盟，而是作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所屬的各共和國分別加入共和國聯盟，也許會更恰當些，顯然，這就事先要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分解成幾個組成部分才行。我認為這條道路是不合理的，不恰當的，並且是運動進程本身所排斥的。第一、它會造成這樣的結果：除了各共和國和國聯合過程以外，還會有使已建立的聯邦分離的過程，就是說，還會有和各共和國已經開始的革命的聯合過程完全相反的過程。第二、如果我們走這條不正確的道路，那就會造成這樣的情況：除了八個自治共和國以外，我們還必須從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分出特殊的俄羅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俄羅斯人民委員會，這就會造成組織上的大變動，這種變動在目前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和有害的；無論內部狀況或外部狀況都絲毫沒有要求這樣做。正因為如此，我認為聯盟的主體應該是下面四個共和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高加索聯邦、烏克蘭和白俄羅斯。

起草聯合條約的原則應當是這樣的：對外貿易、陸海軍、外交、交通、郵電各人民委員部只設立

在聯盟人民委員會內。財政、經濟、糧食、勞動、檢查各人民委員部設立在各締約共和國內，但必須按照聯盟中央的相當的人民委員部的指示辦事。爲了使各共和國的勞動羣衆在糧食、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財政人民委員部或勞動方面的力量在聯盟中央領導下聯合起來，這樣做是必要的。最後，內務、司法、教育、農業等其餘一些人民委員部（總共有六個）因爲同各共和國內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土地規劃的特殊形式、法院組織的特殊形式以及語言和文化有直接關係，應當成爲獨立的人民委員部，受各締約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領導。這樣做是必要的，這是保證各蘇維埃共和國內的各族人民有民族發展自由的實際條件。

在我看來，這些原則都應當成爲我們各共和國之間最近就要簽訂的條約的基礎。

根據這一點，我提出一個已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批准的決議草案：

一、認爲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適時的。

二、聯合建立在各共和國的自願平等的原則上，每個共和國都有自由退出共和國聯盟的權利。

三、委託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會同烏克蘭、南高加索共和國和白俄羅斯各國代表團起草共和國聯盟成立宣言草案，說明要求各共和國聯合成聯盟國家的種種情況。

四、委託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起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加入共和國聯盟的條件，責成該代表團在審查聯盟條約時堅持下列各項原則：

(甲) 成立相當的聯盟立法機關和執行機關；

(乙) 陸海軍、交通、外交、對外貿易、郵電各人民委員部必須合併；

(丙) 各締約共和國的財政、糧食、國民經濟、勞動和工農檢查各人民委員部必須服從共和國聯盟相當的人民委員部的指示；

(丁) 充分保證各締約共和國內各族人民的民族發展利益。

五、條約草案在提交共和國聯盟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前，必須呈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批准。

六、授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根據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批准的聯合條件，締結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同烏克蘭、南高加索和白俄羅斯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條約。

七、條約必須提交共和國聯盟第一次代表大會批准。

這就是我提請你們審查的決議草案。

同志們！從各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起，世界各國就分裂成兩個陣營：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在資本主義陣營裏，我們看到的是帝國主義戰爭、民族糾紛、壓迫、對殖民地的奴役和沙文主

義。相反地，在蘇維埃陣營裏，在社會主義陣營裏，我們看到的是相互信任、民族權利平等、和睦共處和兄弟合作。幾十年以來，資本主義民主力圖把各民族自由發展的利益同剝削制度結合在一起來解決民族矛盾。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做到，將來也不會做到。相反地，民族矛盾的線團愈搞愈亂了，大有扼殺資本主義之勢。只有在這裏，在蘇維埃世界裏，在社會主義陣營裏，才根除了民族壓迫，樹立了各族人民間的相互信任和兄弟合作。也只有蘇維埃做到這一點以後，我們才有了可能建成我們的聯邦和抵禦國內外敵人的進攻。

五年以前，蘇維埃政權奠定了各族人民和睦共處和兄弟合作的基礎。現在，當我們在這裏解決聯合的願望和必要性的問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建造一座新的大廈，建立一個新的、強大的、勞動人民的聯盟國家來完成這一事業。不久以前，我們各共和國的各族人民都召開了自己的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成立共和國聯盟的決議，他們的這種意志肯定地表明，聯合事業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它是建築在自願和民族權利平等的偉大原則上的。同志們，我們希望我們聯盟共和國的成立將豎立起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可靠支柱，希望新的聯盟國家在把全世界的勞動者聯合到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裏去的道路上，將成爲新的有決定意義的一步。（鼓掌多時，高唱『國際歌』。）

截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真理報」第二九五號

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立

（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

大會^(五)上的報告）（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同志們！今天是蘇維埃政權歷史的轉折點。它在已經過去的舊時期和已經開始的新時期之間豎立了一個路標。在舊時期，各蘇維埃共和國雖然是同時行動，但是是各自為政的，它們首先關心的是自己的生存問題；在新時期，各蘇維埃共和國孤立存在的局面已經結束，它們正在聯合成統一的聯盟國家，以便順利地同經濟破壞作鬥爭，蘇維埃政權所考慮的已經不只是生存問題了，而且還有如何發展成一支能夠影響和改變國際局勢以有利於勞動者的嚴重的國際力量的問題。

五年前的蘇維埃政權是怎樣的政權呢？它是一個幾乎不引人注意的渺小的政權，所有的敵人都譏笑它，很多朋友憐惜它。這是軍事破壞時期，當時蘇維埃政權與其說是依靠本身的力量，不如說是依靠敵人的軟弱無力，因為當時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分裂成兩個聯盟，一個是奧德聯盟，一個是英法聯盟；它們彼此間忙於戰爭，沒有可能掉轉槍口來反對蘇維埃政權。這是蘇維埃政權歷史上的軍事破壞時期。但在反對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鬥爭中，蘇維埃政權建立了紅軍，勝利地擺脫了軍事破壞

時期。

以後就開始了蘇維埃政權歷史上的第二個時期，即同經濟破壞作鬥爭的時期。這個時期還遠沒有結束，但是已經有了成就，因為在這個時期蘇維埃政權戰勝了去年國內發生的飢荒。在這個時期，農業大大發展了，輕工業也大大活躍了。我們已經有了優秀的工業領導幹部，他們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依靠。但是要戰勝經濟破壞，這一切還遠遠不夠。要粉碎和消除經濟破壞，還必須把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力量集中起來，必須把各共和國的一切財政和經濟力量投到恢復我們各基本工業部門方面去。因此，各蘇維埃共和國必須聯合成一個聯盟國家。今天就是我們各共和國爲了集中力量恢復我們的經濟而聯合成一個國家的日子。

同軍事破壞作鬥爭的時期使我們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存在的基礎之一——紅軍。後一個時期，即同經濟破壞作鬥爭的時期，將賦予我們新的國家形式——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聯盟無疑地會推進蘇維埃經濟的恢復事業。

現在的蘇維埃政權是怎樣的政權呢？它是一個偉大的勞動人民的強國，敵人已經不再譏笑它，而是切齒痛恨它了。

蘇維埃政權建立五年以來發展的總結就是如此。

但是，同志們，今天不只是做總結的日子，同時也是新俄國戰勝舊俄國，戰勝作爲歐洲憲兵的俄國，戰勝作爲亞洲劊子手的俄國的日子。今天是新俄國高奏凱歌的日子，新俄國扭斷了民族壓迫的鎖

鍊，組織了對資本的勝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喚醒了東方各族人民，鼓舞着西方工人，把紅旗由黨的旗幟變成國家的旗幟，並把各蘇維埃共和國各族人民集合在這面旗幟周圍，以便把他們聯合成一個國家，聯合成未來的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雛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有人常常罵我們共產黨人，說我們沒有能力從事建設。讓蘇維埃政權建立五年以來的歷史作為共產黨人也善於從事建設的證據吧。今天開幕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使命是批准昨天全權代表團會議所通過的關於共和國聯盟的成立宣言和成立條約，讓這次聯盟代表大會向那一切還沒有喪失理解力的人們表明：共產黨人既善於破壞舊制度，也善於建設新制度。

同志們，下面是昨天全權代表團會議〔五〕所通過的宣言，我現在來宣讀一下。（見附錄一）
下面是在同一次會議所通過的條約原文。我也來宣讀一下。（見附錄二）

同志們，我受蘇維埃共和國全權代表團會議的委託，建議你們批准剛才宣讀的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立宣言和成立條約的原文。

同志們，我建議大家用共產黨員所特有的一致精神來通過它們，讓我們在人類歷史上寫下新的一章。（鼓掌）

載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真理報」第二九八號

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戰略和策略問題

(五)

本文是我先後在勃列斯尼亞區工人俱樂部和斯維爾德洛夫大學(五)共產黨黨團裏所做的「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戰略和策略」的演講為基礎寫成的。我決定把它發表出來，這不僅是因為我認為自己有義務滿足勃列斯尼亞區和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同志的願望，而且還因為我認為這篇文章本身對於我們黨的新一代的工作人員不是沒有益處的。但是，我認為有必要聲明一下，這篇文章並沒有打算要提供什麼在實質上比我們一些領導同志在黨的俄文刊物上幾次談過的更新的东西。本文應該看做對列寧同志的幾個基本觀點所作的一個簡要概括的敘述。

一 要預先確定的幾個概念

一、工人運動的兩個方面

政治戰略也和策略一樣，是同工人運動有關的。但工人運動本身又由兩種因素構成：一種是客觀的或自發的因素，另一種是主觀的或自覺的因素。客觀的即自發的因素，就是不以無產階級的自覺

的和調節的意志為轉移的一些過程。國家的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的發展，舊政權的瓦解，無產階級和它周圍各階級的自發運動，階級之間的衝突等等，——所有這些都是不以無產階級的意志為轉移而發展的現象，這是運動的客觀方面。戰略對於這些過程是不起什麼作用的，因為戰略既不能取消它們，也不能改變它們，只能估計到它們並以它們為出發點。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綱領應當研究的範圍。

但是運動還有它的主觀的即自覺的方面。運動的主觀方面，就是運動的自發過程在工人頭腦中的反映，就是無產階級走向一定目標的自覺的和有計劃的運動。其實，運動的這一方面所以使我們感到興趣，就是因為它不同於運動的客觀方面，它完全是受戰略和策略支配的。如果說戰略不能改變運動客觀過程中的任何東西，那末在這裏，在運動的主觀的自覺的方面則相反，戰略的運用地盤是廣闊的、多種多樣的；因為它，即戰略，可以加速或延緩運動，也可以把運動導入捷徑或引向更艱苦的道路，這是以它本身的完善或欠缺為轉移的。

加速或延緩運動，促進或阻礙運動，這就是政治戰略和策略運用的領域和範圍。

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綱領

戰略本身並不研究運動的客觀過程。但是，如果它不願意在領導運動時犯重大的致命的錯誤，就必須了解這些過程並正確地估計到這些過程。研究運動的客觀過程的，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其

次是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因此，戰略必須完全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綱領為依據。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研究資本主義的客觀過程的發展和消亡時得出結論說，資產階級必然崩潰，無產階級必然奪取政權，資本主義必然由社會主義代替。無產階級的戰略只有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這個基本結論作為自己的工作基礎時，才能算做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戰略。

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從理論原理出發，確定無產階級運動的目標，並把這些目標科學地表述在綱領的條文中。綱領可以包括資本主義發展的整個時期，以推翻資本主義和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為目的，也可以包括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例如推翻封建專制制度殘餘和為資本主義自由發展創立條件的階段。因此，綱領可以由兩個部分即最高部分和最低部分組成。不言而喻，綱領最低部分的戰略和綱領最高部分的戰略不能不有所區別；並且，戰略只有把馬克思主義綱領中表述的運動目標作為自己的工作指南時，才能算做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戰略。

三、戰 略

戰略最重要的任務是規定工人階級運動所應遵循的基本方向，沿着這一方面最有利於無產階級對敵人進行基本打擊，以求達到綱領所提出的目標。戰略計劃是組織能夠最迅速地獲得最大效果的決定性打擊的計劃。

拿軍事戰略來對比，例如拿內戰時期同鄧尼金作鬥爭的軍事戰略來對比，政治戰略的主要特點

就可以很容易地描繪出來。大家都記得一九一九年底鄧尼金逼近土拉時的情景。當時在軍事家中間在究竟應當從何處給鄧尼金軍隊以決定性打擊的問題上展開了一場有趣的爭論。有一些軍事家建議選擇察里津——諾沃羅西斯克一綫作為基本打擊方向。另一些軍事家則相反，他們建議沿沃龍涅什——羅斯托夫一綫進行決定性的打擊，以便經過這一綫把鄧尼金軍隊切成兩段，然後再各個擊破。毫無疑問，前一計劃就其預定要佔領諾沃羅西斯克以切斷鄧尼金軍隊的退路這一點來說，是有它的長處的。但是，一方面，它是不利的，因為它主張我軍沿着敵視蘇維埃政權的地域（頓河區）推進，這就要付出巨大的犧牲；另一方面，它是危險的，因為它會給鄧尼金軍隊開闢一條經土拉和謝爾普霍夫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後一個進行基本打擊的計劃是唯一正確的，因為一方面，它主張我軍主力部隊沿着同情蘇維埃政權的地域（沃龍涅什省——頓巴斯）推進，這樣不必付出特別的犧牲；另一方面，它可以擾亂向莫斯科推進的鄧尼金軍隊的主力部隊的行動。大多數軍事家都贊同後一個計劃，因而也就決定了對鄧尼金戰爭的命運。

換句話說，規定基本打擊方向就是預先決定整個戰爭時期各次戰役的性質，因而也就是預先決定整個戰爭十分之九的命運。戰略的任務就在於此。

政治戰略也是一樣。俄國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者們在二十世紀初期即在日俄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運動的基本方向問題上發生過第一次嚴重的衝突。大家知道，當時我們黨內一部分人（孟什維克）所持的觀點是：在同沙皇制度作鬥爭時，無產階級運動的基本方向應該遵循無產階級同自由資產

階級聯盟的路綫，而作為革命極重要因素的農民則被排斥或幾乎被排斥於計劃之外，讓自由資產階級擔任整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黨內另一部分人（布爾什維克）則相反，他們認為應該遵循無產階級同農民聯盟的路綫進行基本打擊，無產階級應當擔任整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自由資產階級應當被中立起來。

如果把我國從二十世紀初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的整個革命運動當做工農反對沙皇制度和地主的戰爭來同我們對鄧尼金的戰爭作對比，那末很明顯，沙皇制度和地主的命運主要是決定於採用哪一個（孟什維克的還是布爾什維克的）戰略計劃，選擇革命運動的哪一個基本方向。

如同在對鄧尼金作戰時軍事戰略規定了基本打擊方向，從而十分之九決定了直到消滅鄧尼金為止的所有各次戰役的性質一樣，在這裏，在同沙皇制度作革命鬥爭時，我們的政治戰略按照布爾什維克計劃規定了革命運動的基本方向，從而決定了我們黨從日俄戰爭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同沙皇制度進行公開鬥爭的整個時期的工作性質。

政治戰略的任務首先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綱領出發，估計到世界各國工人革命鬥爭的經驗，正確地規定某個國家無產階級運動在某一歷史時期的基本方向。

四、策 略

策略是戰略的一部分，它是服從於戰略，服務於戰略的。策略不是同整個戰爭有關，而是同戰爭

中的個別事件，即同個別戰鬥和個別戰役有關。如果說戰略是力求取得戰爭的勝利，或者比方說，是力求把反沙皇制度的鬥爭進行到底，那末策略則相反，它是力求取得某些戰役或某些戰鬥的勝利，力求勝利地進行某些多少適合於某一特定時期的具體鬥爭情況的戰局或發動。

策略最重要的任務是規定最適合於某一時期具體情況的並能最有把握地準備戰略勝利的鬥爭方法和手段，鬥爭形式和方式。因此，評價策略的作用和效果不應該從它的本身，從它的直接效果着眼，而應該從戰略的任務和可能性着眼。

有時候，策略的勝利可以促進戰略任務的執行。例如一九一九年底我軍在鄧尼金戰綫上解放奧勒爾和沃龍涅什的情況就是這樣，當時由於我們的騎兵在沃龍涅什附近和步兵在奧勒爾附近的勝利而造成了突擊羅斯托夫的有利局勢。一九一七年八月俄國的情況也是這樣，當時由於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兩地的蘇維埃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而造成了有利於以後我黨進行十月打擊的新的政治局勢。

也有這樣的時候，策略勝利的直接效果十分輝煌，但是這種勝利和戰略的可能性不相適應，因而造成了對整個戰局有致命危險的『意外』局勢。一九一九年底鄧尼金的情況就是這樣，當時他為迅速地浩浩蕩蕩地向莫斯科進軍的輕易勝利所陶醉，把自己的戰綫從伏爾加河伸展到德涅泊河，因而準備了自己軍隊的覆滅。一九二〇年我們同波蘭軍隊作戰時的情況也是這樣，當時我們對波蘭民族因素的力量估計不足，為浩浩蕩蕩進軍的輕易勝利所陶醉，但負了經過華沙突入歐洲的力所不及的任

務，激起了波蘭絕大多數居民反對蘇維埃軍隊，因而造成了使蘇維埃軍隊在明斯克和日托米爾附近的勝利化爲烏有的局面，破壞了蘇維埃政權在西方的威信。

最後，也有這樣的時候，就是不得不放棄策略勝利，有意識地承受策略劣勢和失敗，以便保證以後取得戰略優勢。這種情況在戰爭中是常有的：交戰的一方爲了拯救自己軍隊的骨幹，把他們從敵人優勢兵力打擊下轉移出來，而開始實行有計劃的退却，不經過戰鬥而放棄一些城市和地區，以便贏得時間和積蓄力量，準備將來進行新的決戰。一九一八年俄國遭受德國進攻時的情況就是這樣，當時我們黨爲了同渴望和平的農民保持聯盟，取得喘息時機，建立新軍隊，從而保證以後獲得戰略優勢，不得不簽訂布列斯特和約，雖然這個和約從當時的直接政治效果來看是極其不利的。

換句話說，策略不能服從於目前的暫時的利益，不應該從直接的政治效果着眼，更不應該離開地面去建造空中樓閣，——策略應該和戰略的任務和可能性相適應。

策略的任務首先是遵循戰略的指示並估計到世界各國工人革命鬥爭的經驗，規定最適合於某一特定時期的具體鬥爭情況的鬥爭形式和方式。

五、鬥爭形式

作戰方式、戰爭形式，不是永遠一樣的。它們是隨着發展的條件，首先是隨着生產的發展而改變。成吉思汗時代作戰的方式不同於拿破侖第三時代；二十世紀作戰的方式不同於十九世紀。

現今條件下的作戰藝術在於掌握戰爭的一切形式和這方面的一切科學成就，機智地運用它們，善於把它們配合起來，或是隨着環境的改變及時地運用其中某一種形式。

政治方面的鬥爭形式也是一樣。政治方面的鬥爭形式比作戰形式更爲複雜。它們的改變取決於經濟、社會制度和文化的發展，取決於各階級的情況、鬥爭力量的對比、政權的性質以及國際關係等等。在專制制度下的同工人局部罷工和遊行示威相聯系的秘密鬥爭形式；在有『合法機會』存在下的公開鬥爭形式和羣衆性的工人政治罷工；國會內的鬥爭形式（如在杜馬時期）和有時轉變成武裝起義的國會外的羣衆發動；最後，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的國家鬥爭形式（這時無產階級有可能保證自己掌握一切國家手段和力量，以至軍隊），——一般說來，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實踐所提出的鬥爭形式就是這些。

黨的任務就是掌握一切鬥爭形式，在戰場上把它們機智地配合起來，並且善於運用最適於某一情況的鬥爭形式來加緊進行鬥爭。

六、組織形式

軍隊的組織形式，兵種和軍種，通常是和作戰形式和方式相適應的。前者隨後者改變而改變。在運動戰中起決定作用的往往是大量的騎兵。在陣地戰中則相反，騎兵或者不起任何作用，或者只起次要作用，因爲一切決定於重砲和空軍，毒氣和坦克。

軍事藝術的任務就是保證自己擁有一切兵種，使它們日臻完善，並且善於把它們的行動配合起來。

政治方面的組織形式也是一樣。這裏也同軍事方面一樣，組織形式和鬥爭形式是相適應的。專制制度時代的職業革命家的秘密組織；杜馬時期的文化教育組織、工會組織、合作社組織和國會組織（杜馬黨團等）；羣衆發動和起義時期的工廠委員會、農民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工兵代表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以及聯系所有這些組織形式的無產階級大黨；最後，工人階級掌握政權時期的無產階級的國家組織形式，——一般說來，在同資產階級作鬥爭時，無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而且應當依靠的組織形式就是這些。

黨的任務就是掌握這一切組織形式，使它們日臻完善，並且善於在某一特定時期把它們的工作配合起來。

七、口號。指示

表述得當、反映戰爭或個別戰役目的並受部隊歡迎的決定，有時在前綫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些決定是鼓舞軍隊作戰、維持士氣等等的工具。對戰爭整個進程來說，適當的命令、口號或告部隊書具有和頭等重砲或頭等快速坦克同樣重要的意義。

口號在政治方面的意義更大，因為它是關係到具有各種不同要求和需要的千百萬居民的。

口號是某一領導集團，例如無產階級領導集團——無產階級政黨對最近的或遙遠的鬥爭目標所作的簡要明確的表述。鬥爭目標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包括整個歷史時期，有的包括某一歷史時期的個別階段和事件，口號則隨着鬥爭目標的不同而不同。『勞動解放社』〔三〕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第一次提出的『打倒專制制度』的口號是宣傳口號，因為它是要把個別的和成批的最堅定不移的戰士吸引到黨方面來。在日俄戰爭時期，工人階級的廣大階層已經多少看清了專制制度的不穩固，於是這一口號就成了鼓動口號，因為它是要把千百萬勞動羣衆吸引過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的時期，沙皇制度在羣衆心目中已徹底破產，於是『打倒專制制度』的口號就由鼓動口號變爲行動口號，因為它是要發動千百萬羣衆去衝擊沙皇政府。二月革命時，這個口號已變成黨的指示，即變成在一定期限內奪取沙皇政府的某某機關和某某據點的直接號召，因為當時已經是推翻沙皇政府、摧毀沙皇政府的問題了。指示是黨在某時某地行動的直接號召，全體黨員必須執行；這種號召只要是正確地恰當地表達了羣衆的要求，只要它真正成熟了，通常就能夠得到廣大勞動羣衆的支持。

把口號和指示，或者把鼓動口號和行動口號混淆起來，同舉行過早或過遲的發動一樣危險，有時甚至有致命的危險。一九一七年四月『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是鼓動口號。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堡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舉行的人所共知的包圍冬宮的遊行示威，是一種想把這一口號變爲行動口號的嘗試〔四〕，是一種過早的因而有致命危險的嘗試。這是把鼓動口號和行動口號混淆起來的最危險的典型。黨當時斥責了這一遊行示威的發起人，黨這樣做是對的，因為黨知道，把這個口

號變為行動口號所必需的條件還沒有具備，而無產階級舉行過早的發動就會使它的力量瓦解。

另一方面，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黨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取消或改變已經採取的和成熟了的口號（或指示），以免自己隊伍陷入敵人所佈置的圈套，或是暫時把指示推遲到更有利的時機去執行。一九一七年六月在彼得格勒就發生過這樣的情形，當時經過周密準備並預定要在六月九日舉行的工人和士兵的遊行示威，就因形勢發生了變化，被我黨中央『突然』取消了。

黨的任務就是巧妙而及時地把鼓動口號變為行動口號，或者把行動口號變為一定的具體指示，或者是在情況需要時表現出必要的靈活性和堅決性，及時地停止執行某些即使是受人歡迎的和業已成熟的口號。

二 戰略計劃

一、歷史轉變。戰略計劃

黨的戰略不是什麼永恆的一成不變的東西。它隨着歷史的轉變和歷史的變動而改變。這種改變表現在：對每一個歷史轉變都制定出一個與其相適應的戰略計劃，這個計劃在從一個轉變到另一個轉變的整個時期內都起作用。戰略計劃的內容就是規定革命力量的基本打擊方向和制定在社會戰綫上相應地佈置千百萬羣衆的計劃。自然，適用於一個有它本身特點的歷史時期的戰略計劃，就不能

適用於另一個有完全不同特點的歷史時期。每一個歷史轉變都有它所必需的和適合於它的任務的戰略計劃。

軍事方面也是這樣。對高爾察克作戰的戰略計劃不能適用於對鄧尼金的戰爭，後者要求制定新的戰略計劃，而這個新的戰略計劃又不能適用於別的戰爭，例如一九二〇年對波蘭軍隊的戰爭，因為在所有這三種情況下，無論基本打擊方向或基本戰鬥力量的佈置計劃，都不能不有所區別。

在俄國近代歷史上，有過產生了我黨歷史上三個不同戰略計劃的三個主要歷史轉變。我們認為有必要把它們簡短地敘述一下，以便說明黨的戰略計劃一般是如何隨着新的歷史變動而改變的。

二、第一個歷史轉變和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方針

這個轉變是在二十世紀初期即日俄戰爭時期開始的。當時沙皇軍隊的失敗和俄國工人大規模的政治罷工激動了居民中的一切階級，並把它們推上了政治鬥爭的舞台。這個轉變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結束的。

這個時期我們黨內有兩個戰略計劃在彼此進行鬥爭：一個是孟什維克的（一九〇五年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的）計劃，一個是布爾什維克的（一九〇五年列寧同志的）計劃。

孟什維克的戰略主張遵循自由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聯合的路綫對沙皇政府進行基本打擊。這個計劃從認為當時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這一點出發，讓自由資產階級擔任運動的領導者（領袖），要

無產階級充當『極左的反對派』的角色，充當資產階級的『推動者』的角色，而作為革命主要力量之一的農民却被排斥或幾乎被排斥於視野之外。不難理解，這個計劃既然排斥了俄國這樣的國家裏的千百萬農民，它就是極端的空想；它既然把革命的命運交給自由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它就是反動的，因為自由資產階級對於革命的完全勝利並不關心，它隨時都準備勾結沙皇政府結束革命。

布爾什維克的戰略（見列寧同志的『兩個策略』^{〔五〕}）主張遵循無產階級同農民聯合和中立自由資產階級的路綫對沙皇政府進行革命的基本打擊。這個計劃是從自由資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不關心，它寧願犧牲工人和農民來同沙皇政府勾結起來，不願革命取得勝利這一點出發，讓俄國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擔任革命運動的領導者。這個計劃所以高明，不僅因為它正確地估計了革命的動力，而且因為它本身包含着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萌芽，它天才地預見到俄國革命的下一個階段即更高的階段，並且促進了向這一階段的過渡。

以後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革命發展，完全證實了這個戰略計劃的正確性。

三、第二個歷史轉變和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方針

第二個轉變是從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即推翻沙皇政府以後開始的。當時帝國主義戰爭割開了全世界資本主義的致命膿瘡；當時自由資產階級已經不能在實際上管理國家，不得不限於維持形式上

的政權（臨時政府）；當時工兵代表蘇維埃雖握有實際政權，但是沒有經驗也沒有意志來把它加以必要的運用；當時前綫的士兵和後方的工人農民都被戰爭和經濟破壞的重担壓得精疲力竭；當時『兩個政權並存』和『聯系委員會』^[25]的制度被內部矛盾弄得焦頭爛額，既無力進行戰爭，也無力取得和平，不但沒有找到『擺脫絕境的出路』，而且把局勢弄得更加混亂了。這個時期是以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結束的。

這個時期蘇維埃內部有兩個戰略計劃在彼此進行鬥爭：一個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計劃，一個是布爾什維克的計劃。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戰略最初是在蘇維埃和臨時政府之間、革命和反革命之間搖擺不定的，直到民主會議召開時（一九一七年九月）才最後形成。這個戰略所採取的路綫是逐漸地然而不斷地使蘇維埃離開政權，把國家全部政權集中於未來的資產階級國會的雛型『預備國會』手中。和平和戰爭問題，土地問題和工人問題以及民族問題，都被推到立憲會議召開時解決，而立憲會議的召開又遙遙無期。『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就是這樣規定自己的戰略計劃的。這是一個準備資產階級專政的計劃，固然這個專政是打扮和裝璜過的，是『完全民主的』，但畢竟還是資產階級專政。

布爾什維克的戰略（見列寧同志一九一七年四月發表的『提綱』^[26]）主張遵循無產階級和貧農的聯合力量來消滅資產階級政權的路綫，遵循組織蘇維埃共和國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綫來進

行基本打擊。同帝國主義決裂並退出戰爭；解放舊俄帝國的各被壓迫民族；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爲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準備條件，——這就是這個時期布爾什維克戰略計劃的要素。『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當時布爾什維克就是這樣規定自己的戰略計劃的。這個計劃所以重要，不僅因爲它正確地估計了俄國新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動力，而且因爲它促進並加速了發動西方革命運動的事業。

以後直到十月革命的事變發展，完全證實了這個戰略計劃的正確性。

四、第三個歷史轉變和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方針

第三個轉變是從十月革命開始的。當時西方的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的決死搏鬥已經達到頂點；當時西方的革命危機已明顯地增長了；當時俄國破產了的和矛盾重重的資產階級政權已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打擊下崩潰了；當時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已同帝國主義決裂並退出了戰爭，因而使西方帝國主義聯合起來成爲它的死敵；當時新的蘇維埃政府頒佈了關於和平、沒收地主土地、剝奪資本家和解放各被壓迫民族的法令，因而博得了全世界千百萬勞動人民對它的信任。這是國際範圍內的轉變，因爲國際資本戰綫第一次被突破，推翻資本主義的問題第一次被提到實踐上來了。這樣，十月革命便從一國的、俄國的力量變成了國際的力量，而俄國工人則從國際無產階級的落後部隊變成了以自己奮不顧身的鬥爭喚醒西方工人和東方被壓迫國家的國際無產階級先鋒隊。這個轉變還沒有達到發展的終點，因爲它還沒有在國際範圍內發展起來，但是它的內容和總的方向已經十分明顯地確定了。

當時在俄國各政治集團之間有兩個戰略計劃在彼此進行鬥爭：一個是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的積極分子拉進自己組織裏去的反革命分子的計劃，一個是布爾什維克的計劃。

反革命分子、積極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制定計劃的路綫是，把一切不滿分子即後方和前進的舊軍官、邊疆地區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府、被革命剝奪了的資本家和地主、準備進行武裝干涉的協約國走狗等等聯合成一個陣營。他們所持的方針是通過暴動或外國武裝干涉來推翻蘇維埃政府並在俄國恢復資本主義制度。

布爾什維克則相反，他們制定計劃的路綫是，在俄國內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把俄國的和歐洲的無產階級的力量以及東方被壓迫國家的力量團結起來反對世界帝國主義，以擴展無產階級革命對世界各國的影響範圍。列寧在他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這本小冊子中對這個戰略計劃所作的精確扼要的說明是非常出色的，這就是『最大限度地實現一個（自己的）——斯大林註』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一切，以便發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國的革命。這個戰略計劃的價值不僅在於它正確地估計了世界革命的動力，而且在於它預見到和促進了以後展開的使蘇維埃俄國變為全世界革命運動注意中心、變為西方工人和東方殖民地的解放旗幟的過程。

以後全世界革命的發展以及蘇維埃政權在俄國存在五年的事實，都完全證實了這個戰略計劃的正確性。曾經幾次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分子、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現在都亡命國外了，而蘇維埃政權和國際無產階級組織則正在變為世界無產階級最重要的政治工具。——這些事實很明

顯地說明布爾什維克的戰略計劃是正確的。

載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

「真理報」第五十六號

署名：約·斯大林

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

（提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討論並經

黨中央批准的提綱（略）

一

一、資本主義的發展早在前一世紀就呈現出一種趨向：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國際化，民族閉關自守狀態消滅，各民族在經濟上接近，廣大領土逐漸聯合成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世界市場的擴大，海上和鐵路交通幹綫的敷設和資本的輸出等等，更加强了這種趨向，並且用國際分工和各方面相互依賴的紐帶把各個極不相同的民族聯系起來了。既然這一過程反映了生產力的蓬勃發展，既然它促進了民族隔閡和不同民族利益對立性的消滅，那末它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個進步過程，因為它在準備未來世界社會主義經濟的物質前提。

二、但是這種趨向是通過各種與其內在的歷史意義完全不相適應的特殊形式發展起來的。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各民族相互依賴和各個地域的經濟聯合，不是通過作爲平等單位的各民族合作建立起來的，而是通過一些民族征服另一些民族、比較發達的民族壓迫和剝削不大發達的民族建

立起來的。對殖民地的掠奪和侵略，民族的壓迫和不平等，帝國主義的專橫暴虐，對殖民地的奴役和民族的毫無權利，以及『文明的』民族爲了統治『不文明的』民族而進行的鬥爭，——這些就是各民族經濟上接近的過程所通過的形式。因此，除了聯合趨向以外，還產生了消滅這種強制聯合形式的趨向，產生了被壓迫的殖民地和附屬民族爭取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鬥爭。既然這第二種趨向是表明被壓迫羣衆對帝國主義的聯合形式的憤怒，既然它要求各民族根據合作和自願聯合的原則聯合起來，那末它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種進步趨向，因爲它在準備未來世界社會主義經濟的精神前提。

三、在多民族資產階級國家近五十年來的歷史中，充滿了以資本主義固有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這兩種基本趨向之間的鬥爭。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範圍內，這兩種趨向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是各資產階級殖民國家內部的軟弱和固有的不穩定的基礎。這些國家內部不可避免的衝突和這些國家間不可避免的戰爭，老殖民國家的崩潰和新殖民國家的形成，對殖民地的新的角逐和多民族國家的新的崩潰，這種崩潰所引起的對世界政治地圖的重新繪制，——這就是這個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後果。一方面，舊俄、奧匈帝國和土耳其的瓦解，另一方面，大不列顛和舊德意志這些殖民國家的歷史，以及帝國主義『大』戰、殖民地民族和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革命運動的增長，——這一切以及諸如此類的事實清楚地說明多民族資產階級國家是不穩定的，不鞏固的。

因此，各民族在經濟上的聯合過程和這種聯合的帝國主義方式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決定資產階級沒有能力、沒有辦法、也沒有力量找到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途徑。

四、我們黨估計到了這種情況，它以民族自決權，以各民族有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作為自己的民族政策的基礎。黨在它一成立的時候，在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一八九八年）上，當資本主義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矛盾還沒有十分明顯地確定的時候，就承認各民族有這個不可剝奪的權利。後來，直到十月革命，它在它的歷次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專門決議和決定中毫不更改地確認了自己的民族綱領。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同它相聯系的聲勢浩大的殖民地革命運動，只不過再次確認了黨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這些決議的要點是：

（甲）堅決擯棄對各民族種種強制形式；

（乙）承認各民族有安排自己命運的平等權利和主權；

（丙）承認只有根據合作和自願原則才能實現各民族的牢固聯合這一原理；

（丁）宣佈只有推翻資本政權才能實現這種聯合的真理。

我們黨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倦地拿這個民族解放綱領同沙皇政府的公開壓迫政策以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不徹底的半帝國主義政策相對抗。沙皇政府的俄羅斯化政策在沙皇政府和舊俄各民族之間挖掘了一條鴻溝，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半帝國主義政策使這些民族的優秀分子離開了克倫斯基統治，而我們黨的解放政策則取得了這些民族的廣大羣衆在他們反對沙皇制度和俄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對自己的同情和支持。毫無疑問，這種同情和支持是我們黨取得十月革命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五、十月革命給我們黨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做出了實踐的總結。十月革命推翻了民族壓迫的主要代表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使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從而一下子扭斷了民族壓迫的鎖鍊，根本改變了各民族間的舊關係，消除了過去的民族仇視，為各民族的合作掃清了地盤，不僅取得了俄國其他民族兄弟對俄羅斯無產階級的信任，而且取得了歐洲和亞洲各民族兄弟對俄羅斯無產階級的信任。未必用得着證明，沒有這種信任，俄羅斯無產階級就不能戰勝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和弗蘭格爾。另一方面，毫無疑問，如果在俄國中部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各被壓迫民族就不能獲得解放。只要資本掌握着政權，只要充滿民族主義偏見的過去「統治」民族的小資產階級首先是農民跟着資本家走，民族仇視和民族衝突就必不可免；相反地，如果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階層跟着無產階級走，也就是說，如果無產階級專政有了保證，那就可以認為民族和平和民族自由有了保證。因此，蘇維埃的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確立，是各民族在統一的國家聯盟內能够藉以建立兄弟合作的基礎。

六、但十月革命的成果不局限於消滅民族壓迫和建立民族聯合的基礎。十月革命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還制定了這種聯合的形式，規定了各民族聯合成一個聯盟國家所應遵循的基本路綫。在革命初期，民族的勞動羣衆初次感到自己是獨立的民族單位，而外國干涉的威脅還沒有成爲實際危險，這時各民族的合作還沒有完全固定的嚴格確定的形式。在國內戰爭和武裝干涉時期，各民族共和國軍事自衛的利益已提到首要地位，而經濟建設問題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這時合作採取了軍事聯盟的形式。最後，在戰後時期，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生產力問題已提到首位，這時軍事聯盟就用經濟聯盟

補充了。各民族共和國聯合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合作形式發展的最終階段，這一次已經具有各民族在軍事、經濟和政治上聯合成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的性質了。

因此，無產階級在蘇維埃制度中找到了正確解決民族問題的鑰匙，發現了根據民族權利平等和自願的原則組織穩固的多民族國家的道路。

七、但是找到正確解決民族問題的鑰匙，還不能說是完全地徹底地解決了民族問題，還不能說這一解決已經完全具體而實際地實現了。要正確實現十月革命所提出的民族綱領，還必須克服過去民族壓迫時期遺留給我們的那些障礙，這些障礙在短時期內是不能一下子剷除掉的。

第一、這種遺產是大國沙文主義殘餘，大國沙文主義是大俄羅斯人過去的特權地位的反映。這種殘餘還存在於我們中央和地方的蘇維埃工作人員頭腦中，盤踞在我們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關裏，它們得到因實行新經濟政策而日益猖獗的「新」路標轉換派〔五〕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思潮的支援。這種殘餘在實踐中的表現是俄羅斯蘇維埃官僚對各民族共和國的需要和要求採取傲慢輕視態度和冷酷無情的官僚主義態度。只有在我們國家機關的實際工作中毅然決然地消滅這種殘餘，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才能成爲真正鞏固的國家，各民族的合作才能成爲真正兄弟般的合作。因此，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殘餘作堅決鬥爭是我們黨當前的第一項任務。

第二、這種遺產是共和國聯盟各民族在事實上即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十月革命所獲得的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是民族的偉大勝利，但是這種平等本身不能解決整個民族問題。許多共

和國和民族沒有經過或者幾乎沒有經過資本主義，沒有或者幾乎沒有自己的無產階級，因而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落後，不能充分享用民族權利平等給它們的權利和可能，它們得不到外來的真正而長期的幫助，就不能提高到高級發展階段，因而也不能趕上走在前面的民族。產生這種事實上不平等的的原因，不僅在於這些民族的歷史，也在於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的政策，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力圖使邊疆地區變成受工業發達的中部地區剝削的純原料產地。在短時期內剷除這種不平等現象，在一兩年內消滅這種遺產是不可能的。我們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就已指出：「消滅民族在事實上的不平等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求我們同民族壓迫和對殖民地實行奴役的一切殘餘作不屈不撓的鬥爭。」但是，我們一定要把它剷除掉。而且只有通過俄羅斯無產階級給予聯盟各落後民族真正的長期的幫助，使它們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繁榮起來，才能把它剷除掉。不這樣，就沒有理由指望在統一的聯盟國家範圍內建立各民族的正確的鞏固的合作。因此，為消滅各民族在事實上的不平等而鬥爭，為提高各落後民族的文化和經濟水平而鬥爭，是我們黨當前的第二項任務。

最後，這種遺產是許多民族中間的民族主義殘餘，這些民族曾經受過沉重的民族壓迫，還沒有擺脫過去的民族恥辱感。民族之間的某種疏遠和過去被壓迫民族對俄羅斯人採取的措施的不完全信任，就是這種殘餘的實際表現。但是，在某些有幾個民族的共和國內，這種防禦性的民族主義往往變成進攻性的民族主義，變成這些共和國內較強大的民族反對弱小民族的頑固的沙文主義。反對阿爾明尼亞人、沃舍梯人、阿札里人和阿布哈茲人的格魯吉亞沙文主義（在格魯吉亞）；反對阿爾明尼亞

人的阿捷爾拜疆沙文主義（在阿捷爾拜疆）；反對土爾克明人和柯爾克茲人的烏茲別克沙文主義（在布哈拉和花刺子模），——這種種形式的沙文主義是一種極大的禍害，它們因受新經濟政策和競爭的條件的激勵而日益猖獗，有使某些民族共和國變成爭吵和糾紛的舞台的危險。不用說，所有這些現象都阻礙着各民族真正聯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聯盟的事業。既然民族主義殘餘是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一種特殊防禦形式，那末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作堅決鬥爭就是剷除民族主義殘餘的最可靠的手段。既然這種殘餘在變成反對各個共和國的弱小民族集團的地方沙文主義，那末同這種殘餘作直接鬥爭就是黨員的義務。因此，同民族主義殘餘首先是同這種殘餘的沙文主義形式作鬥爭，是我們黨當前的第三項任務。

八、中央和地方很大一部分蘇維埃官僚不是把共和國聯盟看做旨在保證各民族共和國自由發展的各平等國家單位的聯盟，而是把它看做取消這些共和國的一個步驟，看做成立所謂「統一而不可分的整體」的開端，這一事實應當認為是舊遺產的鮮明表現之一。代表大會斥責了這種看法，認為它是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同時號召黨員密切注意，不要讓有沙文主義情緒的蘇維埃官僚利用各共和國的聯合和各人民委員部的合併來掩蓋他們忽視各民族共和國經濟和文化需要的企圖。各人民委員部的合併是對蘇維埃機關的考驗：如果這一實驗在實踐中產生了大國主義傾向，那末黨就不得不採取最堅決的辦法來反對這種歪曲，甚至提出撤銷某些人民委員部的合併問題，直到蘇維埃機關經過適當的改造，能夠用真正無產階級和真正兄弟般的精神注意小民族和落後民族的需要和要求為止。

九、既然共和國聯盟是各民族共處的新形式，是各民族在統一的聯盟國家內合作的新形式，而在這個聯盟國家內應當在各民族共同工作過程中剷除上述殘餘，那末聯盟的最高機關就應當不僅要充分反映聯盟內各民族的共同需要和要求，而且要充分反映個別民族的特殊需要和要求。因此，除了現存的代表整個聯盟勞動羣衆的不分民族的聯盟中央機關以外，還應當根據平等原則設立代表各民族的專門機關。這樣組織聯盟中央機關會使我們有充分可能傾聽各民族的需要和要求，及時給它們必要的幫助，造成完全相互信任的環境，從而用最無痛苦的方法消滅上述遺產。

十、代表大會根據上述各點，建議黨員採取下列實際措施：

(甲) 在聯盟最高機關係統內，根據平等原則設立一個代表所有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地區的專門機關；

(乙) 聯盟各人民委員部應根據保證滿足聯盟各民族的需要和要求的原則來建立；

(丙) 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的機關主要應當由熟悉各該民族的語言、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的本地人組成。

二

一、在大多數民族共和國裏，我們的黨組織是在不十分有利於自己成長和鞏固的條件下發展的。

這些共和國在經濟上落後，民族無產階級人數很少，缺乏甚至沒有本地的黨的老幹部，缺乏用本族語言出版的有內容的馬克思主義書刊，黨的教育工作很差，還存在着激進民族主義傳統（至今還沒有消滅）的殘餘，——這一切在當地共產黨員中間產生了過高估計民族特點、過低估計無產階級階級利益的一定傾向，即民族主義傾向。這種現象在有幾個民族的共和國裏表現得特別危險，在那裏，這種現象往往具有較強民族的共產黨員反對弱小民族（格魯吉亞、阿捷爾拜疆、布哈拉、花刺子模）的共產黨員的沙文主義傾向的形式。民族主義傾向的害處在於：它阻礙民族無產階級擺脫民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過程；它給各民族的無產者團結成一個統一的國際主義組織的事業帶來困難。

二、另一方面，在黨中央機關和各民族共和國的共產黨組織中，俄羅斯民族的老幹部人數很多，他們不熟悉這些共和國勞動羣衆的風俗習慣和語言，因此不能經常關心勞動羣衆的需求，這就使我們黨產生了在黨的工作中過低估計民族特點和民族語言的傾向，產生了對這種特點採取傲慢輕視的態度，即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這種傾向所以有害，不僅因為它阻礙了本地的通曉民族語言的共產黨幹部的形成，造成了使黨脫離各民族共和國無產階級羣衆的危險，而且首先因為它滋養和培植上面所說的民族主義傾向，增加了我們同這種傾向作鬥爭的困難。

三、代表大會斥責了這兩種傾向，認為它們對共產主義事業都是有害的、危險的，並且提醒黨員注意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是特別有害和特別危險的，同時號召全黨迅速消滅我們黨的建設中的這些舊的殘餘。

代表大會責成中央委員會實行下列各項實際措施：

- (甲) 成立由各民族共和國當地黨的工作人員組成的高級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
- (乙) 增加用本族語言出版的有原則性的馬克思主義書刊；
- (丙) 加強東方民族大學和它各地的分校；
- (丁) 在各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下設立由當地工作人員組成的指導組；
- (戊) 增加用本族語言出版的黨的羣衆性書刊；
- (己) 加強各共和國的黨的教育工作；
- (庚) 加強各共和國的青年工作。

載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真理報」第六十五號

署名：約·斯大林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 （六）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

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
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

一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

（四月十七日）

同志們！我認爲刊登在『中央通報』^{（六）}上的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已經十分詳盡了，所以在這裏，在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裏就用不着再重複了。

我認爲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應當由三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應當說明黨和工人階級的組織聯系，也就是應當說明環繞着黨的和黨藉以實現對工人階級的領導、工人階級藉以變成黨的軍隊的那些聯系和羣衆性的機關。

我認爲報告的第二部分應當說明工人階級聯系農民的那些組織聯系和羣衆性的機關。這就是國家機關。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通過國家機關實現對農民的領導。

第三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應當談黨的本身，黨是一個本身具有特殊生活的機體，是一個提出口號並檢查其實現情況的機關。

現在我來談報告的第一部分。我把黨比做先鋒隊，把工人階級比做黨的軍隊來談。這樣比較，有人可能認爲這裏的關係和軍事方面一樣，就是說，黨發佈命令，用電報傳達口號，而軍隊即工人階級

執行這些命令。這種看法是根本不對的。政治方面的情况要複雜得多。因為在軍事方面是指揮人員自己建立軍隊，自己編制軍隊。而在這裏，在政治方面，黨不是自己建立軍隊，而是找到自己的軍隊即工人階級。第二個區別是：在軍事方面，指揮人員不僅要建立軍隊，而且還要供給軍隊給養、被服和鞋襪。在政治方面就不是這樣了。黨不供給自己的軍隊即工人階級給養、被服和鞋襪。正因為如此，政治方面的情况要複雜得多。正因為如此，在政治方面不是階級依靠黨，而是黨依靠階級。正因為如此，在政治方面要實現階級先鋒隊即黨的領導，就必須在黨的周圍建立廣大的羣衆性的非黨機關，這些機關是黨的觸角，依靠它們黨就能把自己的意志傳達給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也就能從分散的羣衆變成黨的軍隊。

現在讓我來分析一下連接黨和階級的這些機關，這些引帶，看看它們是怎樣的一些機關，看看一年來黨在鞏固這些機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工會是黨聯系工人階級的第一根主要引帶，第一個主要傳達機關。在一年以來的活動中，就加強這個使黨聯系階級的主要引帶方面的數字來說，黨擴大並且鞏固了自己在工會領導機關中的影響。我不談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它的成分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也不談工會中央委員會。我要談的主要是省工會委員會。去年，在我們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以前，省工會委員會的主席中十月革命前入黨的佔百分之二十七，而今年則佔百分之五十七以上。這個成績不算很大，但畢竟還是成績。它說明，我們黨十月革命前入黨的領導人員已經掌握了工會的主要脈絡，他們依靠這些脈絡使黨和工人階級

聯系起來。

我不打算談整個工人工會的成分問題。數字表明，在上次代表大會以前，工會會員而今年，在這次代表大會以前却只有四百八十萬。這似乎是後退了一步，但這只是去年，——讓我在這裏說實話吧！——工會是虛腫的。當時提出的數字並沒有確切地反映這次代表大會召開以前所提出的數字，雖然比去年少，但這是比較真實、比較實際的。進了一步，儘管工會會員的人數減少了。因此，一方面是工會從虛假的和半官僚的工會領導機關過着共同生活的真正有生命的工會，另一方面是省級工會機關中的黨的領導從百分之二十七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七，——這就是我們所確認的這一年來我們黨在加中的成就。

但是決不能說在這方面一切都順利。在工會基層組織工廠委員會中，還不是廠人。例如，哈爾科夫省的一百四十六個工廠委員會中，就有七十個工廠委員會一個共二但這種現象是個別的。一般地應當承認，就鞏固黨在省級組織和下層組織中的影響來向前發展了。這條戰綫應當認為對黨是有保證的。在工會方面我們沒有強大的敵人。

合作社是黨聯系階級的第二根引帶，第二個羣衆性的傳達機關。我指的首先是消中的工人合作社，其次是農業合作社，因為農業合作社裏有貧農。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費合作總社中工人社員約有三百萬。今年，在這次代表大會以前，稍有增加，總共有

這個數目很小。但是在我們的條件下，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這畢竟還是前進了一步。如果每個工人的家庭以三口人計算，那就是說，約有九百萬的工人居民被作為消費者組織在消費合作社裏了，而黨在其中的影響一天天在擴大……

在下次代表大會以前，黨在消費合作社裏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我們沒有材料說明，可能佔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五，不會超過。在這次代表大會以前，在中央消費合作總社省級機關裏，共產黨員至少已經佔百分之五十。這又前進了一步。

農業合作社的情況較差。這種合作社本身無疑是在發展着。去年，在代表大會召開以前，加入農業合作社的農戶至少有一百七十萬。今年，在這次代表大會以前，加入農業合作社的農戶不下四百萬。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傾向於無產階級的貧農。正因為如此，弄清黨在農業合作社方面的影響怎樣擴大的問題是很有意義的。去年的數字我們沒有。今年在農業合作社省級機關裏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共產黨員（雖然我認為這個數字還值得懷疑）。如果這是事實，那就是一大進步。下層組織的情況較差，在那裏我們至今還不能使初級合作社擺脫敵視我們的力量影響。

共青團是連接階級和黨的第三根引帶。未必用得着證明，共青團和青年對於我們黨的發展是極重大的意義的。我們現有的數字表明，去年，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以前，我們的共青團裏至少有團員四十萬人。後來在一九二二年年中，由於裁減人員，由於為青年工人保留位置的制度還沒有普遍實行和共青團還不能適應新的情況，團員人數降到二十萬。現在，特別是從去年秋天起，共青團又大大

發展了。目前至少有四十萬團員。最令人高興的是，共青團的發展首先是吸收青年工人。共青團有發展的首先是在我們工業有發展的地區。

你們知道，共青團在工人中間的活動主要是在工廠藝徒學校進行的。這方面的數字表明，去年，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以前，我們約有五百所工廠藝徒學校，共有學員四萬四千名。到去年年底我們有七百多所工廠藝徒學校，共有學員五萬名。而重要的是共青團中的工人成分增多了。

和上述農業合作社的戰綫一樣，青年戰綫應當認為是特別受威脅的戰綫，因為我們黨的敵人對這方面的攻擊特別頑強。正是在這裏，在這兩方面，黨和黨的各級組織必須竭盡全力來保證自己取得優勢。

其次，我來談談女工代表大會。這可能沒有引起我們各級組織的注意，但這是一個連接我們黨和工人階級中的婦女的極其重要的傳動機構。我們現有的數字表明：去年，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以前，在五十七個省和三個區域裏，婦女代表大約有一萬六千人，其中女工佔大多數。今年，在這次代表大會以前，在這些省和區域裏，婦女代表至少有五萬二千人，而其中女工有三萬三千人。這是一大進步。應當注意到這是一條我們一直很少注意然而對我們具有重大意義的戰綫。既然事業在向前發展，既然有條件鞏固和擴大這個機關，有條件用黨的觸角去破壞神甫在婦女所教養的青年中的影響，那末黨的當前任務之一自然應當是在這條無疑是受威脅的戰綫上發揮最大的力量。

現在談談學校。我說的是政治學校、蘇維埃和黨務幹部學校、共產主義大學。這也是一種機關，

黨依靠它們來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培養教育方面的指揮人員，讓他們在工人居民中散播社會主義的種子，散播共產主義的種子，從而把黨和工人階級在精神上聯系起來。數字表明，去年蘇維埃和黨務幹部學校的學員約有二萬二千名。今年，如果把由政治教育總局經辦的市立政治常識學校計算在內，至少有三萬三千名。至於對共產主義教育有巨大意義的共產主義大學，學員就增加得很少了，過去約為六千名，現在是六千四百名。黨的任務就是要在這條戰綫上加緊努力，加緊培養和訓練共產主義教育方面的指揮人員。

現在談談報刊。報刊不是羣衆性的機關，也不是羣衆性的組織，然而它在黨和工人階級之間建立了一種微妙的聯系，這種聯系就其力量來說無異於任何羣衆性的傳達機關。有人說，報刊是第六個強國。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強國，但是，它有力量，作用很大，這是無可爭辯的。報刊是黨每日每時用自己所需要的語言向工人階級講話的最有力的武器。其他在黨和階級之間架設精神導綫的方法，其他同樣靈活的機關，在天地間是沒有的。正因為如此，黨應當特別注意這方面，應當說，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就拿報紙來說。根據發表的數字，去年我們有三百八十種報紙，今年至少有五百二十八種。去年的發行額是二百五十萬份，但是，這個發行額一半是依靠公家補助的，沒有生命力的。去年夏天，由於報刊的補助金減少了，必須自力更生，發行額降到九十萬份。在這次代表大會以前，發行額約近二百萬份。就是說，現在報刊依靠公家比較少，它已靠自己的資金維持，並且成了黨手中的銳利武器，使黨和羣衆聯系起來了，否則發行額是不能增加和保持的。

現在來談下一個傳達機關——軍隊。人們習慣把軍隊看做防禦或進攻的機關。而我把軍隊看做工人和農民的集合點。全部革命的歷史表明，軍隊是來自不同省份的不相往來的工人和農民的唯一集合點，他們在這裏聚集在一起並形成他們的政治觀點。大規模的動員和嚴重的戰爭總要引起某種社會衝突，某種羣衆性的革命運動，這並不是偶然的。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各個遙遠的角落裏的農民和工人第一次在軍隊裏見面。要知道，通常沃龍涅什的農夫是看不到彼得堡人的，普斯可夫人是看不到西伯利亞人的，在軍隊裏他們却見面了。軍隊是工人和農民的學校，是工人和農民的集合點，從這個觀點來看，黨在軍隊中的力量和影響具有極大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軍隊是把黨同工人、貧苦農民連接起來的最龐大的機關。軍隊是全俄全聯邦的唯一集合點，在這裏，來自不同省份和區域的人們聚集在一起，進行學習並養成過政治生活的習慣。在這個極其重要的羣衆性的傳達機關中發生了如下的變化：在下次代表大會以前共產黨員佔百分之七點五，今年已達到百分之十點五。在這段期間，軍隊減少了，但是，質量改善了，黨的影響擴大了；在這個主要的集合點裏我們在擴大共產主義的影響方面取得了勝利。

如果把排長以上的全體指揮人員都計算在內，去年共產黨員在指揮人員中佔百分之十，今年佔百分之十三。如果不把排長計算在內，去年佔百分之十六，今年佔百分之二十四。

這些就是環繞着我們黨的引帶，環繞着我們黨的羣衆性機關，它們把黨和工人階級聯系起來了，使黨有可能變成先鋒隊，使工人階級有可能變成軍隊。

這些就是黨（和軍事指揮人員不同）藉以變成先鋒隊，工人階級藉以從分散的羣衆變成真正的政治軍隊的聯系網和傳達網。

我們黨所以能在這些領域在加強這些聯系方面表現出成績來，不僅因為黨在這方面的經驗豐富了，影響這些傳達機關的方法改進了，而且因為整個國家的政治狀況幫助和促進了這一點。

去年我們發生過飢荒，承擔了飢荒的後果，產生過工業蕭條和工人階級渙散的現象等等。今年則恰恰相反，我們豐收了，工業局部高漲了，無產階級的集合過程開始了，工人的生活狀況改善了。過去被迫分散到農村去的老工人現在又重新回到工廠，這一切就造成了一種在政治上有利的形勢，使黨能夠展開廣泛的工作來加強上述聯系機關。

現在來談報告的第二部分：黨和國家機關。國家機關是主要的羣衆性機關，它通過工人階級的政黨把執政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連接起來，並使工人階級有可能通過其政黨來領導農民。我把我的報告的這一部分和列寧同志的兩篇著名的文章〔六〕直接聯系起來談。

許多人以為列寧同志在這兩篇文章中所發揮的思想完全是新的。據我看，這兩篇文章中所發揮的思想去年就已經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腦子裏轉了。你們大概還記得他去年所做的政治報告。他說，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但是機關不協調，因此汽車不是向它應去的方向駛去，而是轉了彎。我記得施路普尼柯夫曾經說這是司機不中用。這當然不對，完全不對。政策是正確的，司機很高明，汽車型式也是好的，是蘇維埃型的，可是國家汽車的組成部分即國家機關中的某些工作人員不好，不是

我們的人。因此汽車不協調，結果就完全歪曲了正確的政治路線。結果不是實現而是歪曲政治路線。我再說一遍，國家機關就其型式來說是正確的，可是它的組成部分還是異己的、官僚的、半沙皇半資產階級的。我們想使國家機關成爲爲人民羣衆服務的工具，但是這個國家機關中的某些人想把它變成他們一項收入的來源。這就是整個機關不協調的原因。我們不去改進機關的工作，單靠正確的政治路線是走不遠的，因爲路線會被歪曲，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關係會破裂。結果是：雖然我們操縱着方向盤，但是，汽車不聽指揮。最後一定會翻車。這些思想列寧同志在去年就已經發揮了，只是在今年他才運用這些思想制定了一套嚴整的制度來改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查院，其目的在於使改組後的監察機關變成改裝汽車各個組成部分的槓桿，變成用新的部分代替無用的舊部分的槓桿，如果我們真想把汽車開往它應去的地方的話。

列寧同志的建議的實質就在這裏。

我可以舉出這樣一件事實，即對奧列哈沃—祖也沃托拉斯的檢查，這個托拉斯是按蘇維埃型式組織起來的，它的任務是生產大量工業品供應農民，可是這個按蘇維埃型式組織起來的托拉斯却把生產出來的工業品放進私人腰包，損害了國家的利益。於是汽車就不是開往它應去的地方了。

我還可以舉出最近伏羅希洛夫同志告訴我的一件事實。我們有一個名叫工業局的機關。這個機關是在東南部。這個機關大約有兩千個工作人員，負責領導東南部的工業。伏羅希洛夫同志很失望地對我說，領導這個機關可不容易，爲了領導它，還得另外成立一個小機關來領導這個領導機關。我

們找到了伏羅希洛夫、埃斯蒙特和米高揚這幾個好人，他們把這個機關徹底地整頓了一下。原來，這個機關只要一百七十個人就可以代替兩千人的工作。結果怎樣呢？現在的工作比過去好得多。過去這個機關生產多少就吃掉多少。現在它正在為工業服務。這樣的事實舉不勝舉，很多，比我的頭髮還要多。

所有這些事實只說明一點，就是我們的蘇維埃機關就其型式來說是正確的，但是它的成員，它的習慣和傳統，實際上往往會推翻正確的政治路線。因此，整個機器不協調，結果就造成政治上的巨大損失，使無產階級和農民有破裂的危險。

問題是這樣擺着的：或者我們改善經濟機關，裁減它們的人員，精簡機構，節約開支，並且把思想上靠近我們黨的人補充進去，那末我們就會達到實行所謂新經濟政策的目的，就是說，工業將生產出大量工業品供應農村並得到自己所需要的農產品，這樣我們就能使農民經濟和工業經濟結合起來。或者我們達不到這個目的而遭到破產。

還可以這樣說：或者精簡國家機關，精簡稅務機關，把小偷和騙子驅逐出去，那末我們從農民那裏拿到的就能比現在少，國民經濟就能維持住。或者這個機關變成為自己服務的機關，像東南部所發生的那樣，把從農民那裏拿來的一切都花在本機關身上，那末就會遭到政治上的破產。

我深信，這就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寫這兩篇文章的指導思想。

在列寧同志的建議中還有另一個方面。他不但力求改善機關和最大限度地加強黨的領導作用

（因為黨既然建立了國家，就應當改善國家），而且顯然還注意到道德方面。他想使國內沒有一個大官僚，甚至也不要有一個因職位高而使普通人覺得對他沒有辦法的官員。道德方面是伊里奇的建議的第三方面，正是這個建議提出了不僅要從國家機關內，而且要從黨內清除那些損害我們黨的名譽的官場傳統和官場習氣的任務。

現在來談談關於挑選工作人員的問題，就是伊里奇早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就談過的那個問題。如果我們了解到我們的國家機關在成員、習慣和傳統方面很不好，有使工農之間的關係破裂的危險，那末很明顯，黨的領導作用就不僅應當表現在發指示上，還應當表現在把能夠理解我們的指示並且能夠忠實地執行指示的人安置在一定的的工作崗位上。無須證明，在中央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之間決不能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綫。

你們中間未必有人會說，只要提出好的政治路綫就夠了，就萬事大吉了。不，這只是事情的一半。在提出正確的政治路綫以後，還必須挑選工作人員，把善於執行指示、能夠理解指示、能夠把這些指示當做自己的東西並且善於貫徹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種工作崗位上。否則，政策就會失去意義，就會變成空談。因此，登記分配局即中央委員會的那個負責登記我們下層和上層主要工作人員並分配他們工作的機關具有重大的意義。到目前為止，登記分配局的工作僅限於登記和分配縣委員會、省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的同志。登記分配局除此而外，說句俗話，就啥事不管了。現在，由於戰爭已經結束，羣衆性的一般動員已經用不着，並已失去任何意義（去年中央委員會負責動員一千人而遭到

失敗這件事就是一個證明，因為在目前條件下，工作已經深入，我們正在實行專業化的方針，並且必須嚴格審查每個工作人員，一般動員只能於事有害，對地方沒有任何好處，登記分配局的工作已不能僅限於省委員會和縣委員會了。

我可以列舉一些數字。第十一次代表大會責成中央委員會至少動員一千名莫斯科的工作人員。中央委員會估計動員一千五百名左右。由於被動員的人生病和其他種種原因，只動員了七百名；根據各地的反映，其中只有三百人比較合適。你們看，這件事實說明過去所實行的舊的一般動員已經不適用了，因為我們黨的工作已經深入，黨的工作已經隨着不同的經濟部門而專業化，如果隨便調動人，第一、就會使這種人無所作爲，第二、不能滿足需要新的工作人員的各級組織本身的最低要求。

我想列舉在登記分配局工作的索羅金所寫的一本著名小冊子〔註〕中關於我國工業指揮人員的一些數字。但在談這些數字以前，我應當談談中央委員會在登記工作人員的過程中在登記分配局內所實行的改革。我已經說過，從前登記分配局的工作僅限於省委員會和縣委員會，現在，由於工作已經深入，建設工作已經普遍展開，就不能僅限於縣委員會和省委員會了。必須毫無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門和黨賴以掌握我們的經濟機關並實現自己的領導的全體工業指揮人員。中央委員會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決定擴大中央和地方的登記分配機關，使局長在經濟方面和蘇維埃方面都有副局長協助他工作，使正副局長在登記企業和托拉斯的指揮人員、地方和中央的經濟機關的指揮人員以及蘇維埃和黨內的指揮人員方面也有自己的助手協助工作。

這一改革的效果立刻就表現出來了。在很短的時期內就登記了將近一千三百個擔任廠長職務的工業指揮人員。其中黨員佔百分之二十九，非黨員佔百分之七十。有人會以為在主要企業中非黨員佔多數。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事實上，百分之二十九的黨員領導着擁有三十多萬工人的最大企業，而百分之七十的非黨廠長領導着至多只有二十五萬產業工人的企業。小企業是由非黨員領導，大企業是由黨員領導的。其次，在黨員廠長中間，工人出身的比非工人出身的多兩倍。這種情況說明，工業建設的下層即基層組織的情況和只有很少黨員的上層即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及其各部門不同，在下層黨員的力量，首先是工人，已經開始掌握企業了。值得注意的是，從質量和稱職與否來看，黨員中適合做廠長的比非黨員要多。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黨分配黨員到企業中去，不僅要以純粹黨的考慮，以加強黨在企業中的影響為指導原則，還要以業務考慮為指導原則。這不僅對黨本身有利，而且對整個經濟建設有利，因為黨員中適合做廠長的比非黨員要多得多。

這就是登記我們工業指揮人員的初次試驗，我已說過，這是一次新的試驗，它遠沒有包括一切企業，因為在這本小冊子裏所登記的一千三百個廠長，只佔所有還應當登記的企業的廠長的一半左右。但是試驗表明，這裏的範圍無限廣闊，登記分配局的工作應當大力展開，使黨能夠把黨員補充到我們的主要企業的管理機關裏去，從而實現黨對國家機關的領導。

同志們一定知道中央委員會提交代表大會審查的關於組織問題（黨方面和蘇維埃方面）的提案。至於我剛才在我的報告的第二部分裏談到的蘇維埃方面的問題，中央委員會打算提交專門委員會進

行詳細審查，這個委員會應當研究這個問題的黨的方面和蘇維埃方面，然後把自己的意見提交代表大會審查。

現在來談報告的第三部分：關於作為機體的黨，作為機關的黨。

首先應該談談我們黨的數量問題。數字表明，去年，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以前，黨員有四十幾萬。今年，由於黨的進一步縮小，由於黨在許多地區清除了非無產階級分子，黨員的數量減少了，減少到四十萬不到一點。這不是損失，而是收穫，因為黨的社會成分改善了。在我們黨的發展中，在改善黨的社會成分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在黨內發生過的非無產階級分子增多、工人階級分子減少的傾向在報告所涉及的年度內停止了，轉變已經開始了，我們黨的工人階級分子的百分數增加，非無產階級分子減少的一定傾向出現了。這正是我們在清黨以前所努力爭取而現在已經取得的成就。我並不是說在這方面我們一切都做到了，還遠不是一切都做到了。但是，我們已經有了轉變，已經達到了某種最低限度的清一色，保證了黨的工人成分，顯然，今後還必須沿着這條繼續減少黨內非無產階級分子和繼續增多無產階級分子的道路前進。中央委員會提出的進一步改善我們黨的成分的那些措施，在中央委員會的提案裏已有說明，我不再重複了。顯然，必須加緊阻止非無產階級分子湧進黨來，因為在目前，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由於黨一定要受到新經濟政策分子的有害影響，必須使我們黨達到最大限度的清一色，至少達到工人成分對非工人成分的絕對優勢。如果黨想保持自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就應當而且必須做到這一點。

我現在來談談省委員會的生活和活動問題。報刊上有些文章時常流露出對省委員會的諷刺口吻，時常嘲笑省委員會，過低估計省委員會的活動。同志們，我應當說，省委員會是我們黨的主要支柱，沒有它們，沒有省委員會，沒有它們對蘇維埃和黨的工作的領導，黨就會失去基礎。儘管省委員會有很多缺點，儘管缺點到現在仍然存在，儘管省委員會有所謂糾紛和爭吵，但是總的說來，省委員會是我們黨的主要支柱。

省委員會是怎樣生活和發展的呢？大約十個月以前，我看到過省委員會的來信，當時我們的省委書記對經濟工作還漫無頭緒，還不能適應新的情況。十個月以後，我又看到了它們的來信，這一次我感到很滿意很高興，因為從這些信裏可以看出省委員會已經成長起來了，它們已經熟悉業務，認真從事建設工作，編制地方預算，掌握地方的經濟，並且真正能夠領導本省的整個經濟和政治生活了。同志們，這是一個很大的成績。無疑地，省委員會也有缺點，但是，我應當說，如果省委員會沒有在黨和經濟方面取得這種經驗，如果省委員會在領導地方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熟練程度方面沒有這種巨大的提高，我們甚至不能夢想黨在什麼時候才能實現對國家機關的領導。

有人在談論省委員會的糾紛和摩擦。我應當說，糾紛和摩擦有不好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產生糾紛和爭吵的基本原因是省委員會力圖在自己內部形成一個能夠經常進行領導的緊密團結的核心。儘管為達到這個目的和滿足這種願望所採取的辦法往往和目的不相適應，但是這種目的和願望是完全健康的、合理的。這是因為我們黨內成分不一，黨內有老幹部和新幹部，有無產者和知識分子，有

中部地區的人和邊疆地區的人，有各種民族的人，而且省委員會裏的這一切不同成分的分子帶來了各種不同的習慣和傳統，於是就在這種基礎上產生了摩擦和糾紛。雖然糾紛和摩擦的形式是不能容許的，但是糾紛和摩擦十分之九是有健康願望的，是要力求結成一個能夠領導工作的核心。用不着證明，如果省委員會裏沒有這樣的領導集團，如果『好人』和『壞人』參半，省裏就沒有任何領導了，我們就不能徵收任何糧食稅和進行任何運動了。這就是糾紛的健康方面，這個方面不應當被它有時具有畸形事實所抹殺。這當然不是說，黨不應當同糾紛作鬥爭，特別是因私人關係而產生的糾紛。

省委員會的情況就是這樣。

但是遺憾的是，在省委員會以下我們黨的力量還沒有想像的那樣大。我們黨在機關方面的主要弱點就是我們縣委員會的弱點，缺乏後備力量——縣委書記。我認爲，如果說我們還沒有完全掌握聯系我們黨和工人階級的主要機關，即我在我的報告的第一部分裏談到的那些機關（我指的是下層組織、合作社、婦女代表大會、共青團等等），如果說省級機關還沒有完全掌握這些機關，這正是因爲我們縣的力量太弱了。

我認爲這是一個基本問題。

我認爲，我們黨的一個基本任務就是在中央委員會下面開辦一所學校，訓練農民和工人出身的最忠誠最能幹的同志來做縣委書記。如果黨在明年能夠把一支二百或三百個縣委書記的後備力量聚

集在自己周圍，並且能夠用這支力量去幫助省委員會，使省委員會對各縣工作的領導易於進行，那末黨也就能保證對一切羣衆性的傳達機關的領導。到那時，在每一個消費合作社，每一個農業合作社，每一個工廠委員會，每一個婦女代表大會，每一個共青團支部，每一個羣衆性的機關裏，黨都將取得優勢。

現在談談區域機關。過去一年表明，黨和中央委員會設立區域機關（部分是選舉的，部分是委派）是正確的。中央委員會在討論整個區域劃分問題時得出了如下的結論：在設立黨的區域機關的工作中，必須逐步從委派的原則過渡到選舉的原則，因為這種過渡無疑會在黨的區域委員會的周圍造成一種良好的道德氣氛，使中央委員會易於領導黨。

現在談談關於改善黨的中央機關的問題。中央委員會關於明確劃分中央書記處、組織局和政治局的職能的建議，想必你們都已經看過了。這個問題幾乎用不着特別解釋，因為它本身就很清楚。但是有一個問題，即擴大中央委員會的問題，在我們中央委員會裏已經討論過好幾次了，並且一度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一些中央委員認為中央委員會不應當擴大，甚至應當減少中央委員的人數。我不談他們的動機，同志們自己發表意見吧。我簡單地說一下應當擴大中央委員會的理由。

目前我們黨的中央機關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們有二十七個中央委員。中央委員會會議每兩個月召開一次，而中央委員會裏有一個十人到十五人組成的核心，這些人在領導我們機關的政治和經濟工作方面已經熟練到有使自己變成領導術士的危險。這也許是好的，但是這也有很危險的一面，因為

轉變時能夠避免分裂的史無前例的團結。世界上沒有一個黨，沒有一個政黨經受住這樣急劇的轉變而沒有混亂，沒有分裂，沒有從黨的大車上摔下某一個集團。大家知道，這樣的轉變通常總會使某個集團從大車上摔下來，黨內即使不發生分裂，也會造成混亂。在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我們黨的歷史上就有過這樣的轉變，當時，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以後，我們習慣於進行革命鬥爭，不願意轉入日常的合法的工作，不想參加杜馬，不想利用合法的機關，不想加強自己在合法機關中的陣地，總之是拒絕採用新方法。這個轉變並沒有實施新經濟政策這樣急劇，但是很明顯，那時作爲一個政黨來說我們還很年輕，我們還沒有隨機應變的經驗，結果整整兩個集團從我們的車上摔下去了。現在我們實行進攻政策以後轉向新經濟政策是一個急劇的轉變。在作這樣的轉變時，就是說，在無產階級必須暫時放棄進攻而退回原來的陣地、無產階級爲了不致和農民斷絕聯系而必須轉向農民的後方、無產階級必須考慮加強和鞏固自己在東方和西方的後備力量時，黨不僅沒有發生分裂，而且轉變時還沒有發生混亂。

這說明黨是無比靈活的，是團結一致的。

這就是我們黨必勝的保證。

去年和今年我們的敵人一直在向我們報喪，說我們黨要瓦解。但是我們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却保全了自己的陣地，掌握了國民經濟的命脈，黨在繼續前進，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而我們的敵人確實在瓦解和破產。同志們，你們大概已經聽說過社會革命黨人不久以前在莫斯科召開代表大會⁽⁵⁾的

事情了。他們的代表大會決定請求我們的代表大會給他們打開我們黨的大門。此外，你們大概已經聽說過關於孟什維主義過去的堡壘格魯吉亞的消息了，這個至少擁有一萬個孟什維克黨黨員的孟什維主義的堡壘已經倒塌了，約有兩千個黨員離開了孟什維克的隊伍。這似乎說明不是我們黨在瓦解，而是他們，是我們的敵人在瓦解。最後，你們大概知道，孟什維主義的一個最忠實最能幹的人馬爾丁諾夫同志離開了孟什維克的隊伍，中央委員會已經接收他入黨了，並且提請代表大會批准。（一部分人鼓掌）同志們，所有這些事實不是說明我們黨內的情況不好，而是說明他們，我們的敵人已經全綫瓦解了，我們黨依然是團結一致的，它經受住了最偉大的轉變，正舉着展開的大旗前進。（熱烈鼓掌多時）

二 關於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的結論

(四月十九日)

同志們！結論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談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工作，因為發言的同志批評了這項工作；第二部分是談中央委員會對組織工作的建議，發言的同志沒有對此提出批評，看來代表大會也是贊同的。

我首先談談對中央委員會的報告的批評。

關於盧托維諾夫。他不滿意我們黨的制度，說我們黨內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合法性，沒有民主。他當然知道，最近六年以來中央委員會籌備代表大會的工作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這樣民主。他知道，在二月全會以後，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立即分赴我們聯邦的各個角落，做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的報告。盧托維諾夫應當知道，我們已經出了四期辯論專頁〔卷〕，拉雜地（的確是拉雜地）分析和解釋了中央委員會的活動。但盧托維諾夫還嫌不夠。他要「真正的」民主，他要求把一切問題，至少是最重要的問題都交給各個支部自下而上地進行討論，他要求全黨干預每一個問題，參加每一個問題的討論。但是，同志們：現在我們執掌着政權，我們至少有四十萬黨員和兩萬個支部，我不知道實行這種

制度會造成怎樣的後果。實行這種制度，我們黨就會變成一個空談不休、不解決任何問題的爭論俱樂部。但是我們黨首先應當是一個行動的黨，因為我們執掌着政權。

此外，盧托維諾夫忘記了雖然我們在聯邦內執掌政權並享有各種合法的優惠權，但是從國際方面來說我們還處於類似一九一二年所經歷的那個時期，當時黨是半合法的，正確些說是不合法的，它有一些合法的環節，例如杜馬黨團、合法的報紙和俱樂部，而且那時黨為敵人所包圍，所以黨竭力設法積蓄自己的力量，以向前推進，擴大合法範圍。目前我們在國際範圍內正處在這樣一個時期。我們被敵人包圍着，——這是大家都知道。包圍我們的帝國主義豺狼並沒有打瞌睡。我們的敵人無時無刻不在想方設法抓住任何一個可以鑽進來危害我們的空隙。沒有根據斷言包圍我們的敵人不在進行什麼封鎖或干涉方面的準備工作。情況就是這樣。在這樣的情況下能不能把一切有關戰爭和平的問題都搬到大街上去呢？要知道，在兩萬個支部大會上討論問題也就是等於把問題搬到大街上去。如果我們把我們對熱那亞會議的全部準備工作都預先搬到大街上去，那會怎樣呢？我們就會完全失敗。應當記住，在我們被敵人包圍的情況下，我方的突然襲擊、出其不意的機動和神速的動作是決定一切的。如果我們不是在受黨委託的一小部分人中間討論我們在洛桑會議上的政策，而是把全部工作搬到大街上去，把自己的意圖和盤托出，那會怎樣呢？敵人就會估計到一切利弊得失，破壞我們的政策，我們就會帶着恥辱離開洛桑。如果我們把有關戰爭和平的問題，把一切重要問題中的最重要的問題預先搬到大街上去——因為，我再說一遍，把問題拿到兩萬個支部裏去討論也就等於把問題

搬到大街上去——那會怎樣呢？我們就會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顯然，同志們，無論從組織上或者從政治上來看，盧托維諾夫的所謂民主是一種幻想，是一種民主的馬尼洛夫精神。這種民主是虛偽而危險的。我們和盧托維諾夫走的不是一條路。

現在來談奧新斯基。他抓住我的一句話：我們必須吸收能獨立思考的人來擴大中央委員會。是的，是的，索凌，是要獨立思考的人，而不是鬧獨立性的人。奧新斯基認為，我在這一點上和奧新斯基、民主集中派〔卷〕有某些一致的地方。我的確說過，必須把能獨立思考的同志補充到中央委員會中去。至於獨立思考什麼，這一點我當時沒有說，因為我知道，在一個主要的演說中把所有的問題都講完是沒有好處的，應當給結論留些話。（笑聲，鼓掌。）在中央委員會裏我們需要有能獨立思考的人，但並不需要離開列寧主義而獨立思考的人，——不，同志們，決不需要這樣的人！我們需要擺脫個人影響，擺脫在中央內部進行鬥爭的習慣和傳統而能獨立思考的人，這種習慣和傳統在我們這裏已經形成，有時還引起中央內部的不安。你們記得列寧同志的那篇文章吧。那篇文章談到我們有分裂的可能。列寧同志在那篇文章中談到的這一點，可能使各級組織認為我們的分裂已在成熟，因此中央委員們一致決定消除可能引起的懷疑，說明中央內部沒有任何分裂，這是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但是中央也說明分裂的可能並沒有消除。這也是完全正確的。近六年來，在中央內部的工作過程中形成了（不能不形成）在中央內部進行鬥爭的某些習慣和傳統，這種習慣和傳統有時造成一種不十分和諧的氣氛。在最近舉行的幾次中央全會中，有一次二月全會使我感覺到這種氣氛，我看出地方上的人的干

預往往決定一切。我們需要不受這些傳統和這些個人影響的支配而能獨立思考的人，以便在他們進入中央委員會時能給中央帶來優良的工作經驗和聯系地方的經驗，並成爲一種水泥，把中央委員會凝結成一個領導我們黨的統一而不可分的集體。我們需要的正是這些擺脫中央內部所形成的舊傳統而能獨立思考的人，因爲他們能把新生的新鮮的成分帶進中央來，鞏固中央並防止中央內部發生分裂的種種可能。我所說的獨立思考的人就是這個意思。

同志們，我不能不理會奧新斯基對季諾維也夫的攻擊。他稱讚斯大林同志，稱讚加米涅夫，但他侮辱季諾維也夫，他認爲目前只要除掉一個人就夠了，以後再挨次除掉其他的人。他採取的方針是先瓦解那個經過多年工作而在中央內部形成的核心，然後再一步一步地逐漸瓦解一切。如果奧新斯基真想追求這樣的目的，如果他真想這樣來攻擊我們中央委員會核心中的某個成員，那我必須警告他，他一定會碰壁的，而且我怕他會碰得頭破血流。

最後，關於穆吉萬。請允許我談談這個整個代表大會已經感到厭煩的問題。他談到中央委員會的動搖不定，他說今天決定把南高加索三個共和國的經濟活動聯合起來，明天做出決議把這些共和國聯合成一個聯邦，後天又決定把所有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成共和國聯盟。他把這叫做中央委員會的動搖不定。這對不對呢？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不是動搖不定，而是整套步驟。各獨立共和國最初是在經濟基礎上接近。這個步驟早在一九二一年就開始了。在各共和國接近的試驗產生良好結果以後，就採取了下一個步驟——聯合成聯邦。特別是像南高加索這樣的地方沒有維護民族和平的事

門機關是不行的。你們知道，南高加索在沙皇時代是韃靼人和阿爾明尼亞人互相殘殺的地方，在木沙瓦特黨人、達什納克黨人和孟什維克時代是發生戰爭的地方。爲了終止這種紛爭，需要一個維護民族和平的機關即說話有力的最高權力機關。要建立這樣的民族和平機關，沒有格魯吉亞民族的代表參加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在經濟活動聯合以後，過了幾個月就採取了下一個步驟，即建立共和國聯邦，過了一年又採取了另一個步驟，即各共和國聯合道路上的最後階段——建立共和國聯盟。這哪裏是動搖不定呢？這是我們民族政策的整套步驟。穆吉萬根本沒有抓住我們蘇維埃政策的實質，雖然他自命爲老布爾什維克。

他提出許多問題，暗示有關南高加索民族問題特別是格魯吉亞民族問題方面的最重要的問題似乎既不是由中央決定的，也不是由個別人決定的。南高加索的基本問題是建立南高加索聯邦的問題。讓我讀一個很短的文件，這個文件可以說明俄共中央制定成立南高加索聯邦的指示的經過。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列寧同志把他草擬的關於成立南高加索聯邦的提議草案寄給我。上面寫道：

「（一）承認建立南高加索共和國聯邦，在原則上是絕對正確的，也是絕對應該實行的，但是立刻實行還爲時過早，就是說，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來進行討論、宣傳，自下而上地推行；

（二）建議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和阿捷爾拜疆中央委員會實現這項決議。」

我寫信給列寧同志建議不要急於這樣做，要等待一下，給地方工作人員一定的時間去推行聯邦

制。我在信裏寫道：

「列寧同志：我不反對你的決議案，如果你同意作如下的修改：把第一條裏的「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來進行討論」改為「需要一定的時間來進行討論」，其他不變。問題在於在格魯吉亞按「蘇維埃方式」在「幾個星期」內「自下而上地」推行」聯邦制是不可能的，因為在格魯吉亞剛剛開始建立蘇維埃。它們還沒有建成。一個月以前還完全沒有蘇維埃，而要在「幾個星期」內在那裏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是不可思議的；可是南高加索聯邦如果沒有格魯吉亞參加就將是一個紙上的聯邦。我認爲要使聯邦制的思想在格魯吉亞廣大羣衆中取得勝利，需要兩三個月的時間。斯大林。」

列寧同志回信說：「我同意這個修改。」

過了一天，列寧、托洛茨基、加米涅夫、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討論通過了這個建議。季諾維也夫沒有出席，莫洛托夫代替了他。可見，這個決定是在一九二一年年底政治局一致通過的。從這時起，以穆吉萬爲首的一批格魯吉亞共產黨員就開始進行反對中央關於成立聯邦的這一指示的鬥爭。同志們，你們可以看到，事情並不像穆吉萬在這裏所描述的那樣。我引用這個文件是爲了反對穆吉萬在這裏所做的那些不體面的暗示。

第二個問題是：黨中央委員會爲什麼要把以穆吉萬爲首的那批同志調回來，原因何在？這裏有兩個主要的、同時也是確鑿有據的原因。這一點我必須加以說明，因爲有人責備中央，其中也責備到我。

第一個原因是穆吉萬集團在格魯吉亞自己黨內沒有威信，它為格魯吉亞共產黨本身所摺棄。這個黨曾經開過兩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二年初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三年初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兩次代表大會上，穆吉萬集團和它的否定聯邦制的思想受到自己黨的堅決的反擊。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好像他在二百二十二票中收羅了大約十八票左右；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他在二百四十四票中收羅了二十票左右；他始終沒有被選入中央委員會，他的觀點不斷遭到否決。第一次，在一九二二年初，我們中央委員會曾對格魯吉亞共產黨施加壓力，並且不願格魯吉亞共產黨的意志追使它接受老同志（毫無疑問，穆吉萬是老同志，馬哈拉澤也是老同志），當時我們認為兩個集團，即多數派和少數派是會協調地進行工作的。可是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到第二次代表大會期間召開了許多次市代表會議和全格魯吉亞代表會議，在每次會議上穆吉萬集團都受到自己黨的打擊，最後，在最近的一次代表大會上，穆吉萬才在一百四十票中勉強收羅到十八票。

南高加索聯邦是一個不僅關係到格魯吉亞而且關係到整個南高加索的組織。通常在格魯吉亞黨代表大會閉幕後緊接着就召開全南高加索代表大會。在這個代表大會上的情況也是這樣。在最近一次全南高加索代表大會上，穆吉萬好像在二百四十四票中勉強收羅到十票左右。事實就是如此。既然黨，既然格魯吉亞組織本身不能容忍穆吉萬集團，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委員會又怎麼辦呢？我知道我們的民族政策是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偏見讓步的政策。這種政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能不能無止境地壓制穆吉萬集團必須在其中工作的黨的意志呢？我認為不能。相反地，必須盡可能使我們的行

動同格魯吉亞黨的意志一致起來。中央就是這樣做的，它把這個集團中的某些成員調回來了。

促使中央調回這個集團中的某些同志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們屢次違反俄共中央的決議。制定聯邦決議的經過我已經向你們談過了；我說過，沒有這個機關，民族和平就不可能實現，只有成立聯邦，南高加索蘇維埃政權才能確立民族和平。因此我們中央認為這個決議是絕對必須執行的。然而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是穆吉萬集團不服從這個決議，不僅如此，它還反對這個決議。這已為捷爾任斯基同志領導的委員會以及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領導的委員會所查明。甚至現在，在三月全會通過了關於格魯吉亞的決定以後，穆吉萬還在繼續反對成立聯邦。這不是玩忽中央的決定又是什麼呢？

迫使黨中央調回穆吉萬的情況就是如此。

穆吉萬把事情描繪成這樣：雖然他被調回，但他仍然勝利了。如果是這樣，那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失敗。不過大家知道，當先哲唐·吉訶德被風車撞傷時他也自認為是勝利者的。我認為在一塊叫做格魯吉亞的蘇維埃領土上工作的某些同志，看來，他們的腦子並不是完全正常的。

現在來談馬哈拉澤同志。他宣稱他是列寧教養出來的民族問題方面的老布爾什維克。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代表會議^(*)上我曾和列寧同志一起對馬哈拉澤同志進行鬥爭。他當時反對民族自決，反對我們的綱領基礎，反對各民族有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他當時持着這種觀點反對黨。後來他改變了自己的觀點（這當然使他很體面），但是，他仍然不應當忘記這件事！他在民族問題方面不是老布爾什維克，而是相當年輕的布爾什維克。

馬哈拉澤同志向我提出了國會式的質問：我是否承認，或者中央是否承認格魯吉亞共產黨人的組織是應當被信任的真正的組織，如果承認，那末中央是否同意這個組織有權提出問題並提出自己的建議。如果承認這一切，那末中央是否認爲在格魯吉亞建立的制度是不能容忍的？

我來回答這個國會式的質問。

當然，中央是信任格魯吉亞共產黨的，否則又信任誰呢？格魯吉亞共產黨是格魯吉亞人民的精華，是格魯吉亞人民的優秀分子，沒有他們就無法管理格魯吉亞。但是每一個組織都是由多數和少數組成的。我們沒有一個組織裏沒有多數和少數。而事實上我們也看到，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是由執行黨的路綫的多數和不經常執行這一路綫的少數組成的。顯然，這裏所說的是信任多數所代表的組織。

第二個問題是：各民族的中央委員會是否有創議即提出問題的權利，它們是否有提出建議的權利？

當然有，這是很明顯的。只是不了解，爲什麼馬哈拉澤同志不給我們提供事實，說明有人不讓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出問題，提出建議和討論建議？我不知道有這樣的事實。我想，如果馬哈拉澤同志真的有這樣的材料，他是會向中央提出的。

第三個問題是：能不能容許格魯吉亞已經建立的那種制度？

可惜，問題提得不具體。是什麼樣的制度呢？如果指的是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格魯吉亞

蘇維埃政權最近已把貴族以及孟什維克和反革命分子逐出他們的老窩，——如果指的是這種制度，那末在我看來，這並沒有什麼不好。這是我們的蘇維埃制度。如果指的是南高加索邊區委員會造成了一種使格魯吉亞共產黨不能發展的條件，那我拿不出這樣的事實。在格魯吉亞共產黨的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以一百一十票對十八票的多數選出的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並沒有向我們提出這些問題。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和我們黨的南高加索邊區委員會工作得非常融洽。如果有一個小集團、一個派別，一句話，如果有黨員對黨的制度不滿，就必須向中央提供有關的材料。在那裏，在格魯吉亞，已經成立了兩個受理這種申訴的委員會，一個是捷爾任斯基領導的委員會，一個是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領導的委員會。如有必要，還可以成立第三個。

關於一年來中央委員會組織工作的結論的第一部分我就這樣結束了。

現在來談第二部分，即關於中央委員會提交代表大會審查的對組織工作的建議。據我所知，發言的同志中間沒有一個人批評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任何一個建議。我認爲，這表明完全贊同我們提交你們審查的中央委員會的那些建議。雖然如此，我還是願意幫忙提出一些意見。我將把這些意見提交中央認爲必須成立的那個組即組織組，這個組的黨方面的主要工作將由莫洛托夫同志負責，蘇維埃方面的主要工作將由捷爾任斯基同志負責。

第一個意見是把候補中央委員的人數從五人至少增加到十五人。

第二個意見是應該特別注意鞏固和擴大上下層的登記分配機關，因爲這些機關目前具有巨大的

頭等重要的意義，因為這是黨掌握經濟方面和蘇維埃機關方面全部脈絡的最實際的辦法。

第三個意見是請代表大會批准在中央委員會下面開辦一所訓練縣委書記的學校的建議，這樣到年底省委員會就能有二百到三百個縣委書記。

第四個意見是關於報刊方面的。我在這方面提不出任何具體的東西，但是，我希望代表大會特別注意把報刊提到應有的高度。報刊正在前進而且已經前進了一大步，但沒有達到應當達到的程度。報刊的成長不應當是與日俱增，而應當是與時俱增，因為這是我們黨最銳利最有力的武器。

最後，關於這次代表大會再說幾句。同志們！我必須說，我很久沒有看到這樣團結一致的、受同一思想鼓舞的代表大會了。很遺憾，列寧同志沒有在這裏。如果他在這裏，他一定會說：「我培養了黨二十五年，現在已經把它培養成一個偉大有力的黨了。」（鼓掌多時）

三 關於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

(四月二十三日)

同志們！自十月革命以來，我們已經是第三次討論民族問題了。第一次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第二次是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第三次就是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這是不是表明我們對民族問題的看法發生了什麼根本的改變呢？不是的，我們對民族問題的根本看法仍然和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後一樣。但是，自第十次代表大會以來，從已經成爲重要的革命後備力量的東方各國的作用日益增長這點來說，國際形勢是改變了。這是第一。第二、自第十次代表大會以來，我們黨的內部狀況因實行新經濟政策也有了某些改變。這一切新的因素必須估計到並加以總結。在這個意義上應當說，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是重新提出了民族問題。

民族問題的國際意義。同志們，你們知道，由於歷史命運的支配，我們蘇維埃聯邦目前是世界革命的先進部隊。你們知道，我們首先突破了整個資本主義戰綫，由於命運的支配，我們走在別人的前面。你們知道，我們在前進中曾經一直走到華沙，後來我們退却了，在我們認爲最牢固的陣地上站穩了腳。從那時起，我們過渡到新經濟政策，從那時起，我們考慮到應當放慢國際革命運動的速度，從

那時起，我們實行的已經不是進攻政策，而是防禦政策了。我們在華沙遭到失敗（不必掩蓋真相）以後，就不能再前進了，因為會有脫離後方的危險，而我們的後方是農民的後方，此外，我們跑得太遠，就有脫離命運所給予我們的革命後備力量即西方和東方的後備力量的危險。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內轉變到實行新經濟政策，對外轉變到實行緩步前進的方針，我們決定必須略事休息，醫治一下自己的創傷，醫治一下先進部隊無產階級的創傷，同農民的後方建立聯系，並繼續在落後於我們的後備力量即西方後備力量和作為世界資本主義主要後方的重要的東方後備力量中進行工作。這些後備力量，這些重要的而且是作為世界帝國主義後方的後備力量，正是我們在討論民族問題時所要談的問題。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們把帝國主義的大後方——東方殖民地國家和半殖民地國家發動起來，使它們革命化，從而加速帝國主義的崩潰；或者我們在這方面遭到失敗，因而鞏固了帝國主義，削弱了我們運動的力量。問題就是這樣擺着的。

問題在於整個東方把我們共和國聯盟看做實驗場。或者我們在這個聯盟範圍內在實踐中正確地解決民族問題，就是說，或者我們在這裏，在這個聯盟範圍內，在各民族之間建立起真正兄弟般的關係，建立起真正的合作，那末整個東方就會看到，我們的聯邦是它的解放的旗幟，是它的先進部隊，它應當跟隨這支部隊前進，——這將是世界帝國主義崩潰的開端。或者我們在這方面犯錯誤，破壞過去被壓迫民族對俄國無產階級的信心，失掉共和國聯盟在東方心目中的吸引力，那末帝國主義就會勝利，我們就會失敗。

民族問題的國際意義就在這裏。

從內部狀況方面來說，民族問題對我們也是很重要的，這不僅因為在數量上過去的統治民族大約有七千五百萬人，其餘的民族大約有六千五百萬人（這畢竟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不僅因為過去的被壓迫民族佔據着經濟發展方面最需要的地區和軍事戰略方面最重要的據點，而首先因為這兩年來我們實行了所謂新經濟政策，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就日益發展，日益猖獗，產生了路標轉換派的思想，出現了通過和平方式建立鄧尼金所未能建立的東西即所謂「統一而不可分的整體」的意圖。

這樣，由於實行新經濟政策，在我們內部生活中正在產生一種新的力量——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這種沙文主義盤踞在我們的機關裏，它不僅透進了蘇維埃機關而且透進了黨的機關，它在我們聯邦的各個角落裏蔓延着，並在形成這樣一種情況：如果我們不堅決回擊這種新的力量，如果我們不把它連根拔掉（新經濟政策的條件在培植它），就會使過去統治民族的無產階級和過去被壓迫民族的農民有分裂的危險，而這就意味着無產階級專政的垮台。

可是新經濟政策不僅在培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而且還在培植地方沙文主義，特別是在有好幾個民族的共和國裏。我指的是格魯吉亞、阿捷爾拜疆、布哈拉和土爾克斯坦部分地區，這些共和國都有好幾個民族，這些民族的先進分子大概不久就要開始互爭雄長。當然，這種地方沙文主義就其力量來說沒有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那樣危險。但它畢竟是一種危險，它會使某些共和國變成民族糾紛的舞臺，會切斷那裏的國際主義聯系。

這就是說明民族問題在一般情況下，特別是在目前時期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一些國際和國內方面的理由。

民族問題的階級實質是什麼呢？在現今蘇維埃發展的條件下，民族問題的階級實質就是在過去統治民族的無產階級和過去被壓迫民族的農民之間建立正確的相互關係。結合問題在這裏已經討論得很充分了，但是根據加米涅夫、加里寧、索柯里尼柯夫、李可夫、托洛茨基等人的報告討論結合問題時，主要涉及的是俄羅斯無產階級對俄羅斯農民的關係。在這裏，在民族問題方面，有更複雜的關係。在這裏，我們涉及的問題，是在過去統治民族的無產階級（它是我們全聯邦無產階級中最有文化的一個階層）和農民（主要是過去被壓迫民族的農民）之間建立正確的相互關係。這就是民族問題的階級實質。如果無產階級能同其他民族的農民建立一種關係，這種關係能夠摧毀對全部俄羅斯人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是數十年來沙皇政府的政策造成的，是它種下的惡根）的一切殘餘，此外，如果俄羅斯無產階級不僅能使無產階級和俄羅斯農民之間，而且使無產階級和過去被壓迫民族的農民之間得到充分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建立真正的聯盟，那末任務就算解決了。爲此，就必須使無產階級政權對於其他民族的農民也像對於俄羅斯的農民一樣是親近的。爲了使蘇維埃政權成爲對其他民族的農民同樣親近的政權，就必須使蘇維埃政權成爲其他民族的農民所了解的政權，它必須使用本族語言辦事，學校和政權機關必須由熟悉非俄羅斯民族的語言、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的本地人組成。只有這些共和國的政權機關用本族語言說話和工作的時候，蘇維埃政權（直到最近還是俄羅斯的政權）才不

僅能够成爲俄羅斯的政權，而且能够成爲各民族的政權，成爲過去被壓迫民族的農民所親近的政權。這就是在一九二三年，特別是在蘇維埃環境下民族問題的基礎之一。

現在，在一九二三年，解決民族問題的特徵是什麼呢？在一九二三年，民族方面需要解決的問題採取的是什麼形式呢？採取的形式是在我們聯邦的各民族之間建立經濟、軍事、政治方面的合作。我指的是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民族問題根本上要解決的任務是在過去統治民族的無產階級和其他民族的農民之間建立正確的關係，而目前所採取的是特殊形式，即在過去被分離而現在聯合在統一國家範圍內的各民族之間建立合作和兄弟般共處的關係。

這就是一九二三年民族問題所採取的形式的實質。

這種國家聯合的具體形式就是共和國聯盟，我們去年年底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就討論過並且建立了這個聯盟。

這個聯盟的基礎是聯盟成員的自願聯合和法律上的平等。所以要做到自願和平等，是因為我們的民族綱領是從各民族有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過去叫做自決權）這一點出發的。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應當肯定地說，任何民族聯盟，任何組成統一國家的民族聯合，如果它不以完全自願爲基礎，如果各民族自己不願意聯合，那是決不能牢固的。第二個基礎是加入聯盟的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這是很容易理解的。現在不談事實上的平等，這個問題我在後面再談，因爲在先進民族和落後民族之間確立事實上的平等是一件很複雜很艱鉅的工作，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我現在談談法律上的平等。

這種平等表現在：加入聯盟的各個共和國，即南高加索、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四個共和國都在同樣程度上享受聯盟的利益，同時也都在同樣程度上爲了聯盟的利益放棄自己的某些獨立的權利。如果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南高加索共和國都不設立外交人民委員部，那就很明顯，撤銷各共和國的外交人民委員部而在共和國聯盟內設立統一的外交人民委員部，必然會使這些共和國原有的獨立受到同等程度的某種限制。很明顯，過去這些共和國都設有自己的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現在爲了在共和國聯盟內設立共同的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就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其他各共和國的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撤銷了，這樣，這些共和國過去充分享有的獨立就受到了某種限制，但是縮小這種獨立是爲了聯盟的共同利益，如此等等。有些人提出了一個純經院式的問題：各共和國在聯合以後是否還是獨立的？這是一個經院式的問題。各共和國的獨立是要受到限制的，因爲任何一種聯合都會使聯合者原有的權利受到某些限制。不過每個共和國都無條件地保留着獨立的基本因素，這至少是因爲每個共和國都有單方面退出聯盟的權利。

總之，在目前，在我們所處的情況下，民族問題的具體形式可歸結爲建立各民族經濟、外交和軍事方面的合作問題。我們應當在這幾方面把這些共和國聯合成一個統一的聯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目前民族問題的具體形式可歸結爲這一點。

但是說話容易做事難。因爲在我們所處的情況下，不僅有許多促進各民族聯合成一個國家的因

素，也有許多阻礙這種聯合的因素。

促進聯合的因素你們是知道的，這首先是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前所確立的並由蘇維埃政權鞏固了的各民族在經濟上的接近，是我們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前所確立的並由我們蘇維埃政權鞏固了的各民族之間的某種分工。這就是促進各共和國聯合成聯盟的基本因素。促進聯合的第二個因素應當認為是蘇維埃政權的性質。這是很容易理解的。蘇維埃政權是工人的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的性質促使聯盟內的各共和國和各民族的勞動者彼此友好相處。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促進聯合的第三個因素就是帝國主義的包圍，共和國聯盟不得不在這種包圍的環境下進行活動。

但是也有妨礙和阻礙這種聯合的因素。我已經說過，阻礙各共和國聯合成一個統一聯盟的主要力量就是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在我國日益發展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同志們，路標轉換派受到大批蘇維埃官僚的擁護決不是偶然的。這決不是偶然的。路標轉換派先生們誇獎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也不是偶然的，他們好像在說：你們盡情談論布爾什維主義吧，盡情談論你們的國際主義趨向吧，不過我們知道，你們是要建立鄧尼金所未能建立起來的東西，你們布爾什維克已經恢復了大俄羅斯思想，或者至少將來要恢復大俄羅斯思想。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這種思想甚至透進了我們黨的某些機關，這也不是偶然的。在二月全會上第一次提出設立第二院的問題時，我親眼看到中央委員中有人發表與共產主義不符的演說，發表了完全違背國際主義的演說。所有這些都是一種時代的現象，都是一種流行病。由此產生的主要危險是：由於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大國沙文主義在我們這裏不是與日俱增而

是與時俱增，它竭力排斥一切非俄羅斯的東西，竭力使一切管理機關都掌握在俄羅斯人手中，並竭力壓制非俄羅斯的東西。主要的危險是：在這種政策下我們有喪失過去被壓迫民族對俄羅斯無產者的信任的危險，這種信任是俄羅斯無產者在十月革命的日子裏取得的，當時他們打倒了地主和俄羅斯資本家，摧毀了俄國內部的民族壓迫，從波斯、蒙古撤出軍隊，宣佈芬蘭、阿爾明尼亞獨立，總之，把民族問題提到了嶄新的基礎上。如果我們大家不武裝起來反對這種新的——再說一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不反對這種正在擴展蔓延，正在一點一滴地滲入我們工作人員的耳目，一步一步地腐蝕我們工作人員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我們就會把十月革命的日子裏所取得的信任喪失無遺。同志們，這種危險我們無論如何要把它剷除掉。否則我們就會有喪失過去被壓迫民族工農的信任的危險，我們就會有使這些民族和俄羅斯無產階級之間的關係破裂的危險，因而我們就會有在我們專政體系中造成裂口的危險。

同志們，不要忘記，我們所以能舉着展開的大旗反對克倫斯基並推翻臨時政府，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我們背後有那些期待俄羅斯無產者來解放它們的被壓迫民族的信任。不要忘記被壓迫民族這樣的後備力量，雖然它們沉默着，但是它們的沉默壓制着和決定着很多東西。人們往往感覺不到這一點，但是這些民族活着，存在着，決不能把它們忘記。不要忘記，如果在高爾察克、鄂尼金、弗蘭格爾和尤登尼奇的後方沒有所謂「異族人」，如果沒有過去被壓迫民族用它們對俄羅斯無產者的那種默默的同情來破壞這些將軍的後方（同志們，默默的同情是我們發展中的一種特殊因素，這種因素誰也看

不到、聽不見，但它決定着一切），如果我們沒有這種同情，那末我們就打不倒這些將軍中的任何一個。當我們向這些將軍進攻的時候，他們的後方便開始瓦解了。爲什麼呢？因爲這些將軍依靠的是哥薩克中的殖民分子，他們在被壓迫民族面前描繪了一幅繼續壓迫它們的遠景，使被壓迫民族不得不投入我們的懷抱，而我們是高舉大旗解放這些被壓迫民族的。這就是決定這些將軍命運的東西，這就是被我軍的勝利所掩蓋了的然而終究還是決定一切的綜合因素。這一點是決不能忘記的。正因爲如此，我們在同新的沙文主義情緒作鬥爭時必須來一個急劇的大轉變，必須當衆揭露我們機關中那些忘記我們在十月革命中所獲得的成果，忘記我們應該珍視的過去被壓迫民族的信任和黨員同志。

應該懂得，如果聽任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這種力量蓬勃發展，猖獗橫行，我們就得不到過去被壓迫民族的任何信任，就不能在統一的聯盟內建立起任何合作，也就沒有任何共和國聯盟。

這就是阻礙各民族和各共和國聯合成統一聯盟的第一個因素，也是最危險的因素。

同志們，妨礙過去被壓迫民族團結在俄羅斯無產階級周圍的第二個因素，是沙皇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各民族事實上的不平等。

我們已經宣佈了法律上的平等，並且正在實現這種平等，這種平等雖然在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發展史上有極重大的意義，但是它畢竟同事實上的平等還相距很遠。所有落後的民族和部族在形式上和我們聯邦內其他一切先進民族享有同等權利。可是不幸的是：有些民族沒有自己的無產者，沒有

經過甚至還沒有開始工業的發展，文化上極端落後，完全沒有力量享用革命給它們的權利。同志們，這是一個比學校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我們有些同志認爲，只要把學校和語言問題放在第一位，問題就解決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單靠學校是無濟於事的，學校本身在發展，語言也在發展，可是事實上的不平等仍然是一切不滿和摩擦的根源。在這裏單靠學校和語言不能解決問題，還需要我們給文化上和經濟上落後的各民族的勞動羣衆以真實的、經常的、真誠的和真正無產階級的幫助。除了學校和語言以外，俄羅斯無產階級必須採取一切辦法在各邊疆地區、在文化上落後的各共和國（它們落後並不是它們自己的過錯，而是人們過去把它們當做原料產地的緣故）內建立工業基地。在這方面已經做了一些嘗試。格魯吉亞已經從莫斯科搬去了一個工廠。這個工廠大概很快就會開工。布哈拉也搬去了一個工廠，而且還可以搬去四個。土爾克斯坦正在搬一個大工廠。總之，一切事實表明，這些在經濟上落後和沒有無產階級的共和國必須在俄羅斯無產階級的幫助下建立自己的工業基地，哪怕是很小的工業基地，以便在這些基地產生一批當地的無產者，使他們成爲俄羅斯無產者和農民同這些共和國勞動羣衆溝通關係的橋梁。因此，我們在這方面應當認真工作，在這裏單靠學校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但是還有阻礙各共和國聯合成一個聯盟的第三個因素，就是各個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新經濟政策不僅對俄羅斯居民，而且對非俄羅斯居民發生作用。新經濟政策不僅使俄羅斯中部的私營工商業，而且使各個共和國的私營工商業得到發展。正是這個新經濟政策本身和同它相聯系的私人資本使格

魯吉亞、阿捷爾拜疆、烏茲別克等地的民族主義發育滋長。當然，如果沒有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這種沙文主義是進攻性的，因為它現在很強大，過去也很強大，它還保存着壓迫人和鄙視人的習慣），那末地方沙文主義（這是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答覆）也許只會有最小限度的、極微小的表現，因為歸根到底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只是一種防禦性的形式，只是一種反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畸形的防禦形式。如果這種民族主義只是防禦性的，那就用不着爲它喊叫了。那就可以集中自己活動的全部力量和鬥爭的全部力量來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並且相信只要打垮這個強敵，也就會接着打垮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因為這種民族主義，再說一遍，歸根到底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反應，是對它的答覆，是一種防禦。是的，如果各地的反俄羅斯民族主義只不過是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反應，那末情形確實是如此。可是不幸的是：在某些共和國裏，這種防禦性的民族主義正在變成進攻性的民族主義。

就拿格魯吉亞來說。那裏百分之三十以上是非格魯吉亞居民，其中有阿爾明尼亞人、阿布哈茲人、阿札里人、沃舍梯人、韃靼人。爲首的是格魯吉亞人。在格魯吉亞一部分共產黨員中間產生了並且正在發展着一種不大重視這些小民族的思想，認爲他們文化較低，不太發達，可以不必重視他們。這是一種沙文主義，有害而危險的沙文主義，因為它可以把小小的格魯吉亞共和國變成糾紛的舞台。而且已經把它變成糾紛的舞台了。

再拿阿捷爾拜疆來說。主要是阿捷爾拜疆族，可是也有阿爾明尼亞人。在部分阿捷爾拜疆人中

間也有這樣的傾向，這種傾向有時很露骨，他們認爲阿捷爾拜疆人是土著居民，而阿爾明尼亞人是外來的，因此可以把他們放到較次要的地位，不必重視他們的利益。這也是沙文主義。這種沙文主義會破壞民族平等這個蘇維埃政權的基礎。

、再拿布哈拉來說。在布哈拉那裏有三個民族：烏茲別克人，是主要民族；土爾克明人，從布哈拉的沙文主義觀點看來，是一個「次要」的民族；柯爾克茲人。在那裏柯爾克茲人很少，看來也是「次要」的民族。

花刺子模的情況也是這樣，那裏有土爾克明人和烏茲別克人。烏茲別克人是主要民族，土爾克明人是「次要」的民族。

這一切都導致衝突，導致蘇維埃政權的削弱。這種地方沙文主義傾向也是應當根除的。當然，同在民族問題總體系中佔四分之三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比較起來，地方沙文主義並不那麼嚴重，但是，它對於當地的工作、當地的居民和各民族共和國本身的和平發展却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這種沙文主義有時會發生很有趣的演變。我指的是南高加索。你們知道，南高加索是由包括十個民族的三個共和國組成的。南高加索早就是一個互相殘殺和糾紛的舞台，後來，在孟什維主義和達什納克黨人統治時期，又成了戰爭的舞台。格魯吉亞和阿爾明尼亞的戰爭你們是知道的。一九〇五年年初和年底在阿捷爾拜疆發生的互相殘殺你們也是知道的。我可以舉出許多地區佔多數的阿爾明尼亞人把其餘的韃靼居民殺光的事實，例如贊格祖爾。還可以拿另一個省份——納希切萬做例子。那

邊鞑靼人佔優勢，他們把所有的阿爾明尼亞人都殺光了。這正是在阿爾明尼亞和格魯吉亞掙脫帝國主義枷鎖以前發生的。（有人喊道：『這是他們解決民族問題的辦法。』）當然，這也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種方式。但這不是蘇維埃的解決方式。這種民族之間互相仇視的情況當然和俄羅斯工人無關，因為互相鬥爭的是鞑靼人和阿爾明尼亞人，俄羅斯人並沒有參加。正因為如此，必須在南高加索設立一個能調整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專門機關。

可以大胆地說，過去統治民族的無產階級和其餘一切民族的勞動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要佔整個民族問題的四分之三。而過去被壓迫民族的相互關係問題則僅佔這個問題的四分之一。

在這種互相不信任的環境裏，如果蘇維埃政權不能在南高加索設立一個可以調解摩擦和衝突的民族和平機關，那末我們就會回到人們互相燒殺的沙皇統治時代或達什納克黨人、木沙瓦特黨人、孟什維克的時代。正因為如此，中央曾三次確認有必要保存南高加索聯邦這個維護民族和平的機關。

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有這樣一批格魯吉亞共產黨員，他們不反對格魯吉亞同共和國聯盟聯合，但是，他們反對通過南高加索聯邦實行這一聯合。你們看到沒有，他們願意跟聯盟更接近些，他們說在我們格魯吉亞人和共和國聯盟之間不需要南高加索聯邦這樣的中間物，說聯邦是多餘的。這聽起來似乎很革命。

但這是別有用心。第一、這種論調表明，在格魯吉亞，同俄羅斯人的關係在民族問題方面僅有次要意義，因為這些傾向分子同志（大家都這樣稱呼他們）絲毫不反對格魯吉亞直接同聯盟聯合，也

就是說，他們並不害怕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認為它反正是要被砍倒的，或者它是沒有決定意義的。顯然，他們更害怕南高加索聯邦。爲什麼呢？爲什麼過去廝殺很久、互相殘殺、互相掠奪的南高加索三個主要民族，在現在，在蘇維埃政權終於在它們之間建立了聯邦這種兄弟般的聯盟關係的時候，在這個聯邦已結出良好的果實的時候，一定要切斷這種聯邦關係呢？同志們，原因何在呢？

原因在於南高加索的聯邦關係使格魯吉亞喪失了因地理位置可以獲得的那些特權。請你們自己判斷吧。格魯吉亞有自己的港口——巴士姆，從這裏可以輸入西方的商品；格魯吉亞有梯弗里斯這樣的鐵路樞紐站，這是阿爾明尼亞人的必經之路，同時也是阿捷爾拜疆從巴士姆取得商品的必經之路。如果格魯吉亞是一個單獨的共和國，如果它不加入南高加索聯邦，那它就可以向不能不利用梯弗里斯的阿爾明尼亞和不能不利用巴士姆的阿捷爾拜疆提出某種小小的最後通牒。這對格魯吉亞是有一些好處的。人所共知的粗暴的邊防法令正是格魯吉亞制定的，這並不是偶然的。現在人們把這一過錯推在謝烈布利雅柯夫身上。就算是他的過錯吧，但是要知道這項法令是在格魯吉亞產生的，而不是在阿捷爾拜疆或阿爾明尼亞產生的。

其次，這裏還有另一個原因。梯弗里斯是格魯吉亞的首都，但是那裏的格魯吉亞人不超過百分之三十，而阿爾明尼亞人不下於百分之三十五，其次是其他民族。你們看，這就是格魯吉亞首都的情況。如果格魯吉亞是一個單獨的共和國，那就可以遷走一些居民，比如說，把阿爾明尼亞人從梯弗里斯遷走。格魯吉亞曾經通過一項人所共知的「調整」梯弗里斯人口的法令，據馬哈拉澤同志說，這項

法令並不是用來對付阿爾明尼亞人的。遷走一些居民的目的就是使梯弗里斯的阿爾明尼亞人逐年少於格魯吉亞人，從而把梯弗里斯變成真正的格魯吉亞首都。即使他們取消了關於遷徙的法令。可是他們還有許多辦法，許多靈活的方式（例如「疏散」），依靠它們就可以在遵守國際主義的幌子下使梯弗里斯的阿爾明尼亞人減少。

這就是格魯吉亞傾向分子不願意丟掉的一些地理上的有利條件和格魯吉亞人在梯弗里斯因人數比阿爾明尼亞人少而處的不利地位，這些情況促使我們的傾向分子為反對聯邦而鬥爭。孟什維克曾經毫無顧忌地把阿爾明尼亞人和韃靼人逐出梯弗里斯。而現在，在蘇維埃政權下，不能再驅逐了，所以就要退出聯邦，那時將獲得法律上的可能單獨進行一些活動，就能充分利用格魯吉亞人的有利地位來對付阿捷爾拜疆和阿爾明尼亞。這樣一來，就會造成格魯吉亞人在南高加索內部的特權地位。全部危險就在這裏。

我們能不能忽視南高加索民族和平的利益而創造一種使格魯吉亞人對阿爾明尼亞和阿捷爾拜疆兩共和國處於特權地位的條件呢？不，我們不能容許這樣做。

有一種舊的管理民族的特別制度，就是資產階級政權籠絡一些民族，給它們特權，鄙視其餘的民族，不肯同它們打交道。這樣，它籠絡了一個民族，就可以通過它去踐踏其餘的民族。例如奧地利就是這樣做的。大家還記得奧地利的一個部長貝斯特的言論吧，他把匈牙利的的一個部長請去說：『你管你們的一羣，我來對付我們的一羣。』這就是說，你壓榨和踐踏你們匈牙利的民族，我來踐踏我們奧

地利的民族。你和我都是特權民族，讓我們來踐踏其餘的民族。

奧地利也是這樣對待國內的波蘭人的。奧地利人籠絡波蘭人，給他們特權，使波蘭人幫助奧地利人鞏固他們在波蘭的陣地，因此讓波蘭人有可能扼殺加里西亞。

分出幾個民族，給它們特權，以便對付其餘的民族，這種制度是一種特殊的純粹奧地利式的制度。從官僚制度的觀點來看，這是一種『經濟的』管理方式，因為這只要同一個民族打交道就夠了；但是從政治的觀點來看，這必然招致國家的滅亡，因為破壞民族平等原則，容許一個民族有某些特權，就是置自己的民族政策於死地。

現在英國也完全是這樣管理印度的。爲了從官僚制度的觀點來更容易地對付印度的各民族和各部落，英國把印度劃分爲英屬印度（二億四千萬人口）和土著印度（七千二百萬人口）。爲什麼呢？因爲英國想分出一部分民族，給它們特權，以便於管理其餘的民族。印度有幾百個民族，於是英國決定：與其同這些民族打交道，不如分出幾個民族，給它們某些特權，通過它們來管理其他民族，因爲第一、在這種情況下，其餘民族的不滿就會針對這些特權民族，而不會針對英國；第二、同兩三個民族『打交道』要合算些。

這也是一種管理制度，英國式的管理制度。這種制度會造成什麼結果呢？會使機關『省錢』，這是對的。但是，同志們，如果撇開官僚主義的方便不說，那末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就必然死亡，在這種制度下英國的管理和英國的統治都必然死亡，正如二乘二等於四一樣。

我們的同志，格魯吉亞的傾向分子正在把我們推上這條危險的道路，因為他們違反黨的一切規章反對聯邦，因為他們想退出聯邦以保持他們的有利地位。他們把我們推上給他們某些特權而犧牲阿爾明尼亞和阿捷爾拜疆兩共和國的利益的道路。我們不能走這條道路，因為這必然會使我們的全部政策和南高加索的蘇維埃政權死亡。

我們格魯吉亞的同志已經覺察到了這個危險，這不是偶然的。這種格魯吉亞的沙文主義對阿爾明尼亞人和阿捷爾拜疆人採取了攻勢，使格魯吉亞共產黨感到不安。格魯吉亞共產黨自公開以來召開過兩次代表大會，每次都一致否決了傾向分子同志們的觀點，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在目前條件下，不建立南高加索聯邦，就無法在高加索維護和平和建立平等。決不容許一個民族比另一個民族享有更多的特權。我們的同志已經覺察到這一點。這就說明為什麼穆吉萬集團鬥爭了兩年還只是一小撮人，而且常常為格魯吉亞共產黨所擯棄。

列寧同志那樣着急和那樣堅持立即成立聯邦，也不是偶然的。我們中央曾三次確認建立南高加索聯邦的必要性，這個聯邦要有自己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執行機關，它的決定各共和國必須執行，這也不是偶然的。捷爾任斯基同志領導的以及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領導的兩個委員會到莫斯科以後說非成立聯邦不可，這也不是偶然的。

最後，『社會主義通報』(卷)的孟什維克對我們的傾向分子同志反對聯邦的鬥爭大加稱讚，並對他們愛護備至，這也不是偶然的，因為他們臭味相投。

現在來分析一下我們必須用來克服阻礙聯合的三個因素——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各民族事實上的不平等、地方民族主義（特別是當它變成沙文主義的時候）的手段或方法。在能够幫助我們無痛苦地剷除全部阻礙各民族接近的舊遺產的手段中，我提出三個來談談。

第一個手段是採取一切辦法使各共和國的蘇維埃政權成爲人們所了解和親近的政權，使它不僅成爲俄羅斯的政權，而且成爲各民族的政權。爲此就必須不僅使學校，而且使一切機關，一切黨的機關和蘇維埃機關逐步民族化，使用羣衆所懂得的語言，在適合本民族生活習慣的條件下進行工作。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才有可能把蘇維埃政權從俄羅斯的政權變成各民族的政權，變成所有共和國特別是那些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落後的共和國的勞動羣衆所親近、了解和愛戴的政權。

第二個能够有助於我們無痛苦地剷除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所留下的遺產的手段，就是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部應當這樣來組織：至少使各個主要民族在部務會議中都有自己的人參加，造成一種使各個共和國的需要和要求都能無條件得到滿足的環境。

第三個手段是必須在我們的中央最高機關中設立一個能够反映所有的共和國和民族的需要和要求的機關。

我希望你們特別注意最後這一點。

如果我們能在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內設立兩個平等的院，第一院由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不分民族，第二院由各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選出（各共和國的代表人數相等，各民族地區的代表人數

也相等)，並由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批准，我想那時我們的最高機關就能不僅反映所有勞動者的階級利益，而且反映純粹民族的需求。這樣我們就會有一個能反映共和國聯盟境內各民族、各部落和各部落特殊利益的機關。同志們，聯盟總共不下一億四千萬人，其中約有六千五百萬是非俄羅斯人，在這種條件下，如果在這裏，在莫斯科，在最高機關內沒有這些民族派來的代表，沒有這種不僅反映整個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而且反映特殊的獨特的民族利益的代表，那就不可能管理這樣的國家。同志們，沒有這個條件就不可能進行管理。沒有這種晴雨表，沒有這種能夠表達各個民族特殊需要的人，就不可能進行管理。

有兩種管理國家的方式：一種方式是使機關「簡單化」，比如說，以一個集團或一個人為首領，他的耳目是各地的省長。這是最簡單的管理形式，在這種形式下，首領依靠從省長那裏能夠得到的消息管理國家，他拿一種希望來安慰自己，希望自己是真誠而正確地管理國家的。後來發生摩擦，摩擦轉為衝突，衝突又轉為起義。然後起義被鎮壓下去。這種管理制度不是我們的制度，雖然它很簡單，但是代價太大。還有另一種管理制度，即蘇維埃制度。我們在蘇維埃國家內實行的是另一種管理制度，這種管理制度使人們能準確地預測農民、少數民族、所謂「異族人」和俄羅斯人的一切變化、一切情況，使最高機關系統內有許多晴雨表可以預測各種變化，估計和預防巴斯馬奇運動(Басмачи)、土匪騷動、喀琅施塔得叛亂以及一切可能的風暴和不幸。這就是蘇維埃的管理制度。它所以叫做蘇維埃政權，人民政權，是因為它依靠的是最下層的羣衆，它能最先覺察到各種變化，如果路線被歪曲，它就能採取

相應的措施及時糾正路綫，它能進行自我批評糾正路綫。我們的最高機關系統內有能够徹底反映民族需要和要求的。

有一種反對意見，認爲這種制度將使管理工作複雜化，我們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又要分成兩部分。這有什麼辦法呢。人執政，給他一些省長。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後已經不能再做可以促進管理工作，使一切管理工作大大蘇維埃化。正因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內設立一個專門機關——第二院，因爲這是我不是說，這是聯盟各族人民之間合作的完善形式。我將不止一次地提出民族問題，因爲國內和國際的情況在變化有這樣的情況：如果經驗證明某些人民委員部合併後產生國聯盟內的某些人民委員部重新分開。不過有一點是很明顯我們還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和其他更適宜的機關。除了設立其他辦法來成立能够反映各個共和國內部的一切動態和一切不言而喻，第二院內不僅應當有這四個已經聯合起來的因爲這不僅與已經正式聯合起來的四個共和國有關，而且還

因此我們必須有一種能够反映所有民族和共和國的需求的形式。

同志們，我來概括地談一談。

總之，民族問題的重要性是由新的國際形勢決定的，是由下面的事實決定的：我們必須在這裏，在俄國，在我們聯邦內正確地模範地解決民族問題，以便給東方的那些重要的革命後備力量做出榜樣，從而增強它們對我們聯邦的信心和嚮往。

從內部狀況來說，新經濟政策的條件、日益猖獗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和地方沙文主義也都使我們不得不強調民族問題的特殊重要性。

其次，我說過，民族問題的實質就是在過去統治民族的無產階級和過去被統治民族的農民之間建立正確的關係，從這個觀點來看，目前民族問題的具體形式就是尋求在共和國聯盟內、在統一的國家內建立各族人民合作的途徑和手段。

其次，我談過促進這種民族接近的各種因素。我也談過阻礙這種聯合的各種因素。我特別談到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認為它是一種日益猖獗的力量。這種力量是主要的危險，因為它能破壞過去各被壓迫民族對俄羅斯無產階級的信任。這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我們必須把它打倒，因為打倒了它就是把某些共和國內過去保存下來的、現在正在發展的民族主義打倒十分之九。

其次，我們還面臨着一種危險，就是有一些同志會把我們推上給一些民族特權而損害其他民族的利益的道路。我已經說過，我們不能走這條道路，因為它會破壞民族和平，摧毀其他民族羣衆對蘇

維埃政權的信任。

其次，我說過，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設立第二院是使我們可能最無痛苦地剷除這些阻礙聯合的因素的主要手段。關於第二院我在中央二月全會上談得比較露骨，而在提綱中談得比較含蓄，目的是使同志們也許有可能找出其他更靈活的方式，找出其他能反映各民族利益的更適當的機關。

結論就是這樣。

我認爲，只有走這條道路，我們才能正確地解決民族問題，才能高舉無產階級革命的大旗，才能把在未來的無產階級同帝國主義的搏鬥中將起決定作用的重要革命後備力量——東方各國的同情和信任集合在這一旗幟的周圍。（鼓掌）

四 關於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的結論

(四月二十五日)

同志們！在報告民族問題組的工作以前，請允許我先對那些就我的報告、就兩個主要問題發言的人提出反對意見。大約至多只要二十分鐘就够了。

第一個問題是以布哈林和拉柯夫斯基爲首的一些同志過分強調了民族問題的意義，誇大了民族問題，並且因民族問題而忽視社會問題，即工人階級的政權問題。

我們共產黨員看得很清楚，我們全部工作的基礎是鞏固工人政權的工作，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能談另一個問題——民族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它是從屬於前一問題的。有人對我們說，不能委屈少數民族。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同意這一點，不應當委屈少數民族。但是如果因此而創造出一種新的理論，說必須使大俄羅斯無產階級在對過去被壓迫民族的關係上處於不平等的地位，——那就是胡說八道了。在列寧同志的一篇著名論文中只是文字上的一種表現方法，布哈林竟把它變成了完整的口號。可是很明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基礎首先而且主要是中部地區即工業地區，而不是邊疆地區即農民地區。如果我們矯枉過正地偏向農民的邊疆地區而損害無產階級地區的利

益，那就造成無產階級專政體系的裂痕。同志們，這是危險的。在政策上既不能過左，也不能過右。應當記住，除了民族自決權以外，還有工人階級鞏固自己政權的權利，自決權從屬於後一權利。有時候會發生自決權同另一個權利，即同最高權利——執政的工人階級鞏固自己政權的權利相抵觸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直截了當地說——自決權不能而且不應當成爲工人階級實現自己專政權利的障礙。前者必須向後者讓步。例如一九二〇年的情況就是這樣，當時我們爲了保衛工人階級的政權，不得不進軍華沙。

因此，在對各少數民族許下種種諾言的時候，在奉承各民族代表的時候，如像某些同志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那樣，不應當忘記，應當記住：在我們國內外條件下，民族問題的活動範圍和所謂管轄範圍要受制於「工人問題」這個一切問題中的基本問題的活動範圍和管轄範圍。

許多人引證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札記和論文中的話。我本來不想引證我的導師列寧同志的話，因爲他不在這裏，我怕可能引證得不正確，不恰當。然而我必須引證一段已成爲公理的不會引起任何誤解的話，以便使同志們對於民族問題所佔的比重不發生懷疑。列寧同志在論民族自決權這篇論文中分析馬克思關於民族問題的一封信時，做了這樣的結論：

「民族問題和「工人問題」比較起來，只有從屬的意義，這在馬克思看來是無可置疑的。」（七）這裏總共只有一行字，但是它解決了一切問題。這是某些熱心過度的同志應當牢牢記住的。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和地方沙文主義問題。拉柯夫斯基和布哈林都在這裏發了

言，特別是布哈林，他建議刪去關於地方沙文主義危害性的那一點。他們說用不着為地方沙文主義這樣的蛆蟲操心，因為我們有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這樣的「歌利亞」^①。一般說來，布哈林有懺悔的情緒。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幾年來一直否認自決權，對民族有罪，現在該是他懺悔的時候了。可是他在懺悔之後，又走上了另一個極端。奇怪的是布哈林竟號召黨也仿效他的榜樣來懺悔，雖然全世界都知道，這和黨毫不相干，因為黨一成立（一八九八年）就承認自決權，因此它沒有什麼可懺悔的。問題在於布哈林不了解民族問題的實質。當人們說在民族問題上必須把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鬥爭放在首位的時候，那是想指出俄羅斯的共產黨員的義務，想說明俄羅斯的共產黨員有同俄羅斯的沙文主義進行鬥爭的義務。如果從事反對俄羅斯沙文主義鬥爭的不是俄羅斯的共產黨員而是土爾克斯坦或格魯吉亞的共產黨員，那末這種鬥爭就會被認為是反俄羅斯的沙文主義了。這會把全部事情弄糟，並且會使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變本加厲。只有俄羅斯的共產黨員才能從事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鬥爭，並把它進行到底。

當人們建議同地方沙文主義進行鬥爭的時候，那是想說明什麼呢？那是想指出地方共產黨員的義務，指出非俄羅斯共產黨員有同自己的沙文主義進行鬥爭的義務。難道能否認反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存在的事實嗎？要知道，整個代表大會親眼看到，地方的沙文主義，即格魯吉亞、巴什基里亞等等的沙文主義存在着，需要同它進行鬥爭。俄羅斯的共產黨員不能同鞑靼的、格魯吉亞的、巴什基里亞的沙文主義進行鬥爭，因為如果俄羅斯的共產黨員担负起反對鞑靼的或格魯吉亞的沙文主義鬥

爭的艱鉅任務，那末這一鬥爭就會被認為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反對韃靼人或格魯吉亞人的鬥爭。這會把全部事情弄糟。只有韃靼、格魯吉亞等等的共產黨員才能反對韃靼、格魯吉亞等等的沙文主義，只有格魯吉亞的共產黨員才能順利地同自己的格魯吉亞的民族主義或沙文主義進行鬥爭。這就是非俄羅斯共產黨員的義務。正因為如此，在提綱中必須指出兩方面的任務，即俄羅斯共產黨員的任務（我指的是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鬥爭）和非俄羅斯共產黨員的任務（我指的是他們反對反阿爾明尼亞的、反韃靼的、反俄羅斯的沙文主義的鬥爭）。否則提綱就是片面的，不論在國家建設中或黨的建設中都沒有任何國際主義。

如果我們只是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進行鬥爭，那末這一鬥爭就會遮蓋住韃靼等等沙文主義者所進行的鬥爭。後一種鬥爭正在各地展開，而且在現在，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是特別危險的。我們不能不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只有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一方面同我們建設工作中的主要危險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作鬥爭；另一方面同地方沙文主義作鬥爭——我們才能取得勝利，不進行這兩方面的鬥爭，俄羅斯的工農和其他民族的工農之間就不會有任何團結。不這樣，就會助長地方沙文主義的氣焰，造成獎勵地方沙文主義的政策，這是我們不能容許的。

讓我在這裏引證一下列寧同志的話。我本來不想這樣做，但是因為在我們的代表大會上有許多同志隨便引證列寧同志的話，歪曲了他的話，那就讓我來讀一下列寧同志的一篇人所共知的論文中的幾句話：

「無產階級應當要求被「它的」民族所壓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離的自由。不這樣，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就仍然是一句空話，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和壓迫民族的工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和階級團結就不可能實現。」^[2]

這可以說是統治民族或過去統治民族的無產者的義務。其次，列寧談到過去被壓迫民族的無產者或共產黨員的義務時說：

「另一方面，被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必須特別堅持和實現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和壓迫民族的工人之間的無條件的（包括組織上的）大團結。否則在資產階級的各式各樣的詭計、叛變和欺騙下就不可能捍衛住無產階級的獨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因為各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經常把民族解放的口號變成欺騙工人的手段。」

可見，如果要追隨列寧同志前進（在座的有些同志是向他宣過誓的），那就必須把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作鬥爭和同地方沙文主義作鬥爭這兩個提綱保留在決議案中，並把它們看做一種現象的兩個方面，看做同沙文主義作鬥爭的提綱。

我就以此結束我對發言人提出的反對意見。

其次，讓我來報告一下民族問題組的工作。民族問題組採納了中央的提綱作為決議的基礎。它未加修改地保留了這個提綱中的六點：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各點。組內首先在下面這個問題上展開了爭論：是否應該先把各自治共和國從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分出

去，再把高加索各獨立共和國從南高加索聯邦內分出去，讓它們分別加入共和國聯盟。這個建議是格魯吉亞的一部分同志提出的，大家知道，這個建議並沒有得到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和阿捷爾拜疆的代表團的支持。民族問題組討論了這個問題，絕大多數主張保留提綱中所發揮的那個論點，就是說，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應該是一個完整的單位，南高加索聯邦也應該是一個完整的單位，它們就用這種形式加入共和國聯盟。格魯吉亞的這一部分同志提出的建議並沒有一一進行表決，因為提這些建議的人看到他們的建議沒有得到支持就把它們撤回了。在這個問題上，爭論是激烈的。

展開爭論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如何組織第二院的問題。一部分同志（少數）建議第二院不應當由各共和國、各民族和各地區的代表組成；而應當只由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高加索聯邦、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這四個共和國的代表來組成。多數否決了這個建議，民族問題組也反對這個建議，認為這樣來設立第二院比較適當；根據平等原則各共和國（不管是獨立的還是自治的）和各民族地區都有代表參加。現在我不想陳述理由，因為這少數人的代表拉柯夫斯基將在這裏發言論證他的那個在組內沒有通過的建議。等他發表了意見，我再來談我的看法。

對是否應當給提綱加進一個修改意見，即指出在解決民族問題時必須不僅指靠東方而且指靠西方的問題，也進行了不很激烈的爭論。民族問題組對這個修改意見進行了表決。這個少數人的修改意見就是拉柯夫斯基的修改意見。民族問題組否決了這個修改意見。等拉柯夫斯基發表意見以後，我還要談這個問題。

現在我來讀一下我們已經採納的那些修改意見。前六點我們是無條件地採納了。在第七點第二段第三行『因此堅決反對』這幾個字前面加進下面一段話：

『若干民族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阿捷爾拜疆和土爾克斯坦）內的情況所以日益複雜，是因為作為蘇維埃政權主要支柱的工人階級的很大一部分屬於大俄羅斯民族。在這些地區內，城鄉之間的結合、工農之間的結合受到黨的機關和蘇維埃機關內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殘餘的極大阻撓。在這種情況下，談論俄羅斯文化的優越性和提出水平較高的俄羅斯文化必然戰勝較落後民族的（烏克蘭的、阿捷爾拜疆的、烏茲別克的、柯爾克茲等等的）文化的論點，無非是企圖鞏固大俄羅斯民族的統治。』

我所以採納這個修改意見，是因為它可以使提綱更加完善。

第二個修改意見也是關於第七點的。在『否則就沒有根據指望』這句話前面加進下面一段話：

『這種幫助首先應當表現在：採取一系列實際措施在過去被壓迫民族的共和國內建立工業基地，並且盡量吸引當地居民參加這一工作。最後，根據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這種幫助應當同勞動羣衆反對當地的和外來的上層剝削分子（這種剝削分子因實行新經濟政策而日益增多），爭取鞏固自己的社會陣地的鬥爭相輔而行。因為這些共和國多半是農業地區，所以內部的社會措施首先應當沿着把國有的閒置土地分給勞動羣衆這條道路前進。』

下面還是關於第七點的。在第二段中間講到格魯吉亞、阿捷爾拜疆等等的沙文主義的地方加進

『阿爾明尼亞等等的沙文主義』幾個字。阿爾明尼亞的同志希望不要委屈阿爾明尼亞人，希望也提到他們的沙文主義。

其次，在提綱的第八點『統一而不可分的整體』幾個字後面插進下面一段話：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某些主管機關企圖使各自治共和國的獨立的委員部也受它們的管轄並為撤銷這些委員部開闢道路，這也應該認為是舊遺產帶來的一種後果。』

其次，在第八點插進下面一句話：

『並宣佈各民族共和國有存在和進一步發展的絕對必要性。』

其次是第九點。開頭的幾句話應當是：

『各共和國的工人和農民根據平等和自願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共和國聯盟，是無產階級在調整各獨立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方面所做的第一次實驗，也是建立未來的全世界蘇維埃勞動共和國的第一個步驟。』

第十點有一個『甲』項，在『甲』項前面插進一個『甲』項，其內容如下：

『(甲)在設立聯盟中央機關時，必須保證各共和國在它們的相互關係上和對聯盟中央權力機關的關係上，權利和義務一律平等。』

其次，把原來『甲』項的內容作為『乙』項的內容：

『(乙)在聯盟最高機關系統內，根據平等原則設立一個代表所有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地區的專門

機關，並盡可能考慮到使這些共和國內一切民族都有代表參加。」

其次，把原來「乙」項的內容作為現在「丙」項的內容：

「（丙）聯盟執行機關應根據下述原則建立：保證各共和國都有代表實際參加並滿足聯盟內各民族的需要和要求。」

其次，增加「丁」項：

「（丁）賦予各共和國相當廣泛的財政權（其中包括預算權），以保證它們能夠發揮自己在國家行政、文化和經濟方面的主動性。」

其次，把原來的「丙」項當作「戊」項：

「（戊）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的機關主要應由熟悉各該民族的語言、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的當地人組成。」

其次，另外增加一項，作為「己」項：

「（己）頒佈特別法令，在為當地居民、民族居民和少數民族服務的一切國家機關和一切機構內，保證使用本民族語言；頒佈法律，對一切侵犯民族權利，特別是少數民族權利的人，用最嚴厲的革命手段予以追究和懲治。」

其次，增補一項「庚」：

「（庚）加強紅軍的教育工作，以聯盟各族人民友愛和團結的思想教育紅軍，採取實際措施組織

民族部隊，遵行各項爲保證各共和國有充分國防力量而必需的措施。」

這就是民族組所採納的各項補充，我不反對這些補充，因爲它們可以使提綱更加具體。

至於第二部分，並沒有作比較重大的修改。有一些不大的修改，民族問題組所選出的委員會決定把它們轉交下屆中央委員會。

因此，第二部分仍照原來印發的材料，沒有改動。

五 對決議案的修改意見的答覆

(四月二十五日)

雖然拉柯夫斯基把他在組內所提出的那個決議案改動了三分之二，刪去了四分之三，可是我仍然堅決反對他的修改意見，理由如下。我們的民族問題提綱是這樣擬定的：我們是面向東方，注意的是東方那些打瞌睡的重要的後備力量。我們是把整個民族問題和伊里奇的文章聯系起來的，伊里奇似乎一個字也沒有談到西方，因為民族問題的中心不是在那裏，而是在東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拉柯夫斯基要我們在轉向東方的同時也轉向西方。但是，同志們，這是不可能的，是反常的，因為人們通常總是不面向這一方，就面向另一方；在同一個時間內要面向兩方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而且也不應該破壞提綱的總的精神，破壞它的面向東方的精神。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必須否決拉柯夫斯基的修改意見。

*

*

*

我認為這個修改意見就其意義來說是帶根本性的。如果代表大會通過這個修改意見，那我必須說，提綱就完全本末倒置了。拉柯夫斯基建議根據各個國家聯合都有代表參加的原則來設立第二院。

他認為烏克蘭是一個國家聯合，而巴什基里亞不是。爲什麼呢？要知道我們現在還沒有撤銷各共和國的人民委員會。難道巴什基里亞中央執行委員會不是國家機關嗎？爲什麼巴什基里亞不是一個國家呢？難道烏克蘭加入聯盟以後就不再是一個國家了嗎？國家拜物教把拉柯夫斯基弄糊塗了。如果各民族有平等的權利，如果它們有自己的語言、風俗、生活方式和習慣，如果這些民族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那末所有這些民族就都是國家聯合，這難道還不明白嗎？我認爲我們應該堅持一個觀點，即各共和國和各民族特別是東部各民族在第二院的地位是平等的。

看來，拉柯夫斯基迷戀於普魯士的聯邦制。德意志聯邦是根據國家之間完全沒有平等的原則建立的。我建議除了階級代表機關，即除了全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選出的第一院以外，我們還要根據平等原則建立一個民族代表機關。東部各民族同中國、印度有機地联系着，它們在語言、宗教和習慣等方面同這些國家是有聯系的，因此，它們對於革命是極重要的。這些小部族的重要性比烏克蘭大得多。

如果我們在烏克蘭犯一個小錯誤，這對東方影響並不大。但是只要是在阿札里斯坦（十二萬人口）這樣一個小國內犯一個小錯誤，那就會影響到土耳其，影響到整個東方，因爲土耳其和東方有極密切的聯系。只要在同西藏和中國接壤的卡爾梅克人的小地區內犯一個小錯誤，那對我們工作所起的壞影響比在烏克蘭犯一個錯誤要糟得多。我們面臨着東方即將到來的聲勢浩大的運動，我們的工作首

先應當是喚醒東方，而不應當採取任何即使是輕微地間接地忽視東部邊疆地區各個最小部族的作用的措施。正因為如此，我認爲從管理擁有一億四千萬人口的共和國聯盟這樣一個大國着眼，使各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都有同等數量的代表參加第二院是比較公正合理的、對革命比較有利的辦法。我們有八個自治共和國，有八個獨立共和國；俄羅斯也作爲一個共和國參加；有十四個地區。這些共和國和地區組成第二院就能够反映各民族的一切要求和需要，並使我們易於管理這樣大的一個國家。正因為如此，我認爲必須否決拉柯夫斯基的修改意見。

六 對民族問題委員會的報告的補充

(四月二十五日)

同志們，我在向你們報告民族問題組的工作時，還忘記提到兩點不能不提到的小補充。在第十點的『乙』項中談到根據平等原則設立一個代表所有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地區的專門機關的地方，必須加一句『並盡可能考慮到這些共和國內的一切民族』，因為有些要派代表參加第二院的共和國裏有好幾個民族。例如土爾克斯坦，在那裏除了烏茲別克人，還有土爾克明人、柯爾克茲人和其他部族，因此在規定代表資格時必須使這些部族中的每一個部族都有代表參加。

在第二部分的結尾再補充一段話，這就是：

『由於各自治共和國、各獨立共和國和一般邊疆地區的負責工作人員的活動有極大的重要性（建立某一共和國的勞動者和整個聯盟的其餘勞動者的聯系），代表大會責成中央特別仔細地挑選這些工作人員，以便能夠完全保證真正貫徹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決議。』

其次，就拉狄克發言中的一個意見談一兩句話。這是阿爾明尼亞的同志要求我談的。在我看來，這個意見是不符合事實的。拉狄克在這裏說，阿爾明尼亞人在阿捷爾拜疆壓迫或可能壓迫阿捷爾拜

疆人，或者相反，阿捷爾拜疆人在阿爾明尼亞可能壓迫阿爾明尼亞人。我必須說，天地間根本沒有這樣的現象。相反的現象倒是有的：在阿捷爾拜疆佔多數的阿捷爾拜疆人壓迫和屠殺阿爾明尼亞人，像在納希切萬所發生的那樣，那裏阿爾明尼亞人幾乎全被殺光；而阿爾明尼亞人在他們的阿爾明尼亞也幾乎把所有的韃靼人都殺光了。這種事情在贊格祖爾就發生過。但是少數人要在別的國家裏壓迫多數人，——這種反常的事情從未有過。

① 據舊約記載，歌利亞是一個巨人。——譯者註

報刊是集體的組織者

英谷洛夫在他的『挖掘根源』（見『真理報』第九十八號）一文中談到了報刊對國家和黨的意義這一重要問題。看來，他爲了證實自己的思想而援引了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中的一段話：報刊『在黨和工人階級之間建立了一種微妙的聯系，這種聯系就其力量來說無異於任何羣衆性的傳達機關；報刊是黨每日每時向工人階級講話的最有力的武器』。

但是，英谷洛夫在試圖解決這一問題時犯了兩個錯誤：第一，他歪曲了中央委員會報告中的這段話的意思；第二，他忽略了報刊的極重要的組織作用。由於問題的重要性，我認爲應當簡單地談談這兩個錯誤。

一、報告的意思決不是說黨的作用似乎僅限於向工人階級講話這項任務，黨應當同工人階級交談，而不僅僅是向他們講話。把『講話』這種說法 and 『交談』這種說法對立起來，無非是在玩弄無聊的把戲。實際上二者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表現在讀者和作者、黨和工人階級、國家和勞動羣衆之間

○ 見本卷第一六六頁。——編者註

報刊是集體的組織者

的毫不間斷的相互作用上。這個現象從羣衆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剛剛成立時起，從老『火星報』時期起就有了。英谷洛夫認爲這種相互作用只是在俄國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過了幾年才開始的，這是不對的。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中的這段話的意思並不在於『講話』，而是說報刊『在黨和工人階級之間建立了一種聯系』，這種聯系『就其力量來說無異於任何羣衆性的傳達機關』。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報刊的組織作用。正因爲如此，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裏是把報刊作爲黨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引帶之一提出的。英谷洛夫不理解這段話，因而不自覺地歪曲了這段話。

二、英谷洛夫強調報刊的鼓動作用和揭露作用，認爲定期刊物的任務僅限於此。他舉出了我們國內的一些壞事，指出報刊的揭露工作和通過報刊所進行的鼓動是問題的『根源』。然而很明顯，報刊的鼓動作用雖然有極大的意義，但是它的組織作用在目前是我們建設工作中最迫切需要的因素。問題不僅在於要使報紙進行鼓動工作和揭露工作，而且首先在於要使報紙在全國範圍內，在一切工業地區和農業地區，在所有縣和鄉內有廣大的工作人員、代辦員和通訊員網，以便有一條綫索經過報紙把黨同一切工人地區和農民地區連接起來，使黨和國家之間、工業地區和農民地區之間的相互作用充分發揮。如果『貧農報』⁽¹⁾這種大衆化的報紙能够經常召開自己在我國各地區的主要代辦員代表會議來交換意見和總結經驗，而每個主要代辦員又爲了同一目的召開自己的地區、市鎮和鄉的通訊員代表會議，那末這不僅在建立黨和工人階級之間、國家和我國最偏僻的角落之間的組織聯系方面會邁進重要的第一步，而且在改善和活躍報刊本身，在改善和活躍我國定期刊物的全體工作人員方

面也會邁進重要的第一步。在我看來，這種代表會議和這種會議比『全俄的』和其他的新聞工作者代表大會有更巨大的實際意義。使報紙成爲黨和蘇維埃政權的集體組織者，使報紙成爲聯系我國勞動羣衆並把他們團結在黨和蘇維埃政權周圍的工具，——這就是目前報刊的迫切任務。

讀者不妨回憶一下列寧同志的『從何着手？』（寫於一九〇一年）一文中關於定期刊物在我們黨的生活中的組織作用這段話：

『但是，報紙的作用並不限於傳播思想、進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者。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從後一點來說，可以把報紙比做腳手架，它搭在正在修建的建築物周圍，刻畫出建築物的輪廓，便利各個建築工人來往，幫助他們分配工作和觀察有組織的勞動所獲得的總成績。依靠報紙和同報紙聯系自然而然會形成一種經常性的組織，這種組織不僅從事地方工作，而且從事經常的一般工作，教會自己的成員密切注視政治事變，估計這些事變的意義和它們對各個不同居民階層的影響，擬定革命的黨影響這些事變的適當辦法。單是技術上的任務——保證正常地供給報紙材料和正常地推銷報紙——就迫使我們必須建立統一的黨的地方代辦員網，這些代辦員彼此間要密切聯系，了解總的情況，習慣於有條理地執行全國工作中的零星職務，並組織某些革命行動以檢驗自己的力量。這種代辦員網將成爲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那種組織的骨幹，這種組織應當很龐大，遍佈全國；它應當很廣泛，很全面，實行嚴格而細緻的分工；它應當很堅定，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轉變關頭」和意外情況下能堅

定不移地進行自己的工作；它應當很靈活，一方面善於避免同佔絕對優勢的敵人（當敵人把全部力量集中在一點的時候）公開作戰，另一方面善於利用這個敵人的遲鈍，在他們最難料到受攻擊的地方和時機向他們攻擊。」〔七四〕

列寧同志當時說報紙是建設我們黨的工具。沒有理由懷疑，列寧同志的這些話在目前我們黨和國家的建設環境中是完全適用的。

英谷洛夫在他的文章中忽略了定期刊物的這種重要的組織作用。他的主要錯誤就在這裏。我們報刊的一位主要工作人員怎麼會忽視這個重要的任務呢？昨天有一位同志對我說，顯然英谷洛夫除了提出解決報刊問題的任務以外，還提出了另一個附帶的任務：『打這個人一下，捧那個人一下。』我自己不想來肯定這一點，而且決不否認任何人除了提出直接任務以外還有提出附帶任務的權利。但是一分鐘也不能容許附帶任務掩蓋住闡明報刊在我們黨和國家建設事業中的組織作用的直接任務。

載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

「真理報」第九十九號

署名：約·斯大林

欲蓋彌彰……

我在「真理報」第九十九號上發表的關於報刊的組織作用那篇文章^①中，曾經指出英谷洛夫在報刊問題上所犯的兩個錯誤。英谷洛夫在答辯的文章（見「真理報」第一〇一號）中支吾其詞地說他沒有犯錯誤，而是「誤解」。我同意把英谷洛夫的錯誤叫做「誤解」。但不幸的是：英谷洛夫在自己的答辯文章中又犯了三個錯誤，也可以說又有了三個「誤解」。很遺憾，由於報刊的特殊作用，決不能對這些錯誤置之不理。

一、英谷洛夫說，他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並沒有認為有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報刊的組織作用問題上，只是探討了「誰在辦我們的黨報」這個「局部問題」。就算是這樣吧，但是，英谷洛夫為什麼還引用中央委員會組織報告中專門論述我們定期刊物的組織作用的一段話作為自己文章的小標題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英谷洛夫不了解那段話的意思，或者他的全篇文章是不顧和違背中央委員會組織報告中關於報刊的組織作用那段話的原意寫成的。不管是哪一種情況，英谷洛夫的錯誤却是

① 見本卷第二二九頁至第二三二頁。——編者註

一目了然的。

二、英谷洛夫說，「兩三年以前我們的報刊和羣衆沒有聯系」，「沒有把黨和羣衆聯系起來」，一般說來，報刊和羣衆之間是「沒有」聯系的。只要仔細看看英谷洛夫的這個論斷，就會了解它是多麼荒謬，多麼無力和脫離實際。事實上，如果我們黨的報刊以及我們黨本身（通過報刊）「兩三年以前」和工人羣衆「沒有聯系」，那末我們黨就抵擋不住國內外革命敵人的進攻，黨就會「一下子」被埋葬，化為烏有，這豈不是很明顯嗎！請想一想吧：當內戰進行得正熾烈的時候，黨抗擊敵人，取得了多次輝煌的勝利，黨通過報刊號召工人和農民起來捍衛社會主義祖國，幾萬幾十萬的勞動羣衆通過數百個決議響應黨的號召，走上前綫，不怕犧牲，這一切英谷洛夫雖然知道，但他認爲還是可以斷言，「兩三年以前我們的報刊和羣衆沒有聯系，因而也沒有把黨和羣衆聯系起來」。這不是很可笑嗎？你聽說過有這樣一個「不」通過羣衆性報刊「和羣衆聯系」而能使幾萬幾十萬工人和農民行動起來的黨嗎？黨已經使幾萬幾十萬勞動羣衆行動起來了，羣衆性的黨不依靠報刊就不能做到這一點，這不是很明顯嗎？是的，的確有人和羣衆失去了聯系，但這不是我們黨，不是黨的報刊，而是別的人。不能誣蔑報刊！問題在於「兩三年以前」黨通過報刊無疑是同羣衆有聯系的，而且不可能沒有聯系，但是這種聯系比較薄弱，正像我們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公正地指出的那樣。現在的任務是擴大這種聯系，大力加強這種聯系，使這種聯系更加牢固，更加經常。全部問題就在這裏。

三、其次，英谷洛夫說，「兩三年以前黨和工人階級沒有通過報刊發生相互作用」。爲什麼呢？原

來是因爲當時「我們的報刊每天都在號召人們參加鬥爭，每天都在講述蘇維埃政權的各項措施和黨的各項決議，但是工人讀者沒有響應」。就是這樣說的：「工人讀者沒有響應。」

這是難於置信的、駭人聽聞的，然而這是事實。

誰都知道，當黨通過報刊號召「大家都去支援運輸業」的時候，羣衆便一致響應，他們給報刊寄來數百份決議書，表示他們的同情和對保衛運輸業的決心，並且把他們的幾萬名子弟送去支援運輸業。但是，英谷洛夫不同意把這種事情看做工人讀者的響應，不同意把這種事情叫做黨和工人階級通過報刊發生的相互作用，因爲這種相互作用與其說是通過通訊員實現的，不如說是黨和工人階級直接（當然是通過報刊）實現的。

誰都知道，當黨號召「同飢荒作鬥爭」的時候，羣衆一致響應黨的號召，他們給黨的報刊寄來無數份決議書，並把他們的幾萬名子弟送去同富農作鬥爭。但是，英谷洛夫不同意把這種事情看做工人讀者的響應，看做黨和工人階級通過報刊發生的相互作用，因爲這種相互作用不是「按照規則」即不是通過某些通訊員等等實現的。

在英谷洛夫看來，幾萬幾十萬工人響應黨的報刊的號召，並不是黨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相互作用，而一二十個通訊員對黨的報刊發出的同一號召所作的書面響應，那才是黨和工人階級之間真正的實在的相互作用。這就是對黨的報刊的組織作用所下的定義！英谷洛夫，看上帝面上，請你不要把馬克思主義和文牘主義對相互作用的解釋混爲一談。

其實問題很清楚，如果不用文牘主義者而用馬克思主義者的眼光來看黨和工人階級通過報刊發生的相互作用，那末這種相互作用無論在『兩三年前』或在更早的時候都一直是存在的，而且不能不存在，因為不這樣黨就不能保持對工人階級的領導，工人階級也就不能保持政權。顯然，現在的問題是使這種相互作用更加經常，更加牢固。英谷洛夫不僅過低估計了報刊的組織作用，而且還歪曲了這種作用，在黨和工人階級通過報刊發生的相互作用問題上，用文牘主義的、表面的技術性的理解來頂替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而他把這叫做『誤解』……

至於英谷洛夫所堅決否認的『附帶任務』，應當說，他的第二篇文章並沒有消除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對這一點所表示的懷疑。

載於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

「真理報」第一〇二號

署名：約·斯大林

**有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負責工作
人員參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會議**
（五）

（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

有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
負責工作人員參加的俄共中央
第四次會議速記記錄
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

一 提交第四次會議討論並經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民族問題綱領草案

黨在民族問題方面工作的總路線

從反對離開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立場的意義上來說，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工作路線應當由這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決議中有關的幾點，即決議中第一部分的第七點和第二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各點來確定。

黨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在當地居民的無產階級分子和半無產階級分子中培育和發展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的年輕的共產黨組織，用一切辦法協助這些組織站穩腳跟、受到真正的共產主義教育並把即在開始時為數不多然而真正國際主義的共產黨幹部團結起來。只有當真正名副其實的共產黨組織在各共和國和各地區鞏固的時候，蘇維埃政權才能在這些地方鞏固起來。

但是各共和國和各地區的共產黨員應當記住，單是拿居民的社會成分不同這一點來說，他們那裏的情況就已經和共和國聯盟各工業中心大不相同了，因此在邊疆地區必須常常採用不同的工作方法。特別是在這裏，在竭力爭取當地居民中的勞動羣衆的支持時，必須比在中部地區更加熱誠地歡迎

那些革命民主人士，甚至歡迎那些僅僅忠順於蘇維埃政權的分子。各共和國和各地區內，本地的知識分子的作用在許多方面同共和國聯盟中部地區的知識分子是不同的。邊疆地區本地的知識分子工作人員極感缺乏，所以應當盡一切力量把他們每一個人都吸引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

邊疆地區的共產黨員應當記住：我是共產黨員，因此我應當根據當地的情況來行動，向當地民族中的那些願意和能够在蘇維埃制度範圍內忠順地工作的分子讓步。這並不是排斥而是預計到要有系統地進行維護馬克思主義原則、維護真正的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傾向的思想鬥爭。只有這樣，才能順利地剷除地方民族主義，使當地的廣大居民階層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

同設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院和組織共和國聯盟

各人民委員部有關的問題

根據還不够完全的材料，這樣的問題共有七個：

(甲)關於第二院的成員問題。這個院應當由各自治共和國、各獨立共和國的代表（每個共和國四名或四名以上）和各民族地區的代表（每個地區一名就夠了）組成。最好能做到第一院的成員一般不兼第二院的成員。各共和國和各地區的代表應當由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批准。第一院稱爲聯盟蘇維埃，第二院稱爲民族蘇維埃。

(乙)關於第二院同第一院關係上的權利問題。應當規定第一院和第二院享有平等權利，每院都

有創制法律的權利，並遵守凡提交第一院或第二院審查的法案如未經兩院同意（兩院分別進行表決）不得成爲法律這一規定。有分歧的問題交由兩院協商委員會解決，不能達成協議時在兩院聯席會議上重付表決，如果有爭論的法案經過這樣修正後仍沒有得到兩院多數通過，就必須提交共和國聯盟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或通常代表大會解決。

（丙）關於第二院的權限問題。凡蘇聯憲法第一條所載明的問題都應由第二院（第一院也一樣）處理。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和聯盟人民委員會的立法職能仍然存在。

（丁）關於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問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應當只有一個。它應當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兩院選出，當然必須保證各民族至少其中最大的民族有代表參加。烏克蘭人建議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兩院中每院都設立一個具有立法職能的主席團以代替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單一的主席團，這個建議是不適當的。主席團是在兩屆常會之間常設的聯盟最高權力機關。設立兩個具有立法職能的主席團就是把最高權力機關分成兩部分，這勢必造成工作上很大的困難。兩院應當分別設立自己的主席團，但不能具有立法職能。

（戊）關於統一的人民委員會的數量問題。根據以往幾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決定，統一的人民委員會應當有五個（外交人民委員會、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軍事人民委員會、交通人民委員會和郵電人民委員會）；直屬的人民委員會也應當有五個（財政人民委員會、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糧食人民委員會、勞動人民委員會、工農檢查院）；其餘的人民委員會應當完全自治。烏克蘭人建議把外

交人民委員部和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從統一的一類移到直屬的一類，就是說，讓各共和國的這兩個人民委員部與聯盟的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同時並存，並使它們服從後者的指示。如果我們確實要建立一個對外能夠以聯合的整體出現的聯盟國家，這個建議是不能接受的。關於租賃合同的情況也是這樣，訂立這種合同的權力應當集中於共和國聯盟。

(己)關於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部的機構問題。應當擴大這些人民委員部的部務會議，吸收最大最重要的民族的代表參加。

(庚)關於各共和國的預算權問題。在分給各共和國的份額（其數量應特別加以規定）範圍內，各共和國在預算方面應當有更大的獨立性。

吸收當地居民中的勞動分子參加黨的建設和蘇維埃建設的辦法

根據不完全的材料，現在已經可以提出四個辦法：

(甲)清洗國家機關和黨機關中的民族主義分子（首先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以及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分子和其他民族主義分子）。清洗工作應當在黨中央監督下根據審查過的材料慎重進行。

(乙)不斷地堅定不移地使各共和國和各地區內的國家機關和黨機關民族化，就是說在文牘工作方面逐步使用當地語言，負責工作人員有義務學會當地語言。

(丙)挑選和吸收當地知識界中多少對我們忠順的分子參加蘇維埃機關工作，同時我們各共和國

和各地區的負責工作人員應當從黨員中培養蘇維埃的和黨的工作幹部。

(丁) 召開非黨工農代表會議，由人民委員和黨的一般負責工作人員報告蘇維埃政權的各項最重
要的措施。

關於改善當地居民文化生活狀況的措施

大致必須採取下列措施：

- (甲) 開辦使用當地語言的俱樂部(非黨的)和其他教育機關；
- (乙) 擴大使用當地語言的各級學校網；
- (丙) 吸收當地的多少對我們忠順的人民教師參加教學工作；
- (丁) 建立使用當地語言的識字普及協會網；
- (戊) 組織出版工作。

根據民族生活習慣的特點進行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

大致必須採取下列措施：

- (甲) 調整移民，有些地方如有必要可停止移民；
- (乙) 盡可能把國有土地分配給當地勞動居民，保證他們都有土地；

有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負責工作人員參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會議

- (丙) 發放低息農業貸款給當地居民；
- (丁) 加強水利工作；
- (戊) 大力幫助合作社，其中包括工藝合作社（爲了吸引手工業者）；
- (己) 把工廠遷到富產所需原料的共和國去；
- (庚) 爲當地居民開辦工藝學校和技術學校；
- (辛) 爲當地居民開辦農業訓練班。

關於組織民族部隊的實際措施

必須立即着手在各共和國和各地區開辦軍事學校，以便在一定時期內從本地人中間培養出以後能够成爲組織民族部隊核心的指揮人員。同時很明顯，必須充分保證民族部隊特別是指揮人員的黨的成分和社會成分。凡在本地人中間有老軍事幹部的地方（韃靼、巴什基里亞部分地區），可以立即組織民族民軍團。在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和阿捷爾拜疆似乎都已經有一個師了。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特別是在烏克蘭）都可以立即建立一個民軍師。

建立民族部隊的問題不論從防禦可能來自土耳其、阿富汗、波蘭等國的侵犯來說，或者從共和國聯盟對鄰國可能採取迫不得已的行動來說，都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從共和國聯盟的內部狀況來看，民族部隊的意義也是無須證明的。預計我們軍隊的數量一定會因此而增加二萬到二萬五千名。

組織黨的教育工作

大致必須採取下列措施：

- (甲) 創辦使用本族語言的政治常識學校；
- (乙) 用本族語言出版馬克思主義書刊；
- (丙) 用本族語言出版辦得很好的定期刊物；
- (丁) 擴大東方民族大學在中央和地方的活動，給該大學以物質上的保證；
- (戊) 在東方民族大學設立黨的爭論俱樂部，吸收住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員參加；
- (己) 加強各共和國和各地區的共青團工作和婦女工作。

為貫徹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挑選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

必須吸收一定數量的民族幹部參加中央登記分配局、中央宣傳鼓動部、中央組織部、中央婦女部和中央指導機關的工作（每個機關兩個或三個），以便在他們幫助下促進中央在邊疆地區的黨的日常工作，並以保證實現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路綫的精神，把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合理地分配給各共和國和各地區。

二 關於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內的右派和「左派」

（關於會議第一項議程「蘇丹—加里也夫事件」的演說）（六月十日）

我想對同志們在這裏發表的演說提幾點意見。至於蘇丹—加里也夫事件所涉及的問題的原則方面，我將盡力在我關於第二項議程的報告中加以說明。

首先談談有關會議本身的問題。這裏有人說（我忘了究竟是誰）這次會議是一種反常的現象。這是不對的。這種會議對我們黨來說並不是什麼新東西。自蘇維埃政權建立以來，這次會議已經是第四次了。截至一九一九年初，這種會議召開過三次。那時候環境允許我們召集這樣的會議。後來，在一九一九年以後，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期間，我們以全力對付國內戰爭，沒有工夫召開這種會議。只是在現在，在我們結束國內戰爭以後，我們的工作已經深入到經濟建設方面了，黨的工作特別是在各民族地區和各民族共和國內的工作也更加具體了，我們才又有可能召開這種會議。我想，中央爲了使地方上執行政策的人和制定政策的人之間達到充分的相互諒解，還將不止一次地採用這種辦法。我想，這樣的會議不但可以和所有共和國所有地區的代表共同舉行，而且可以和個別地區個別共和國的代表單獨舉行，以便作出更具體的決定。只有這樣提問題，才能既滿足中央，又滿足地方工作

人員。

我聽到某些同志說當我有機會看到蘇丹——加里也夫的第一封密信（好像是給阿季加莫夫的，他不知爲什麼默不作聲，不發一言，雖然他應當比別人更早更多地發表意見）的時候，我警告過蘇丹——加里也夫。我受到這些同志的指責，說我過分替蘇丹——加里也夫辯護。是的，我確實是盡量替他辯護的，我過去認爲現在仍然認爲這是我的義務。不過我替他辯護有一定的限度。當蘇丹——加里也夫超出這一定度的時候，我就離開了他。他的第一封密信說明他已經和黨脫離關係，因爲他那封信的口氣差不多是白衛分子的，因爲他談到中央委員的那些話，只有對敵人才那樣說。我會偶然地在政治局遇見他，當時他正在爲韃靼共和國所提出的有關農業人民委員部的要求辯護。當時我警告過他，遞給他一張條子，說他的那封密信是反黨的，責備他是在建立瓦里多夫型的組織，我告訴他，如果他不停止非法的反黨活動，一定不會有好結果，並且將得不到我的任何支持。他很窘地回答說我被蒙蔽了，說他給阿季加莫夫確實寫過信，但所寫的不是那些事情而是別的事情，說他過去是現在仍然是黨員，並且發誓保證今後還要繼續做黨員。可是，過了一個星期，他又寄出第二封密信，要阿季加莫夫同巴斯馬奇匪徒和他們的頭子瓦里多夫建立聯系，並要他閱後把信「燒毀」。這樣蘇丹——加里也夫的卑鄙行爲和欺騙手段就暴露了，這種手段使我同他斷絕了任何聯系。從這時起，在我看來，蘇丹——加里也夫已經是一個站在黨外，站在蘇維埃以外的人了，我認爲不能再同他講話了，雖然他曾幾次想找我「談一談」。『左派』同志們早在一九一九年初就指責我，說我支持蘇丹——加里也夫，說我爲黨保護他，

憐惜他，希望他不再是民族主義分子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我確實認為有義務支持他到一定的時候。知識分子，有思想的人，甚至一般識字的人，在東部各共和國和各地區少得屈指可數，這怎麼能不珍視他們呢？不採取一切辦法保護東部我們所需要的人，使他們不致腐化墮落，不為黨保存他們，那就是犯罪。但一切事情都是有限度的。當蘇丹——加里也夫從共產黨人營壘跑到巴斯馬奇匪徒營壘裏去的時候，便超過了這個限度。從這時起，他對於黨已經不存在了。這就是他覺得土耳其大使比我們黨中央更合乎他的心意的原因。

我也聽到沙米古洛夫對我的同樣的指責，說我不顧他的乾脆開除瓦里多夫的堅決要求，而替瓦里多夫辯護，力圖為黨保存他。我確實替瓦里多夫辯護過，希望他能改過自新。我們從許多政黨的歷史中知道，比他更壞的人也能改過自新。我認為沙米古洛夫解決問題太簡單了。我沒有聽從他的勸告。誠然，一年以後沙米古洛夫的預言證實了，瓦里多夫並沒有改過自新，他跑到巴斯馬奇匪徒那裏去了。但是，黨還是勝利了，因為我們使瓦里多夫的脫黨延遲了一年。如果我們在一九一八年就制裁了瓦里多夫，那末我相信像穆爾塔津、阿季加莫夫、哈里柯夫和其他同志也就不會留在我們隊伍裏了。（喊聲：「哈里柯夫會留下來的。」）哈里柯夫也許不會離開，但是我們隊伍裏的整整一批同志是會同瓦里多夫一起離開的。這就是我們的忍耐和慎重的結果。

雷斯庫洛夫的發言我聽到了，應當說，他的發言是不十分誠懇的，是半外交式的，（喊聲：「對！」）一般說來，他的發言使人感到很沉重。我本來以為他能談得更明確更誠懇。不管雷斯庫洛

夫怎樣說，在他家裏明明白白放着兩封蘇丹——加里也夫的密信，他沒有給任何人看過，顯然他在思想上是和蘇丹——加里也夫有聯系的。雷斯庫洛夫竭力同蘇丹——加里也夫事件的刑事部分劃清界限，硬說他在巴斯馬奇活動方面同蘇丹——加里也夫沒有聯系，——這是胡說。這次會議上要談的不是這個問題。要談的是關於同蘇丹——加里也夫主義在思想意識上的聯系問題。雷斯庫洛夫同蘇丹——加里也夫有這種聯系，這是很明顯的，同志們，連雷斯庫洛夫本人也不能否認這一點。難道現在還不是在這裏，在這個講台上堅決地無條件地同蘇丹——加里也夫主義最後劃清界限的時候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雷斯庫洛夫的發言是半外交式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延巴也夫也作了外交式的、不誠懇的發言。延巴也夫和一批鞭韃工作人員（雖然他們的思想是不堅定的，但是，我認爲他們都是出色的實際工作者）在蘇丹——加里也夫被捕後會要求中央立即釋放他，並且願意完全担保蘇丹——加里也夫，暗示從蘇丹——加里也夫那裏搜出的文件是不真實的，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然而經過調查以後發現了什麼呢？發現一切文件都是真實的。連蘇丹——加里也夫本人也承認這些文件的真實性，而且說自己的罪過比文件中所說的還要多，他徹底承認了自己的過錯，承認後還表示悔悟。既然如此，延巴也夫就應該堅定不移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並同蘇丹——加里也夫劃清界限，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可是延巴也夫並沒有這樣做。他找到了機會嘲笑『左派』，而不願以共產黨員的精神堅決地同蘇丹——加里也夫主義劃清界限，同蘇丹——加里也夫所陷入的深淵劃清界限，似乎以爲玩弄外交手腕就能得救。

菲爾傑夫斯的發言是一套徹頭徹尾的外交手腕。在思想上究竟是誰領導誰？是蘇丹——加里也夫領導菲爾傑夫斯，還是菲爾傑夫斯領導蘇丹——加里也夫？這個問題我留做懸案。但是，我認爲在思想上與其說是菲爾傑夫斯領導蘇丹——加里也夫，不如說是蘇丹——加里也夫領導菲爾傑夫斯。我在蘇丹——加里也夫的理論練習中並沒有看到任何特別不能容許的東西。如果蘇丹——加里也夫的問題只限於大突厥主義和大伊斯蘭主義，那末這將是一種半不幸，這種思想雖然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中已被禁止，但是，我認爲仍然是可以容忍的，只要在我們黨的隊伍裏對它進行批評就行了。但是，如果思想練習的結果是同巴斯馬奇匪徒的首領們即同瓦里多夫以及其他入建立聯系，那末這就是拿思想無罪做藉口來替巴斯馬奇匪徒的實踐辯護，像菲爾傑夫斯打算做的那樣，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替蘇丹——加里也夫的活動作這樣的辯護是誰也欺騙不了的。這樣也就可以爲帝國主義和沙皇制度辯護，因爲它們也有它們的思想，這種思想有時從表面上看也是毫無罪過的。這樣談論問題是不行的。在這裏你們不是站在法庭面前，而是站在負責工作人員的會議面前，這些負責工作人員要求你們直爽、誠懇，而不是玩弄外交手腕。

我認爲霍札諾夫講得很好。伊克拉莫夫也講得不錯。但我必須指出這兩位同志的講話中的一個值得考慮的地方。他們兩個人都說，今天的土爾克斯坦和沙皇時代的土爾克斯坦沒有任何差別，只是換了一塊招牌，土爾克斯坦仍然和過去沙皇時代的土爾克斯坦一樣。同志們，如果這不是失言，如果這是深思熟慮的發言，如果這完全是有意識地說出來的，那就應當說巴斯馬奇匪徒是對的，我們是不

對的。如果土爾克斯坦真是殖民地，和在沙皇制度下一樣，那末巴斯馬奇匪徒是對的，那我們就不應當審判蘇丹——加里也夫，而應當由他來審判我們這些容忍殖民地在蘇維埃政權下存在的人了。如果這是對的，那末我不明白，爲什麼你們自己不參加巴斯馬奇活動呢？顯然，霍札諾夫和伊克拉莫夫對他們發言中的這一點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爲他們不能不知道，今天的蘇維埃土爾克斯坦和沙皇時代的土爾克斯坦是根本不同的。我指出這兩位同志發言中的這個模糊的地方是爲了要這兩位同志好好考慮一下並改正自己的錯誤。

伊克拉莫夫在談中央的活動時，指責我們不能經常注意和經常及時提出東部各共和國和各地區的情況所產生的那些實際問題，我承擔這些責備的一部分。當然，中央工作繁忙，不能處處走在前面。如果認爲中央一切事情都能及時做到，那是可笑的。當然，土爾克斯坦的學校很少。國家機關還沒有通用當地語言，機關還沒有民族化。文化水平一般很低。這一切都是事實。但是難道能夠真的希望中央或全黨在兩三年內提高土爾克斯坦的文化水平嗎？我們大家都在叫嚷和埋怨，說俄羅斯的文化水平，俄羅斯人民的文化水平雖然比共和國聯盟的其他各族人民高，但是俄羅斯本身文化水平很低。這一點伊里奇不止一次地說過，他說我們的文化水平很低，我們不可能在兩三年內甚至在十年內大大提高俄羅斯的文化水平。既然在兩三年內甚至在十年內不能大大提高俄羅斯文化，那末怎麼能要求落後的、識字人很少的非俄羅斯地區的文化加速提高呢？這裏十分之九的「過錯」在於環境，在於落後，這一點像大家所說的不能不估計到，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現在來談『左派』和右派。

在各地區和各共和國的共產黨組織中有沒有『左派』和右派呢？當然有。這是無可否認的。

右派的罪過在哪裏呢？右派的罪過在於他們不是也不可能消除因實行新經濟政策而變本加厲的民族主義思潮的解毒劑和反對這種思潮的可靠堡壘。蘇丹——加里也夫主義的產生以及它在東部各共和國特別是在巴什基里亞和韃靼能夠得到一批人擁護的事實，毫無疑問地說明右傾分子在這些共和國內佔絕大多數，他們不是反對民族主義的堅強堡壘。

應當記住，各邊疆地區、各共和國和各地區的共產黨組織只有把民族主義剷除掉，才能發展和站穩脚跟，才能成爲真正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組織。民族主義是在各邊疆地區和各共和國培養馬克思主義幹部，培養馬克思主義先鋒隊道路上的主要思想障礙。我們黨的歷史說明，布爾什維克黨的俄羅斯部分是在反對孟什維主義的鬥爭中成長和鞏固起來的，因爲孟什維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想，孟什維主義是向我們黨輸送資產階級思想的傳導者，不戰勝孟什維主義，黨就不能站穩脚跟。這一點伊里奇曾經談過好幾次。只有在組織上和思想上戰勝孟什維主義，布爾什維主義才能成長和鞏固起來，才能成爲真正的起領導作用的黨。關於民族主義和我們各邊疆地區和各共和國的共產黨組織的關係也應當這樣說。民族主義對這些組織所起的作用和孟什維主義過去對布爾什維克黨所起的作用一樣。各式各樣的資產階級影響，包括孟什維克的影響在內，只有在民族主義的掩護下才能滲入我們各邊疆地區的組織。我們各共和國的組織只有抵抗住闖入我們各邊疆地區的民族主義思潮，才能成爲

馬克思主義的組織，這種思潮所以能闖入，是因為資產階級正在復活，新經濟政策正在成長，民族主義正在發展，並且還存在着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殘餘（這種殘餘也推動地方民族主義）和千方百計支持民族主義的外國勢力。如果我們各民族共和國的共產黨組織想要堅強起來，成爲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組織，那就必須在各共和國和各地區經過同這種敵人作鬥爭的階段。其他道路是沒有的。而右派在這一鬥爭中是軟弱的。他們所以軟弱，是因為他們染上了對黨懷疑的毛病，因而很容易受民族主義的影響。這就是各共和國和各地區共產黨組織裏的右翼的罪過。

邊疆地區「左派」的罪過不能說更大，也不能說更小。如果說不剷除民族主義，邊疆地區的共產黨組織就不能鞏固和發展成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組織，那末這些組織本身要能够成爲羣衆性的組織，要能够把大多數勞動羣衆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就只有學會十分靈活地吸收各民族中一切比較忠順的分子參加我們的國家機關工作，向他們讓步，學會既能靈活地同黨內的民族主義作堅決鬥爭，又能爲吸收本地人和知識界等等中間的一切多少對我們忠順的分子來參加蘇維埃工作而進行同樣堅決的鬥爭。邊疆地區的「左派」對黨的懷疑比較少，並且沒有那麼容易受民族主義的影響。但是「左派」的罪過在於他們不善於靈活地對待居民中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分子和僅僅對我們忠順的分子，他們不善於也不願意靈活地去吸收這些分子，他們歪曲了黨的掌握國內大多數勞動人民的路綫。可是這種既能靈活地同民族主義作鬥爭，又能靈活地吸收比較忠順的分子加入我們國家機關隊伍的靈活性和本領，無論如何必須培養和鍛鍊出來。只有估計到我們在我們各地區和各共和國內所遇到的全部複雜

性和特殊性，只有不簡單地搬用在中部工業區所創造的一套辦法（這套辦法是不能機械地搬到邊疆地區去的），只有不拋開居民中有民族主義情緒的分子和有民族主義情緒的小資產者，只有學會吸收這些分子參加一般的國家工作，才能培養和鍛鍊出這種靈活性和本領。「左派」的罪過在於他們沾染了宗派主義習氣，不了解黨在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內的這些複雜任務的頭等重要性。

如果右派的危險在於他們容易受民族主義的影響，因而會阻礙我們邊疆地區的共產黨幹部的成長，那末「左派」對於黨的危險就在於他們醉心於他們的簡單的輕率的「共產主義」，會使我們黨脫離農民和當地居民中的廣大階層。

這兩種危險中哪一種最危險呢？如果「左」傾的同志們今後還想在各地實行用人工方法劃分居民階層的政策，——這一政策不僅在微岑和雅庫特區實行了，不僅在土爾克斯坦實行了……（伊布拉吉莫夫：「這是分化的策略。」）現在伊布拉吉莫夫想用分化的策略來代替分層的策略（但這絲毫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我說，如果他們今後還想從上面實行分層政策，如果他們以為可以把俄羅斯的一套辦法機械地搬到特殊的民族環境裏去，不考慮那裏的生活習慣和具體條件，如果他們以為同民族主義作鬥爭就必須拋棄一切民族的東西，一句話，如果邊疆地區的「左派」共產黨員還不想改正錯誤，那末我應當說，在這兩種危險中「左」傾危險可能成爲最大的危險。

這就是我在「左派」和右派問題上所要說的一切。我稍微冒進了一些，但這是因爲整個會議冒進了，預先討論第二項議程了。

必須鞭策右派，迫使和教會他們去同民族主義作鬥爭，以便從本地人中間培養出真正的共產黨幹部。但是也必須鞭策『左派』，教會他們機動靈活，善於隨機應變，以便掌握廣大的居民羣衆。這一切都必須做到，因為正如霍札諾夫所正確指出的，真理在『中間』，在右派和『左派』之間。

三 貫徹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關於 民族問題的決議的實際措施

(關於第二項議程的報告)(六月十日)

同志們！中央政治局關於民族問題的綱領草案^①你們大概都已經收到了。(喊聲：「不是每個人都收到了。」)這個綱領同第二項議程的所有各項都有關聯。中央用密碼電報發出的會議議程大家都收到了。

政治局的建議可以分爲三類。

第一類問題是關於加強各共和國和各地區本地的共產黨幹部的問題。

第二類問題是同實際貫徹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具體決議有關的一切問題，這就是：關於吸收當地居民中的勞動分子參加黨的建設和蘇維埃建設的問題；關於提高當地居民的文化水平所必須採取的措施問題；關於按照生活習慣的特點改善各共和國和各地區的經濟狀況的問題；

^① 見本卷第二三九頁至第二四五頁。——編者註

最後是關於各地區和各共和國的合作問題，關於遷移工廠、建立工業基地的問題等等。這一類問題涉及到各地區和各共和國根據當地情況所提出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任務問題。

第三類問題是關於共和國聯盟的憲法問題，特別是關於因設立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院而修改這個憲法的問題。大家知道，最後一類問題是同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即將召開的會議有關的。

現在我來談第一類問題，即關於從本地人當中培養和提高能夠成爲各邊疆地區蘇維埃政權最重要的棟梁支柱的馬克思主義幹部的方法問題。如果拿我們黨的發展來說（我是拿黨的基本部分即俄羅斯部分來說的），考察一下黨的幾個主要發展階段：然後照樣繪製一幅在最近將來我們各地區和各共和國的共產黨組織發展的圖畫，那末我想我們就一定能找到一把從邊疆地區我黨的發展方面來了解這些地區所具有的那些特點的鑰匙。

我們黨的俄羅斯部分在第一個發展時期的基本任務是造就幹部，造就馬克思主義幹部。這些馬克思主義幹部是在我們反對孟什維主義的鬥爭中造就和鍛鍊出來的。在那個時期（我指的是從布爾什維克黨成立到孟什維主義的最典型的代表取消派被驅逐出黨這一時期），這些幹部的基本任務是：把工人階級中最有生氣、最忠誠、最優秀的分子爭取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造就幹部，鍛鍊先鋒隊。這裏首先是同資產階級性的派別作鬥爭，特別是同孟什維主義作鬥爭，因爲它們妨礙把幹部團結成統一的整體，團結成黨的基本核心。那時同千百萬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廣泛建立聯系的任務，掌

握這些羣衆的任務，爭取國內大多數的任務，還沒有迫切地刻不容緩地擺在黨的面前。黨還沒有發展到這種地步。

只有在我們黨的下一個發展階段即第二個階段上，當這些幹部已經成長起來，已經成爲我們黨的基本核心的時候，當工人階級中的優秀分子的同情已經爭得或者差不多已經爭得的時候，——只是在這個時候，掌握千百萬羣衆的任務，把黨的幹部變成真正羣衆性的工人政黨的任務，才迫切地刻不容緩地提到黨的面前。在這個時期，我們黨的核心與其說不得不同孟什維主義作鬥爭，不如說不得不同我們黨內的「左」傾分子即各式各樣的「召回派分子」作鬥爭，因爲他們企圖用革命的詞句來代替對一九〇五年以後新局勢的特點的認真研究，他們的簡單的「革命」策略阻礙了我們黨的幹部變成真正羣衆性的政黨，他們的活動造成了使黨脫離廣大工人羣衆的危險。未必用得着證明，不同這種「左」的危險作堅決鬥爭，不消除這種危險，黨就不能掌握千百萬勞動羣衆。

反對右派即孟什維克和「左派」的兩條戰綫的鬥爭的大致情況就是這樣，我們黨的基本部分即俄羅斯部分發展的大致情況就是這樣。

列寧同志在他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十分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共產黨的這種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發展。列寧同志證明，西方的共產黨都要經歷並且已經在經歷與此大致相同的發展階段。我們補充一句，我們邊疆地區的共產黨組織和共產黨的發展情形也是這樣。

但是應當指出，雖然我們黨過去的經歷同目前我們邊疆地區黨組織的經歷有類似之處，但是我

們黨在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的發展仍然有某些重要的特點，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些特點，如果不周密地考慮這些特點，我們在規定從邊疆地區本地人當中培養馬克思主義幹部的任務時，就有犯一系列極嚴重的錯誤的危險。

現在來研究一下這些特點。

同我們邊疆地區組織中的右傾分子和「左」傾分子作鬥爭是必需的、必要的，否則我們就培養不出密切聯繫羣衆的馬克思主義幹部。這是很明顯的。邊疆地區的特點以及我們黨的發展和過去不同的地方在於：在邊疆地區鍛鍊幹部並把他們變成羣衆性的政黨的工作，並不是像我們黨過去那樣在資產階級制度下進行的，而是在蘇維埃制度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的。在那時，在資產階級制度下，根據當時的條件是可以而且必須首先打擊孟什維克（爲了鍛鍊馬克思主義幹部），然後打擊召回派（爲了把這些幹部變成羣衆性的政黨），反對這兩種傾向的鬥爭充滿了我黨歷史上的整整兩個時期。根據目前的情況來說，我們絕對不能這樣做，因爲現在黨已經執政，執政黨需要在邊疆地區擁有同廣大居民羣衆有聯系的、可靠的本地馬克思主義幹部。現在我們不能像在我們黨過去所做的那樣首先利用「左派」來擊敗右的危險，然後利用右派來擊敗「左」的危險，現在我們應當同時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力求擊敗這兩種危險，以便能够在邊疆地區得到同羣衆有聯系的、有馬克思主義修養的本地幹部。那時可以說幹部還沒有同廣大羣衆聯系起來，應當在下一個發展時期同廣大羣衆聯系起來，而現在連提這一點都是可笑的，因爲在蘇維埃政權下不能設想馬克思主義幹部同廣大羣衆沒有

某種聯系。這樣的幹部只能認爲是和馬克思主義以及羣衆性政黨毫不相干的。這一切使問題大大複雜化了，並且要求我們邊疆地區的黨組織必須同時同右派和「左派」進行鬥爭。由此就產生了我們黨在兩條戰綫上同時反對兩種傾向的立場。

其次應當指出一個情況，就是我們邊疆地區共產黨組織的發展並不是像我們黨的俄羅斯部分過去那樣孤立地進行的，而是在我們黨的基本核心的直接影響下進行的，這個核心不僅在造就馬克思主義幹部方面受過考驗，而且在使這些幹部同廣大居民羣衆聯系方面，在爭取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的革命的機動靈活性方面也受過考驗。邊疆地區在這方面的特點是：由於邊疆地區蘇維埃政權發展的條件，我們在這些地區的黨組織可以而且應當機動地運用自己的力量並利用我們黨前一時期的豐富經驗來加強同廣大居民羣衆的聯系。直到最近，俄共中央通常總是越過邊疆地區的共產黨組織，有時甚至繞過這些組織，直接在邊疆地區機動地吸收各民族中一切多少對我們忠順的分子來參加蘇維埃建設的一般工作。現在這項工作應當由邊疆地區黨組織自己來做了。它們可以做這項工作，應當做這項工作，要記住這條道路是把本地的馬克思主義幹部變成能够領導本地大多數居民的真正羣衆性政黨的最好手段。

這就是在確定我們黨在邊疆地區培養馬克思主義幹部並通過這些幹部掌握廣大居民羣衆方面的路綫時，所應當周密考慮的兩個特點。

現在來談第二類問題。因爲不是每個同志都收到綱領草案，所以我來把它讀一下並加以解釋。

第一、『吸收無產階級分子和半無產階級分子參加黨的建設和蘇維埃建設的辦法』。爲什麼要這樣做呢？爲的是使黨的機關特別是蘇維埃機關接近居民。必須使這些機關使用廣大居民羣衆所懂得的語言進行工作，否則就不可能使它們接近居民。既然我們黨的任務是使蘇維埃政權成爲羣衆所親近的政權，那末只有使這個政權成爲羣衆所了解的政權，才能完成這項任務。國家機關的領導人員以及機關本身都必須用居民懂得的語言進行工作。必須把破壞共和國聯盟各族人民間的友誼和團結精神的沙文主義分子從機關裏驅逐出去，必須把這類分子從我們莫斯科的機關和各共和國的機關裏清除出去，指派通曉居民的語言和習慣的本地人領導各共和國國家機關的工作。

我記得兩年前柯爾克茲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培斯特柯夫斯基就沒有掌握柯爾克茲語言。這種情況在當時就給加強柯爾克茲共和國政府和柯爾克茲農民羣衆之間的聯系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困難。所以黨盡力爭取到使柯爾克茲人擔任了現在柯爾克茲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的主席。

此外，我記得去年有一些巴什基里亞的同志建議派俄羅斯的同志擔任巴什基里亞人民委員會主席。黨當時斷然否決了這個建議，決定派巴什基里亞人擔任這個職務。

任務就是在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內，首先是在烏克蘭這樣重要的共和國內，貫徹這條路線，貫徹使政府機關逐步民族化的路線。

第二、『挑選和吸收當地知識界中多少對我們忠順的分子，同時應當從黨員中培養蘇維埃幹部』。這一點不需要特別解釋。現在，當工人階級執掌政權，並把大多數居民團結在自己周圍的時候，害怕

吸收多少對我們忠順的分子甚至從前的「十月黨人」參加蘇維埃建設是沒有根據的。相反地，必須吸收所有這些分子參加各民族地區和各民族共和國的工作，以便在工作過程中改造他們並使他們蘇維埃化。

第三、「召開非黨工農代表會議，由政府委員報告蘇維埃政權的各項措施」。我知道在有些共和國內，例如在柯爾克茲共和國內，有許多人民委員不願意到各地去視察，不願意出席農民的會議，不願意在羣衆大會上講演，不願意向廣大羣衆報告黨和蘇維埃政權在對農民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問題上所進行的工作。這種情況必須結束。必須召開非黨工農代表會議，向羣衆報告蘇維埃政權的活動。不這樣做就休想使國家機關同人民接近。

其次，「改善當地居民文化生活的措施」。提出了一些措施，這些措施當然不能認爲很全面。這就是：(甲)「開辦使用當地語言的俱樂部（非黨的）和其他教育機關」；(乙)「擴大使用當地語言的各級學校網」；(丙)「吸收多少對我們忠順的人民教師」；(丁)「建立使用當地語言的識字普及協會網」；(戊)「組織出版工作」。所有這些措施都是很清楚很容易理解的。因此不需要特別加以解釋。

其次，「根據民族生活習慣的特點進行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政治局所提出的有關措施是：(甲)「調整移民，有些地方如有必要可停止移民」；(乙)「把國有土地分配給當地勞動居民，保證他們都有土地」；(丙)「發放低息農業貸款給當地居民」；(丁)「加強水利工作」；(戊)「把工廠遷到富產原料的共和國去」；(己)「開辦工藝學校和技術學校」；(庚)「開辦農業訓練班」；最後，

(辛)『大力幫助合作社，其中包括工藝合作社(爲了吸引手工業者)』。

我應當談一談最後一點，因爲它有特殊的意義。過去，在沙皇時代，發展的方式是：富農成長，農業資本增長，中農羣衆處於不穩定的平衡狀態，而廣大農民羣衆，廣大農業小業主羣衆不得不在破產和貧困的逆境中掙扎；而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當信貸、土地和政權都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裏的時候，就不會沿着舊道路發展了，儘管新經濟政策的條件還存在，儘管私人資本在復活。有些同志斷言由於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我們似乎不得不重演靠大多數農民的普遍破產來培植富農的舊歷史，這完全是錯誤的。這條道路不是我們的道路。在新的條件下，當無產階級執掌政權並掌握經濟命脈的時候，就必須沿着另一條道路發展，即沿着把農村小業主聯合成各種形式的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在私人資本鬥爭時得到國家的支持)的道路發展，沿着通過合作社逐步吸引千百萬農村小業主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發展，沿着逐步改善小業主的經濟狀況(而不是使他們陷於貧困)的道路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邊疆地區，在這些主要是農民的地區，『大力幫助合作社』對共和國聯盟未來的經濟發展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其次，『關於組織民族部隊的實際措施』。我認爲，這方面的措施我們制定得太遲了。我們必須建立民族部隊。當然，民族部隊不是一天就能建立起來的，但是現在可以而且必須着手在各共和國和各地區開辦軍事學校，以便在一定時期內從本地人中間培養出以後能夠成爲組織民族部隊核心的指揮人員。開始進行並向前推進這項工作是絕對必要的。如果我們在土爾克斯坦、烏克蘭、白俄羅斯、格

魯吉亞、阿爾明尼亞、阿捷爾拜疆這樣的共和國內有可靠的民族部隊和國無論在防禦方面或在採取迫不得已的行動方面就要比現在有保工作。當然，我們軍隊的數量一定會因此而增加二萬到二萬五千名，服的障礙。

關於其餘各項（見綱領草案）我就不談了，因為它們本身就很清楚。第三類問題是同設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院和組織共和國在這裏，基本問題，最惹人注目的問題已經提出來了，可是當然不能

政治局認為第二院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組成部分。曾經有員會以外，再成立一個不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最高民族蘇維埃。這中央執行委員會本身分成兩個院比較適宜，其中第一院可以稱為聯代表大會選出，第二院應當稱為民族蘇維埃，由各共和國中央執行大會選出，每一共和國選舉代表五人，每一地區選舉代表一人，而選代表大會批准。

至於第二院同第一院關係上的權利問題，我們主張兩院享有平等的。可是這兩個主席團都不能具有立法職能。兩院開會選舉一個共同的閉會期間最高權力的代表。凡提交某一院的任何一項法案，如未經

說，應當確立兩院的完全平等。

其次，關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問題。這個問題我已經簡略地談過了。政治局認為，不能容許兩個具有立法權的主席團同時並存。既然主席團是最高權力機關，那末就不能把它分成兩部分或更多的部分，最高權力機關必須是單一的。因此認為設立一個共同的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是適當的，這個主席團由第一院和第二院的兩個主席團以及兩院聯席會議即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選出的幾個人組成。

其次，關於統一的人民委員部的數量問題。你們知道，根據去年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舊憲法的規定，軍事、外交、對外貿易、郵電和鐵路五項事務由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集中掌管，其他五個人民委員部是直屬的，就是說，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糧食人民委員部、財政人民委員部、勞動人民委員部和工農檢查院帶有雙重的從屬性，而其餘六個人民委員部是獨立的。這個方案曾經受到拉柯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等部分烏克蘭人的批評。但是政治局否決了烏克蘭人關於把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從統一的人民委員部一類移到直屬的一類的建議，根據去年的各項決議的精神基本上通過了憲法的主要條文。

一般說來，政治局在制定綱領草案時所持的見解就是這樣。

我認為，關於共和國聯盟的憲法和第二院的問題，會議只限於簡單地交換意見就夠了，何況中央全會委員會正在研究這個問題。關於貫徹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各項決議的實際措施問題，我認為應

該談得更詳細些。至於提高本地的馬克思主義幹部問題，則應該着重討論一下。

我認爲，在展開討論以前，先聽取各共和國和各地區的同志根據本地的材料所做的報告是適當的。

四 結 論

(六月十二日)

首先我想談一下同志們的報告並根據這些報告一般地談談會議的性質。雖然這次會議是蘇維埃政權建立以來的第四次會議，但是這次會議是過去一切會議中唯一完滿的會議，會上聽取了各共和國和各地區的比較完滿的和有根據的報告。從報告中可以看出，各地區和各共和國的共產黨員幹部成長了，並且在學習獨立工作。我認爲，同志們在這裏所提供的豐富材料，同志們在這裏所介紹的各地區和各共和國的工作經驗，一定能夠用這次會議的記錄形式保存下來，成爲我們全黨的財富。人們成長了並且在前進，他們在學習管理。——這就是從報告中得到的第一個結論，第一個印象。

如果談到報告的內容，那末可以把提供的材料分成兩類：一類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報告，一類是非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布哈拉、花刺子模）的報告。

現在來看看第一類報告。從報告中可以看出，在黨的機關特別是國家機關接近人民的語言和生括習慣方面，應該認爲格魯吉亞是最發達最先進的共和國。格魯吉亞後面是阿爾明尼亞。它們後面是其餘的共和國和地區。我認爲這是無可爭辯的結論。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格魯吉亞和阿爾明尼

亞的文化水平很高。格魯吉亞識字人的百分數相當高——百分之八十，阿爾明尼亞至少佔百分之四十。這就是這兩個國家走在其他共和國前面的秘密。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識字人愈多和文化水平愈高的國家、共和國或地區，黨的機關和蘇維埃機關就愈接近人民，愈接近人民的語言和生活習慣。當然，這要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這是很明顯的，這個結論並沒有什麼新東西，正因為如此，這個結論經常被遺忘，人們往往竭力把文化的落後，國家的落後歸咎於黨的政策「錯誤」，歸咎於糾紛等等，然而這一切的根源是缺乏識字的人，沒有文化。要想使自己的國家成爲先進國家，即想使自己的國家制度發達，就必須提高居民的識字能力，提高本國的文化水平，而其他一切也就好辦了。

如果從這方面觀察問題和根據這些報告估計各個共和國的狀況，那就必須承認，土爾克斯坦的狀況，土爾克斯坦目前的情況是最不好最令人不安的。文化落後，識字人的百分數低得可怕，國家機關脫離土爾克斯坦各族人民的語言和生活習慣，發展速度慢得可怕，——情況就是這樣。然而很明顯，從使東方革命化的意義上看，土爾克斯坦是所有蘇維埃共和國中最重要、這不僅因爲土爾克斯坦是同東方有最密切聯系的民族的總匯，而且因爲從地理位置來看，它正插入最受剝削的、儲藏了大量反帝國主義火藥的東方的心臟。正因爲如此，目前的土爾克斯坦是蘇維埃政權最薄弱的地方。任務就是要使土爾克斯坦變成模範共和國，變成使東方革命化的前哨。正因爲如此，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土爾克斯坦羣衆的文化水平，使其國家機關民族化等等方面。我們應當不惜任何力量，不怕任何犧牲，無論如何也要實現這項任務。

蘇維埃政權的第二個薄弱的地方應當認爲是烏克蘭。這裏的文化、識字能力等等方面的情況和土爾克斯坦一樣或者幾乎一樣。國家機關也和土爾克斯坦一樣，很少接近人民的語言和生活習慣。同時，烏克蘭對西方各民族也具有土爾克斯坦對東方各民族那樣的意義。烏克蘭的工業發展的某些特點使它的情況更爲複雜。因爲烏克蘭基本工業部門（煤礦工業和冶金工業）不是從下面產生的，不是國民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從上面產生的，是輸入的，是用人工方法從外面建立的。因此這些部門的無產階級成員都不是本地人，都不說烏克蘭話。這種情況使城市對農村的文化影響和無產階級與農民的結合因無產階級和農民在民族成分上的這些差異而遇到很大困難。在進行把烏克蘭變成模範共和國的工作時，這一切情況都應當估計到。由於烏克蘭對西方各民族有巨大的意義，把它變成模範共和國是絕對必要的。

現在來談關於花刺子模和布哈拉的報告。我不打算談花刺子模，因爲花刺子模的代表沒有出席，而且只根據中央所掌握的材料來批評花刺子模共產黨和花刺子模政府的工作是不恰當的。布羅多在這裏所說的關於花刺子模的事情都是過去的。這和花刺子模的當前的情況很少有關係。在談到黨的時候，他說百分之五十的黨員是商人等等。也許過去的情況是這樣，可是現在那裏正在清黨，還沒有發給花刺子模一張『統一的黨證』，實際上那裏還沒有黨，只有在清黨以後才談得上有黨。據說那裏有幾千個黨員。我想在清黨以後那裏至多剩下幾百個黨員。去年布哈拉的情況也正是這樣，當時那裏有一萬六千個黨員，但在清黨以後剩下了不到一千個黨員。

現在來談關於布哈拉的報告。在談布哈拉的時候，我應當首先談談關於所聽取的報告的總的精神和性質。我認爲，關於各共和國和各地區的報告一般是真實的，符合實際情況的。只有一個報告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這就是關於布哈拉的報告。這甚至不是報告，而是一套外交手腕，因爲把布哈拉的一切不好的東西都掩蓋起來，粉飾起來，而把一切外表上光輝奪目的東西都提到首位，加以宣揚。結論是布哈拉一切都很好。我認爲，我們來參加這次會議不是爲了彼此玩弄外交手腕，互相恭維，背後互相瞞騙，而是爲了說出全部真相，用共產黨員的精神揭露一切膿瘡，割開它們並且開出治病的藥方。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才能向前邁進。從這一點來看，關於布哈拉的報告和其他一切報告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不真實。我在這裏向報告人提出關於布哈拉納季羅夫蘇維埃的成員問題並不是偶然的。納季羅夫蘇維埃就是人民委員會。在這裏面是否有傑赫坎即農民呢？報告人沒有答覆。但是據我了解，在布哈拉政府裏一個農民也沒有。在九個或十一個政府委員中，有富商的兒子、商人、知識分子、毛拉、商人、知識分子、商人，但沒有一個傑赫坎。可是，大家知道，布哈拉是一個十足的農民國家。

這個問題和布哈拉政府的政策有直接關係。這個由共產黨員領導的政府的政策是怎樣的？這個政府是否考慮到農民的利益？是否考慮到本國農民的利益？我只想舉出兩件事實來說明由共產黨員領導的布哈拉政府的政策。例如，從高級負責同志和老黨員簽署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布哈拉國家銀行自開辦以來發放給私商的貸款佔百分之七十五，發放給農民合作社的貸款只佔百分之二。用絕對數

字來表明：貸給商人七百萬金盧布，貸給農民二十一萬金盧布。其次，在布哈拉沒收土地的工作還沒有進行。但是那裏爲了農民的利益而沒收了酋長的牲畜……結果怎樣呢？從同一文件中可以看出，爲農民沒收了大約兩千頭牲畜，其中農民得到的總共只有二百頭左右，其餘的都賣掉了，當然是賣給富裕的人了。

而這個政府也叫做蘇維埃政府，人民政府！幾乎用不着證明，在上面所談的布哈拉政府的活動中，既沒有什麼人民的東西，也沒有什麼蘇維埃的東西。

報告人很愉快地說明了布哈拉人民對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對共和國聯盟的態度問題。照他說來，這方面也是一切都很好。原來布哈拉共和國願意加入聯盟。報告人大概認爲只要願意加入共和國聯盟，聯盟的大門就會敞開。不，同志們，問題並不那麼簡單。還必須問一下，是否准許加入共和國聯盟？爲了能够加入聯盟，必須事先在聯盟各族人民心目中博得加入聯盟的權利，必須爲自己爭取這個權利。我應當提醒布哈拉的同志們，決不能把共和國聯盟看做垃圾堆積處。

最後，在結束我關於報告結論的第一部分時，我想談談這些報告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報告人回答會議議程上的一個問題，即本地工作人員中是否還有沒有被使用的閒置力量問題。除了格林柯（可是格林柯不是報告人）以外，誰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誰也沒有提到這個問題。然而這個問題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各共和國或各地區的本地人中間是否有沒有被使用的閒人？如果有，那爲什麼沒有被使用？如果沒有這樣的後備力量，而又總是感到工作人員缺乏，那末用

什麼民族的人來填補黨和蘇維埃機關裏的空額。所有這些問題對黨都是極其重要的。我知道，在各共和國和各地區有一部分領導人員，主要是俄羅斯的領導人員，有時阻擋本地工作人員的進路，阻撓把他們提拔到一定的崗位上，排擠他們。這樣的情形是有的，而這就引起各共和國和各地區不滿的原因之一。但是引起不滿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原因是：本地人中間適於工作的閒置的力量少得可怕，很可能完全沒有。全部問題就在這裏。既然本地的工作人員缺乏，顯然就必須派外地的工作人員，其他民族的人去工作，因為時間是不等待人的，建設和管理都必須進行，而本地的幹部又成長得很慢。我認為各地區和各共和國的工作人員在這裏隻字不提這種情況，是有些狡猾的。但是很明顯，誤解十分之九是由於缺乏本地工作人員引起的。由此得出一個結論：把從本地人當中加緊造就蘇維埃和黨的工作人員這項工作當做黨的一項戰鬥任務提出來。

關於報告就談到這裏，現在來談談發言。同志們，我應當指出，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發言人批評政治局所提出的綱領草案的原則性部分。（喊聲：『很難提出批評。』）我認為這是表示代表會議贊同和擁護綱領的原則性部分中所闡述的那些論點。（喊聲：『對！』）

托洛茨基所作的補充或者說增補（它涉及原則性部分）是應當採納的，因為這個補充絲毫沒有改變決議中原則性部分的性質，並且是從決議的這個部分自然引伸出來的。何況，托洛茨基的補充實質上是對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中著名的一點的重複，在那裏說到不容許把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一套辦法機械地搬到各地區和各共和國裏去。這當然是重複，但是，我認為有些東西有時重複

一下是沒有害處的。因此我不想多談決議的原則性部分。斯克雷普尼克的發言爲這樣的結論，即他按自己的看法來解釋這一原則性部分，竭力在基本任務面前，即在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這一主要危險作鬥爭面前，遮蓋另一危險——地方民族主義的危險這一結論，提供了某些根據。但是這種解釋是極端錯誤的。

政治局的綱領的第二部分涉及到共和國聯盟的性質問題和爲設立所謂第二院而對共和國聯盟憲法作某些修改的問題。我應當說明，在這一問題上政治局和烏克蘭的同志們是有一些分歧的。政治局的綱領草案中所闡述的各點都是政治局一致通過的。但是某幾點曾遭到拉柯夫斯基的反對。這在中央全會委員會內也發生過。也許不應該談這一點，因爲這裏並不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已經報告過綱領的這一部分，並且說中央全會委員會和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會正在研究這個問題。但是既然有人提到這個問題，我就不能避開不談。

認爲邦聯和聯邦的問題不值一談是不對的。烏克蘭的同志們在討論共和國聯盟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著名的憲法草案時，刪去了草案中各共和國『聯合成一個聯盟國家』這句話，這難道是偶然的嗎？難道他們沒有這樣做嗎？爲什麼他們要刪去這句話呢？烏克蘭的同志們在自己的反草案中建議不要合併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和外交人民委員部，而把它們移到直屬的一類，這難道是偶然的嗎？假如每個共和國都保留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那末哪裏還有統一的聯盟國家呢？烏克蘭人在自己的反草案中主張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權力由兩院的兩個主席團分掌，而把中央

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權力化爲烏有，這難道是偶然的嗎？拉柯夫斯基的所有這些修正中央全會委員會都記錄下來了，並且加以分析研究，結果都被否決。那末爲什麼還要在這裏重複它們呢？我從某些烏克蘭同志的這種固執中看出一種意圖，這就是在確定聯盟的性質問題上竭力使聯盟成爲某種介於邦聯和聯邦之間而又偏重於邦聯的中間物。但是很明顯，我們要建立的不是邦聯，而是共和國聯邦，是一個統一管理軍事、外交、對外貿易以及其他事務的聯盟國家，這個國家的存在是不會縮小各個共和國的主權的。

如果我們在聯盟內設有外交人民委員部、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等等，而同時在各加盟共和國裏也設有所有這些人民委員部，那末很明顯，整個聯盟對外就不能以一個統一的國家出現，因爲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們合併這些機關而作爲一個統一的聯盟出現在外敵面前，或者是我們不合併這些機關，不建立聯盟國家，而組成共和國的混合體，那末每個共和國都必須有自己的平行機關。我認爲這裏的真理是在曼努伊里斯基同志方面，而不是在拉柯夫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方面。

關於國家問題就談到這裏，現在來談談純係具體實踐性質的問題，這些問題部分和政治局的實踐建議有關，部分和作實際工作的同志可能在這裏提出的修正有關。我作爲政治局的報告人沒有說也不能說政治局的具體的實踐建議很全面。相反地，我一開頭就聲明，這裏可能有疏忽的地方，作一些補充是不可避免的。斯克雷普尼克提出的關於工會的問題就是一個這樣的補充。這個補充是可以接受的。米高揚同志提出的一些補充我也採納了。關於某些落後共和國和落後地區的出版工作和一般

報刊的基金問題，確實必須提出修正。這個問題被忽略了。關於某些地區甚至某些共和國的學校問題也被忽略了。初級學校沒有被列入國家預算。這的確是疏忽，而且類似這樣的疏忽可能還很多。因此我建議那些對自己組織的情況談得很多而具體建議提得很少的做實際工作的同志想一想這方面的問題，並向中央提出有關的具體補充、修正等等，中央把它們彙集以後，就可以補充到有關各項裏去並分發給各級組織。

我不能不談談格林柯的一個建議，這個建議是：必須規定一些優待條件，使文化水平較低或者無產階級人數較少的民族中的本地人易於入黨和被提拔到黨的領導機關裏去。這個建議是正確的，我認為也應當採納。

我在結束我的結論時提出下列建議：以政治局關於民族問題的綱領草案為基礎，同時也考慮到托洛茨基的修正。建議中央委員會把現有的和可能提出的具有實踐性質的修正分別加到綱領的有關各項裏去。建議中央委員會在一星期內把綱領草案、記錄、決議、報告人留下的最重要的文件印發給各級組織。不必成立專門委員會來通過綱領草案。

我沒有談到成立中央民族問題委員會的問題。同志們，我對成立這樣的組織是否適當有些懷疑，第一、因為各共和國和各地區肯定地不會為這件事派給我們高級工作人員。這一點我深信不疑。第二、我想，區域委員會和民族中央委員會一定不會同意把自己在分配工作人員方面的部分權利轉讓給中央直屬的委員會。現在我們在分配人力時，通常都徵求區域委員會和民族中央委員會的意見。如

果成立了這個委員會，重心自然就會移到委員會方面。民族問題委員會、合作社問題委員會或農民工作問題委員會沒有相似之處。農村工作委員會和合作社委員會通常擬定一般指示。而民族問題方面所需要的不是一般指示，而是擬定各個共和國和各個地區的具體步驟，這是一般委員會做不到的。任何委員會未必都能擬定和通過任何一項決議，例如關於烏克蘭共和國的決議；兩三個烏克蘭人不能代替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正因為如此，我認為成立這個委員會是不會產生重大效果的。這裏所提出的那個步驟，即把民族幹部派到中央各主要部門裏去，我認為在目前已經足夠。如果半年後沒有顯著成績，那時就可以提出成立專門委員會的問題。

五 對發言的答覆

(六月十二日)

因爲有人向我進攻，(笑聲)請允許我回答關於「統一而不可分的整體」的問題。不是別人，正是斯大林在關於民族問題決議的第七點裏斥責了「統一而不可分的整體」這種說法。顯然，這裏說的不是成立『不可分的整體』，而是成立聯邦，然而烏克蘭人却硬要我們成立邦聯。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拉柯夫斯基。我再說一遍(這一點我已經談過一次)，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憲法中載明，某某共和國『聯·合·成·一·個·聯·盟·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烏克蘭人寄給中央一個反草案。其中說道：某某共和國『組·成·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聯·合·成·一·個·聯·盟·國·家』這句話被刪去了。總共刪去了九個字。爲什麼呢？這難道是偶然的嗎？這哪裏還有聯邦呢？我認爲拉柯夫斯基的邦聯制的萌芽還表現在：他刪去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憲法中著名的一條所說的主席團是『常會閉會期間最高權力的代表』那句話，主張權力由兩院的兩個主席團分掌；就是說把聯盟的權力化爲烏有。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爲他反對建立聯盟國家的思想，反對建立真正的聯盟政權。這是第二。

有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負責工作人員參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會議

第三是烏克蘭人的草案不主張合併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而主張把它們從統一的一類移到直屬的一類。

這就是使我在拉柯夫斯基的建議裏看到的邦聯萌芽的三點依據。憲法原文也是由烏克蘭代表團通過的，你和憲法原文之間怎麼會有這種分歧呢？（拉柯夫斯基：「已經有過第十二次代表大會。」）

對不起，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否決了你的修正，並通過了「各共和國聯合成一個聯盟國家」這句話。

我看到，在從共和國聯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到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和這次會議期間，某些烏克蘭同志已經逐漸從聯邦制轉向邦聯制。我是贊成聯邦的，就是說我反對邦聯，反對拉柯夫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的建議。

十月革命和中間階層問題

毫無疑問，中間階層問題是工人革命的基本問題之一。中間階層就是農民和城市小勞動者。被壓迫民族也應該算在裏面，因為它們中間十分之九是中間階層。可見，按經濟地位來說，這是一些介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層。這些階層的重要性是由下面兩種情況決定的：第一、這些階層是現今各國人口中的大多數，或者至少是數量很大的少數；第二、它們是資產階級從中招募軍隊以反對無產階級的重要後備力量。如果沒有中間階層首先是農民的同情和支持，無產階級就不能保持住政權，在我們共和國聯盟這樣的國家內尤其是如此。如果沒有使這些階層至少保持中立，如果這些階層還沒有脫離資產階級，如果這些階層的大多數還是資本的軍隊，那末無產階級就休想奪取政權。由此就產生了爭取中間階層的鬥爭，爭取農民的鬥爭，這一鬥爭像一根紅綫貫穿在我們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的全部革命中，這一鬥爭還遠沒有結束，還將繼續進行下去。

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沒有得到法國農民的同情和響應。巴黎公社崩潰的原因之一，就是它遇到了中間階層首先是農民的抗拒。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情形也是如此。

以考茨基為首的一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根據歐洲歷次革命的經驗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間

階層，首先是農民，好像生來就是工人革命的敵人，因此必須採取比較長期的發展方針，使無產階級成爲各民族中的大多數，從而爲工人革命的勝利創造實際條件。這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根據這個結論，警告無產階級不要『過早』發動革命。他們根據這個結論，就從『原則上考慮』，把中間階層完全交給資本支配。他們根據這個結論，向我們預言俄國十月革命必遭失敗；他們的論據是：無產階級在俄國人口中佔少數，俄國是個農民國家，因此工人革命在俄國不可能取得勝利。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本人對中間階層首先是對農民的評價完全不是這樣。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把農民拋開，讓他們在政治上完全受資本支配，並且大叫大嚷地誇耀自己『原則性很強』，可是馬克思，這位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原則性最強的馬克思主義者，却堅定不移地勸告共產黨不要忽視農民，要把他們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要保證在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取得他們的支持。大家知道，在五十年代，在法國和德國的二月革命失敗以後，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並通過恩格斯轉達德國共產黨說：

『德國的全部問題將決定於是否可能有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五)

這是對五十年代的德國這個農民國家所說的話，當時德國的無產階級人數極少，並且不如一九一七年俄國的無產階級那樣有組織，德國的農民由於自己所處的地位，不如一九一七年俄國的農民那樣願意支持無產階級革命。

毫無疑問，十月革命是『農民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完滿結合，關於這種結合，馬克思已經

不顧一切「有原則性的」空談家的反對而論述過了。十月革命證明，這種結合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能實現的。十月革命證明，只要無產階級能够使中間階層首先是農民脫離資產階級，能够使這些階層由資本的後備力量變為無產階級的後備力量，它就能够奪取政權並保持政權。

簡單地說：十月革命是世界上一切革命中第一次把中間階層問題首先是農民問題提到首要地位的革命，它不顧第二國際英雄們的一切「理論」和哭訴而勝利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一個功績，如果這裏一般也稱得上功績的話。

但是，問題不限於此。十月革命還更進一步，它力求把各被壓迫民族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上面已經說過，各被壓迫民族中十分之九是農民和城市小勞動者。但是，這還不能完全說明「被壓迫民族」這一概念。被壓迫民族通常不僅作為農民和城市勞動者受壓迫，而且作為民族，即作為屬於一定的民族、具有一定的語言、文化、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的勞動者受壓迫。雙重壓迫的壓力不能不使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革命化，不能不推動他們去同壓迫的基本力量作鬥爭，去同資本作鬥爭。這種情況就成了無產階級不僅能够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同「農民戰爭」結合，而且能够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同「民族戰爭」結合的基礎。這一切不能不使無產階級革命的活動範圍大大地超出俄國國境以外，不能不使資本的最深遠的後備力量受到打擊。如果說爭取統治民族內部的中間階層的鬥爭是爭取資本的最接近的後備力量的鬥爭，那末爭取被壓迫民族解放的鬥爭就不能不成為爭取資本的某些最深遠的後備力量的鬥爭，就不能不成為殖民地各族人民和沒有充分權利的各族人民擺脫資本壓迫

的鬥爭。後面這一種鬥爭還沒有結束，它甚至還沒有取得第一批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但是，由於十月革命，這個爭取深遠的後備力量的鬥爭已經開始了，並且它一定會隨着帝國主義的發展、隨着我們共和國聯盟的實力的增長、隨着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進展而一步步擴張開來。

簡單地說：十月革命真正使無產階級從被壓迫的和主權不完整的國家的人民羣衆中爭取資本的深遠的後備力量的鬥爭開始了，十月革命第一次舉起了爭取這些後備力量的鬥爭旗幟，——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個功績。

我們是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把農民爭取過來的。農民從無產階級手中得到了土地，在無產階級幫助下戰勝了地主，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參加了政權，因此，他們不能不感覺到，不能不了解到他們的解放過程過去是而且將來還會是在無產階級的旗幟下，在無產階級的紅旗下進行。這種情況就不能不使從前農民所害怕的社會主義旗幟變成了吸引他們注意並促使他們擺脫愚昧、貧困和壓迫的旗幟。

關於被壓迫民族也應該這樣說，而且更應該這樣說。爭取民族解放的呼聲，這個由解放芬蘭、撤回駐波斯和中國的軍隊、成立共和國聯盟以及給土耳其、中國、印度斯坦和埃及人民公開的道義上的援助等等事實證實了的呼聲，是從十月革命的勝利者口中第一次發出的。在被壓迫民族的眼裏，俄國從前是一面壓迫的旗幟，而現在，在它已成爲社會主義國家之後，就變成了一面解放的旗幟，這一事實決不能認爲是偶然的。十月革命的領袖列寧同志的名字，現在成了殖民地國家和主權不完整的國家裏受壓抑受摧殘的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口中最愛戴的名字，這也不是偶然的。如果說從前，在極

遼闊的羅馬帝國內，基督教被認為是受壓迫受摧殘的奴隸的救星，那末現在的情形是：在帝國主義的極廣大的殖民地國家中，社會主義可以成爲（而且已經開始成爲！）千百萬羣衆解放的旗幟。無庸置疑，這種情況大大地促進了同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偏見作鬥爭的事業，並給社會主義思想開闢了一條通向被壓迫國家最遙遠的角落的道路。從前社會主義者很難在被壓迫國家或壓迫國家的非無產階級中間階層中公開發面，現在他們却可以公開地在這些階層中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希望人們傾聽他們的話，希望人們也許會聽從他們，因爲他們已經有了像十月革命這樣一個有力的論據。這也是十月革命的成果。

簡單地說：十月革命爲社會主義思想掃清了通向各民族和各部落內的中間的、非無產階級的農民階層的道路，十月革命把社會主義旗幟變成了這些階層所歡迎的旗幟。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三個功績。

載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真理報」第二五三號

署名：約·斯大林

紀念女工和農婦第一次代表大會⁽²⁰⁾五周年

五年前，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在莫斯科召開了全俄女工和農婦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有一千多人，代表着不下一百萬勞動婦女。這次代表大會在我們黨的勞動婦女工作上是一個里程碑。這次代表大會的不可估量的功績在於：它為組織我們共和國女工和農婦的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礎。

有些人會認為，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黨對羣衆（其中也包括婦女）是經常進行政治教育的，既然我們有團結一致的工農幹部，對婦女的政治教育就不會有重大的意義。這種論斷是根本不對的。現在，當政權已經轉到工人和農民手中的時候，對勞動婦女的政治教育就具有頭等重要意義。

原因如下：

我國約有一億四千萬人口，其中至少半數是婦女，主要是女工和農婦，她們備受壓抑，覺悟很低，愚昧無知。我們的國家已經認真動手建設蘇維埃新生活了，如果佔我國人口半數的婦女今後仍然受到壓抑，沒有覺悟和愚昧無知，她們就一定會成爲一切前進運動中的絆腳石，這難道還不顯嗎？

女工和男工並肩站在一起。她們和男工一起進行我國工業建設的共同事業。如果她們是覺悟的，如果她們受到政治教育，她們就能推進共同事業。但是，如果她們受到壓抑和愚昧無知，她們就會危害共同事業，這當然不是出於她們的惡意，而是由於她們的愚昧無知。

農婦和農夫並肩站在一起。她們和農夫一起推進發展和繁榮我國農業的共同事業。如果她們能擺脫愚昧無知，她們就會給這一事業帶來莫大的好處。相反地，如果她們今後仍然做愚昧無知的俘虜，她們就會阻礙整個事業。

女工和農婦同男工和農夫一樣是自由的公民。她們選舉我們的蘇維埃，我們的合作社，她們也可以被選入蘇維埃、合作社。如果女工和農婦受到政治教育，她們就能改善我們的蘇維埃和合作社，使它們得到鞏固和發展。如果女工和農婦愚昧無知，她們就會削弱並破壞蘇維埃和合作社。

最後，女工和農婦是我們青年——我們國家的未來——的母親和教養者。她們能摧殘孩子的心靈，也能為我們教養出心理健全、能把我們國家推向前進的青年，這要看做母親的是同情蘇維埃制度還是做神甫、富農、資產階級的尾巴。

正因為如此，現在，當工人和農民動手建設新生活時候，對女工和農婦的政治教育工作是真正戰勝資產階級的頭等重要的工作，極其重要的工作。

正因為如此，女工和農婦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意義的確是不可估量的，它為組織勞動婦女的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礎。

五年前，女工和農婦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時，黨的當前任務是吸引幾十萬女工參加建設蘇維埃新生活的共同工作。當時站在最前列的是工業區的女工，她們是勞動婦女中最活躍最覺悟的分子。應當承認，五年來在這方面已經做了不少工作，雖然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現在，黨的當前任務是吸引千百萬農婦參加建設我們蘇維埃生活的共同工作。經過五年的工作，已經從農婦的隊伍中選拔出許多領導者。我們希望農婦領導者的隊伍能有新的覺悟的農婦來補充。我們希望黨也能完成這項任務。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載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女共產黨人」雜誌第十一期

署名：約·斯大林

在軍事學院慶祝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簡要報道)

在我們紅色騎兵建立四周年的慶祝大會上，騎兵集團軍的創始人及其光榮的紅色戰士斯大林同志發表了演說。

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在組織騎兵的基本核心這個未來的騎兵集團軍的萌芽的時候，它的首倡者同軍事領導集團和軍事專家的意見發生了衝突，因為他們根本否認有組織騎兵的必要。

騎兵集團軍歷史上最突出的一頁是：一九一九年夏天，我們的騎兵已經成爲大量騎兵和大批機槍的結合。有名的『塔呂卡』就是這種結合的標誌。

無論我們的騎兵怎樣強大，如果它在作戰時不善於把馬的力量同機槍和砲的力量結合起來，它就不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載入騎兵集團軍史冊的最光榮的一頁是：一九一九年年底，在通向沃龍涅什的道路上，我們騎兵的十二個團打垮了敵人的二十二個團。從這個時候起，我們的騎兵就開始真正成爲騎兵集團軍。

這個時期的特點是我們的騎兵又具備了一種使它能夠戰勝鄧尼金騎兵的新的特性。這就是：它

把若干步兵部隊和自己聯結起來，通常用大車調運步兵部隊，並且用步兵部隊作為抗擊敵人的掩護，以便在其掩護下稍稍休息，聚集力量，重新打擊敵人。這就是騎兵和作為輔助力量的步兵的結合。這種結合，這另一種新的性質，使我們的騎兵變成一個揮動自如、堅強有力的拳頭，使敵人胆顫心驚。

斯·大·林·同·志·在·結·束·演·說·時·說：同志們，我並不是一個易於陶醉的人，但是，我必須說，如果我們的騎兵集團軍能够把這些新的性質保持下去，我們的騎兵和它的領袖布瓊尼同志就會是不可戰勝的。

載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消息報」第二六五號

關於黨的任務

(在小組長、爭論俱樂部成員和支部委員會委員

參加的俄共(布)紅色勃列斯尼亞區委員會擴大

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同志們！首先我必須說明，在這裏我不是代表黨中央，而是以個人名義來做報告的。如果會議願意聽取這樣的報告，我就來談談。(喊聲：「請講吧。」)這並不是說，我在這個問題上和中央有什麼分歧，——絕對沒有。我以個人名義講話，只是因為中央關於制定改善黨內狀況辦法的委員會(八)最近就要向中央呈報自己工作的結果；這個結果還沒有呈報，所以我現在還沒有合法權利代表中央講話，雖然我相信，我現在要對你們講的基本上會把中央對這些問題的態度表達出來。

爭論是黨堅強有力的標誌

我想在這裏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報刊上和支部裏正在進行的爭論的意義問題。這次爭論說

明什麼呢？它標誌着什麼呢？這是不是一場闖入黨內平靜生活的暴風雨？這次爭論是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是黨瓦解和崩潰的標誌，或者像另一些人說的那樣，是黨蛻化的標誌？

同志們，我認爲都不是：既不是蛻化，也不是瓦解。事實上，黨在最近時期壯大了，它清除了大量的廢物，它更加無產階級化了。你們知道，兩年前我們至少有七十萬黨員，你們知道，當時有好幾千黨員退出了黨或者被驅逐出黨。其次，在這段時間內，由於工業的發展使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狀況有所改善，由於熟練的老工人從農村歸來，由於在產業工人中掀起了文化高漲的新浪潮，黨的成員改善了，黨的質量提高了。

一句話，由於這一切條件，黨壯大了，質量更高了，它的要求提高了，它的要求更加嚴格了，它想比以前更多地知道一些東西了，它希望比以前更多地解決一些問題了。

已經展開的爭論不是黨軟弱的標誌，更不是黨瓦解或蛻化的標誌，而是黨有力的標誌，黨堅強的標誌，黨的成員質量改善的標誌，黨的積極性提高的標誌。

爭論的原因

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二個問題是：爲什麼恰恰在目前時期，恰恰在今年秋天，黨內政策問題具有尖銳的性質。怎樣解釋這一點呢？原因在哪裏呢？同志們，我認爲這裏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今年八月我國某些地區因工資問題而掀起的不滿和罷工浪潮。這次罷工浪潮暴露了我們一些組織的缺點，暴露了我們一些黨組織和工會組織不過問企業中所發生的事件的現象；這次罷工浪潮也暴露了我們黨內存在着一些力求瓦解黨的、實質上是反共的秘密組織。所有這些因罷工浪潮而暴露出來的缺點都以如此耀眼的閃光，如此令人清醒的光綫映射到黨的身上，使黨感到必須改變黨內狀況。

黨內政策問題恰恰在這個時期尖銳化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們黨員同志大批休假。休假當然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休假的人很多就使得黨內生活的節拍恰恰在工廠裏產生不滿情緒的時候大大地緩慢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積累下來的缺點恰恰在今年秋天這個時期暴露出來。

黨內生活的缺點

我已經講過，我們黨內生活的缺點是在今年秋天暴露出來的，這些缺點提出了改善黨內生活的問題。這些黨內生活的缺點究竟是什麼呢？是不是像有些同志所想像的那樣是黨的路綫不正確？或者黨的路綫是正確的，但在實踐中却離開了正確的道路，由於某些主觀和客觀的條件而被歪曲了？

我認爲我們黨內生活的主要缺點是：雖然體現在我們歷次代表大會決議中的黨的路綫是正確的，但地方（當然不是任何地方，而是某些地區）上的實踐是不正確的。雖然我們黨的無產階級民主

路線是正確的，但地方上在實踐中用官僚主義的態度歪曲了這一路綫。

這就是主要的缺點。歷次代表大會（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所確定的黨的基本路線和我們的地方組織在執行這一路綫時的實踐之間存在着矛盾，——這就是黨內生活一切缺點的根源。

黨的路綫說，我們黨的實踐中的最重要問題（當然，那些急待解決的或者有關軍事秘密和外交秘密的問題除外）一定要在黨的會議上進行討論。黨的路綫就是這樣說的。但是黨的地方（當然不是任何地方）上的實踐却認為：黨內實踐中的一些問題實在沒有多大必要在黨的會議上進行討論，因為中央和其他領導組織自己會解決這些問題。

黨的路綫說，如果沒有像黨齡等等不可克服的障礙存在，我們黨的負責人就一定要由選舉產生。你們知道，按黨章規定，省委書記必須是十月革命前入黨的，縣委書記必須有三年黨齡，支部書記必須有一年黨齡。但是黨的實踐却往往認為，既然需要黨齡，那就是說不需要真正的選舉了。

黨的路綫認為，必須使黨員羣衆了解經濟機關、企業和托拉斯的工作，因為我們的黨支部對企業中的缺點一定要向非黨羣衆負道義上的責任。然而黨的實踐却認為，既然有中央委員會向經濟機關發佈指示，既然經濟機關受這些指示的約束，即使沒有黨員羣衆自下而上的監督，這些指示也是會被執行的。

黨的路綫認為，各部門的負責工作人員，不論是黨的工作人員、經濟工作人員、工會工作人員或軍事工作人員，儘管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各有專業，但是他們相互之間還是要有聯系，他們都是一個

整體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為他們都是為無產階級的共同事業工作，而這個事業是不能分裂成幾部分的。黨的實踐却認為，既然有工作上的專業化，有黨本身的工作、經濟工作、軍事工作等等的分工，黨的工作人員就可以不對經濟工作人員負責，經濟工作人員就可以不對黨的工作人員負責，一般說來，他們之間的聯系就必然削弱甚至失掉。

同志們，在我們歷次代表大會（從第十次代表大會起到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止）的一系列決議中所確定的黨的路綫和黨的實踐之間的那些矛盾，一般說來就是如此。

我決不因爲黨的路綫被這樣歪曲而責備地方組織，因爲，如果分析一下，這裏與其說是我們地方組織的過錯，不如說是它們的不幸。這種不幸表現在哪裏，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這一點我在下面要講到，但是，我想把這一事實肯定下來，以便解釋這種矛盾，然後試圖提出改進辦法。

我也決不認爲我們中央沒有過錯。它同其他一切機關和組織一樣也有一些小過錯，——中央在這裏也有一部分過錯和一部分不幸，中央的這一部分過錯，至少表現在它由於某種原因而沒有及時揭露這些缺點，沒有設法克服這些缺點。

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裏。現在問題是要弄清我剛才講過的這些缺點產生的原因。這些缺點是怎樣造成的呢？怎樣才能把它們消滅呢？

造成缺點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我們的黨組織還沒有剷除或者至今還沒有剷除戰爭時期的某些殘餘，這個時期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在我們工作人員的頭腦中留下了黨內軍事作風的殘餘。我認爲這些殘餘表現在下面這種對黨的看法上：黨不是一個獨立的有機體，不是無產階級的獨立的戰鬥組織，而是某種類似機關系統的東西，某種由低級職員和高級職員組成的、類似許多機關的綜合體的東西。同志們，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看法，它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這種看法是戰爭時期給我們遺留下來的殘餘，那時我們使黨軍事化，不得不把黨員羣衆的自動性問題挪到次要地位，那時戰鬥命令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不記得這種看法是什麼時候以完備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但是這種看法或者這種看法的因素仍然有力地影響着我們的工作。同志們，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同這種看法作鬥爭，因爲它是一種最現實的危險，它造成有利條件，使我們黨的實質上是正確的路綫在實踐中受到歪曲。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的國家機關（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義的機關）對黨和黨的工作人員有某種壓力。一九一七年，當我們向上走的時候，向十月革命走的時候，我們是這樣想的：我們將要有公社，這種公社將是勞動者的聯合；我們將消滅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如果不在最近時期內，那末經過兩三個短短的時期，國家就能變成勞動者的聯合。可是實踐表明，這對我們說來還是一種遙遠的理想，要

使國家擺脫官僚主義分子，要把蘇維埃社會變成勞動者的聯合，人民必須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周圍必須有完全有保障的和平環境，有了這種環境就沒有必要保存大量的常備軍，保存常備軍是需要大量的開支和龐大的機構的，因此它的存在就會影響其他一切國家機關。我們的國家機關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義的機關，而且在長時期內還會是這樣的機關。在這個機關裏工作的有我們的黨員同志，而這個機關的環境——據我看來是氣氛——是這樣的：它促使我們的黨的工作人員，我們的黨組織官僚主義化。

同志們，造成缺點的第三個原因是我們的一些支部缺乏積極性，落後，有的甚至全部是文盲，邊疆地區尤其是如此。這些地區的支部很不積極，政治上和文化上都落後。毫無疑問，這種情況也給歪曲黨的路綫造成了有利條件。

第四個原因是地方上缺乏足夠數量的受過訓練的黨員同志。不久以前，我在中央委員會聽過一個烏克蘭組織的代表的報告。做報告的同志極有才能，前途遠大。他說，一百三十個支部中有八十個支部的書記是由省委會委派的。這位同志駁斥了認為這個組織這樣做是不對的意見，他所持的理由是支部裏沒有識字的人，沒有够黨齡的人以及支部自己請求派書記給它們等等。我可以說，這位同志有百分之五十是說得過火的，事實上，這裏的問題不但在於支部裏沒有受過訓練的人，而且在於省委會過於熱心和沿襲舊傳統。但是，如果省委會有百分之五十正確，那末，既然在烏克蘭有這樣的支部，在組織很年輕、黨員幹部和識字的人都比烏克蘭少的邊疆地區就更應該有這樣的支部，這難道還

不明顯嗎？這也是造成有利條件，使我們黨的實質上是正確的路綫在實踐中受到歪曲的一個原因。

最後，第五個原因是通報工作做得很差。我們的通報工作，首先是中央的通報工作做得不好，這可能是因為它的工作過於繁忙。地方上也很少向我們彙報。應該結束這種情況了。這也是我們黨內的缺點積累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怎樣消滅黨內生活的缺點？

必須採取哪些辦法來消滅這些缺點呢？

第一、必須用一切辦法不倦地反對我們黨內的戰爭時期的殘餘和習慣，反對下面這種錯誤的看法：我們黨似乎是一個機關系統，而不是積極思考、獨立活動、充滿活力、破壞舊事物和創造新事物的無產階級的戰鬥組織。

第二、必須提高黨員羣衆的積極性，黨員羣衆所關心的一切問題，只要可以公開討論，都讓他們進行討論，對於各級黨機關所提出的一切建議，保證能夠自由地進行批評。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黨的紀律成爲真正自覺的真正鐵的紀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黨員羣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經驗豐富起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爲黨員羣衆準備必要的條件，逐步地從下層選拔出新的積極的工作人員和新的領導者。

第三、如果沒有像黨齡不夠等等不可克服的條件存在，那末一切黨組織和負責人必須真正由選舉產生。在提拔某些同志担任黨的負責工作時，必須從實踐中剷除忽視組織內大多數人的意志的現象，必須真正貫徹選舉原則。

第四、在中央委員會、省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下面必須有常設的各部門負責工作人員（經濟工作人員、黨的工作人員、工會工作人員、軍事工作人員）會議；必須定期召開會議，在會上提出會議認為必須提出的問題；必須使各種工作人員之間的聯系不致中斷，使所有這些工作人員感到自己是一個黨的大家庭裏的一員，是在為一個共同的、不可分割的事業即無產階級的事業工作；必須在中央和地方組織周圍造成一種環境，使黨能夠取得和檢驗我們各部門負責工作人員的工作經驗。

第五、必須把我們生產部門的黨支部吸引到與企業和托拉斯的工作進程有關的問題方面來。必須使支部了解我們企業和聯合企業的管理機關的工作，使它們能夠影響這一工作。你們是支部的代表，你們一定知道我們生產部門的支部在企業的工作進程方面向非黨羣衆所負的意義上的責任多大。支部要能够在工廠裏領導並帶領非黨羣衆，能夠對企業的工作進程負責（對於企業中的缺點，支部無條件地要向非黨羣衆負道義上的責任），就應該了解這些工作，就應該有可能這樣或那樣地去影響這些工作。因此，必須吸引支部討論與企業有關的經濟問題，必須經常舉行有托拉斯內部各企業的支部代表參加的經濟會議來討論與托拉斯各項工作有關的問題。這是為豐富黨員羣衆在經濟方面的經驗以及組織自下而上的監督所必需的可靠方法之一。

第六、必須提高我們黨支部的質量。季諾維也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說過，我們某些地方的黨支部在質量上落後於周圍的非黨羣衆。

當然，這種說法不能概括和適用於所有的支部。確切些說大概是這樣：如果我們沒有把我們的黨支部弄得很空虛，如果我們沒有從這些支部裏調人出來擔任經濟、行政、工會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那末這些支部的文化水平要比現在高得多，在非黨羣衆中也會享有更高的威信。如果近六年來我們從支部調走的所有工人同志，所有幹部都回到自己的支部，那末這些支部就會比一切非黨工人，即使是很進步的非黨工人強好幾倍，這難道還用證明嗎？正因為黨沒有另外的幹部來改善國家機關，正因為黨今後仍然不得利用這個源泉，如果我們不採取緊急辦法來改善我們支部的質量，那末它們的文化水平今後還是不能很快提高，首先必須在支部裏盡量加強黨的教育工作。此外，必須拋棄我們的地方組織往往在接收工人同志入黨時表現出來的那種多餘的形式主義。我認爲不應當醉心於形式主義；黨可以而且應當放寬從工人階級隊伍中接收新黨員的條件。地方組織已經開始進行這工作。黨應當掌握這工作並開展一個有組織的運動，使產業工人易於入黨。

第七、必須加強非黨工人工作。這也是一種能够改善黨內狀況、提高黨員羣衆積極性的辦法。我必須指出，我們的組織對吸引非黨工人參加我們蘇維埃機關至今還很少注意。比如拿現在正在進行的莫斯科蘇維埃選舉來說。我認爲這次選舉的一個重大缺點就是非黨人士當選太少。據說組織上決定至少要有一定數量的非黨人士當選，要佔一定的比例等等。但是，我看到實際上他們當選的人數要

少得多。據說羣衆似乎拚命想選共產黨員。同志們，我對這一點表示懷疑。我認爲，如果我們不對非黨人士表示某種最低限度的信任，非黨人士就會相應地對我們的組織表示很大的不信任。同志們，對非黨人士的這種信任是絕對必要的。必須促使共產黨員放棄自己的候選資格。不要老是說只選共產黨員，要鼓勵非黨人士，要吸收他們參加管理國家的工作。我們一定能因此得到好處，我們的組織一定能因此得到非黨人士的相應的信任。莫斯科的選舉就是一個例子，它說明我們的組織是怎樣不去擴大自己的活動範圍，不去逐步地把非黨人士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而開始閉關自守起來。

第八、必須加強農民工作。我們有些地方的農村支部枯萎了，它們的成員有時跑掉了，它們沒有得到農民很大的信任（這一點必須承認）。我不知道爲什麼不能向這些支部提出一些實際任務，例如提出下面兩項任務：第一、解釋和宣傳同農民生活有關的蘇維埃法律；第二、宣傳和普及農藝基本知識，例如必須按時耕地，必須選種等等。同志們，你們是否知道，如果每個農民都有決心花一點工夫去選種，那末不經過任何土壤改良，不使用新的機器，每俄畝的產量就可以增加十普特左右？每俄畝的收成增加十普特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總產量每年增加十億普特。這一切是不用花很大力量就可以得到的。我們的農村支部爲什麼不能做這些工作呢？難道這不比談論克遜的政策重要嗎？只有這樣做，農民才能了解共產黨員已經停止空談，已經行動起來；只有這樣做，我們的農村支部才能得到農民極大的信任。

關於在能够提供新幹部的青年中、在紅軍中、在婦女代表中以及在一切非黨人士中加強黨的教

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對改善和活躍黨的生活是多麼必要，我就不講了。

加強我在前面所談到的通報工作即加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通報工作對於我們是多麼必要，我也不多講了。

同志們，這就是中央早在今年九月規定的必須自下而上實行的改進辦法，也就是黨內民主的方針。

現在我想談談「真理報」上一些爭論性的短文中所暴露出來的關於工人民主問題的兩種極端的過分的看法。

第一種極端看法表現在選舉問題上。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主張「徹底」選舉。既然要選舉，那就盡量選舉吧！黨齡嗎？爲什麼要它呢？選你願意選舉的人吧。同志們，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這種看法黨是不能接受的。當然，現在我們沒有戰爭，我們處在和平發展時期。但是，我們有新經濟政策。同志們，這一點是不能忘記的。清黨不是在戰時而是在戰後開始的。爲什麼呢？因爲在戰時，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問題，失敗的恐懼使黨團結成一個整體，黨內的一些腐化分子也不得不執行黨的總路線。現在我們的頭上已經沒有這些箍了，因爲已經沒有戰爭了，現在我們有新經濟政策，我們容許資本主義存在，資產階級正在復活。誠然，這一切都使黨純潔，使黨鞏固，但是另一方面，有一種資產階級出生和成長的新氣氛籠罩着我們，資產階級雖然還不是那麼強大，但是已經能够在國內商業方面擊敗我們某些合作社和商業機關了。正是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黨才開始清黨，把黨員的人數減少了。

一半，正是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黨才決定：爲了保護我們的組織，使它不受新經濟政策的影響，必須使非無產階級分子入黨的條件更嚴格，必須規定黨內負責人的黨齡等等。黨制定了這些限制『擴大的』民主的預防辦法，是否做得對呢？我認爲是做得對的。正因爲如此，我認爲民主是必需的，選舉是必要的，但是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所規定的限制辦法，至少是其中的一些主要辦法，也應當仍然是有效的。

第二種極端看法表現在爭論的範圍問題上。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主張無限制的爭論。他們認爲討論問題是黨的工作的全部，而忘記了黨的工作的另一方面，即要求實現黨的決議的積極的方面。至少臘德津的短文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臘德津企圖援引托洛茨基的話來論證無限制爭論的原則，說托洛茨基似乎講過『黨是思想一致者的自願聯盟』。我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過這句話，但是沒有找到。托洛茨基未必會把這句話當做黨的定義的完善公式說出來，即使他說過，也未必說到這裏就完了。黨不僅是思想一致者的聯盟，而且是行動一致者的聯盟，是在共同的思想基礎（綱領、策略）上進行鬥爭的行動一致者的戰鬥聯盟。我認爲這樣援引托洛茨基的話是不對的，因爲我知道托洛茨基是最愛強調黨的工作的積極方面的中央委員之一。因此我認爲臘德津的定義應該由他自己負責。這個人定義會引起什麼後果呢？會引起下面兩種可能性中的一種：或者是黨墮落成爲宗派、哲學學派，因爲只有在這種狹小的組織內才可能有完全的思想一致；或者是黨變成爭論不休的俱樂部，永遠討論，永遠議論，直到形成派別，直到分裂。這兩種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種我們黨都是不能接受的。正因爲如

此，我認爲討論問題是必要的，爭論是必需的，但是，爭論一定要有範圍，以便防止黨這個無產階級的戰鬥部隊墮落成爲爭論俱樂部。

同志們，在我結束我的報告的時候，我必須提醒你們不要走這兩種極端。我想，如果我們擺脫了這兩種極端看法，老老實實地堅決貫徹中央早在今年九月規定的關於黨內民主的方針，我們就一定能够改進我們黨的工作。（鼓掌）

載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

「真理報」第二七七號

關於爭論，關於拉法伊爾， 關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論文和 薩普龍諾夫的論文以及關於托洛茨基的信

關於爭論

幾星期以前展開的關於黨內狀況的爭論，如果就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兩地的情況看來，大概快要結束了。大家知道，彼得格勒擁護黨的路綫。莫斯科各個主要的區也擁護中央的路綫。十二月十一日舉行的莫斯科組織全市積極工作人員大會表示完全贊同黨中央的組織路綫和政治路綫。沒有理由懷疑，即將舉行的莫斯科組織全黨代表會議一定會走莫斯科各區所走的道路。反對派，即一部分『左派』共產主義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斯土柯夫、皮達可夫等）同所謂民主集中派（拉法伊爾、薩普龍諾夫等）的聯盟，已經潰不成軍。

爭論的過程和反對派在爭論期間的那些變化都是值得注意的。

關於爭論，拉法伊爾，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和薩普龍諾夫的論文以及托洛茨基的信

最初，反對派簡直就要求重新審查近兩年來即整個新經濟政策時期黨在黨內建設和黨內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綫。反對派要求徹底執行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內民主的決議，同時堅決主張取消黨的第十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所規定的限制辦法（禁止派別活動、規定黨齡等等）。可是反對派並不以此爲限。它還硬說黨實際上已經變成軍隊式的組織，黨紀已經變成軍紀，因而要求自上而下整刷黨機關的全體成員，要求撤換主要工作人員等等。對中央的惡言和謾罵當然是够多的了。『真理報』載滿了控訴中央犯有滔天罪行的文章。只是還沒有把日本的地震歸罪於中央罷了。

這個時期，整個中央都沒有干預『真理報』上的爭論，讓黨員完全自由地進行批評。中央甚至認爲沒有必要去駁斥批評家們常常提出的那些荒誕無稽的責難，認爲黨員有充分的自覺來獨立解決所討論的問題。

這可以說是爭論的第一個時期。

後來，惡言使人生厭了，謾罵不起作用了，黨員要求認真討論問題了，於是爭論就進入第二個時期。這個時期是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關於黨的建設的決議（三）公佈後開始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根據中央十月全會（三）贊同黨內民主方針的決定制定了一項有名的決議，規定了實行黨內民主的條件。這樣一來，爭論的進程就發生了轉變。現在已經不能局限於一般的批評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的具體計劃，要求反對派或者接受這個計劃，或者提出另外一個實行黨內民主的、平行的、同樣具體的計劃。可是反對派無力提出一個自己的能够滿足各級黨組

織要求的計劃來同中央的計劃對抗。反對派開始退却了。取消近兩年來的要求已經在反對派的武庫中消失了。取消黨的第十次、第十一次制民主辦法的要求已經黯然無色了。自上而下整刷機關的要求緩和了。已經認為有必要用必須「確切闡明派別組織問題」、「改選過去委派的等等提議來代替這一切要求了。值得注意的是：就連反對派的這些列勃列斯尼亞區和莫斯科河南岸區的組織否決了，這兩個組織中絕大多數委員會的決議。

這可以說是爭論的第二個時期。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第三個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反對派繼續這些已經褪了色的、緩和了數倍的要求也從他們的決議案中勾銷了。組織積極工作人員大會（有一千多人參加）提出的決議案（似乎已經『只有同心協力和真心誠意地迅速執行政治局的決議，特別才能保證我們黨沒有震動和沒有內部鬥爭地轉到新的方向，才能統一。』

就連反對派的這個完全沒有害處的提議也被大會否決了，這一個以絕大多數通過了關於『贊同中央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決議，

關於爭論，拉法伊爾，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和薩普龍諾夫的論文以及托洛茨基

關於拉法伊爾

我認爲拉法伊爾是目前反對派，或者確切些說，是目前反對派聯盟最忠實最典型的代表。拉法伊爾在一次辯論會上說，我們黨實際上已經變成一個軍隊式的組織，黨紀已經變成軍紀，因此必須自上而下整刷黨的全部機關，整刷這個不中用的、違背真正的黨性的機構。據我看來，在目前反對派分子的頭腦中是存在着這種或與此類似的思想的，但是，他們由於種種顧慮而不敢把這種思想暴露出來。應當承認，拉法伊爾在這方面要比他的反對派同夥勇敢。

不管怎樣，拉法伊爾的這種說法是根本不對的。他的說法不僅在形式上不對，而且首先在實質上不對。因爲我們黨如果的確已經變成或者只是開始在變成一個軍隊式的組織，那末我們就不會有名副其實的黨，就不會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會有革命，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什麼是軍隊呢？

軍隊是從上面建立起來的一種獨特的組織。軍隊的實質在於：領導軍隊的是司令部，它由上面任命，按照強制原則編制軍隊。司令部不僅要編制軍隊，而且還要供給軍隊給養、被服、鞋襪等等。全軍在物質上完全依賴司令部。軍紀也建立在這上面，違犯軍紀就要受到特殊的最嚴厲的處罰——槍決。也正因爲如此，司令部僅僅根據自己的戰略計劃就能隨時隨地調動軍隊。

什麼是黨呢？

黨是根據自願原則從下面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黨也有自己的司令部，但它不是由上面任命，而是由全黨自下選舉的。不是司令部編制黨，恰恰相反，是黨編制自己的司令部。黨本身是根據自願原則編制起來的。在黨的司令部和全黨之間沒有上面所說的軍隊中的那種物質上的依賴關係。黨的司令部不供給黨給養、食物和被服。也正因為如此，黨的司令部不能隨時隨地任意調動黨的隊伍，黨的司令部只能根據本階級（黨本身就是這個階級的一小部分）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來領導全黨。因此，黨紀具有特殊的性質，它主要以說服方法為基礎，而和主要以強制方法為基礎的軍紀不同。因此，黨內最嚴厲的處罰（開除黨籍）和軍隊中最嚴厲的處罰（槍決）有根本的差別。

只要把這兩個定義比較一下，就能了解拉法伊爾的錯誤多麼嚴重。

他說，黨已經變成一個軍隊式的組織。但是，既然黨在物質上不依賴自己的司令部，既然黨是根據自願原則自下建立起來的，既然黨自己編制自己的司令部，那末黨怎麼能變成一個軍隊式的組織呢？如果黨變成了軍隊式的組織，那末工人源源不斷地入黨，黨在非黨羣衆中的影響日益擴大，黨在全世界勞動階層中間享有威望，又怎樣解釋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黨是極其消極的，被動的，——那就無法解釋，這樣一個消極而被動的黨怎麼能領導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並且好幾年來一直管理着世界上最革命的國家。

或者黨是積極的，自動的，——那就不能理解，這樣一個積極而自動的黨爲什麼在這個時期內沒有廢除黨內的軍事制度，假如黨內真有這種制度的話。

我們黨進行了三次革命，擊潰了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現在正搖撼着世界帝國主義的基礎，這個黨一星期也不能容忍拉法伊爾輕率地所說的那種軍事制度和命令制度，它不等到拉法伊爾發出號召就會立刻廢除這些制度並建立新的制度，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夢是可怕的，但上帝是仁慈的。事實是，第一、拉法伊爾把黨和軍隊混爲一談了，因爲他顯然既沒有真正了解黨，也沒有真正了解軍隊。第二、看來拉法伊爾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發現。他所以要說黨內有命令制度這類「可怕的」話，是爲了論證目前反對派的基本口號：（甲）要有派別活動的自由；（乙）從上到下撤換黨的領導人。

看來，拉法伊爾感到不說這類「可怕的」話就不能偷運這些口號。
全部實質就在這裏。

關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論文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認爲，黨內生活有缺點的主要原因是黨在黨的建設方面的基本路綫不正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斷言，「黨在黨內政策方面實行根本不正確的路綫已有兩年了」，「新經濟政策時期

黨在黨內建設和黨內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線』是不正確的。

黨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基本路線是什麼呢？黨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關於工人民主的決議。黨通過這項決議是否正確呢？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認為是正確的。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還規定了嚴格限制民主的辦法（禁止派別活動）。黨規定這種限制是否正確呢？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認為不正確，因為在他看來，這種限制會束縛黨的獨立思考。黨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規定了限制民主的新辦法（規定一定的黨齡等等）。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只是確認了這些限制。黨規定這些限制來防止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小資產階級傾向的侵襲，這是否正確呢？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認為不正確，因為在他看來，這些限制會束縛各級黨組織的自動性。結論很明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提議取消黨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在新經濟政策情況下通過的黨在黨內建設和黨內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線。

但是，黨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是在列寧同志直接領導下舉行的。關於禁止派別活動的決議（關於統一的決議）是列寧同志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並爭取通過的。關於進一步限制民主（規定一定的黨齡等等）的決議是列寧同志親自參加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是否想到，他實際上就是提議取消同列寧主義有着有機聯系的黨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路線呢？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是否開始懂得，他提議取消新經濟政策條件下黨在黨的建設方面的基本路線，實質上就是重複那個要求修正列寧主義的臭名遠揚的『匿名綱領』（見）中的某些提議呢？

只要提出這些問題，就可以了解黨是不會走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道路的。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提議究竟是什麼呢？他的「年樣式的」黨內生活。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黨內存在着派別集團，公開進行派別鬥爭，黨處於生「局部地」恢復這種已被第十次代表大會廢除的黨內。因為恢復新經濟政策施行前即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黨在新經濟政策施行後即一九二三年條件下的要求。壞黨的統一，特別是現在，在列寧同志不能視事的時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愛把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東西。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時期的黨內生活有許多鬥爭似乎從來沒有像這個時期即布列斯特和約時期獨立派別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竟狂妄到公然說要拋「左派」共產主義者派別內的人物組成的新的人民派斯基、皮達可夫、斯土柯夫等等）就是當時「左派」。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是否想在我們黨內「恢復」這顯然，黨是無論如何不會同意這種「恢復」的。

關於薩普龍諾夫的論文

薩普龍諾夫認為黨內生活有缺點的主要原因是黨的機關裏存在着『黨學究』和『女學監』，他們按照『學校方法』來『教育黨員』，因而阻礙了黨員在鬥爭過程中受到真正的教育。這樣，薩普龍諾夫就把我們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說成了『女學監』，他却不想問一問：這些人是從哪裏來的，『黨學究』怎麼會在我們黨的工作中佔優勢。薩普龍諾夫把這種極其危險極能蠱惑人心的論點當做已經證實的東西提出時，忘記了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滿足於簡單的格言，他首先應當了解現象（如果自然界的確有這種現象），說明現象，進而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進辦法。可是，薩普龍諾夫顯然是不理會馬克思主義的。他不管怎樣都要辱罵黨的機關，以為這樣做，其他一切就好辦了。照薩普龍諾夫看來，『黨學究』的惡意就是造成我們黨內生活缺點的原因。不用說，這是一個多麼正確的解釋。

不過有兩點令人不能理解：

（一）這些『女學監』和『黨學究』怎麼能保持住對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領導？

（二）受『女學監』教育的我們『黨的學生』怎麼能保持住對世界上最革命的國家的領導？

顯然，空談『黨學究』無論如何要比了解和評價我們黨機關的極大的優點容易得多。

薩普龍諾夫打算怎樣醫治我們黨內生活的缺點呢？他用的藥像他的診斷一樣簡單。『重新審查

我們的軍官』，撤換現在的工作人員，——這就是薩普龍諾夫所用的藥。他認為這就是實行黨內民主的基本保證。我決不否認，從民主的角度來看，改選對改進我們黨內生活是有意義的。但是把這一點看做基本保證，那就是既不了解黨內生活，也不了解黨內生活的缺點。在反對派隊伍中，有像別洛博羅多夫、羅晉哥里茨、皮達可夫、阿里斯基、貝克這樣的人。別洛博羅多夫的『民主』至今還留在羅斯托夫工人們的記憶中；羅晉哥里茨的『民主』使我們的水運員工和鐵路員工吃了苦頭；皮達可夫的『民主』使整個頓巴斯不是號叫而是痛哭；阿里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貝克的『民主』使花刺子模至今還在痛哭。薩普龍諾夫是否認為，由上面列舉的那些『可敬的同志』來代替現在的『黨學究』，民主就能在黨內取得勝利？我對這一點有些懷疑。

顯然，有兩種民主：一種是黨員羣衆的民主，這些黨員羣衆極願意發揮自動性並積極參加黨的領導工作；另一種是有不滿情緒的黨內要人的『民主』，這些黨內要人認為民主的實質就是用一些人代替另一些人。黨一定會贊成第一種民主，並且要堅決地實現這種民主。黨一定會拋棄有不滿情緒的黨內要人的『民主』，因為它和真正的工人的黨內民主毫無共同之處。

爲了保證黨內民主，首先必須剷除我們某些工作人員頭腦中存在的那些戰爭時期的殘餘和習慣，使他們不再把黨看做一個機關系統，而看做一個獨立的有機體。可是這些殘餘在最短期間是剷除不了的。

其次，爲了保證黨內民主，必須消除我們擁有近百萬職員的官僚主義的國家機關對只有兩三萬

工作人員的黨機關所加的壓力。但在最短期間是不能擺脫這部笨重機器的壓力並使它服從自己的。

最後，爲了保證黨內民主，必須提高我們許多落後支部的文化水平，並且把積極的工作人員合理地分配到全聯盟的各個地區。這一點也不是最短期間所能做到的。

由此可見，保證充分的民主，並不像薩普龍諾夫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當然，如果指的不是薩普龍諾夫的那種空洞的形式上的民主，而是真正的工人的民主的話。

顯而易見，爲了保證和實現真正的黨內民主，就必須自下而上集中全黨的意志。

關於托洛茨基的信

十二月七日公佈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關於黨內民主的決議是一致通過的。托洛茨基是贊成這個決議的。因此可以預料，中央委員（包括托洛茨基在內）一定會一致號召黨員同心協力地支持中央和中央的決議。可是，這種期望沒有實現。前幾天托洛茨基寫了一封信給各地黨的會議，這封信的用意不能作別的解釋，只能說是想削弱黨員一致支持中央和支持中央立場的意志。

請你們自己判斷吧。

托洛茨基在講到黨機關的官僚主義、講到老近衛軍即我們黨的基本核心列寧主義者有蛻化危險的時候寫道：

關於爭論，拉法伊爾，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和薩普龍諾夫的論文以及托洛茨基的信

「老近衛軍」的蛻化在歷史上發生過不止一次。就拿第二國際的領袖和政黨這個最新最顯著的歷史實例來說。我們知道，威廉·李卜克內西、倍倍爾、津蓋爾、維克多·阿德勒、考茨基、伯恩施坦、拉法格、蓋得等等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教導出來的學生。但是，我們知道，所有這些領袖——有些人是局部地，另一些人是全部地——都蛻化了，都轉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我們，正是我們這些「老頭子」應當說，我們這一代在黨內自然是起領導作用的，可是，假如我們容許黨內繼續堅持和推行機關官僚主義的方法來執行政策，使青年一代變成教育的消極對象，因而必然使機關同羣衆、老年人同青年人疏遠，那末我們就絲毫不能獨立自主地保證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不會逐步地不知不覺地消沉下去……』青年是黨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對黨的官僚主義的反應最敏感……『青年必須通過戰鬥領會革命公式……』

第一、我必須消除一種可能引起的誤解。從托洛茨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自命爲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以此表示他有決心承擔那些可能落到老近衛軍頭上的責難，如果老近衛軍真正走上蛻化道路的話。應當承認，這種自我犧牲的決心無疑是一種可貴的優點。但是，我要保護托洛茨基，使他不致自己打自己，理由很簡單：他不能而且也不應當承擔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骨幹可能蛻化的責任。犧牲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老布爾什維克需要這種犧牲嗎？我認爲不需要這種犧牲。

第二、令人不解的是：怎麼能把像伯恩施坦、阿德勒、考茨基、蓋得等等這樣的機會主義者和孟什維克，同一直反對而且一定還會光榮地反對機會主義、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的布爾什維克老近衛

軍混爲一談呢？這種地抱着某種決不是以鬥爭中成長起來的老

第三、我決不認發生地震一樣。可以發生的危險呢？我認實的危險。可是我們什維克，他們加入我時期關於這些孟什維

『一切機會

適應在工人中佔

懂得並估計到孟

什維克起初可能

要清除出黨。』○

托洛茨基怎麼會

化的危險提到首要地

關於爭論，拉

的領導核心的威信，那末怎麼能閉眼不看現實的危險，而把實際上是不現實的可能發生的危險提到首要地位呢？這種「見解」只能有利於反對派，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第四、托洛茨基怎麼會把可能蛻化的「老頭子」和黨的「最可靠的晴雨表」「青年」對立起來，把可能官僚主義化的「老近衛軍」和必須「通過戰鬥領會革命公式」的「青年近衛軍」對立起來呢？怎麼會把他們對立起來呢？爲什麼要把他們對立起來呢？難道青年和老近衛軍不是向來就團結一致地抗擊國內外敵人的嗎？難道「老頭子」和「年輕人」的團結不是我國革命的基本力量嗎？怎麼會侮辱老近衛軍並蠱惑性地阿諛青年，在我們黨的這兩支基本隊伍中間製造並擴大裂縫呢？如果從黨的利益、黨的統一和黨的團結出發，而不是想動搖黨的統一以迎合反對派的心意，那末誰需要這樣做呢？

難道是這樣來維護中央和中央一致通過的關於黨內民主的決議嗎？

可是，當托洛茨基寫信給各地黨的會議的時候，他顯然並沒有給自己規定這種任務。顯然，這裏是別有用心的，那就是：在維護中央決議的幌子下用外交手腕支持反對派反對黨中央。

正因爲如此，托洛茨基的信中有兩面性的痕跡。

托洛茨基和民主集中派及一部分「左派」共產主義者結成了聯盟，——這就是托洛茨基的言論的政治意義。

載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真理報」第二八五號

署名：約·斯大林

必要的指摘

(關於拉法伊爾)

我在『真理報』(第二八五號)上發表的『關於爭論，關於拉法伊爾等等』那篇文章中說，按照拉法伊爾在勃列斯尼亞會議上的說法，『我們黨實際上已經變成一個軍隊式的組織，黨紀已經變成軍紀，因此必須自上而下整刷黨的全部機關，整刷這個不中用的機構』。關於這一點，拉法伊爾在『真理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我沒有正確地表達他的見解，說我『在激烈論戰時』把他的見解『簡單化了』等等。拉法伊爾說，他只不過是拿黨和軍隊相比擬(相比較)罷了，而相比擬並不是說相等。他說：『說黨的領導方式和軍隊的領導方式相類似，並不等於把它們看成一模一樣，而只是把它們加以對比罷了。』拉法伊爾說得對不對呢？

不，不對。原因如下：

第一、拉法伊爾在勃列斯尼亞會議上的發言並不像他現在所說的那樣只是簡單地把黨和軍隊相比較，而是實際上把黨和軍隊等量齊觀，因為他認為黨是按照軍隊的型式建立起來的。在我面前放着拉法伊爾本人審閱過的發言速記記錄。記錄中說：『我們全黨自上而下都是按照軍隊的型式建立起來的。』未必可以否認，這裏不是簡單的比擬，而是把黨的結構和軍隊的結構相提並論，等量齊觀。

能不能說我們黨是按照軍隊的型式建立起來的呢？顯然不能，因為黨是根據自願原則從下面建立起來的，黨在物質上並不依賴它自己選舉出來的司令部；但是，大家知道，軍隊却是根據強制原則從上面建立起來的，它在物質上完全依賴不是由選舉產生而是由上面任命的司令部。如此等等。

第二、拉法伊爾不是簡單地把黨的領導方式和軍隊的領導方式相比較，而是『乾脆』把前者和後者相提並論，等量齊觀。請看拉法伊爾在他的文章中所說的話：『我們認為黨的領導方式和軍隊的領導方式是相同的，這不是根據某些不相干的理由，而是根據對黨內狀況的客觀分析。』不可能否認，拉法伊爾在這裏並不是僅僅把對黨的領導和對軍隊的領導相比擬，因為他『簡直是』『乾脆』把這二者混同起來了。

能不能把這兩種領導方式混同起來呢？不，不能。因為作為一種方式來說，軍隊的領導方式無論同黨的本質或者同黨教育黨員和爭取非黨羣衆的方法都是不相容的。

第三、拉法伊爾在他的文章中斷言，全黨的命運和每個黨員的命運歸根到底是由中央登記分配局決定的，『黨員被看做是動員來的，每個人的工作都是由登記分配局分配的，任何人都沒有支配自己的絲毫權利，供給的多少即工資以及工作的形式等等都是由登記分配局或「司令部」決定的』。這些話說得對不對呢？當然不對！在和平時期，由中央登記分配局分配工作的通常一年內只有八千人到一萬人。從中央委員會向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其中可以知道，一九二二年由中央登記分配局分配工作的有一萬零七百人（即比一九二一年減少了一半）。如果從這個數目中除去由各地派往

學校的一千五百人和因病休假的人(四百多人)，大約還剩下八千多人。其中由中央分配的負責工作人員一年內有五千一百六十七人(即不到由登記分配局分配的總人數的一半)。但是當時全黨的人數既不是五千，也不是一萬，而是五十萬左右，因此，大多數黨員的工作不是也不可能由中央登記分配局分配的。顯然，拉法伊爾忘記了在和平時期中央通常只是分配負責工作人員，忘記了中央登記分配局沒有規定、不可能也不應當規定全體黨員(其人數現在已超過四十萬)的「工資」。拉法伊爾究竟爲什麼要這樣可笑地加以誇大呢？顯然是爲了「用事實」來證明黨的領導方式和軍隊的領導方式是「相同」的。

事實就是這樣。

正因爲如此，我過去認爲現在仍然認爲拉法伊爾「既沒有真正了解黨，也沒有真正了解軍隊」。

至於拉法伊爾從第十次代表大會決議中引來的那些話，在這裏是沒有意義的，因爲它們所講的只是我們黨內戰爭時期的殘餘，而不是所謂「黨的領導方式和軍隊的領導方式相同」問題。

拉法伊爾說得對，必須改正錯誤，不應該堅持錯誤。正因爲如此，我對拉法伊爾終究會改正他所犯的錯誤這一點沒有失掉希望。

載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真理報」第二九四號

署名：約·斯大林

致『共產黨人報』^(卷)的賀電

衷心祝賀『共產黨人報』第一〇〇〇號出版。希望它成爲照耀東方勞動羣衆走向共產主義完全勝利的道路的可靠燈塔。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 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巴庫工人報』第二九四號

(總第一〇二二號)

附錄

附錄一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宣言

從各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起，世界各國就分成兩個陣營：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

在資本主義陣營裏，是民族仇視和不平等，是對殖民地的奴役和沙文主義，是民族壓迫和蹂躪，是帝國主義的獸行和戰爭。

在社會主義陣營裏，是相互信任和和平，是民族自由和平等，是各族人民的和睦共處和兄弟合作。

數十年來，資本主義世界企圖用各族人民的自由發展同人剝削人的制度結合的辦法來解決民族問題，但是沒有得到結果。相反地，民族矛盾的線團愈搞愈亂，它威脅到資本主義的存在本身。資產階級顯然已無力建立各族人民的合作了。

只有在蘇維埃陣營裏，只有在把大多數人民團結在自己周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徹底消滅民族壓迫，創造相互信任的環境，奠定各族人民兄弟合作的基礎。

只是由於這些情況，各蘇維埃共和國才擊退了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即國內外帝國主義者的侵犯。只是由於這些情況，各蘇維埃共和國才勝利地撲滅了國內戰爭，保障了自己的生存，並着手進行和平的經濟建設。

可是連年戰爭並不是沒有留下痕跡。戰爭所遺留下來的田地荒蕪、工廠停工、生產力遭到破壞和經濟資源枯竭的現象，使得各個共和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僅僅靠單獨努力就不够了。在各個共和國單獨存在的情況下，國民經濟的恢復顯然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國際形勢的不穩定和新的侵犯的威脅，使得各個蘇維埃共和國必然要建立統一戰綫來對付資本主義的包圍。

最後，就階級本質來說，蘇維埃政權是國際主義的政權，因此它的結構本身就推動各個蘇維埃共和國和勞動羣衆走上聯合成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道路。

所有這些情況都無條件地要求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成一個聯盟國家，這個國家既能保證外部的安全和內部的經濟繁榮，又能保證各族人民的民族發展自由。

不久以前，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各族人民都舉行了自己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決議，他們的這種意志就是一個可靠的保證，它保證這個聯盟是各個平等民族的自願聯合，保證每個共和國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保證現有的或將來產生的一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都可以加入聯盟。新的聯盟國家將是早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已確立的各族人民和睦

共處和兄弟合作原則的輝煌實現，它將成爲反對世界資本主義的可靠堡壘，將是各國勞動者聯合爲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新的有決定意義的一個步驟。

蘇維埃政權的基礎已經體現在授予我們全權的各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憲法裏面。當我們，這些共和國的代表們，把這一切向全世界宣告，並莊嚴地宣佈蘇維埃政權的基礎不可動搖的時候，根據授予我們的全權，決定簽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條約。

附錄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條約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南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由格魯吉亞、阿捷爾拜疆和阿爾明尼亞三共和國組成）以下列各點為基礎締結本聯盟條約，聯合成一個聯盟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由其最高機關行使下列職權：

- (一) 代表聯盟發生國際關係；
- (二) 變更聯盟的國界；
- (三) 締結接收新共和國加入聯盟的條約；
- (四) 宣戰和媾和；
- (五) 訂借外債；
- (六) 批准國際條約；
- (七) 規定對外貿易和國內商業制度；
- (八) 規定全聯盟國民經濟的原則和總計劃，並締結租讓合同；

- (九) 調整運輸和郵電工作；
- (一〇) 規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武裝力量的組織原則；
- (一一) 批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統一的國家預算，規定鑄幣制度、貨幣制度和信貸制度，並規定全聯盟的、共和國的和地方的稅收制度；
- (一二) 規定全聯盟境內的土地規劃和土地使用以及礦藏、森林、水流使用的一般原則；
- (一三) 制定全聯盟的移民法；
- (一四) 規定法院組織和訴訟程序的原則，並制定聯盟的民法和刑法；
- (一五) 制定基本的勞動法；
- (一六) 規定國民教育的一般原則；
- (一七) 規定人民保健方面的一般辦法；
- (一八) 規定度量衡制度；
- (一九) 組織全聯盟的統計；
- (二〇) 制定聯盟國籍和外籍人權利的基本法律；
- (二一) 決定大赦；
- (二二) 撤銷各加盟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與聯盟條約相抵觸的

決議。

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權力機關，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是聯盟最高權力機關。

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由市蘇維埃代表和省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組成。市蘇維埃代表每二萬五千選民選舉一人；省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每十二萬五千居民選舉一人。

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由省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

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如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必要，或者有兩個以上加盟共和國的提議，可以召集非常代表大會。

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按各加盟共和國的人口比例從各加盟共和國的代表中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該委員會委員共三百七十一人。

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每年舉行三次。如果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認為必要，或者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或某一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提議，可以召集非常會議。

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按照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所規定的程序依次在各加盟共和國首都舉行。

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主席團，在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閉會

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是聯盟最高權力機關。

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由十九人組成，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按照加盟共和國的數目從中選出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四人。

十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是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執行機關，由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其任期由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確定；該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聯盟人民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外交人民委員，

陸海軍人民委員，

對外貿易人民委員，

交通人民委員，

郵電人民委員，

工農檢查人民委員，

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

勞動人民委員，

糧食人民委員，

財政人民委員。

十二、爲了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境內的革命法制並把各加盟共和國同反革命作鬥爭的力量聯合起來，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立最高法院，執行最高審判監督權；而在聯盟人民委員會下設立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其主席參加聯盟人民委員會，有發言權。

十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的法令和決議各加盟共和國必須執行，並直接在全聯盟境內施行。

十四、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法令和決議用各加盟共和國通用的文字（俄羅斯文、烏克蘭文、白俄羅斯文、格魯吉亞文、阿爾明尼亞文、突厥語系各種文字）公佈。

十五、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可以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出對聯盟人民委員會的命令和決議的異議，但不得停止執行。

十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的決議和命令只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才能撤銷；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的命令只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和聯盟人民委員會才能撤銷。

十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的命令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即在該命令顯然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相抵觸的情況下，才能由各加盟共和

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停止執行。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應將停止執行命令這一情況立即報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有關的人民委員。

十八、各加盟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人民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

農業人民委員，

糧食人民委員，

財政人民委員，

勞動人民委員，

內務人民委員，

司法人民委員，

工農檢查人民委員，

教育人民委員，

衛生人民委員，

社會救濟人民委員，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

聯盟的外交、陸海軍、對外貿易、交通、郵電各人民委員部的特派員，也有發言權。

十九、各加盟共和國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以及糧食、財政、勞動、工農檢查各人民委員部直屬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並遵照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相應的人民委員的命令辦事。

二十、各加盟共和國都有自己的預算，此項預算是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批准的全聯盟預算的組成部分。各共和國預算的收入和支出由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規定。列入各加盟共和國預算的收入項目以及每項收入的數額由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確定。

二十一、對於各加盟共和國公民規定統一的聯盟國籍。

二十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有自己的國旗、國徽及國印。

二十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首都是莫斯科城。

二十四、各加盟共和國按照本條約修改自己的憲法。

二十五、聯盟條約的批准、修改和補充權屬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

二十六、每個加盟共和國都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

註 釋

(一) 俄共(布)中央召開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突厥語系民族共產黨員會議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日在莫斯科舉行。出席會議的有阿捷爾拜疆、巴什基里亞、土爾克斯坦、韃靼、達格斯坦、捷列克區域、柯爾克茲和克里木等地的黨的工作人員。會議討論了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中央常務局的報告以及組織問題等等。約·維·斯大林於一月二日做了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報告沒有速記下來)。會議根據約·維·斯大林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中央常務局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突厥語系民族中工作的條例」。按照這個「條例」,一九一八年成立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中央常務局改組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央突厥語系民族宣傳鼓動局。——(正文第三頁)

(二) 指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俄共(布)黨綱中「在經濟方面」這一部分和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關於工會及其組織問題」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四二二頁至第四二四頁,第四九〇頁至第四九四頁)。——(正文第五頁)

(三) 關於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及代表大會關於軍事問題和其他問題的決議,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第三〇六頁至第三一一頁和「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四〇七頁至第四五五頁。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了關於軍事問題的演說(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二二二頁至第二二三頁),並參加了代表大會為起草軍事問題決議而成立的軍事委員會。——(正文第六頁)

(四) 指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莫斯科省工會委員會的俄共(布)黨團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舉行的聯席會議。——(正文第十一頁)

(五)「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這一提綱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五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進行了討論。會上決定成立以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為首的委員會來最後修訂這個提綱。提綱發表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真理報」第二十九號上，並於同年出版了單行本。——(正文第十四頁)

(六)大伊斯蘭主義是一種宗教政治思想，它宣傳一切信奉伊斯蘭教(回教)的民族聯合成一個整體。十九世紀末葉，這種思想在東方各國的剝削階級中間廣泛傳播，土耳其曾利用這種思想來達到使全世界回教徒服從於土耳其蘇丹這個「全體穆斯林」的「哈利發」的目的。弗·伊·列寧評論說，大伊斯蘭主義是企圖「把反對歐美國主義的解放運動回羣固可汗、地主、毛拉等的地位結合起來」的一個流派(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七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七九四頁)。

大突厥主義所抱的目的就是使突厥語系一切民族受土耳其的統治。它產生在巴爾幹戰爭時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期間發展成一種極力主張侵略的沙文主義思想。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俄國反革命分子曾利用大伊斯蘭主義和突厥主義來反對蘇維埃政權。——(正文第二十三頁)

(七)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舉行。代表大會討論了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討論了關於工會及其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的報告，關於實物稅的報告，關於黨的建設的報告，關於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的報告，關於黨的統一和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報告等等。弗·伊·列寧做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關於實物稅的報告以及關於黨的統一和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報告。代表大會做了關於工會的爭論的總結，並以絕大多數通過了列寧的綱領。代表大會在弗·伊·列寧起草的「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中斥責了一切派別集團，責令它們立即解散，並指出黨的統一是一無產階級專政取得勝利的的基本條件。代表大會通過了弗·伊·列寧提出的「關於我們黨內的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斥責了所謂「工人反對派」，並認為宣傳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思想和共產黨員的黨籍不能相容。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從餘糧收集制過渡到糧食稅，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決議。三月十日聽取了約·維·斯大林「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的報告。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以約·維·斯大林的提綱為基礎，選出一個委員會來進一步加工。約·維·斯大林在三月十五日下午會議上報告了該委員會的工作結果。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約·維·斯大林代表該委員會提出的決議。代表大會斥責了民族問題方面的反黨傾向即大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和地方

民族主義，指出這兩種傾向對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都是有害而危險的。代表大會集中火力批判了大國沙文主義這一主要危險。（關於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三六頁至第三四二頁。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一一五頁至第五七二頁）——（正文第二十五頁）

（八）「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電氣化計劃。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向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彙編由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科學技術部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出版。——（正文第四十頁）

（九）「經濟生活報」（日刊）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財經人民委員部和財經機關（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勞動國防委員會、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銀行、財政人民委員部等）的機關報，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版。——（正文第四十一頁）

（二〇）第二半國際，即「國際社會黨工人聯盟」，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在維也納成立，參加這次成立大會的是在具有革命情緒的工人羣衆的壓力下暫時退出第二國際的各中派政黨和集團的代表。第二半國際的首領們（弗·阿德勒、奧·鮑威爾、拉·馬爾托夫等人）口頭上批評第二國際，實際上却在無產階級運動的一切重大問題上實行機會主義政策，並竭力利用這一聯盟來抵制共產黨對工人羣衆的日益擴大的影響。一九二三年第二半國際重新和第二國際合併。——（正文第四十二頁）

（二一）「東方民族行動和宣傳委員會」是根據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巴庫舉行的東方民族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成立的。該委員會的宗旨是援助和聯合東方的解放運動，該委員會存在將近一年。——（正文第四十四頁）

（二二）山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勞動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弗拉基高加索舉行。出席代表大會的有來自遙遠的山村的徹岑人、沃舍梯人、韃靼人、卡巴爾達人、巴爾卡爾人等等共一百五十二名代表。代表大會討論了東部婦女過去和現在在經濟上和法律上的地位、手工業生產和山地婦女參加手工業生產、國民教育和東部婦女等問題，討論了關於婦孺保健等問題的報告。在代表大會六月十八日下午會議上宣讀了約·維·斯大林的賀電。代表大會向約·維·斯大林發出致敬電。——（正文第四十八頁）

（二三）山民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是根據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日的法令成立的。山民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最初包括徹岑州、納茲蘭譯夫州、弗拉基高加索州、卡巴爾達州、巴爾卡爾州和卡拉恰也夫州。一九二一

年至一九二四年間，山民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陸續分化出許多民族自治區。一九二四年七月七日，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頒佈法令取消了山民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正文第四十八頁）

（二四）指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批准的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項條件。——（正文第五十二頁）

（二五）指弗·伊·列寧的四月提綱「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見「列寧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四卷第一頁至第六頁）。——（正文第五十三頁）

（二六）指一九二一年三月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亂（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三一頁至第三三二頁）。——（正文第五十三頁）

（二七）弗·伊·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一頁至第一一九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五六九頁至第六八〇頁）。——（正文第五十四頁）

（二八）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八卷。——（正文第五十四頁）

（二九）弗·伊·列寧的「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和工人政黨的任務」（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卷第一一七五頁至第二五〇頁）。——（正文第五十四頁）

（三〇）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二一七頁至第二二九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二七二頁至第二八四頁。——（正文第五十五頁）

（三一）指弗·伊·列寧的小冊子「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二〇七頁至第二四六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三七二頁至第四〇六頁）。——（正文第五十五頁）

（三二）信條（Articles）是一部分「經濟派」分子的宣言。（關於信條，見弗·伊·列寧的「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抗議書」，「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四卷第一四九頁至第一六三頁）。——（正文第五十七頁）

（三三）弗·伊·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頁至第九十七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六八九頁至第七七八頁）。——（正文第六十頁）

（三四）民主會議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在彼得格勒舉行。會議是由工兵代表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農民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中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首領們召集的，參加會議的有社會主義政黨、妥協派蘇維埃、工

會、地方自治局、工商界和部隊的代表。會議選出了預備國會（共和國臨時會議）——臨時政府的諮議機關。妥協派想利用預備國會來制止革命並把國家從蘇維埃革命的道路引上資產階級立憲發展的道路。——（正文第六十一頁）

〔三〕弗·伊·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見「列寧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十八卷第二〇九頁至第三〇六頁）。——（正文第六十四頁）

〔四〕指弗·伊·列寧的「做什麼？」一書（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一九頁至第四九四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一七七頁至第三四六頁）。——（正文第六十五頁）

〔五〕見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一九三九年俄文版第四十頁至第四十一頁。——（正文第六十五頁）

〔六〕約·維·斯大林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底從納爾契克（當時他在那裏治病）到達梯弗里斯，參加有地方黨組織和工會組織代表參加的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高加索局全體會議的工作。全會於七月二日至七日舉行，討論了南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建設中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全會在約·維·斯大林主持擬定的關於政治形勢的報告的決議中規定了南高加索共產黨員的任務，並給予民族主義傾向分子以堅決打擊。全會通過了關於組織一個委員會來聯合南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經濟活動的決議，討論了關於南高加索的鐵路狀況、關於南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內的貨幣流通、關於納果爾內卡拉巴赫的自治、關於阿札里亞、關於阿布拉哈茲的情況等問題。約·維·斯大林在七月六日的梯弗里斯黨組織全體黨員大會上做了「關於共產主義在格魯吉亞和南高加索的當前任務」的報告。報告發表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格魯吉亞真理報」第一〇八號上，並於同年白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高加索局出版單行本。——（正文第七十一頁）

〔七〕木沙瓦特（「木沙瓦特」黨）是阿捷爾拜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民族主義政黨，成立於一九二二年。在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時期是阿捷爾拜疆的主要反革命力量，木沙瓦特黨人在土耳其武裝干涉者支持下，後來又在英國武裝干涉者支持下，於一九一八年九月至一九二〇年四月在阿捷爾拜疆執政。一九二〇年四月，木沙瓦特黨政府被巴庫工人、阿捷爾拜疆農民和前來幫助他們的紅軍合力推翻。——（正文第七十七頁）

〔八〕達什納克（「達什納克楚純」黨）是阿爾明尼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成立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間，達什納克黨人領導了阿爾明尼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府，把阿爾明尼亞變成了英國武裝干涉者反對蘇維埃俄國的據點。達什納克黨政府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被紅軍支持下的阿爾明尼亞勞動人民的起義所推翻。——（正文第七十

七日)

(二) 指一九〇四年英國和法國簽訂的軍事政治協定，這個協定是成立協約國（英國、法國和沙皇俄國的帝國主義同盟）的開端。——（正文第七十八頁）

(三) 「火星報」是第一個全俄馬克思主義的秘密報紙，於一九〇〇年由弗·伊·列寧創辦。（關於「火星報」的意義和作用，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第三十八頁至第四十九頁）——（正文第八十一頁）

(三) 尼·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彼得格勒版（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頁至第九十七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六八九頁至第七七八頁）。——（正文第八十二頁）

(三) 見「列寧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十八卷第二七三頁。——（正文第八十五頁）

(三) 指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華盛頓舉行的關於限制軍備、關於太平洋問題和遠東問題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美國、英國及其自治領、日本、法國、意大利、中國、比利時、荷蘭和葡萄牙。雖然蘇維埃政府曾多次提出抗議，但會議沒有邀請蘇維埃俄國參加。華盛頓會議對戰後世界重新進行了分割，企圖建立帝國主義在太平洋上的新的力量對比關係。在華盛頓簽訂的各項協定，規定了帝國主義列強海軍軍備的規模和帝國主義列強在太平洋各島嶼的統治權，確立了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原則，即「各國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華盛頓會議不僅沒有消除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反而使它加深了。——（正文第九十七頁）

(三) 「明星報」是布爾什維克的公開報紙，於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是周刊，後來每周出兩三號）。弗·伊·列寧對「明星報」進行了思想領導，他經常從國外寄文章給這個報紙。經常給「明星報」撰稿的有維·米·莫洛托夫、米·斯·奧里明斯基、尼·古·波列塔也夫、尼·尼·巴圖林、克·斯·葉列梅也夫等人。阿·馬·高爾基也曾參加該報工作。一九二二年春，約·維·斯大林留居彼得堡時曾直接領導該報工作，並在該報發表了幾篇文章（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二一五頁至第二四二頁）。該報的發行額有幾號曾達五六萬份。「明星報」為出版布爾什維克「真理報」（日刊）做了準備工作。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沙皇政府封閉「明星報」。繼「明星報」之後的是「涅瓦明星報」，該報出到一九二二年十月。——（正文第一〇六頁）

(三) 引自約·維·斯大林「我們的目的」一文，該文發表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真理報」創刊號上（見「斯大林

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二四三頁。——（正文第一〇七頁）

〔二六〕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二四四頁。——（正文第一〇七頁）

〔二七〕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於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至八月七日在莫斯科進行。在受最高革命法庭審判的三十四個被告中有十一個是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在審判中查明，社會革命黨從二月社會主義革命一開始就反對蘇維埃政權，組織武裝暴動和策劃陰謀，援助武裝干涉者，對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人採取恐怖行動。——（正文第一一一頁）

〔二八〕指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在熱那亞舉行的和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二十日在海牙舉行的兩次國際經濟會議。熱那亞會議的召開是爲了確定資本主義世界和蘇維埃俄國之間的關係。參加會議的一方是英、法、意、日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另一方是蘇維埃俄國。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向蘇維埃俄國代表團提出幾項要求（償還戰時和戰前的一切債款，把收歸國有的財產歸還外國產權人等等）；履行這些要求，就等於把蘇維埃國家變成西歐資本的殖民地。蘇維埃俄國代表團拒絕了外國資本家的這些無理要求。後來這個問題移交在海牙召集的專家會議進行討論。海牙會議也因雙方觀點不一致而沒有達成協議。——（正文第一一一頁）

〔二九〕約·維·斯大林領導了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由俄共（布）中央全會成立的關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高加索聯邦和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法案起草委員會。該委員會領導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全部籌備工作。——（正文第一一四頁）

〔三〇〕指阿捷爾拜疆、阿爾明尼亞、格魯吉亞、白俄羅斯、烏克蘭、花刺子模、布哈拉、遠東等獨立共和國的全權代表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全權代表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簽訂的關於授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其他共和國出席熱那亞全歐經濟會議的協定。——（正文第一一六頁）

〔三一〕遠東共和國於一九二〇年四月成立。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取消。遠東共和國包括貝加爾湖沿岸地區、外貝加爾湖地區、阿穆爾省、沿海區、堪察加和庫頁島北部。——（正文第一一六頁）

〔三二〕南高加索聯邦，即南高加索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同盟，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在格魯吉亞、阿捷爾拜疆和阿爾明尼亞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權代表會議上成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聯邦同盟改爲南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高加索聯邦存在到一九三六年。根據一九三六年蘇聯憲法的規定，阿爾明尼亞、阿捷爾拜疆和格魯吉亞等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作爲加盟共和國加入蘇聯。(關於南高加索聯邦，見本卷第一八四頁至第一八八頁，第二〇三頁至第二〇八頁)——(正文第一一七頁)

(四) 布哈拉人民蘇維埃共和國和花刺子模人民蘇維埃共和國是從前布哈拉汗國和希瓦汗國境內的人民起義勝利後於一九二〇年成立的。一九二四年底和一九二五年初，由於中亞細亞各國按民族特徵劃分疆界，布哈拉共和國和花刺子模共和國的領土被劃入新成立的土爾克明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和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和卡拉—卡爾帕克自治區。——(正文第一一七頁)

(四) 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在莫斯科舉行。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共二千二百一十五人，其中包括南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等締約國的代表四百八十八人，他們到莫斯科來參加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工作，他們被邀請作爲貴賓出席全俄第十次代表大會。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討論了下列幾個問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關於共和國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總結報告，關於工業狀況的報告，農業人民委員會的報告(發展農民經濟的工作總結)、教育人民委員會的報告，財政人民委員會的報告，各締約蘇維埃共和國關於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提案。約·維·斯大林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做了關於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的報告。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約·維·斯大林提出的決議案。約·維·斯大林做報告後，烏克蘭、阿捷爾拜疆、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和白俄羅斯的代表發言，他們代表本國人民擁護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成一個統一的聯盟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文第一二〇頁)

(四) 指蘇維埃政府同英國工業家烏爾卡爾特就開採烏拉爾和哈薩克斯坦的礦產簽訂租賃合同的談判。由於烏爾卡爾特提出的苛刻條件和英國保守黨政府對蘇維埃俄國的敵視政策，人民委員會於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否決了合同草案。資產階級報刊利用蘇維埃政府拒絕同烏爾卡爾特簽訂合同這件事大肆進行反蘇宣傳。——(正文第一二二頁)

(四) 洛桑會議(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舉行)是由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發起，爲討論近東問題(締結希土和約，確定土耳其疆界，通過關於海峽航行制度的協定等等)而召開的。參加會議的除上述國家外，還有日本、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希臘、保加利亞、土耳其(美國代表以觀察員身分列席會議)。蘇維埃俄國只是在討論海峽(博斯普魯斯海峽、達達尼爾海峽)問題時才被邀請參加會議。在會議上，在海峽問題委員會裏，蘇維埃俄國代表團發言反對無

論平時或戰時都讓軍艦通過海峽的草案，並提出了自己的草案，主張除土耳其以外任何國家的軍艦都絕對不能通過海峽。蘇維埃俄國代表團的草案被委員會否決了。——（正文第二二三頁）

〔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莫斯科舉行。出席代表大會的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代表一千七百二十七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代表三百六十四人，南高加索聯邦的代表九十一人，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代表三十三人。代表大會討論了約·維·斯大林關於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報告，批准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宣言和聯盟條約，選出了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正文第一一九頁）

〔五〕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南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全權代表團會議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舉行。會議審查並通過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宣言和成立條約。約·維·斯大林在會議上報告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工作日程。會議委託約·維·斯大林在代表大會上做關於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問題的報告。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各全權代表團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宣言和成立條約上簽字。——（正文第一三一頁）

〔五〕約·維·斯大林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戰略和策略問題一文於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四日發表在紀念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真理報」第五十六號上，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四日、十五日和十六日發表在「彼得格勒真理報」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和第五十九各號上，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發表在「共產主義革命」雜誌第七期（總第四十六期）上。後來這篇文章的一部分以「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戰略」為題刊載於約·斯大林「論十月革命」（一九三二年莫斯科版）一書中。——（正文第一三二頁）

〔五〕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就是雅·米·斯維爾德洛夫農共產主義大學。

一九一八年由雅·米·斯維爾德洛夫發起，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下附設宣傳鼓動短期訓練班，一九一九年一月該訓練班改名為蘇維埃工作學校。根據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在這個學校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央蘇維埃工作和黨工作學校。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中央蘇維埃工作和黨工作學校改組為雅·米·斯維爾德洛夫農共產主義大學。——（正文第一三二頁）

〔五〕「勞動解放社」是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一八八三年由格·瓦·普列漢諾夫創立於日內瓦。（關於該社的活動和它的歷史作用，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〇頁至第二〇頁）——（正文第一四一頁）

〔六〕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在彼得格勒舉行羣衆性政治遊行示威時，布爾什維克黨彼得格勒委員會一部分委員（巴格達齊也夫等）違背布爾什維克中央關於遊行示威的和平性質的指示，提出了立即推翻臨時政府的口號。黨中央委員會斥責了這些「左的」冒險主義者的行爲（見「列寧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四卷第一八三頁至第一八四頁）。——（正文第一四二頁）

〔七〕弗·伊·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一頁至第一一九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五六九頁至第六八〇頁）。——（正文第一四四頁）

〔八〕「聯系委員會」由齊赫澤、斯切克洛夫、蘇漢諾夫、菲里波夫斯基和斯柯別列夫組成（稍後加入的有切爾諾夫和策烈鐵里），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爲了同臨時政府建立聯系，「影響」臨時政府和「監督」它的活動而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設立的。事實上「聯系委員會」幫助了臨時政府實行資產階級政策，阻擋了工人羣衆進行爭取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的積極革命鬥爭。一九一七年五月，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代表直接參加臨時政府，「聯系委員會」就撤銷了。——（正文第一四五頁）

〔九〕弗·伊·列寧的「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見「列寧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四卷第一頁至第六頁）。——（正文第一四五頁）

〔十〕提交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民族問題提綱草案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討論過。當時成立了以約·維·斯大林爲首的委員會來修訂這個提綱。這個提綱於三月二十二日經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審查批准，三月二十四日發表在「真理報」第六十五號上。——（正文第一四九頁）

〔十一〕路標轉換派是一個資產階級政派，一九二一年在流亡國外的俄國白衛分子中間組成，由出版「路標轉換」雜誌（最初會以此名出版過一本文集）的尼·烏斯特里雅洛夫、尤·克柳奇尼柯夫等人的集團領導。路標轉換派的思想反映了那些放棄同蘇維埃政權進行公開武裝鬥爭的資產階級的觀點。路標轉換派分子指責蘇維埃制度由於蘇維埃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

而逐漸變爲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正文第一五三頁）

〔六〇〕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五三頁）。——（正文第一五四頁）

〔六一〕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舉行。這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弗·伊·列寧不能出席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大會討論了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俄國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總結報告，討論了關於工業的報告、關於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關於農村稅收政策的報告、關於區域劃分的報告等。代表大會在做決議時考慮了弗·伊·列寧在他最後幾篇文章和一些書信中的全部指示。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做了兩年來實施新經濟政策的總結。堅決反擊了把新經濟政策理解爲放棄社會主義陣地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和他們的擁護者。代表大會對組織問題和民族問題給予很大的注意。約·維·斯大林在四月十七日下午會議上做了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代表大會在根據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中批准了列寧改組工農檢查院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計劃，指出了中央組織機關和全部組織工作已有改進。四月二十三日代表大會聽取了約·維·斯大林「關於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四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討論了這一報告，問題的進一步討論移至約·維·斯大林直接領導的代表大會民族問題組進行。四月二十五日代表大會通過了該組提出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是以約·維·斯大林的提綱作爲基礎的。代表大會揭露了民族主義傾向分子，並號召黨堅決反對民族問題上的兩種傾向即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和資產階級地方民族主義。（關於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第三四七頁至第三四九頁。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六八一頁至第七五八頁）。（正文第一五九頁）

〔六二〕「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通報」是一種通報性的雜誌，根據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創辦，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出版（前二十期是作爲「真理報」的附刊出版的）。「中央通報」由通報性的公報逐漸成爲黨中央的雜誌並於一九二九年改編爲「黨的建設」雜誌。「俄共中央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發表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中央通報」第四期（總第五十二期）上。（正文第一六一頁）

〔六三〕約·維·斯大林指「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和「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兩篇文章（見「列寧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

【五〇】 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六頁至第四五五頁。——（正文第一六八頁）

【六一】 約·維·斯大林指「我們工業的指揮人員（根據俄共中央登記分配局的材料）」這本小冊子（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正文第一七二頁）

【六二】 全俄社會革命黨普通黨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認為社會革命黨已經徹底瓦解，它的流亡國外的領導機關沒有權利代表不存在的黨進行活動。——（正文第一七九頁）

【六三】 辯論專頁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在「真理報」上刊出，它的名稱是「代表大會召開前辯論專頁」。總共出了五期，四期在代表大會召開前刊出，一期在代表大會期間刊出（見一九二三年三月一日、二十四日及四月五日、十五日和二十日「真理報」第四十六、第六十五、第七十五、第八十二、第八十六各號）。——（正文第一八一頁）

【六四】 約·維·斯大林指「民主集中派」反黨集團。（關於這個集團，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一七頁、第三三五頁）——（正文第一八三頁）

【六五】 指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約·維·斯大林在代表會議上做了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報告的決議案是由弗·伊·列寧起草的。（代表會議的各項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三三五頁至第三五三頁）——（正文第一八八頁）

【六六】 「社會主義通報」是白俄孟什維克的機關刊物，於一九二一年二月由馬爾托夫創辦。一九三三年三月前在柏林出版，一九三三年五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在巴黎出版，後來在美國出版。「社會主義通報」是最反動的帝國主義集團的喉舌。——（正文第二〇八頁）

【六七】 巴斯馬奇運動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中亞細亞（土爾克斯坦、布哈拉、花刺子模）的一種反革命的民族主義運動，它以公開的政治性的土匪活動的形式出現，由巴依和毛拉領導，其目的是使中亞細亞各共和國脫離蘇維埃俄國並恢復剝削階級的統治。英帝國主義者積極支持巴斯馬奇運動，力圖把中亞細亞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正文第二一〇頁）

【六八】 見弗·伊·列寧的「論民族自決權」（「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四〇六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八五九頁）。——（正文第二一五頁）

【六九】 弗·伊·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三六頁至第一三七頁）。——

(正文第二一八頁)

〔七〕「貧農報」(日刊)是聯共(布)中央的機關報，於一九一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出版。——(正文第二三〇頁)

〔八〕「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一〇頁至第一二頁。——(正文第二三二頁)

〔九〕有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負責工作人員參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會議由約·維·斯大林發起，於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莫斯科舉行。參加會議的除俄共(布)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以外，還有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的代表五十八人。會議議程上的主要問題是約·維·斯大林「貫徹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的實際措施」的報告。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的二十個黨組織的代表分別做了關於地方情況的報告。會議也審查了中央監察委員會關於蘇丹·加里也夫反黨反蘇維埃活動的報告。(會議的各項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七五九頁至第七六六頁)——(正文第二三七頁)

〔十〕民族問題綱領草案是約·維·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底為籌備第四次會議而起草的，六月四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該草案由會議作為關於約·維·斯大林「貫徹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的實際措施」的報告的決議而通過。——(正文第二三九頁)

〔十一〕俄共(布)中央全會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實際提案起草委員會是根據俄共(布)中央全會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決議成立的。委員會由約·維·斯大林領導，其成員有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的代表。委員會領導了蘇聯憲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正文第二六五頁)

〔十二〕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蘇聯憲法起草委員會由各加盟共和國的二十五名代表組成。約·維·斯大林代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參加該委員會。委員會全體會議於一九二三年六月八日至十六日舉行，討論了憲法草案。——(正文第二七三頁)

〔十三〕約·維·斯大林引證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一九二二年莫斯科俄文版)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卡·馬克思給弗·恩格斯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九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第二卷第四四頁)。——(正文第二八〇頁)

〔十四〕全俄女工和農婦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莫斯科舉行。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有一

千一百四十七人。十一月十九日弗·伊·列寧在代表大會上發表了演說。代表大會希望在各級黨委員會下面設立專門的婦女工作機關。代表大會閉幕後，根據俄共（布）中央的決議在各級黨委員會下面設立了婦女宣傳鼓動委員會，並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下面設立了中央婦女宣傳鼓動委員會。——（正文第二八四頁）

〔八〕 指根據政治局和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舉行的俄共（布）中央全會的決議成立的委員會。——（正文第二八九頁）

〔八二〕 關於黨的建設的決議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五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上通過的，該決議發表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七日「真理報」第二七八號上。——（正文第三〇四頁）

〔八三〕 指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舉行的有十個黨組織的代表參加的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全會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七六七頁至第七六八頁）——（正文第三〇四頁）

〔八四〕 指自稱「工人集團」的反革命秘密集團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前夕發出的匿名綱領（「工人集團」是被開除出黨的米雅斯尼柯夫和庫茲涅佐夫於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組成的，參加的人數不多，一九二三年秋被消滅）。——（正文第三〇九頁）

〔八五〕 約·維·斯大林指發表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俄共（布）中央通報」雜誌第四期（總第五十二期）上的「俄共中央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正文第三一八頁）

〔八六〕 「共產黨人報」（日刊）是阿捷爾拜疆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和巴庫委員會的機關報，用阿捷爾拜疆文出版。創刊號是由阿捷爾拜疆布爾什維克組織於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秘密出版的，該報在創刊號發行後即被木沙瓦特黨政府封閉。隨着阿捷爾拜疆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該報於一九二〇年四月三十日復刊。約·維·斯大林的賀電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共產黨人報」上用阿捷爾拜疆文發表，並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巴庫工人報」和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東方曙光報」上用俄文發表。——（正文第三二〇頁）

年 表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一年

一月一日至二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突厥語系民族共產黨員會議，在會上致開幕詞並做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

一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文，該文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真理報」第十號上發表。

一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第一海岸部隊劇院(彼得格勒)舉行的羣衆大會上做關於目前形勢的報告。

一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就工會在生產中的作用問題發表演說，反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提綱，捍衛列寧的「十人綱領」。

一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發言反對關於軍隊改行民軍制的提議，擁護關於加強並鞏固正規軍的提議。

一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民族委員會會議上擔任主席並被選入民族委員會條例草案起草委員會。

年 表

二月五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約·維·斯大林的提綱「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當時成立了以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為首的委員會來最後修訂這個提綱。

二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弗·伊·列寧和委員會的其他委員共同修訂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關於民族問題的提綱。

二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的提綱「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在「真理報」第二十九號上發表。

二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和達格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代表談話。

二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把俄共（布）中央對第十一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示用電報通知巴庫的格·康·奧爾忠尼啓澤，並要求每天把高加索事變的進程告訴他。

二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向格·康·奧爾忠尼啓澤詢問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和阿捷爾拜疆的情況。

二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寫便箋給弗·伊·列寧，談到必須保衛巴士姆以防土耳其人的攻擊。

三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以直達電報向格魯吉亞共產黨員轉達弗·伊·列寧的祝賀和指示。

三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民族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民族委員會條例起草委員會的工作總結報告。

三月八日至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三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選入代表大會主席團。

三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蘇維埃政府同土耳其代表團的談判。

- 三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做「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的報告。
- 三月十三日
弗·伊·列寧寫便箋給約·維·斯大林，談派遣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代表去鎮壓喀琅施塔得叛亂的問題。
- 三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選為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委員。
- 三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代表民族問題決議起草委員會報告工作。
- 三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中央全會選為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和組織局委員。
- 三月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弗·伊·列寧，談俄羅斯電氣化計劃。
- 四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把他對燃料管理總局條例草案的意見寄給弗·伊·列寧。
- 四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人民委員會會議，並被選入關於擴大阿捷爾拜疆石油委員會職權範圍的決議草案起草委員會。
- 四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把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關於成立科米自治區的草案原文送交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
- 四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民族委員會會議上報告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對「民族委員會條例」所提出的修正，並在討論成立科米自治區問題時發言。
- 五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論民族問題的提法」一文，該文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八日「真理報」第九十八號上發表。

五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部務會議上傳達一項法令草案，規定所有人民委員部都必須把有關各民族的一切法案和決議提請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批准。

五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就工農檢查院地方機關問題發言。

五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部務會議上担任主席。部務會議通過關於召開雅庫特勞動人民代表大會來討論成立雅庫特自治區問題的決議。

五月十六日至二十
五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籌備和舉行全俄工會第四次代表大會的委員會的工作。

五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受俄共（布）中央委託，在全俄工會第四次代表大會共產黨黨團會議上發言反對無政府工團主義集團根據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團在代表大會上的總結報告提出的決議案。

五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全會為調查托姆斯基在全俄工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反黨行為而成立的委員會的工作。

五月底

約·維·斯大林去納爾契克城就醫。

六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向卡巴爾達州蘇維埃第四次代表大會致賀電。

六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向山民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致賀電。

六月底

約·維·斯大林從納爾契克前往梯弗里斯參加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全體會議的工作。

七月二日至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全體會議的工作。

七月四日

弗·伊·列寧致電格·康·奧爾忠尼啓澤，詢問約·維·斯大林停止休養的原因並要求把醫生關於約·維·斯大林健康狀況的診斷書寄去。

七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梯弗里斯黨組織全體黨員大會上做「關於共產主義在格魯吉亞和南高加索的當前任務」的報告。這個報告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格魯吉亞真理報」第一〇八號上發表。

七月七日、八日、十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格魯吉亞共產黨（布）中央全會的工作。全會根據約·維·斯大林的提議，討論關於格魯吉亞共產黨在恢復國民經濟和鞏固蘇維埃政權方面的政策問題。

七月二十五日

弗·伊·列寧詢問格·康·奧爾忠尼啓澤約·維·斯大林停止休養了幾天，並要求把給約·維·斯大林看病的醫生姓名和地址告訴他。

八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從納爾契克返回莫斯科。

八月十八日

弗·伊·列寧責成國家計劃委員會協助約·維·斯大林熟悉一切經濟材料，特別是關於金礦工業和巴庫石油工業的經濟材料。

八月二十二日

俄共（布）中央委託約·維·斯大林對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鼓動部的工作進行總的領導。

八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的「黨在取得政權以前和以後」一文在「真理報」第一九〇號上發表。

九月六日至八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鐵路運輸中央機關工作改進委員會。

九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被選入山地居民（徹岑人）和哥薩克人土地分配問題委員會。

年 表

三四九

九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收到弗·伊·列寧「關於工農檢查院的任務、對任務的理解和執行的問題」的信並寫「關於檢查院問題的答覆」的回信給弗·伊·列寧。

十一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被選入全俄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

十一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民族政策」一文在「民族生活報」第二十四號（總第一二二號）上發表。

十一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黨的紅色勃列斯尼亞區委員會俱樂部做「論共產黨人的政治戰略和策略與新經濟政策」的講演。

十一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會議研究了農業集體組織——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的問題。

十一月十八日

黨中央委員會批准約·維·斯大林為俄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通報」雜誌的編輯之一。

十一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收到弗·伊·列寧關於成立南高加索共和國聯邦的提議草案並寫對草案的意見和修正。弗·伊·列寧採納約·維·斯大林的修正。

十一月二十九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提出的關於成立南高加索共和國聯邦的決議案。

十二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的「前途」一文在「真理報」第二八六號上發表。

十二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和人民委員會其他委員一起在人民委員會關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

和國電氣化計劃的決議草案上簽字。

十二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被全俄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選入主席團。

十二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被全俄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十二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被全俄第九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並被批准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和工農檢查人民委員。

十二月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

一九二二年

一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部務會議上擔任主席並就成立卡拉恰也夫——切爾克斯省問題發言。

一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把俄共(布)中央給土爾克斯坦共產黨的通知信草稿寄給維·米·莫洛托夫。

一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建議召開各獨立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會議來討論出席熱那亞會議的共同代表問題。

一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部務會議上擔任主席並就審查一九二二年預算問題發言。

一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全俄第九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非常會議，會議討論了派遣代表團出席熱那亞會議的問題。

年 表

三五二

一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老布爾什維克協會」成立會上就協會章程問題發言。

約·維·斯大林在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部務會議上擔任主席並就草擬關於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省特派員條例的訓令問題發言。

二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和亞·德·翟魯巴接見一批教授——高等技術學校的代表。

二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格魯吉亞共產黨員，指出必須採取實際措施來執行弗·伊·列寧關於加強格魯吉亞紅軍的指示。

二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收到弗·伊·列寧關於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起草工農檢查院監督私人合股商店和企業的草案的便箋。

三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收到弗·伊·列寧關於使用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去幫助人民委員部機關檢查決議執行情形的信。

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三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選入代表大會主席團。

三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入二十二個人（過去的「工人反對派」集團）案件調查委員會。

三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二十二個人（過去的「工人反對派」集團）案件調查委員會的工作。

三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選入關於黨的財政政策的決議最後修訂委

員會。

四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

四月三日

俄共(布)中央全會根據弗·伊·列寧的提議選約·維·斯大林為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四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弗·伊·列寧，談改變供應農民種子的方式問題。

五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紀念『真理報』創刊十周年(回憶)」一文，該文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真理報』第九十八號上發表。

五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為祝賀『真理報』創刊十周年紀念給該報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九十八號上發表。

五月十二日至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關於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央機關相互關係的條例起草委員會。

五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的俄共(布)中央就統一戰綫的策略問題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在『真理報』第一一〇號上發表。

六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擴大全會的會議。

六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的俄共(布)中央給柯爾克茲共和國共產黨員的信在『民族生活』雜誌第十二期(總第一四七期)上發表。

七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的俄共(布)中央就開展繳納糧食稅運動問題給各省委員會、各區域委員會、中央各民族常務局和各區域常務局的信在『真理報』第一五一號上發表。

年 表

七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探望在哥爾克休養的弗·伊·列寧。

七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把弗·伊·列寧的健康狀況電告格·康·奧爾忠尼啓澤。

八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會關於黨的第十二次代表會議各項工作組織委員會會議上担任主席。

八月四日至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國代表會議的工作。

八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會議選入主席團。

八月五日

弗·伊·列寧召約·維·斯大林前往哥爾克並委託他向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會議祝賀。

約·維·斯大林在下午會議上向代表會議轉達弗·伊·列寧的祝賀。

八月十一日

黨中央委員會成立以約·維·斯大林爲首的委員會來準備向俄共(布)中央全會提出關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南高加索聯邦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

九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關於他探望在哥爾克休養的弗·伊·列寧的短文。

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關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南高加索聯邦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委員會的工作。

九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和弗·伊·列寧談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成聯盟國家的問題。

十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做關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南高加索聯邦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的報告。全會決定成立以約·維·斯大林爲首的委員會來領導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成統一的聯盟國家的準備工作。

十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向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傳達俄共(布)中央全會關於保留南高加索聯邦以及它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共和國、白俄羅斯共和國聯合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決議。

十月三十日

黨中央委員會批准約·維·斯大林爲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十一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爲慶祝十月革命五周年致彼得格勒的賀電在「彼得格勒真理報」第二五一號上發表。

十一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和「真理報」記者關於各獨立民族共和國聯合問題的談話在「真理報」第二六一號上發表。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
二十八日

俄共(布)中央全會委員會在約·維·斯大林領導下起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基本條文」。

十一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關於共和國聯盟的報告。政治局根據約·維·斯大林的報告批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基本條文」。

十二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會委員會會議上被選入起草共和國聯盟憲法原文和宣言原文的小組委員會。

年 表

三五五

十二月五日至十六日之間

約·維·斯大林起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宣言」草案。

十二月十六日

俄共（布）中央全會委員會在約·維·斯大林主持下通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條約草案和約·維·斯大林提出的宣言草案。

十二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做關於各蘇維埃共和國聯盟條約草案的報告。全會決定成立以約·維·斯大林爲首的委員會來籌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

十二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會議。

十二月二十三日
至
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被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選入主席團。

十二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做關於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的報告。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共產黨黨團會議上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問題發言。

十二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被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選爲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出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十二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被全俄第十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爲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並被批准爲民族事務人民委員。

十二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全權代表團會議上報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工作日程。會議委託約·維·斯大林在代表大會上做關於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報告。

十二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選入代表大會主席團。

約·維·斯大林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做關於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報告。代表大會選約·維·斯大林為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約·維·斯大林在蘇聯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表演說並被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

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的一九二三年祝詞在「消息報」創刊號上發表。

一九二三年

一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布里亞特—蒙古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成立問題委員會的會議。

一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被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選入蘇聯各人民委員部組織機構方案制定委員會。

一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做「論黨的戰略和策略」的講演。

年 表

二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關於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內成立代表蘇聯各民族利益的機關——第二院的建議。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二月二十一日 俄共(布)中央全會討論約·維·斯大林提交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關於民族問題的提綱草案。會上成立以約·維·斯大林爲首的委員會來最後修訂這個提綱。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中央全會選入俄共(布)中央提交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組織問題提綱最後修訂委員會。

二月二十四日 俄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成立以約·維·斯大林爲首的委員會來領導蘇聯憲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三月十一日至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託，把弗·伊·列寧的健康狀況用電報通知各省委員會、各區域委員會、各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各中央委員。

三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的「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戰略和策略問題」一文在紀念俄國共產黨(布)建立二十五周年的「真理報」第五十六號上發表。

三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報告提交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民族問題提綱。政治局決定把這個提綱作爲俄共(布)中央批准的提綱發表。

三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的提綱「在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在「真理報」第六十五號上發表。

四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次代表會議選爲出席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

的代表。

四月十七日至二十
五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四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選入代表大會主席團。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做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

四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做關於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的結論。

四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做「關於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

四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選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四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民族組的工作，並在該組就蘇聯憲法問題發言。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做「關於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的結論。

四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中央全會選為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代表，並被批准為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五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的「報刊是集體的組織者」一文在「真理報」第九十九號上發表。

五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的「欲蓋彌彰……」一文在「真理報」第一〇二號上發表。

年 表

三五九

五月二十四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約·維·斯大林爲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參加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蘇聯憲法起草擴大委員會的代表。

五月至六月

約·維·斯大林參加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憲法起草擴大委員會的工作。

六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報告關於召開有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負責工作人員參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會議的準備工作。政治局批准約·維·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問題綱領草案。

六月九日至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有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負責工作人員參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會議的工作。

六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有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負責工作人員參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會議上發表關於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的右派和「左派」的演說，並做貫徹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的實際措施的報告。

六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有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負責工作人員參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會議上做報告的結論。

六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憲法起草擴大委員會會議上就統一的聯盟國籍問題發言。

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的工作。

六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做關於蘇聯憲法的報告。

- 七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的俄共(布)中央號召把弗·伊·列寧的全部札記、書信、筆記和其他文件獻給在莫斯科成立的弗·伊·列寧研究院的公告在『真理報』第一五一號上發表。
- 七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其他委員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蘇聯憲法後簽署的『告全世界人民和政府書』在『真理報』第一五六號上發表。
- 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 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有十個黨組織的代表參加的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工作。
- 十一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中間階層問題』一文在『真理報』第二五三號上發表。
- 十一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紀念女工和農婦第一次代表大會五周年』一文，該文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女共產黨人』雜誌第十一期上發表。
- 十一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軍事學院紀念騎兵集團軍建軍四周年的慶祝大會上發表演說。
- 十二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紅色勃列斯尼亞區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做『關於黨的任務』的報告。
- 十二月五日以前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起草關於黨的建設的決議草案的小組委員會的工作。該決議於十二月五日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上通過並在十二月七日『真理報』第二七八號上發表。

十二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的「關於爭論，關於拉法伊爾，關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論文和薩普龍諾夫的論文以及關於托洛茨基的信」一文和約·維·斯大林簽署的俄共（布）中央黨內狀況問題的爭論告俄共（布）各級組織書在「真理報」第二八五號上發表。

十二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的「必要的指摘（關於拉法伊爾）」一文在「真理報」第二九四號上發表。